

塔利班非基地组织 奥马尔·本·拉登 权威揭秘塔利班真相



塔利班

TALIBAN

宗教极端主义 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

★ 透视9·11事件前后全球新一轮大国博弈 ★

〔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 著 钟鹰翔 译



Taliban


塔利班

宗教极端主义
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

[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 (Ahmed Rashid) 著
钟鹰翔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Copyright Ahmed Rashid, 2000, 2001, 2008, 201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B.Tauris & Co Ltd, Lond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B.Tauris & Co Ltd, London. The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of this book is entitled Taliban: The Power of Militant Islam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 and published by I.B.Tauris & Co Ltd

版贸核渝字(2010)第15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利班 / (巴基斯坦) 拉希德著 ; 钟鹰翔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 1

书名原文: Taliban

ISBN 978-7-229-08704-3

I. ①塔… II. ①拉… ②钟… III. ①政治—研究—阿富汗 VI. ①D7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875号

塔利班

TALIBAN

[巴基斯坦]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 著 钟鹰翔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连果

责任校对: 刘晓燕

书籍设计: 热浪文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政编码: 400064

<http://www.cqph.com>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 000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70千 插页: 2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704-3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For my mother
What I have seen she taught me to see
I hope I have honoured it
And for Angeles*

献给我的母亲
那些她教给我的事情，我已经践行
希望我没有辱没她的声名
同时，献给安赫莉斯

Advance Praise For Taliban

《塔利班》一书的发行评语

通过这部杰作，读者将对纷乱的阿富汗政治以及相关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毒品和教派冲突一目了然。

——帕特里克·希尔《星期日泰晤士报》（Patrick Seale, *Sunday Times*）

关于塔利班崛起的第一部信史。

——里克·阿里《新左翼评论》（Tariq Ali, *New Left Review*）

拉希德对这场纠纷中的各色人等了如指掌，他们就如同19世纪大博弈年代里的人物一样狡诈多变。

——鲁珀特·埃迪斯《星期日电讯报》（Rupert Edis, *Sunday Telegraph*）

《塔利班》充满了007式的元素。好战的军阀、崩溃的帝国、统治世界的狂想、暴力和性。在阿富汗问题上，艾哈迈德·拉希德是最可信的真正专家。

——杰森·伯克《观察家报》（Jason Burke, *Observer*）

拉希德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清晰透彻，他将塔利班的崛起放进了阿富汗内战、中亚各国能源政策、美国国家利益以及沙特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大背景之中。

——罗宾·巴内尔基《每日电讯报》（Robin Banerji, *Daily Telegraph*）

本书引人注目、客观中立、资料翔实。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本书堪称完美，值得一读。艾哈迈德·拉希德笔下那些细节不但关乎逸闻趣事，更是倾注了对于无辜人民的同情，这些人深陷国际政治阴谋和霍布斯式的战争中不能自拔。

——罗杰·霍华德《观察者》（Roger Howard, *Spectator*）

通过讲述在阿富汗十多年的个人经历，以及和神秘而癫狂的塔利班领导层的接触，作者抖出了不少内幕。

——理查德·比特森《新政治家》（Richard Beeston, *New Statesman*）

拉希德写下了迄今为止关于塔利班的最详尽记录，对大博弈以降的阿富汗历史做出了一番总结。

——尼尔·吉拉姆《新闻纸》（Neil Quilliam, *BRISMES Newsletter*）

感谢艾哈迈德·拉希德关于政府和公司之间勾结的详细揭露，那些石油公司的主管得到了有关经营的一本百科全书。那些突厥语国度中部分人也可以就此看出他们政府的嘴脸。

——迈克尔·彻奇《独立报》（Michael Church, *Independent*）

人人都在读这本书。

——《卫报》（*The Guardian*）

杰出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销量超过数百万册，已经被译作不少于22种语言版本。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艾哈迈德·拉希德对塔利班研究的成果的重要性应当让我们的政治家惊醒，这本书是现象级的。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精确而冷静，关于塔利班的大师之作。

——《时代》周刊文献版（*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拉希德先生这本关于塔利班的著作的焦点在于外部世界对阿富汗危机的漠视。

——詹姆斯·布坎《标准晚报》（James Buchan, *Evening Standard*）

据说此书对于托尼·布莱尔的思想状况很有影响。同样，它还是美国决策者的目光焦点，帮助他们支持一个稳定的政府以战胜塔利班。

——提摩尔·摩恩《星期日快报》（Timur Moon, *Sunday Express*）

年度最重要图书。

——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

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读书》节目主持人

这是一部杰作，花费了21年的研究和写作……布莱尔给予了很高评价。德国外长费舍尔也在公开场合提到了它。

——卡梅伦·费舍尔《先驱报》（Cameron Simpson, *The Herald*）

好书一本——博学、准确、充满真实感和信息、简单易读。

——迪利普·希罗《中东国际》（Dilip Hir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他的这本新书不但是专业人士的必读物，也值得推荐给那些关心时事的读者，向他们展示一个国家如何从反抗苏联侵略的斗争渐渐堕入下流的过程。

——威廉·马利《今日世界》（William Maley, *The World Today*）

艾哈迈德·拉希德的这部作品可信、可读，凝聚了他辛勤的工作，令人激赏。

——《亚洲新闻》（*Asian News*）

中文版序

1

多年前在喀布尔，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存在。2004年6月10日凌晨，中铁建十四局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附近的一个公路项目营地遭袭，导致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重伤。我当时是新华社驻巴基斯坦首席记者。为增援报道，我于12日乘飞机抵达喀布尔，踏上了战乱频仍的阿富汗土地。那时，我住在喀布尔一家中国人开的只有10多间客房的小旅馆里。不过旅馆24小时都有手持步枪的两名保安守门，感觉比较安全。但就在完成报道任务即将返回伊斯兰堡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旅馆突然听到爆炸声，后来听说那是塔利班武装分子从附近山上向美国大使馆发射火箭弹，但没有命中目标，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里，我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活动的传闻和报道。那时候，巴基斯坦塔利班还没有形成气候。由于历史、宗教、地理和民族等多方面原因，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军方、政府和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政府对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态度和政策也是截然不同的。巴基斯坦坚决打击“基地”恐怖组织。事实上，在穆沙拉夫当政时期，巴基斯坦在本国境内逮捕了多名“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以及消灭了数以百计的“基地”武装人员。但是，巴基斯坦一直把阿富汗塔利班当作一个反政府的极端武装组织，没有对进入巴境内活动的塔利班人员采取军事行动，并主张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通过谈判实现国家和平。

《塔利班》原著自2000年出版以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它已经被译为26种语言。仅英文译本的销量就超过150万册。这堪称出版界的一个奇

迹。《塔利班》的读者有新闻记者，也有外交官，甚至连进驻阿富汗的美军山地师的军人都会人手一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塔利班》一书的价值和影响。该书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是一名长期报道阿富汗战争的巴基斯坦记者。他在书中不仅描述了阿富汗的政治、社会和安全现状，而且详细记录了塔利班的发展历史、指导思想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可以说，《塔利班》既是一本了解阿富汗过去20多年政治和社会的历史书，同时也是深刻了解阿富汗塔利班的一本非常难得的教科书。但由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我们不同，因此作者的有些观点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随着美国即将于2014年底从阿富汗全部撤军，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而且它也将再次成为阿富汗能否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钟鹰翔先生此时将《塔利班》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可谓正逢其时。相信这本书会让方方面面的读者受益匪浅。

荣守俊

2012年2月于北京

序者简介：荣守俊，新华社高级编辑，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伊拉克和赞比亚做记者，2003—2005年常驻巴基斯坦任新华社伊斯兰堡分社首席记者。曾担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总编（挂职），2010年获评“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

中文版序

2

“9·11”事件之后，“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新闻热词一直延续至今，备受关注，艾哈迈德·拉希德先生的《塔利班》一书也因此在世界各地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并登上了《纽约时报》非文学类畅销书冠军宝座，被视为“最好的塔利班类书籍”。中文版的《塔利班》似乎让读者期待得久了些，但塔利班的神秘故事会让读者永远充满好奇和关注。

阿富汗被称为“战争博物馆”，到处可见战火留下的印迹，没完没了的战争、冲突、爆炸和杀戮给这里的人民带来无尽灾难和无法治愈的伤痛，就像一个体无完肤的伤者。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的2002年6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往那里参加战地报道，3个多月的经历，至今挥之不去的是酸楚的感触和记忆。不论是在喀布尔街头，还是塔利班老巢，流离失所的儿童、罩袍下的妇女、无家可归的难民、炸毁的巴米扬大佛、美术馆里被撕毁的书画残片，处处都可以看到塔利班统治留下的阴影和对民众疾苦的冷漠。在位于喀布尔南城区主干道迈旺德大街两侧民房的残垣断壁中，我环顾沉思，是谁燃起了战火把这个美丽家园变成一座凄凉的魔鬼城？在我的《目击阿富汗》一书中这样感言：“就像乘坐一叶小舟，漂到一个远离文明的孤岛上，经历和感受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我把拍摄的照片和采访日记整理成书，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阿富汗，一个被和平与发展遗忘的角落。”阿富汗有2 000多万人，战争导致500多万人成为难民；近10万个家庭失去男主人，因战火死亡和伤残者更难计其数；全国各地密布着战争留下的1 000多万颗地雷，至今每天仍然威胁和伤害着贫民；世界毒品产量的75%产自阿富汗，用它可以置换武器。

作为20多年一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采访的记者、资深学者，

拉希德先生被媒体称为“巴基斯坦最优秀和最勇敢的记者”。他所投入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甚至是生命危险，这让很多同行对他充满敬意。这本《塔利班》透过一个个新闻纪实、深度分析和作者对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问题的长期关注研究，解读了神秘塔利班政权的兴衰、阿富汗政坛的风云变幻、民众疾苦和内忧外患的根源。1979年的苏联入侵、军阀混战和“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把阿富汗拖进深渊。如今，一直被阿富汗政府军、国际安全部队和驻阿美军清剿的塔利班又卷土重来，国家重建恢复步履艰难。

受本书译者钟鹰翔先生之托，作为一个曾经从阿富汗匆匆走过的目击者来为《塔利班》中文版作序。在此，借此书一角为阿富汗人祈祷，但求他们衣食无忧、远离战火、平安度日！不与快乐的人同快乐，但与哀伤的人共哀伤。

赵 鹏

2012年3月于郑州

序者简介：赵鹏，新华社河南分社摄影部主任。2002年6—9月被派往喀布尔参加阿富汗战争采访；2004—2007年常驻美国纽约新华社联合国分社。曾参加过美国总统大选、航天飞机发射、新奥尔良飓风、世界首脑大会、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大阅兵等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拍摄过两任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多国政要。其著有图文纪实类作品《目击阿富汗》，于2003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版前言

自2000年首次付梓以来，这本关于塔利班的作品再次印刷。在一个消费主义横行、记忆趋于短浅的年代，简直是出版界的稀罕事，笔者对此受宠若惊。据笔者了解，拙作已经被译为26种语言，同时，未经授权的盗版译本层出不穷。最近，又发现了叙利亚出版的阿拉伯文译本。而且，本书还至少拥有3个波斯语译本。

拙作被译为英文后，销售量达到150余万册。至于其他语言译本的销售情况，笔者并不清楚。不过，这本书在巴西、波兰、日本等国都登上了畅销书榜，虽然这些地区跟伊斯兰极端主义无甚渊源可言。有一次，笔者甚至在一本皱得不像样的《塔利班》上签了名，那显然是多位读者传看后造成的效果。

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叛乱行为再次引发世界的兴趣和关注，笔者希望，再版后的《塔利班》能成为这一地区从事新闻工作的新一代记者的首要读物。而那些“9·11”事件中还在大学读书的新一代外交官也肯定会加入品读的行列。同时，笔者还期望新一代公众都能读一读这本书，从学生到军人，从研究人员到政府官员，乃至街头的普通男女。广大读者，不分年龄，无论阶层都赞扬此书，因此，出版商方面特此再次出版《塔利班》一书，以飨各位。

对于即将出征阿富汗的美英等北约各国军人，本书会是他们放进行囊的最后一件物品。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对军官，对于普通士兵也是大有益处的。美国北部所有顶尖大学的新生也应该人手一册，在开始正式课程之前，他们最好先完成一篇有关本书的专题论文。实际上，《塔利班》已

经是全世界数千所大学的教学参考书，很多大学生宣称本书是他们认真读过的第一本严肃题材书籍。

因为《塔利班》的缘故，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多次讲演。由于塔利班势力在巴基斯坦的活动升温，年轻一代的巴基斯坦学生不顾校方的反对态度，纷纷要求我去他们的学校讲学。又因为盗版的缘故，本书已经被翻译成阿富汗国内通行的各种语言，似乎每个识字的阿富汗人都已经读过了一遍。女性穆斯林对《塔利班》尤其热情，可能因为这本书对于极端主义盛行的社会加诸女性的迫害作了详尽的叙述。

本书在中亚多处都被列为禁书，因为笔者在书中多次批评这一地区的多国当局，而所涉人物大多还在其位，即便如此俄文版《塔利班》仍然在当地秘密流传。同样，因为政治和宗教原因，沙特阿拉伯也成为本书的禁区。但《塔利班》在黎巴嫩付印的盗版阿拉伯语版本仍然大有市场，这个版本如此隐秘，以至于我本人都未曾见过。

20世纪90年代末，《塔利班》的出版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如今看来都成就了本书的传奇性。笔者仍然记得，当时英美两国的书商和出版经纪人人都大惑不解地追问：“塔利班？那是什么东西？”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也有一则关于塔利班的故事。就任总统之前，布什先生一度认为塔利班是个流行乐女子组合。“9·11”事件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转变。塔利班成为无数笑话、打油诗、卡通的素材，无数的书籍和论文也因此找到了主题，更别提那些一夜之间变成的塔利班事务专家了。

“9·11”事件一直阴魂不散，它时刻地在我们的梦魇中重演。那可怕的一天所带来的梦魇，在当今的阿富汗还真实地存在着。虽然付出了数以亿计的金钱和成千上万的生命，浪费了大量的时机，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仍然猖獗，对地区的稳定形成巨大威胁。塔利班的活动已经不仅限于阿富汗，他们的势力延伸到了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塔利班已经超越了基地组织，成为南亚和中亚地区极端主义分子的目标和榜样。

“9·11”事件已经过去8年，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仍然对塔利班无可奈何，而愤怒的伊斯兰狂热分子依旧视塔利班为行为楷模。塔利班的思想方式继续蛊惑着这一地区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未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在决心再版《塔利班》一书的时候，笔者曾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另起

炉灶，根据最新时事进展，逐节进行添补；要么开辟新篇，在原书基础上另增一章，专述2000—2009年间塔利班活动的内容。为使旧版的结构不致变动，最终选择了后一种方案。笔者创作旧版《塔利班》的时候正值20世纪90年代末，身处塔利班的控制范围之内，一字一句都是历史瞬间的忠实笔录。笔者报道阿富汗战争逾10年，其间遭遇的人、事、物，获得的种种知识和见闻，悉数浓缩在旧版中。此外，针对阿富汗这个失败国家，旧版《塔利班》就该国各部族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演进史方面提供了一些资料，可用于相关领域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本书还揭示了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临近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书中指出，由于美国和西欧的漠视，阿富汗的邻国参与并制造了阿富汗的分裂局面。可想而知，如果西方世界置阿富汗于不顾，相关敌对势力会立即卷土重来，地区更无宁日。

最重要的是，旧版《塔利班》是第一本详尽记录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所作所为的著作，它的内容还涉及了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共同统治阿富汗的种种事实。当然，现在对本·拉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专门产业。综上所述，我保留了旧版的大部分内容和结构。读者可能觉得本书的某些资料有一点过时，而且对事实阐释不够详尽，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对当下时事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对“9·11”之前诸多往事的了解。

本书的新增章节将继续讲述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故事，并为读者揭示塔利班巴基斯坦分支的发展，以及两地塔利班组织对于中亚形势的影响。塔利班能从2001年的惨败中脱身逃往巴基斯坦，和美军来袭前他们在阿富汗的经营大有关系。时至今日，所有的极端主义领袖，包括奥萨马·本·拉登、毛拉·奥马尔、亚拉鲁丁·哈扎尼、古尔布丁·希克梅贾尔等，以及塔利班巴基斯坦分支的一众小头目，无不在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藏身。塔利班逃出重围的历程，新增章节中会加以重点着墨。部分段落直接引自笔者的最新著作《堕入乱局：美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地区民族建设的失败》。该书涵盖了2001年以来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种事件，对于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惨败也作出了分析。

拙作能够长期出版，并不断推出最新版本，有赖于出版社各位精英，以及I.B.塔乌里斯（I.B.Tauris）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笔者在此致以深

深的谢意。感谢我在纽约的经纪人弗利普·布罗菲（Flip Brophy），没有他的努力，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感谢苏珊·拉伊提（Susan Laity）女士对新增章节的编辑指正。

此外，我对家人十分愧疚，尤其是我的太太安赫莉斯（Angeles）。笔者长期出门在外，在家也忙于伏案工作，而她都给予了宽容。

艾哈迈德·拉希德
于马德里

前言

写在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之后

1989年之后，美国和西方阵营对于内战不止的阿富汗一直不闻不问。2001年9月11日，阿富汗血腥而又悲剧性地重获世界关注，而国际局势也因此彻底改变。这一天，19名自杀袭击者劫持了4架航空班机，其中的3架分别撞击了纽约的世贸双子塔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袭击者都来自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领导的基地组织（Al Qaeda），而该组织的大本营位于塔利班（Taliban）统治下的阿富汗。他们的行动不但直指冷战后的世界中心，而且瞄准了全球化运动的心脏所在，意在恐吓一切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力量。

恐怖硝烟尚未散尽的几小时内，乔治·W. 布什总统一声令下，吹响了向国际恐怖主义宣战的号角。9月15日，布什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他还表态：“任何将战争加诸于美国的人，都等于自取灭亡。”布什警告，美国面临着一场“没有阵地、没有滩头”的战斗，而且这场战事“不会很快结束”。为了惩罚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布什承诺美国将联合北约和其他盟友，组成国际阵线。

布什的诺言很快兑现。9月还未过去，美国的战斗机就踏上了轰炸阿富汗的征途。少数几个北约成员（以英国最为积极）为美军提供后勤，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组成的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一路南下，先后攻占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Herat），最终夺取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以及在美国直接支持下北方联盟的咄咄攻势，塔利班的抵抗迅速瓦解殆尽。那些依附塔利班的普什图军阀也显现了墙头草的本性，纷纷倒向美军。

虽然身为塔利班重镇，喀布尔的陷落却并无任何传奇色彩。塔利班

首领奥马尔（Omar）戏剧性地逃出重围，这位毛拉乘坐摩托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说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美军对阿富汗东部进行了大轰炸，最终也没能找出本·拉登的任何踪迹。坊间流传他已经身亡，也有人认为，基地组织的首领身在国外，藏匿在巴基斯坦或者克什米尔，甚至逃到了伊拉克。大部分基地组织战俘被集中羁押。经过在马扎里沙里夫看守营里的一番困兽之斗，其中的数十名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分子被转送到位于古巴的美军关塔那摩基地服刑，而他们那些留守阿富汗的同伴也承受着同样的命运。同年11月27日，阿富汗各大政治派别在德国波恩（Bonn）进行紧急磋商，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这次会议上当选阿富汗临时政府首脑，任期直到支尔格大会——查希尔·沙阿当政时代的部落长老会议——召开为止。卡尔扎伊于2002年1月来到美国并会晤了布什总统。这次来访象征着塔利班统治的覆灭。行程所到之处，阿富汗的临时元首时时刻刻都沐浴在西方政治家们的赞誉之中。不过，卡尔扎伊的各项政令在阿富汗国内施展得并不顺畅，军阀间的对立、部族间的冲突，都对脆弱的和平环境形成了巨大威胁。2002年3月，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顽固分子被发现在加德兹（Gardez）一带蠢蠢欲动，阿富汗的战争风险随之升级。为此，美军不得不再次对这一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这次空袭的目的是摧毁各种山洞，窒息委身其中的顽固分子，扑灭他们反抗的火焰。

无论未来阿富汗的前途如何，都不能否认“9·11”事件的残忍行径。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塔利班政权的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参与“9·11”事件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美国和德国接受过飞行员训练，他们都是新一代的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位属中产阶级，有工作也有家庭和女朋友。但是，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不可抑制的愤怒。数年来，他们持续不断地被这种愤怒激化，不惜以4 000多人的生命作为发泄的工具。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过是普通而虔诚的美国籍穆斯林而已。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基地组织对他们的训练和引导，部分相关内容都将在本书中得到披露。

不过，如果没有安全的庇护所、训练、资金、通讯等有利条件，基地组织的一切谋划都不能成真。正是由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漠视，使得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成为基地组织极端分子的训练场。在阿富汗受训的极端分子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国家。成员3 000余人，来源分布于至少13个阿拉

伯国家，在34个国家拥有分支的基地组织只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伊斯兰极端分子甚至从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伊朗、中亚地区及一些远东国家远道前来，他们都为塔利班而战，并承担着在自己的故乡展开秘密行动的使命。

阿富汗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中心，但不能因此怪罪苦难深重的阿富汗人民。多年以来，他们深陷塔利班和反塔利班势力“联合阵线”（UF）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之中，饱受干旱、饥荒、内战等恶果的折磨。

“9·11”事件实际上早有先兆——联合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ud）的遇刺，而此人正是塔利班最想除掉的反对派领袖。马苏德死前两天，两名持比利时护照的摩洛哥年轻人伪装成记者，他们把炸弹藏在摄像机中，自布鲁塞尔、伦敦、伊斯兰堡一路来到喀布尔。当马苏德在阿富汗北部接受两位“记者”的“采访”时，炸弹发生爆炸。重伤的马苏德只坚持了几个小时便一命呜呼。毋庸置疑，事件由基地组织一手策划，既除掉反对派最为精明强干的领袖，又拉近了和塔利班政权的关系。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十分清楚，他们的行径必然招来美国的报复。不过两位极端主义领袖都有十足的信心，既然阿富汗圣战组织能通过10年战争摧毁强大的苏军，他们也能让入侵的美军陷入绝境。

进入2001年，塔利班对西方世界的仇视与日俱增。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UNSC）通过1333号决议，对塔利班进行制裁。制裁内容包括武器禁运、对塔利班海外资产的查封、禁止塔利班当局利用阿里亚娜航空公司（Ariana）进行旅行和国际运输。联合国安理会认为，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是全世界恐怖主义的中心，且有包庇本·拉登之嫌。对此，塔利班反应激烈，宣称要与本·拉登共存亡。最让塔利班不能接受的是，武器禁运对联合阵线毫无约束力。塔利班的敌人仍然源源不断地从俄罗斯、伊朗、印度、中亚诸国获得军火。

面对禁令，塔利班的最大武器来源地——巴基斯坦处境尴尬。巴方承诺会遵守联合国的要求。不过，在当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全球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美国外交部指出，巴基斯坦仍在“燃料、资金、技术支持和军事顾问”等方面给塔利班予以支持。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的相关调查显示，巴基斯坦已然违背联合国的禁运令，向塔利班提供军需和人力支持。由于国际社会对巴基斯

坦的怀疑，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31日通过第1363号决议，派专员前往巴阿边境，以确保联合国禁运措施的有效实行。而塔利班和支持他们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党派，则威吓联合国专员敢来一个，他们就杀一个。

更有甚者，2001年的前9个月之中，不断有警告爆出，显示恐怖袭击行将临近。2月5日，纽约地方法庭开庭审判4名本·拉登的阿拉伯裔追随者，他们被控于1998年用炸弹袭击两处位于非洲的美国大使馆。5月29日，4人被裁定犯有302项恐怖主义罪名，他们将度过长时间的牢狱生涯。3月，阿尔及利亚人艾哈迈德·雷萨姆（Ahmad Ressam）被指控从加拿大携带爆炸物入境美国，他原计划于2000年炸毁洛杉矶机场。1—8月之间，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先后拘捕20名阿尔及利亚人，他们都和本·拉登关系密切，同在阿富汗受训，并涉嫌恐怖袭击欧洲的图谋。6月23日，阿拉伯海上的美国舰队接到恐怖袭击警告，随后宣布进入最高警戒状态，驻非洲和海湾地区多国的美国大使馆也纷纷关门了事。华盛顿方面同时警告塔利班，若本·拉登发动袭击，美国将对塔利班进行报复。

联合国的禁令虽然在国际上孤立了塔利班政权，却也使后者走上了同西方全面对抗的道路。此时，阿富汗正经受着农业减产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洪灾导致100万人流离失所，甚至逃离阿富汗。1月间，塔利班和联合阵线为争夺阿富汗中部的哈扎腊贾特（Hazarajat）展开激战。该地区为哈扎腊人聚居地，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与属于逊尼派的塔利班水火不容。塔利班于1月8日重新夺回亚克朗（Yakowlang），据有关人权组织的文件透露，在此期间塔利班杀害了210名平民。2月13日，联合阵线一度夺回巴米扬（Bamiyang），但塔利班很快反击成功。作为惩罚，也为了挫伤哈扎腊人的反抗意志，塔利班领袖穆罕默德·奥马尔命令部下摧毁巴米扬山谷里的两座巨型佛像。这两尊大佛都建于1800余年前，如今，蜂拥而来的塔利班用炸药和坦克炮威胁着它们的安危。谴责声从日本、斯里兰卡和埃及等全球各地飞来。世界各大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浪潮，佛教信众、阿富汗侨民和艺术爱好者纷纷加入指责的行列。不过，塔利班方面并无退缩之意。3月10日，佛像在爆破声和炮击声中化为灰烬，同时，塔利班当局还将喀布尔博物馆中的40多尊佛像一并毁灭，格哈兹尼（Ghazhni）的一尊卧佛像也遭劫难。不过，塔利班也借机指责外界对自己的孤立。他们认为，全世界的目光宁肯集中在一堆佛像上，也不愿意关心一下饥荒中的阿富汗人民。尽管塔利班对于阿富汗人民的苦楚最是置若罔闻。

佛像事件让许多国家看清了塔利班的面目，以及这个政权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当年4月，联合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阿·马苏德首次出访欧洲。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说。访欧期间，马苏德还访问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并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外长。联合阵线还有一个好消息——拉希德·杜斯图姆（Rashid Dostum）将军回国了。凭借土耳其方面的援助，杜斯图姆在阿富汗北部建立了基地，借助乌兹别克武装拓展势力。杜斯图姆和伊斯梅尔·汗（Ismael Khan）的军队遥相呼应，形成对抗塔利班的一对犄角。伊斯梅尔·汗是阿富汗西部的前任行政长官，其势力范围以古尔（Ghor）省为中心，得到伊朗的支持。如此一来，塔利班在夏季战场上必须同时面对两支联合阵线部队的挑战。

4月16日，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Mohammed Rabbani）因癌症在卡拉奇一所医院内去世。拉巴尼是塔利班舒拉（内阁）的首脑，被认为是位温和派人物，塔利班与马苏德方面的对话由他一手负责。拉巴尼的去世，代表着温和派势力在塔利班政权内的全线溃退。强硬派从此再无桎梏，他们可以放手贯彻全力对抗西方的政策，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去经营这个所谓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此后，塔利班新出台的一系列规定无不是严重侵犯人权、戕害阿富汗人民的恶法。其强硬态度波及到了阿富汗境内的联合国机构和各大人道主义救援组织，5月19日，塔利班强行关闭了喀布尔一间意大利医院，医生们被控与阿富汗妇女往来过密，随即被驱逐出境。两天之后，一项旨在防治脊髓灰质炎的联合国计划因为塔利班的不合作态度而被迫中止。5月22日，塔利班规定，阿富汗境内所有印度教信徒须在衣服上佩戴黄色标记，以示区别。这一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数周之后，塔利班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但印度教信徒仍需随身携带黄色身份证明。当时，阿富汗境内约有1 700余名印度教和锡克教信徒。5月31日，塔利班当局又规定，参与人道主义救援的外国女性不得驾驶车辆。

塔利班和国际救援组织的最大龃龉还不止于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承担着300多万阿富汗人的救援任务，该组织原计划通过设在喀布尔的烤馕房向当地人提供主食津贴。这一计划遭到塔利班的回绝。历经数月，谈判最终破裂。联合国方面威胁将于6月15日前关闭设在喀布尔的157家烤馕房。塔利班并不示弱，转而求助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救援组织，但并无多少效果。联合国方面按计划关停了所有烤馕房，而塔利

班被迫在两天后提出妥协协议。

7月13日起，塔利班颁布禁令，禁止互联网在阿富汗的使用。一周以后，另一项禁令断绝了30多种商品的入境，游戏机、音乐磁带和唇膏等都在禁入之列。

8月5日，塔利班和救援组织再次发生冲突。“保护现在国际委员会”（Shelter Now International）属下的16位阿富汗雇员和8名外籍人士遭到逮捕，罪名是企图传播基督教。根据塔利班法律，这一指控足以导致死刑判决。受审的8名外国人之中，有4位来自德国。这一案件将于9月4日在喀布尔开审，并根据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作出判决。

6月1日，塔利班开始了每年度的夏季攻势。2.5万名塔利班士兵向喀布尔郊外的联合阵线武装发起攻击，塔利班阵营中约有1万余人属于非阿富汗籍（分别来自巴基斯坦、阿拉伯国家和中亚诸国）。战事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省（Takhar）和哈扎腊贾特展开。联合阵线方面虽无夺取塔利班势力范围的能力，但尚能坚守原有的分界线，而且，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和西部新开辟的战场分散了塔利班的兵力。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一份安理会报告中呼吁，阿富汗要实现和平亟须“多方努力”，而以往的促和努力“未收到成效”。安南认为，刺激政策和重建计划同样重要。他还指出，越来越多的非阿富汗籍伊斯兰极端分子拥入阿富汗为塔利班而战。

政治危机加剧了阿富汗人民的苦难。2001年，该国被评为世界上人道主义灾难最为深重的地区。约有360万阿富汗难民流亡国外，居世界之冠。其中220万人滞留巴基斯坦，120万人逃往伊朗。当年9月之前，更多的阿富汗人民加入难民潮，80万难民在阿富汗国内流离失所，20万人逃到巴基斯坦，10万人涌入伊朗。长时间的干旱使得农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抛弃土地，涌入城市。但是，城市中的救援组织严重缺乏物资，而且行动处处受到塔利班阻挠，他们对难民的困境爱莫能助。2001年1月的赫拉特地区，聚集了8万余人的6处难民营里，有100名难民死于严寒，其中大部分为儿童。在阿富汗北部，20余万人失去家园。他们只能用草料、动物饲料和老鼠充饥，为了换取食物，许多人不得不廉价出卖儿女。

联合国无力解决阿富汗的农业问题。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因干旱和种子短缺，2001年阿富汗的耕地减少了一半，70%的牲畜因饮水和

饲料短缺而死亡。6月，联合国再次就粮食短缺提出警告，若国际社会不加大救援力度，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将不可避免。不过，塔利班对救援组织的钳制，让许多西方国家在救援问题上犹豫不定。

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1—2002年之交的冬天，约有550万难民亟须粮食救助，而2000年同期，该项数字约为380万人。8月底，阿富汗的人道危机演变为国际问题，澳大利亚拒绝接收以阿富汗人为主的438名难民。这些难民本想搭乘印度尼西亚船只前往澳大利亚，不料中途遭遇沉没事故，因得到一艘挪威油轮救助而幸免于难。而在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中，阿富汗人也成为了主力。

塔利班对罂粟出口的打击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危机。要知道，塔利班在多种问题上无视国际社会呼吁，唯在打击罂粟种植方面相对较为配合。

罂粟花是鸦片和海洛因的原料，也是多个阿富汗武装派别的财源。2000年7月，奥马尔明令禁止罂粟种植，随着时间推进，禁令愈加严厉。2001年3月，联合国和美国方面承认塔利班在禁绝罂粟方面的成效，至于因禁令带来的农民生活困难问题，不少国家主动请缨为困难农户提供替代作物和肥料。实际上，许多农户因无法种植罂粟而沦为难民。但是，源源不断的鸦片仍然通过秘密渠道流入塔吉克斯坦和伊朗等邻国，继而销往俄罗斯和欧洲。2000—2001年间，鸦片价格增长了10倍。

“9·11”事件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阿富汗是影响国际和地区稳定的火药桶。干旱、内战、难民潮、毒品交易、塔利班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以及恐怖分子的不断流出，种种迹象已经为西方势力敲响警钟，危机迫在眉睫。

但是，直到飞机撞入世界贸易中心，引发纽约一片慌张的那个明媚清晨，全世界方才意识到阿富汗问题的严重性。现在，随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挥兵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如果不能在阿富汗建立稳定的新政权，这个国家的危机和混乱只会使得恐怖主义和极端行为愈演愈烈。

前言和致谢

《塔利班》的写作前后历经21年，几乎和我的记者生涯相等。21年来，我的祖国巴基斯坦一直新闻事件不断，其后又有中亚局势和苏联解体引人注目。不过，此间我的大部分人生，还是都耗在了阿富汗的战事当中。

为什么是阿富汗？对于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独特之处，我已经多次提及。那些造访过阿富汗或者曾和阿富汗人接触过的有缘人肯定会有相同的感受。另外，阿富汗内战持续不断，时间之长创造了世界纪录。人民深陷其中，默默地承受煎熬。

阿富汗人的个性，阿富汗人的故事，充斥着各种矛盾的对立。他们勇敢顽强、慷慨大方、热情好客、富有魅力。但是，有的时候，一些男男女女也会现出狡黠、卑鄙乃至嗜血的一面。

几个世纪以来，了解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国家已经成了一门艺术和一种权力的角逐。波斯人、蒙古人、英国人、苏联人以及最近的巴基斯坦人都是游戏的参与者。不过，外来客无一例外地败走阿富汗，他们既不能征服这个国家，也无法洞悉当地人民的灵魂。阿富汗人先后让英国和苏联两大帝国陷入困境。在这一点上，20世纪之中，还没有其他民族能与他们比肩。但是，最近21年，阿富汗人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150多万人死于战事，整个国家变成一片瓦砾。

在我的阿富汗故事中，幸运常常前来关照。许多次，我只是碰巧撞对了时间和地点。我曾经看到军队坦克开进喀布尔总统宫。那是1978年，总统还是达乌德（Daud）。政变开启了阿富汗四分五裂的历史。一年后，在坎大哈巴扎（Kadahar Bazaar）饮茶的我又目睹了苏联坦克的入侵。此后，我全程见证

了苏联军队和圣战组织（Mujaheddin）的鏖战。正因为如此，家人们催促我写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就像当时其他记者所作的那样。不过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为虽然我有很多故事可讲，却不知道从哪里讲起。

1988年，我一度有了写书的决心。当时，我正在日内瓦采访联合国组织的多方谈判。会议耗时数月，气氛让人痛苦，最终以《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和苏军撤离阿富汗落下帷幕。作为参与采访的200位记者之一，我有幸多次参与了外交官之间的私下聚会，了解来自联合国、美国、苏联、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的多方消息。不过，那本书并没有付诸笔下。因为日内瓦会议并未给我亲爱的阿富汗人民送去和平。相反，血腥而让人绝望的战争困扰他们至今。

后来，我去了中亚，那里曾经留下阿富汗人民先祖的足迹。同时，我看到了苏联的解体。此后，一本由我执笔，从苏联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视角出发的作品诞生了。不过，阿富汗发生的一切常常让我揪心。

1992年，圣战组织攻入喀布尔市区，纳吉布拉（Najibullah）政权砰然崩溃。当时，我正在喀布尔的枪林弹雨中穿梭，这也许本应该是另一本书的由头。这年之前，阿富汗的题材已经引领我走遍了莫斯科、华盛顿、罗马、吉达、巴黎、伦敦、阿什哈巴德、塔什干和杜尚别。最终，塔利班的独特，以及相关文献的缺失，使我下定决心要讲一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同时，这也是对阿富汗21年来发生的种种故事的延续，我个人的历史也会穿插其中。

长期以来，作为严肃的阿富汗关注者，我在巴基斯坦记者中形单影只。虽然战火就燃烧在邻国，而且时时影响着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乃至奠定了齐亚·哈克（Zia-ul Haq）军政府的统治基础。此外，早在1982年，我已经察觉到伊斯兰堡当局对阿富汗政策的重要性，它不但会在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内政中扮演关键角色，还将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引回国内。如今的巴基斯坦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毒品肆虐、枪支泛滥、腐败横行、暴力不断正腐蚀着这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的局势对于巴基斯坦更为重要。

对于我的作品和观点，巴基斯坦的当局者常常有不同意见。和齐亚意见不一是有代价的。1985年，因为一些批评意见，我被总统先生手下的情报人员聆讯长达6小时，然后又遭遇强制封笔6个月。当时的我只好以假名发表文章。我的电话常常被监听，而一切行动也时不时遭到监控。

阿富汗这个国家就像它的子民一样，充斥着矛盾，让记者们精疲力竭、无所适从。比如，圣战组织军阀古尔布尔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ldin Hikmetyar）曾经缺席判处我死刑，罪名是同情共产主义。我还有一位同罪相

怜的难友——英国广播公司的乔治·阿尔内（George Arney）。有一年，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希克马蒂亚尔的党报上，成为了悬赏通缉告示的一部分。还有一次，我刚刚抵达喀布尔，就遭到一群武装分子的追杀。在那之前，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的火箭弹命中了麦克罗延（Microyan）住宅区，两名男孩因此身亡。街坊们把我当成了前来检查损失的希克马蒂亚尔武装人员，自然要索我性命。

1981年，我还曾经被傀儡政权手下的秘密情报组织（KHAD）逮捕过，这个特务机关完全以苏联克格勃为榜样。事由是在喀布尔邮局阅读《时代》周刊，而该杂志属于被禁之列。当时，纳吉布拉亲自审讯了我。纳吉布拉当上总统后，我也多次回访过他。纳吉布拉一直认为，我可以代他给贝·布托（Benazir Bhutto）总理捎个口信。我向他表示，总理女士没有兴致关注我，事实上她确实没有那份心思。

此外，我不止一次地被困在战场上。其中有圣战组织和傀儡政府的较量，也有圣战组织之间的火并，以及塔利班和马苏德（Ahmad Masud）部队的交火。我不是个打仗的料，遇到这些情况只能选择抱头逃窜。

没有大众的帮助，我的阿富汗之旅寸步难行。在这里，我要谢谢许多人。首先是众多的阿富汗人，包括塔利班的各位毛拉，反塔联盟的各位指挥官，还有在他们之前出现的众多军阀，以及那些战场上的普通士兵。此外，还有出租车司机、知识分子、志愿者和农夫。人员太多，不胜枚举，而且逐个地感谢，恐怕会带来麻烦。谨向他们献上我的感谢。

此外，我的巴基斯坦同胞也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这些部长、外交官、将军、公务员和情报人员不仅对我推心置腹，还对我的观点深感认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我的挚友。

许多年来，联合国机构和非政治援助组织在阿富汗境内为我提供了庇护，他们的观点、信息和支持也让我受益匪浅。对于联合国阿富汗人道援助协助办公室的各位负责人——马丁·巴伯（Martin Barber）、阿尔弗雷多·塞斯塔里（Alfredo Cestari）、埃里克·德·穆尔（Eric de Mul）和布里奇特·诺伊巴赫（Brigitte Neubach），我要献上万分的致谢。他们在阿富汗的工作年限几乎和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我还要感谢联合国难民署的各位专员，包括罗伯特·范·鲁文（Robert van Leeuwen）、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斯里·维贾拉南（Sri Wijaratne）、雅克·穆谢（Jacque Muchet）、鲁珀特·科尔维尔（Rupert Colville）和莫妮克·马尼亚（Monique Malha）。世界粮食计划

署的阿丹·阿达尔（Adan Adar）尤为值得一提，他对塔利班的洞察远远超过其他联合国官员。

我还要向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的各位——弗朗西斯·奥凯洛（Francis Okelo）、詹姆斯·恩戈比（James Ngobi）、高桥博（Takahashi Hiroshi）、阿诺·谢佛德克（Arnold Schifferdecker）和安德鲁·特索里耶（Andrew Tesoriere）致献上谢意。联合国总部的贝农·塞万（Benon Sevon）和安德鲁·吉尔摩尔（Andrew Gilmour）也在感谢之列。我还要感谢国际红十字会的托马斯·君特纳（Thomas Gurtner）和奥利弗·杜尔（Oliver Durr），法国援助机构技术合作与发展组织（ACTED）的弗雷德里克·卢梭（Frederique Rousseau）和玛丽·皮埃尔·卡雷（Marie Pierre Caley），“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安德鲁·维尔德（Andrew Wilde）和索菲·艾利乌森（Sophie Elieussen）。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派驻阿富汗特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Lakhdar Brahimi），他的友谊和热情帮助对于我的工作至关重要。

16年来，我一直为《远东经济评论》报道阿富汗事务。因此，我要感谢该杂志的编辑人员，尤其是纳延·昌达（Nayan Chanda）。他为我写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充足的经费，并一直对这场亚洲边缘的隐秘战争怀着浓烈兴趣。作为该杂志社的前任国际版编辑，V. G. 库尔卡尔尼（V.G.Kulkarni）为我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说服了杂志的管理层，把我关于阿富汗油气管线的报道作为封面故事刊载。从而引发了一个字头——“新的大博弈”的诞生。另两位编辑安德雷·沃勒（Andrew Waller）和安德雷·谢利（Andrew Sherry）的帮助也不可磨灭。

我还要谢谢《每日电讯报》的历任国际版编辑——奈吉尔·韦德（Nigel Wade）、帕特里克·毕肖普（Patrick Bishop）和斯蒂芬·罗宾逊（Stephen Robinson），他们一直牵挂着阿富汗。此外，要谢谢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部（BBC World Service）、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的各位朋友，他们的努力让我的言论找到了空间。

我要感谢巴基斯坦舆论界的诸位。比如《国民报》（*The Nation*）的编辑阿里夫·尼扎米（Arif Nizami），这位朋友对我的阿富汗报道一直鼎力支持。他总是为我的故事留出头版，并因此常常要接到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各种问罪电话。还要谢谢《先驱》（*The Herald*）的谢里·拉赫曼（Sherry Rehman），她的杂志为我的报道提供了空间。

如果没有巴内特·鲁宾（Barnett Rubin）提供的支持、帮助和网络空间，我的工作肯定无法完满。在我的交际圈子中，他对阿富汗的了解无与伦比。此外，我要感谢那些关注阿富汗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他们包括奥利维耶·罗瓦（Olivier Roy）、南希·杜普里（Nancy Dupree）、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威廉·马雷（William Galey）、安德斯·方格（Anders Fange）、西塔·马斯（Citha Maass）、阿克巴·艾哈迈德（Eqbal Ahmad）、帕蒂·戈斯曼（Patty Gossman）、阿巴斯·法耶兹（Abbas Faiz）、斯蒂夫·列文（Steve Levine）、托尼·戴维斯（Tony Davis）、爱德华·吉拉戴、堺贞夫（Sakai Sadao）、蒂姆·麦克基克（Time McGirk）、鲍勃·尼克雷斯伯格（Bob Nicklesberg）、马里哈·罗蒂（Maleeha Lodhi）、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Rahimullah Yousufzai）、莱斯利·科克伯恩（Leslie Cockburn）、弗朗索瓦·西珀（Francois Chipaux）、詹妮弗·格里芬和格雷琴·皮特斯（Gretchen Peters），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对凯西·卡农（Cathy Canon）抱有最诚挚的谢意。作为美联社驻伊斯兰堡和喀布尔的负责人，她应为数年来的杰出工作获得普利策奖。此外，她的慷慨和诚恳令人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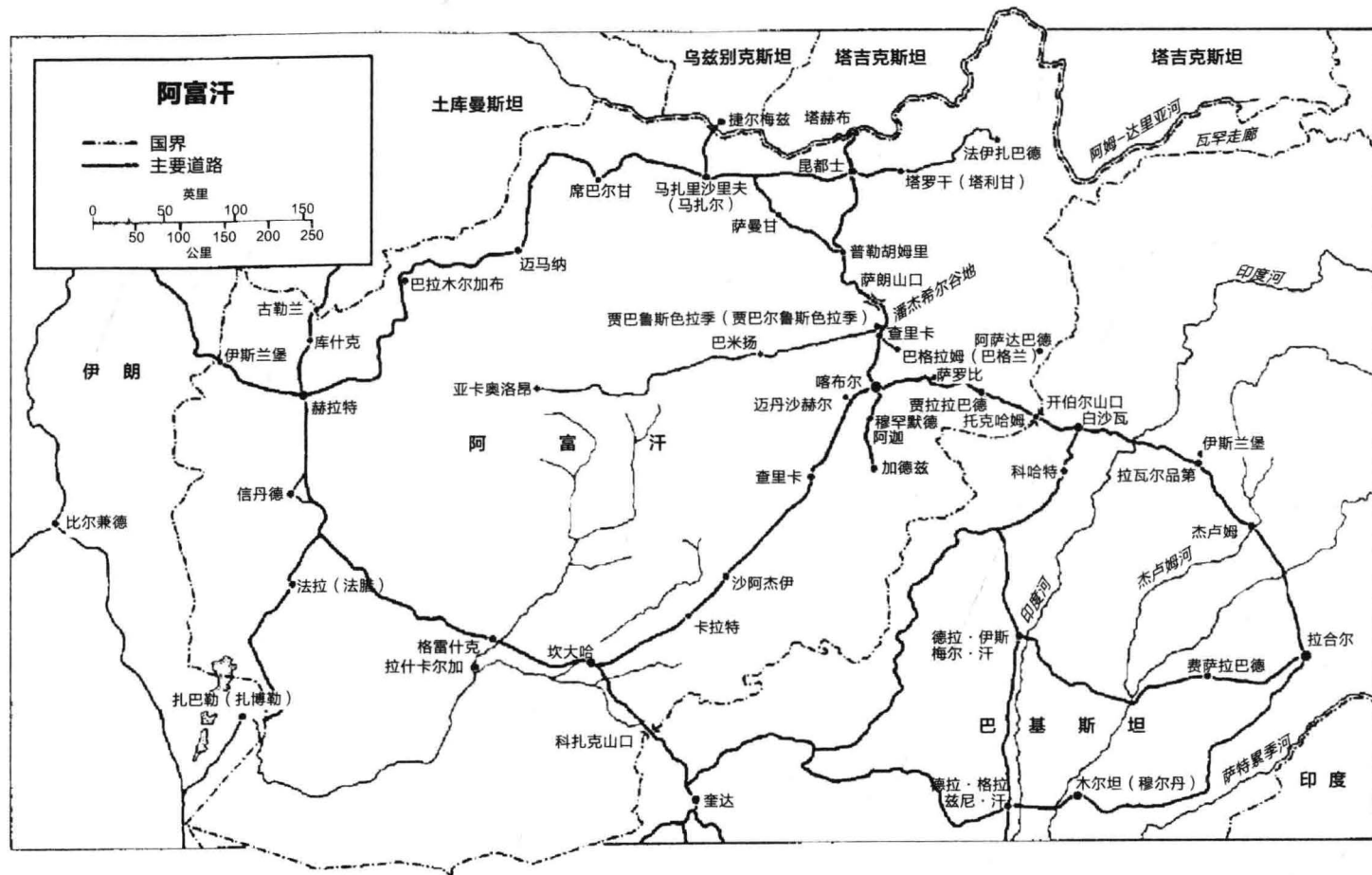
对于路透社驻伊斯兰堡的诸位负责人——简·麦卡特尼（Jane Mac Cartney）、阿里斯泰尔·里昂（Alistaire Lyon）和安迪·希尔（Andy Hill），我也要谢谢他们。此外，还要向塔乌里斯（I.B.Tauris）出版社的萨拉·库克（Sarah Cooke）献上衷心感谢，谢谢她对于我的工作的信心，以及对我发稿日期的耐心。

最后，如果没有家人——我太太安赫莉斯（Angeles）和两位子女，我的工作断无可能完成。他们长期忍受着我的外出不归，同时还分享了我对阿富汗的一片深情。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
于拉合尔（Lahore）

阿富汗

—— 国界
—— 主要道路





引言

阿富汗的圣战者

这是阿富汗南部的普通一天，坎大哈城迎来了温暖的春日午后时光，小店主们纷纷为店面装上门板，准备着周末歇业。巴扎（Bazaar，源自阿拉伯语，集市之意）外的巷道里一群普什图男子正在途经此地，只见一具具肥胖的身躯朝不远处的市足球场走去。他们的胡须很长，脑袋被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四周都是跑来跑去的孩子，其中不少孩子都已经失去父母、衣衫褴褛，他们高兴地叫着喊着，因为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出好戏。

1997年3月，塔利班极端分子已经在坎大哈盘踞了两年半之久。同时，他们还占据了阿富汗三分之二的国土，并正在为夺取那剩下的三分之一进行战争。一些塔利班成员曾经在80年代抵抗苏军入侵，参与过推翻纳吉布拉政权的人就更多了。不过，绝大部分塔利班分子都没有反苏入侵的战争经历，他们只是一群刚刚迈出宗教学校大门，从巴基斯坦难民营里回到故国的学生兵而已。

塔利班的迅速崛起有着很强的戏剧性。自1994年底开始，坎大哈及临近省份因为塔利班而得到了相对的安定和平。塔利班击溃了这里的割据武装，处死了不少军阀头目，民间的枪支问题得到了管控。一度堵塞的走私大道再次开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之间的非法贸易重现生机，这也为当地经济带来了点生气。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也是塔利班分子的主要来源。因此，塔利班奉行普什图民族主义非常合理。300多年来，阿富汗都处在普什图统治者手中。不过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那些小民族已经夺去了普什图人的权力。塔利班的崛起，让普什图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除了普什图民族主义，塔利班的另一杆大旗便是所谓的伊斯兰教法。塔利班教法的极端程度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感到战栗。在他们的统治下，一切女

子学校都被迫关闭，而所有女性都被禁锢在家里，甚至没有出门自由购物的权利。所有的娱乐活动也一应被禁，包括音乐、电视、录像机、扑克牌、风筝和大多数体育活动。塔利班标榜的原教旨主义是如此的极端，完全曲解了伊斯兰崇尚和平、提倡宽容的教义，和其他的宗教、民族完全对立。巴基斯坦和中亚的极端分子把塔利班当作榜样，向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社会体制和现有的国家制度发起挑战。

足球也逃不掉被禁的命运。但是在几周之前，塔利班当局突然解禁了这项运动。坎大哈的足球场早已破败不堪。联合国援助机构对其进行了一番整修。在文章开头描述的这个温暖的春日里，坎大哈的穆斯林迎来了周末，足球场焕然一新。不过，奠基仪式上并没有联合国人员出席，足球场上也没有足球可踢，球门之间上演的是一出公开处决犯人的大戏。处决开始的时候，笔者正好走下班机，并和一群联合国工作人员搭上了话。这些人面色沮丧，声音啜嚅。其中的一位告诉我：“我们要怎样鼓励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伸出援手提供支持？我们如何向外界解释塔利班对足球场的用途？”

谈话当中，工作人员的眼神一直在笔者的周围紧张地游移，他们被我的美国同事格雷琴·彼得斯吓着了，她有着瘦长的个子、一头金发和一张轮廓分明的长脸。当时，彼得斯女士腿上的那件沙尔瓦灯笼裤紧绷绷的，明显不大合身。她的身上则罩着一件宽大的T恤衫遮到了膝盖，头上还包着一条长巾。不过，她那副身板和美国气息十足的脸仍然十分显眼，这对于塔利班的理念是一种威胁。塔利班分子认为，公众场合不宜出现女人的身影，也不宜响起女人的声音，她们会让男人心猿意马，背离伊斯兰的道路。因此，塔利班分子对一切带有女性元素的东西都敬而远之，自然不可能接受一位女记者的采访。

笔者很早就开始涉足关于塔利班的报道。在1994年塔利班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攻克了坎大哈，1996年9月，塔利班又占领了喀布尔。对于这些事件，我全程跟踪采访，多次往返于塔利班的各处重镇之间，坎大哈、赫拉特和喀布尔都是我经常的落脚点。塔利班是什么？他们又在追求什么？什么人支持了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他们会走上一条暴力而又极端的宗教道路？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一直在进行探寻。

坎大哈足球场的见闻是塔利班带给笔者的又一次惊奇。这一次噩梦般的遭遇是塔利班献给来访记者的一份大礼。这礼物让我不寒而栗，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十分恐惧。这些年的战场经历，我已经见惯了生死别离。不过，看着一个大活人被夺去生命，我的内心仍然难以平静。当时，我的周围有成千

名观众，这场死刑就是他们的娱乐，反映了塔利班的统治力和被曲解的伊斯兰教法正义。

一开始，我们在足球场外遭到了塔利班的阻拦。其后不久，笔者获准入场观刑，但是必须安安静静地站到警戒线后边，不做声，不交谈。格雷琴·彼得斯也混了进来，不过很快便暴露了，几名惊慌失措的守卫端着冲锋枪把我的这位女同事押出场去。

邻近中午的时候，足球场里已经座无虚席，多出来的1万多名老少看客不得不挤到球场中央的沙地边上。一些胆大的孩子干脆直接窜上了球场中央，引得守卫恼怒不已，连忙上前驱赶。球场里似乎装下了整个城市的男性市民，而没来的另一半人根本没有外出的权利。

突然，喧闹的人群集体屏住了呼吸。24名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分子大摇大摆地走上球场，他们个个脚踏塑料凉鞋，头戴黑色头巾，穿着肥大的灯笼裤。这些人来到警戒线旁边维持秩序，把孩子们赶回去，并喝令人们保持安静。广大看客很是听话地闭了嘴，整个球场里只剩下凉鞋的踢踏声。

一切继续依照事先安排的程序进行。几辆达特桑牌的双门皮卡车开进了球场，领头的一台车上安装着一个小小的扩音器。日本产的小车是塔利班最喜爱的代步工具，扩音器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地的清真寺里的常见物品。一位白胡子长者走到扩音器前，开始面对群众发表演讲。他就是塔利班政权坎大哈高等法院的法官卡兹·哈里鲁拉·费罗兹。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说过程中，费罗兹法官强调了塔利班运动的正义性和伊斯兰教法惩戒的有益性。并向看客们介绍罪犯犯罪的全过程。

罪犯阿卜杜拉·阿富汗（Abudullah Afghan）20岁出头，男性，被控偷窃坎大哈郊区农民阿卜杜尔·瓦里（Abdul Wali）的财产。瓦里奋起反抗，遭阿卜杜拉枪击身亡。经过跟踪追击，瓦里的家人找到了杀人凶手的下落，并将仇人解往塔利班法庭受审。阿卜杜拉被坎大哈伊斯兰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而最高法院随后认可了这一判决的合法性。整个过程中没有律师参与辩护，一切按照有罪推定的逻辑进行。

根据塔利班所谓的伊斯兰教法，处决犯人的权力系于受害者的家庭。不过，受害者的家庭有特殊的赦免权，法官可以据此在最后一刻留住犯人的性命。而宽宏大量的受害者家庭可以获得一笔“血钱”，作为对生命的补偿。这种塔利班式的伊斯兰教法是否纯正？是否有着大量普什图人部落制度的残余？对于这个问题，阿富汗国内外的神学家们意见并不统一。

让我们的目光回到那一天的刑场上。塔利班守卫亮相之后，受害者的20多名亲属也陆续现身。法官转过身，面对着这群男士双手高举，大声询问家属们是否愿意饶阿卜杜拉一命，以换取“血钱”。他说：“如果宽恕这个罪人，你们将会得到10次去麦加朝觐的机会。你们如果原谅他，塔利班领导层将从伊斯兰基金会里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赔偿。”不过，亲属们纷纷摇头表示拒绝。守卫们也举起了枪，随时准备狙击那些敢于轻举妄动的人。人群中默然无声。此时的犯人一直在另一辆皮卡车上，被几名荷枪实弹的守卫看护着不能动弹。阿卜杜拉一身新衣，双腿戴着沉重的镣铐，双手反剪背在身后。随着一声令下，犯人缓缓走向球场一端的球门处。他的双腿抖个不停，显然是害怕了，身上的镣铐在太阳光下闪烁不停。几名守卫将阿卜杜拉摁倒在地上，使他双膝跪地、背对人群。一名守卫小声提醒犯人，最后的祈祷时间已到。

另一名守卫则将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交到被害者亲属的手中。那位汉子接过枪，快速闪到阿卜杜拉身后，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连发了3发子弹。犯人应声倒地，行刑者则一步上前，冲着阿卜杜拉的胸口又补了3枪。几秒钟的时间内，犯人的尸体被运上了车，一溜烟地消失了。我们这些观众也随之走出了球场。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集市里炊烟缭绕，茶铺和饼店正准备着晚间的生意。

连年的战争让阿富汗人民心中充满了恐惧、疲惫和挫败感，面对塔利班提倡的所谓正义，他们只得表示接受。阿卜杜拉死后第二天，喀布尔附近一名妇女被自己的亲属用石头活活砸死。女犯人被控和一名男子合谋逃离阿富汗，而该男子并非她的血亲。根据塔利班的规定，那些触犯偷盗罪的人会被斩掉一只胳膊或者被砍掉一条腿。1996年9月，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便虐杀了前总统纳吉布拉。此前，傀儡政权的强人统治者在联合国的保护下度过了4年。

塔利班是冷战后伊斯兰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政治运动。一些阿富汗人在塔利班身上寄托着无限希望。他们认为，塔利班是一群单纯的学生兵，为了实现和平、消灭军阀奋斗不已。1992年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各派军阀势力就一直猖獗至今。不过，另外一些人也表示忧虑。他们担心塔利班最终不过是另一个军阀政权而已，阿富汗人民仍然逃不掉暴政的凌虐。

塔利班运动的普什图本色使得阿富汗的民族矛盾公开化，伊斯兰教和部落、宗族和封建秩序之间的对立也日渐明晰。而且，如何在一个保守的伊斯兰社会中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塔利班的政治体系、决策过程和领导人物都充满神秘，周围人难以琢磨这个伊斯兰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塔

利班方面从来不发表媒体公报、不提出政策声明，也不召开记者招待会。由于他们对摄影和电视的抵制态度，外界甚至不知道奥马尔等领导人究竟是一副何等面孔。那位独眼毛拉在外界眼中仍然是个未解谜题。在神秘的程度上，塔利班完全可以跟红色高棉看齐。

不经意间，塔利班为本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设立了新日程。他们的思想波及了阿富汗周边各个国家。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以及中亚5国中的4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选择力挺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8个国家出钱又出武器，帮助北方联盟延缓塔利班的攻势。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则站在塔利班一边。全球的冷战早已结束，不过，阿富汗周边地区却又存在着阵营之间的对立。1998年，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北部的大片领土，控制了这个国家90%以上的土地。伊朗当局指责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袒护，并威胁将派军队介入阿富汗局势，地区情况的紧张程度达到了最高点。

中亚位于阿富汗临近地区的中心，这里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堪称世界能源最后一块丰饶的处女地，却又因为地理位置一直被外界隔离。为一条连接中亚资源和亚欧广大市场的天然气管线，周边国家和西方各大石油公司你争我夺、战况激烈。它们之间的敌对姿态似乎回到了19世纪。当时，英俄帝国主义曾经为了中亚控制权展开过一场“大博弈”。如今，这种大国游戏似乎又要重演。

1995年末开始，美国优尼科公司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条连接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同时又穿越阿富汗的天然气管线，优尼科的背后有华盛顿当局作为坚强后盾。不过，大国的角力场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足球场那个午后的第二天，笔者来到毛拉·穆罕默德·哈桑（Mullah Mohammed Hassan）的宅邸，准备对这位塔利班政权的坎大哈市长进行采访。我的脚步在经过一群荷枪实弹的守卫时停住了，只见市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位一头银发的商人，笔挺的蓝色法兰绒上衣搭配金色的纽扣、黄色的丝绸领结和意大利马甲，让他显得很帅气。身旁的两位随从也是衣冠楚楚，手里还夹着公文包。3位绅士似乎刚刚在华尔街做成了一笔大买卖，而不是在坎大哈的穷街陋巷和伊斯兰武装分子谈生意。

那位商人便是布里达斯公司主席卡洛斯·布尔格罗尼。自1994年起，布尔格罗尼先生就一直在和塔利班以及北方联盟进行秘密谈判，他的公司也对那条横穿阿富汗的管线心有属意。当时，布里达斯方面正和优尼科公司在加利福尼

亚对簿公堂，阿根廷人指责美国同行窃取了自己的商业创意。

一家在中南亚地区籍籍无名的阿根廷公司为什么愿意涉足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国度？一年以来，笔者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布里达斯对此一直保持缄默，优尼科方面居然也是守口如瓶。总之，布里达斯总裁被我这样一个记者堵在塔利班领导人的办公室外面，这可不是布尔格罗尼希望发生的事情。当时，总裁先生借口要赶飞机而匆匆离开了。随后，私人飞机载着他飞到了北方联盟的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简称“马扎尔”）。

塔利班的名气并不仅仅来源于这场管线大战。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还很关心他们的思想动态。也许，塔利班代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未来，他们富于进取、不断扩张，而且从不妥协。他们的目的很纯粹——把阿富汗社会带回理想状态，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阿拉伯世界便是这种理想的模板。另外，西方人还担心阿富汗那不断扩张的毒品贸易，塔利班政权对国际恐怖分子的庇护也让他们头疼不已。沙特极端分子奥萨马·本·拉登正在阿富汗躲避，他所领导的基地组织策划实施了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爆炸案。

更令专家们忧心忡忡的是，塔利班那种复古原教旨主义理念似乎暗合了某些美国知识分子的预言——在后冷战时代里，一个由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操控的世界与西方敌对，文明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另一场冷战的爆发。^{【1】}

而阿富汗将成为冲突的中心地带，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阿富汗走廊上，无数的征服者、宣教家、圣徒和哲人曾经席卷而过，旧的文明被摧毁，新文明得到传播。塔利班不过是最新的那一个。古代的王者们一直认为阿富汗是世界的最中央，不少现代人对此表示认同。印度著名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ammed Iqbal）把这片土地形容为“亚细亚的心脏”。而英属印度的总督寇松爵士（Lord Curzon）在20世纪也抱有同样的观念，在他看来，阿富汗就是“亚洲的驾驶舱”。^{【2】}

有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政治和秉性。阿富汗便是这种理论的最好佐证。这个国家位于伊朗、阿拉伯海和印度的十字路口，是中亚和南亚之间的交通要道。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环境赋予阿富汗的领土和山脉极大的重要性。自6 000多年前雅利安人征服的时代开始，这种重要性一直存在。这片崎岖难行、荒凉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一代代的战士群体，他们的勇敢善战为世人所罕见。同时，巍峨险峻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河谷和硕果累累的树木也是诗人灵感的上好来源地。

关于安拉创造阿富汗，许多年以前一位圣战组织的老兵曾经跟笔者讲过。“安拉的世界已经创造完毕，不过手边还有不少剩下的材料、残余的垃圾，放在哪里都嫌不合适。于是，他将他们捏成一块摔到地上，于是便有了阿富汗。”

现今的阿富汗有着2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兴都库什山脉将这个国家劈作南北两半。20世纪以来，民族融合的程度大大加强。不过，山南山北的风情仍然大不相同。大多数普什图人都居住在南部，一些波斯语民族也在此定居。北面则是突厥语民族和波斯语族群的混居之地。至于巍峨的兴都库什山脉本身，则是说波斯语的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的家园。阿富汗的东北部矗立着帕米尔高原，这里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中的世界屋脊。^{【3】}当地分属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由于交通不便，阿富汗其他地区的民族多元化状况无力拓展到此地。这片高山雪原上的居民对于其他的阿富汗人来说充满异国风情。

喀布尔坐落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麓，毗邻的河谷土地十分肥沃，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农业区。阿富汗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身处伊朗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势开阔、荒无人烟。当地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雷吉斯坦”（registan），即沙漠之意。不过，赫拉特附近的绿洲地带是个例外，3 000多年来，这座古城遗址是文明的中心。

兴都库什山脉北面则延绵着中亚大草原。这片荒凉的土地一路向北，直达西伯利亚的中心。这里的气候和地势环境都十分恶劣，当地的突厥语民族民风剽悍、好勇善战。阿富汗东部的山势略为平缓。苏莱曼山脉在这里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分割开来，普什图人便居住在这边界之上。许多年来，北方来的征服者正是跨过这里的层层山口，直扑南部的印度平原。开伯尔山口便是其中的著名要道。

阿富汗的可耕地面积只占总领土的10%~12%。其中有些农田还位于高山峡谷之间，需要农人艰苦培育才能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开始，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靠放牧山羊和阿富汗肥尾羊维持生计。每年，科奇（Kochi）地区的牧民都要赶着牲口，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转战几千英里，以期找到一片丰美的牧地。

80年代的战争摧毁了科奇人的文化和生计，不过，当地人仍然要靠饲养牲畜苟延求生。过去，这里的人放牧骑马。现在，他们改做走私贸易。走私是塔利班的财源，塔利班鼎力支持这门生意。满载走私货品的大卡车因此遍及阿富汗各地。

对于阿富汗这样一个地区，道路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开端就已经得到显现。这个国家地势封闭，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两股文明在此交锋，也在此融合。一股是城市化的波斯文明，另一股则是自中亚南下的突厥游牧民族。遍布阿富汗各地的诸多建筑遗迹便是当时的遗存。

随着历史的演进，两种文明都渐渐褪色，攻城略地的力度也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这方土地便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有时候，这里也是两大势力的缓冲区域。其他的某个历史时刻，阿富汗又成了各路人马的走廊地带，他们有的自北南下，有的自西东伐，目的都是征服印度。阿富汗还是多种宗教共存的地方，拜火教、摩尼教和佛教都曾在这里生根发芽、兴盛一时。如今，马扎里沙里夫城外数英里还能看到这些古老宗教的遗迹。马扎里沙里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这里一度是繁盛的佛国，也曾经遍布着波斯和突厥风格的艺术和建筑。当年，虔诚的求道者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佛教传入中国大地，阿富汗是这些人途中的一站。无数的豪强曾在这里建功立业。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大军征服了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并以此为基地窥视印度。亚历山大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他留下了一个糅合了佛教文明和希腊文化的王国，继续存在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这是欧洲和亚洲古文明在历史上的唯一一次大规模交融。公元654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兵临喷赤河畔，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宣扬平等和正义。很快，新宗教席卷了整个地区。萨曼王朝（874年～999年）统治下的阿富汗是波斯文艺复兴的重地，艺术和文学都极为繁盛。此后，伽色尼王国（977年～1186年）崛起，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纳入版图，并征服了今伊朗东部的部分领土。1219年，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从这里践踏而过，大批人民被屠杀，巴尔赫和赫拉特等地被完全摧毁。不过，蒙古人的到来也标志哈扎拉人的出现。这个民族是蒙古人和当地土著通婚融合的结果。

14世纪的阿富汗则是帖木儿帝国的天下。成吉思汗（Cengjis Khan）的后裔帖木儿（Taimur）重建了一个广阔的帝国，俄罗斯和波斯的领土都被囊括在内。帝国的中心位于撒马尔罕（Samarkand），今天那里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领土。1381年，帖木儿征服赫拉特。其后的1405年，他的儿子沙阿鲁将帝国的首都迁到了这座古城。突厥文化和波斯文明也就此开始了融合的进程。赫拉特也因此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最为精美的城市。中亚和波斯两种文明的交流一直惠及到当今的阿富汗。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来到这座城市游历，莫卧儿帝国的王者感叹道：“普天之下难以找到赫拉特这样的城市。”^{【4】}

此后的300年内，阿富汗东部的一些部族时不时地侵入印度劫掠。最后，他们占领了德里地区，并成立了辽阔的印度-阿富汗帝国。1451—1526年，德里一直处于阿富汗的罗迪人统治之下。1500年，巴布尔被迫从费尔干纳河谷出走。不过，这位帖木尔的后代此后一路交好运。1504年，巴布尔征服喀布尔，此后又攻克德里，这便是统治印度数百年的莫卧儿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辉煌一直持续到英国入侵为止。此时的阿富汗西部，波斯人的势力已经衰落，赫拉特落入乌兹别克昔班尼部（Sheybanis）的手中。不过，16世纪的西阿富汗被萨法维王朝（Safavid）夺取，波斯语民族的统治再次复兴。

错综复杂的征服史造就了阿富汗这个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综合体，也让这个国家的建设和团结变得十分艰难。阿富汗的西部主要流行波斯语，这门古老的语言在这个国家演变出了另一种形式——达里语。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人也以达里语为母语，并且在波斯语民族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哈扎拉人也成了一个逊尼派教众为主体的地区中最大的什叶派族群。此外，西部的塔吉克人也说达里语，他们是古代波斯文化在今天的见证人。阿富汗北部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民族则属于突厥语族，他们的语言和中亚别无二致。普什图语则流行于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普什图人之中，这是一种混合了印度和波斯元素的古老语言。

阿富汗南部的普什图人最终奠定了现代阿富汗的基础。18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四邻无一例外地处于历史低谷。波斯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和乌兹别克贾尼德王朝都在走下坡路。普什图人主要分为两大部族——吉尔扎伊（Ghilzai）和阿卜达里（Abdali）。阿卜达里部后来自称为杜兰尼人（Durranni），两部之间常常发生武装冲突。普什图人认为，自己的源头是先知的亲密战友卡伊斯（Qais），因此本民族属于闪-含语系。不过，人类学家把普什图人归为印欧语系，他们是这个族群随着历史演进衍生出的民族集团之一。在普什图人的传说中，杜兰尼部是卡伊斯长子萨尔巴纳尔（Sarbanar）的后代，吉尔扎伊部源自卡伊斯的次子。至于卡伊斯的三儿子则繁衍出了其他的普什图部落，比如坎大哈的喀喀尔部（Kakar）和白沙瓦的萨菲斯部（Safis）。6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典籍中，就有关于加兹尼东部普什图部落的相关记载。自15世纪开始，这些部落一路西迁，来到坎大哈、喀布尔和赫拉特定居。16世纪，吉尔扎伊和杜兰尼两部人马常常为了争夺领地而在坎大哈附近发生战争。今天，吉尔扎伊部的领地位于萨菲德科（Safed Koh）和苏莱曼山脉（Suleman Range）之间，北抵喀布尔河，西邻哈扎腊贾特，南边和

坎大哈相接。^{【5】}

1701年，吉尔扎伊部属下霍塔基部的首领米尔·瓦伊斯（Mir Wais）在坎大哈拥兵起事，开始了反抗萨法维王朝的斗争。此前，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曾想让普什图人改宗什叶派，激起了米尔·瓦伊斯的怒火，成为他起兵反叛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这段往事，3个世纪后的塔利班仍然对于阿富汗的什叶派势力及伊朗耿耿于怀。

经过几年征战，米尔·瓦伊斯的儿子彻底击垮了萨法维王朝，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伊朗。不过，1729年，阿富汗人被迫从伊朗撤退。此时，阿卜达里部抓住吉尔扎伊人失势的机会团结到了一起。1794年，阿卜达里人在坎大哈召集举行支尔格大会，经过9天的讨论，部族长老们将艾哈迈德·沙阿·阿卜达里拥戴为王。阿卜达里部的首领戴上头巾，各部长老将青草和刀片放到头巾里，以示对国王的忠诚。此后，支尔格大会就成了遴选新王的盛事，从而避免了王权世袭罔替。历代国王都宣称自己的权力得自支尔格大会的托命。艾哈迈德·沙阿将本部族的名称改为杜兰尼（Durrani），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今天巴基斯坦的大部分领土都成为了他的领地。

截至1761年，艾哈迈德·沙阿不仅击败了信仰印度教的马哈拉他人成为德里的统治者，还趁机夺取了克什米尔，一个强大的阿富汗帝国就此建立。艾哈迈德·沙阿因此被公认为现代阿富汗的奠基人，如今，他长眠在坎大哈郊外，陵墓宏大而精美。至今仍有许多阿富汗人前去拜祭，他们将这位君主看作本民族的至圣先贤。1772年，为了巩固帝国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和印度河以东的统治，艾哈迈德·沙阿的儿子帖木儿（Taimur）将首都迁到了喀布尔。1780年之前，阿富汗帝国和统治中亚的布哈拉埃米尔达成协议，双方以阿姆河为界，南部是普什图人的帝国，北部归于布哈拉管辖。这也是阿富汗第一次划定北方边界。

一个世纪之后，杜兰尼人多次发生内斗，他们因此失去了印度河以东的领地。不过，另一个来自杜兰尼部的家族再次崛起，他们夺取了阿富汗的统治权，并一直在国王宝座上待到了1973年。当时，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被自己的表兄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推翻，阿富汗就此成为共和国。同时，吉尔扎伊和杜兰尼两部之间的矛盾也随着苏军入侵愈演愈烈。塔利班上台后，内斗也没有停息的痕迹。

杜兰尼部的君主们面临着两大强敌，北面的沙皇俄国和东部的英帝国。19世纪的英国对于沙俄政权十分忌惮，生怕俄方在中亚的扩张危及英属印度的

安全形势。因此，英国殖民者决议夺取阿富汗，并为此发动了三次战争。不过，英国殖民当局最终意识到倔强的阿富汗人民吃软不吃硬。于是，英方大洒银票，贿赂部族长老，试图把阿富汗变为自己的傀儡。此后，英俄之间正式爆发一场“大博弈”。这场大国游戏从头到尾贯穿着诡计和行贿受贿，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不过，英、俄势力最终并没有大打出手，而只是把阿富汗作为双方势力间的缓冲地带。

杜兰尼部上层之间的钩心斗角因为英国情报部门的挑拨而愈加热烈，阿富汗的君主因此无法掌控局面，不得不向英国寻求金钱支援。而北部的非普什图裔民族也因此建立了自己的割据势力，和喀布尔的中央政权划清了关系。英帝国的印度西北部政府更是削弱了普什图人的势力，一个民族被迫分居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两地。1893年，英方主持划定了杜兰德线（Durand Line），奠定了英属印度和阿富汗的边界。

第二次英阿战争之后，英国支持的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mir Abdul Rehman）登上阿富汗王位。这位被称为“铁腕埃米尔”（Iron Amir）的新君主选择全面倒向英国人，以换取对方支持自己加强中央集权。英国人的金钱和武器让阿卜杜尔·拉赫曼创建了富有效率的政府和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他先是清洗了普什图人中的反叛者，紧接着又挥师北进，消灭了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割据势力。阿卜杜尔·拉赫曼大肆屠杀非普什图裔民族，然后将普什图人迁移到北方进行开垦。通过这种手段，“铁腕埃米尔”获得了普什图同胞的支持，但也让各个民族间严重对立。这种19世纪的民族清洗，在100多年后被塔利班几乎完全照搬。

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期间，非普什图裔民族曾经先后发起40多次武装起义，都被他一一镇压了下去。此外，“铁腕埃米尔”还成立了阿富汗第一支秘密警察部队，残暴的程度堪称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保安局（Khad，卡哈德）的先驱。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些措施确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各民族都臣服在他的统治之下。如今阿富汗北部大多数民族冲突的案例，以及1997年之后的民族仇杀，都可以在“铁腕埃米尔”的铁血政策中找到痕迹。此外，阿卜杜尔·拉赫曼对塔利班的影响还有许多，后者对西方和一切现代化事务（包括教育）的抵触跟这位国王如出一辙。而且，拉赫曼也依靠毛拉阶层，推崇神权政治，对于支尔格大会的选举理念则是极力抹杀。

20世纪上半叶，“铁腕埃米尔”的继任者都是追求现代化的积极分子。1919年，阿富汗摆脱英国控制获得完全独立。随后，这个国家有了第一部宪

法，培养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市知识阶层。不过在此期间，两位国王先后遇刺身亡，时不时有部族起义发生。统治者想要把一个部族社会改造成现代国家，这样的困难肯定不能避免。

1933年，杜兰尼王朝的末代君主查希尔·沙阿登上王位。40多年后，末代国王被自己的表兄兼妹婿达乌德赶下了台，出走罗马，杜兰尼部族的统治就此结束。阿富汗随即成为共和国，达乌德出任总统。左翼军官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的左翼组织“旗帜派”为达乌德的改朝换代出了大力，在他们的联合打击下，一次未遂的原教旨主义政变无疾而终。政变的策划者逃往巴基斯坦，阿里·布托总理（Ali Bhutto）支持他们继续对抗达乌德政权。这些策划者中包括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个个都是后来圣战组织运动的风云人物。为了继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达乌德政权向苏联方面请求援助。1956—1978年间，苏联方面一共向阿富汗提供了总计1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高达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苏联还将这个国家拉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阿富汗也进入了冷战的深渊。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当局向阿富汗提供的援助资金为5.33亿美元。这笔钱大多集中在50年代，其后美国当局渐渐失去了经营阿富汗的兴趣。达乌德接手的阿富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食利国家，4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外国援助。达乌德总统的统治生涯并不成功，他和此前的几位杜兰尼王朝的国王一样，都没能建立起运转良好的政治制度。一个松散的官僚体系行驶着社会管理的职能，后来发展壮大的支尔格大会在当时则是唯一的民意机构。^[6]

1978年4月，阿富汗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发动政变，达乌德的统治在一场血雨腥风中宣告结束。5年前，正是这帮曾接受苏联训练的军人帮助查希尔·沙阿的表亲夺取政权。达乌德一家及保镖全部死于非命。不过，政变分子很快也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大众派（Khalq，又称哈拉克派）和旗帜派（Parcham，又称帕尔查姆派）。两派人马都无视阿富汗复杂的部族传统，引发了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反抗浪潮。地方上的宗教长老和权势人物纷纷宣布圣战，要和异教徒斗争到底。异教徒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愈演愈烈，隶属大众派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总统遇刺身亡，继任者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很快步其后尘。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将旗帜派首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推举为总统。

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阿富汗便成为了冷战的焦点和美苏势力角力的中心。美国方面扶植圣战组织以对抗苏联。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苏联的入侵不过

是又一次外来者的阴险图谋，目的是为了推翻阿富汗光荣的宗教和社会传统，代之以异教徒的思想和体制。

反苏圣战的势头十分强劲，美国、阿富汗的东亚邻国和阿拉伯诸国都为之付出了大量金钱和武器。其间的大小冲突造成约150万阿富汗人丧生。1989年苏联撤兵。不过，塔利班（波斯语意为“伊斯兰学生”）很快崛起，成为了新一代的圣战分子。

目 录

- 1 ☆ 新版前言
- 5 ☆ 前言 写在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之后
- 13 ☆ 前言和致谢
- 19 ☆ 地图
- 21 ☆ 引言 阿富汗的圣战者

1 ☆ 第一部分 塔利班运动的历史

- 3 ☆ 第1章 坎大哈，1994年：塔利班的起源
- 19 ☆ 第2章 赫拉特，1995年：安拉的无敌勇士
- 31 ☆ 第3章 喀布尔，1996年：信徒的领袖
- 47 ☆ 第4章 马扎里沙里夫，1997年：北方的屠杀
- 61 ☆ 第5章 巴米扬，1998—1999年：永无休止的战争

77 ☆ 第二部分 伊斯兰和塔利班

- 79 ☆ 第6章 咄咄逼人的伊斯兰：塔利班的新型原教旨主义
- 93 ☆ 第7章 秘密结社：塔利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 103 ☆ 第8章 消失的性别：女性、青少年和塔利班的文化政策
- 117 ☆ 第9章 海洛因之惑：毒品和塔利班的经济政策
- 129 ☆ 第10章 全球圣战：奥萨马·本·拉登和阿拉伯人在阿富汗

143 ☆ 第三部分 新一轮的大博弈

- 145 ☆ 第11章 独裁者和石油大亨：
塔利班和中亚、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的纠葛
- 161 ☆ 第12章 塔利班传奇(一)：油气管道战争，1994—1996年
- 177 ☆ 第13章 塔利班传奇(二)：油气管道战争，1997—1999年
- 193 ☆ 第14章 操纵者还是受害者：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角色

| | | | |
|-----|---|------|--------------------------|
| 207 | ☼ | 第15章 | 逊尼派对什叶派：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争夺 |
| 219 | ☼ | 第16章 | 总结：阿富汗的未来 |
| 229 | ☼ | 第17章 | 卷土重来：2000—2009年间的塔利班 |
| 261 | ☼ | 附录一 | 1996年喀布尔陷落后塔利班的女性和文化法令展示 |
| 265 | ☼ | 附录二 | 塔利班的政权结构 |
| 272 | ☼ | 附录三 | 塔利班大事编年纪 |
| 294 | ☼ | 附录四 | 新时期的“大博弈” |
| 303 | ☼ | 附录五 | 专有名词表 |
| 305 | ☼ | 注释 | |

第一部分

塔利班运动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Taliban Movement

第 1 章

坎大哈，1994年：塔利班的起源

穆罕默德·哈桑·拉赫曼尼（Mohammed Hassan Rehmani）有个让人烦心的怪癖。这位塔利班政权驻坎大哈的地方首长习惯用仅存的一条腿把身前的桌子推来推去。一场采访下来，桌子能绕着主人的座位转十来个圈。也许出于某种心理暗示，也许只是无意识的抽搐，总之，哈桑健全的那条腿一直动个不停。

哈桑的另外一条腿就是一根木头桩子，和《金银岛》（*Treasure Island*）里约翰·西尔佛（John Silver）的那条木腿如出一辙，旧得已经脱了漆，木腿上遍布着的抓痕和碎木屑无疑是主人办公据点外的崎岖山路留下的痕迹。哈桑当年四十出头，资历很高，曾经亲身参与过抗苏战争，这一点在塔利班中可不多见。他是塔利班的创始元老之一，在组织中的地位仅次于老战友奥马尔，位居第二。

1989年坎大哈前线的一次战斗让哈桑失去了自己的一条腿，当时正值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际。如今，阿富汗境内的数百万名截肢者已经用上了国际援助的假肢，不过哈桑还是更喜欢那根木桩。除去腿脚不便，哈桑还被苏军火炮夺去了一根手指。塔利班有着世界上残疾率最高的领导层，这一点真叫人哭笑不得。其中，奥马尔因为1989年的一次火箭袭击而右眼失明，法务部长努鲁丁·图拉比（Nuruddin Turabi）和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高斯（Mohammed Ghaus）也都只剩下一只眼睛可用。而喀布尔市长阿卜杜尔·马吉德（Abdul Majid）则失去了一条腿和两根手指。至于其他的领导



人，包括那些军事指挥官，也都留下了类似的残疾。

塔利班领导层的肢体残疾都源于阿富汗20年来持续不停的战事。这一系列战事让150多万人丧生，整个国家因此满目疮痍。当年，苏联方面为了剿灭圣战组织，每年都要向阿富汗战场投入近50亿美元的资金。最后，苏联虽然付出了450亿美元的代价，战争却以失败告终。同样在1980—1992年间，美国政府向圣战组织提供了40—50亿美元的援助。而沙特阿拉伯也紧跟盟友的脚步，为圣战组织慷慨解囊，西欧以及许多伊斯兰国家也是纷纷跟进，提供援助。圣战组织收到的援助总额超过100亿美元。^[7]这笔钱的绝大部分都以致命的现代武器的形式出现在许多普通农民的手中，并发挥了极大的破坏力。

20世纪80年代坎大哈地区附近战斗的残酷性，反映在了塔利班领导者们的肢体残疾上。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阵营向阿富汗各地的圣战组织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和药品等战略物资。坎大哈及阿富汗南部一带的杜兰尼部普什图人（Durrani Pushtuns）获助甚微，而居住在阿富汗东部和喀布尔附近的吉尔扎伊部（Ghilzai Pushtuns）才是大力扶持的对象。负责分配西方援助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对杜兰尼部存有戒心，多次敷衍坎大哈方面的求援。结果，坎大哈方面的伤兵必须跨过边境到巴基斯坦一侧的奎达（Quetta）才能接受治疗，一路上要在骆驼背上颠簸两天。时至今日，塔利班所拥有的急救物资也少得可怜，医生寥寥无几，前线的外科大夫更是没有。

事实上，阿富汗境内仅有的几个医疗从业者只存在于国际红十字会（ICRC）开办的医院之中。

1979年12月，笔者正好身处坎大哈，有机会目睹了第一批苏军坦克的闯入。苏联人从位于中亚的苏联土库曼斯坦加盟共和国一路南下，途中经过赫拉特，踏着20世纪60年代苏联援建的公路来到坎大哈，整个行程不过两天。那些苏联士兵不过十几岁大，其中不少是中亚人。他们钻出坦克，拂去制服上的尘土，涌向附近的小摊讨茶喝。绿茶不加糖是中亚人的主食，对于阿富汗居民同样不可或缺。当时集市里的阿富汗居民，只是默默观望着中亚邻居的一举一动。12月27日，苏军特种部队（Spetsnaz）攻入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位于喀布尔的官邸，杀死了这位阿富汗总统。喀布尔被苏军完全控制，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

则成了傀儡政府的头头。

坎大哈附近的反苏起义最初是由杜兰尼部族人组织起来的。究其性质而言，将其定性为伊斯兰极端分子领导的宗教圣战，不如说是由部落长老和教士（Ulema，乌里玛，资深宗教学者）们掀起的部族斗争。当时，在白沙瓦受到巴基斯坦政府确认的七个圣战组织，无一由杜兰尼部的人领导。这七路人马不但受到西方支持，在坎大哈也各自拥有一批追随者。不过，阿富汗南部最有势力的派系，还是那些依靠部落血缘组织起来的武装，比如莫拉维·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Maulvi Mohammed Nabi Mohammedi）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Harakat-e-Inqilab Islami）以及莫拉维·尤尼斯·哈里斯（Maulvi Younis Khalis）旗下的伊斯兰党（Hizb-e-Islami）。这两位领袖都是有名的地方豪强，战前也都开办着各自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sas）（有资料指出“madrassa”泛指一切学校，并非宗教学堂的专称，但本书习惯用这个单词指代专门的宗教学校）。

阿富汗南方豪强之所以效忠白沙瓦，是因为后者手中有钱有枪。奥马尔加入了伊斯兰党，而哈桑则成了伊斯兰革命运动组织的一员。哈桑说：“我和奥马尔很熟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常常各为其主。当然，我们也有处在同一战壕的时候。”^{【8】}

艾哈迈德·盖拉尼（Pir Sayed Ahmed Gailani）领导的国家伊斯兰阵线也吸引了大批人马，“Pir”为伊斯兰苏菲派宗教头衔，意为“长者”。盖拉尼主张迎回老国王查希尔·沙阿作为抗击外敌的领袖。他的提议遭到了美国 and 巴基斯坦方面的强烈反对。

查希尔·沙阿当时生活在罗马，他的威信仍然很高，在坎大哈广受爱戴。坎大哈的父老乡亲都希望查希尔·沙阿的归来能重塑杜兰尼部的领导地位。随着战争的推进，普什图圣战组织内部各部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也趋于白热化。伊斯兰教士阶层标榜伊斯兰教建立初期的种种文化和价值，同时，他们也很尊重以支尔格会议（Jirga）为代表的阿富汗部落传统。相较于其他势力，教士们对于非普什图裔人也有一份包容心。伊斯兰极端分子对部落传统非议很多，他们的意识形态追求十分极端，那就是在阿富汗掀起一场伊斯兰革命。对于其他民族，伊斯兰极端分子主张排斥政策。这也引发了非普什图裔阿富汗人的反感。

伊斯兰革命运动组织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完全靠武装分子和部族



首领之间的松散联盟加以维系。许多成员只在宗教学校上过几年学，远算不上宗教事务专家。不过，相对来说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行动隐秘、权力集中，参政的激情也更高。伊斯兰党的干部都是普什图人，他们来自城市地区，也受过教育。战争爆发之前，伊斯兰主义者在阿富汗社会里缺乏根基。不过，美金、武器源源不断而来，再加上来自巴基斯坦某些势力的鼎力支持，极端分子不但有了自己的根基，而且力量猛增。1994年之前，传统派和极端派之间争端不断。结果两败俱伤，一个更极端的武装派别——塔利班接管了坎大哈的权力真空。

坎大哈是阿富汗第二大城市，苏军入侵之前，该市约有人口25万。如今已经下降到不足一半。特殊的地位，让坎大哈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500年，坎大哈古城便有人类居住。不过，距坎大哈35英里的蒙迪加克（Mundigak）历史更为悠久，这个小村子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时代便已经成形，是印度河文明的一部分。从坎大哈东去，穿过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波伦山口（Bolan Pass）便能到达巴基斯坦的信德省，近而来到阿拉伯海边上，直通印度，而从此地一路西行，则可以去到赫拉特省和伊朗。凭借贯通东西的地利，当地人有着杰出的经商才能。坎大哈不但是印度和伊朗之间重要的商业驿站，也是两地艺术、文化和手工艺品的交流之处。城中有着无数的集市，其中很多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著名老店。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Ahmed Shah Durrani）是杜兰尼王朝的开国君主，也是坎大哈新城的奠基者。自1761年落成以来，坎大哈新城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杜兰尼王朝延续了300年，奠定了现代阿富汗的基础。因此，坎大哈在普什图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阿富汗历代君王对家乡父老特别体恤，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坎大哈居民享有免服兵役的特权。艾哈迈德·沙阿的陵寝位于坎大哈中心，正处在中央集市的旁边。时至今日，仍有几千名阿富汗人来到沙阿长眠的地方进行拜祭，纪念这位阿富汗的国父。

紧邻沙阿陵寝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清真寺。那里是阿富汗的宗教圣地，先知的披风（Shrine of cloak of Prophet）便收藏于此。不过，平日里的朝拜者无缘见到披风的真面目。只有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披风才会适时亮相。历史上，这种情况只发生过寥寥数次，比如1929年，当时的国王阿曼诺拉·汗（Amanullah Khan）正处于团结各大部落的紧要关头；以及1935年坎大哈爆发霍乱的危急时刻。^[9]1996年，先知的披风再次现身。这

一次是奥马尔的缘故。塔利班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展示了这件披风，很快便被手下拥戴为“信徒的领袖”（Amir-ul Momineen）。

不过，坎大哈最著名的特产是各种水果。作为一个绿洲上的城市，坎大哈和灼热干旱的沙漠完全绝缘。这里有的是成片的绿地、荫凉的果园，出产的葡萄、甜瓜、桑葚、蜜桃、石榴、无花果享誉伊朗和印度。其中，坎大哈的石榴最是闻名。1 000多年前，波斯人便在文献中称赞坎大哈石榴的甘美。20世纪，英属印度的总督大人习惯用它来款待宾客。20世纪初，由于司机们的作用，坎大哈的优质水果一路远销，甚至出现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市场上，坎大哈的卡车司机因此掘到了第一桶金，后来，从事走私的司机阶层成了塔利班最大的资金来源。

在坎大哈，果园曾经有着丰沛的水源，灌溉系统良好。不过，这一切已经成为往事。苏军和圣战组织之间的混战让昔日的田野变成了地雷区，大批农村人口逃往巴基斯坦。果园纷纷荒废。如今的坎大哈是世界上地雷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坎大哈地势平坦，不易隐蔽。但是圣战组织的战士还是在果园和水渠中找到了庇护所，并很快控制了农村地区。苏军部队只能困守城市。为了扫荡圣战组织，苏联方面砍掉了成千株果树，将灌溉系统全部毁坏。所以，1990年难民们重归故园的时候，这片土地已经不适合发展水果种植了。但是，人们很快找到了替代作物，那就是罂粟。由此带来的鸦片贸易，很快变成了塔利班的财源。

1989年，苏联虽然已经撤军，纳吉布拉政权却仍然死而不僵，圣战组织的战斗还在继续。1992年，圣战组织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终于倒台。不过，阿富汗的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一切才刚刚开始。白沙瓦走出的普什图武装虽然装备精良，但是经常内讧。攻占喀布尔并不是他们的战绩，而要归功于布尔哈努丁·拉巴尼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率领的塔吉克武装，以及拉希德·杜斯塔姆（Rashid Dostum）指挥的乌兹别克民兵武装（学界一般将杜斯塔姆武装称为“乌兹别克民兵”）。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组织性更强，更加团结，因此捷足先登，抢先进入喀布尔地区。三百年来，普什图人一直控制着喀布尔地区。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一国之都旁落他人之手。很快，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便包围了喀布尔，把阿富汗首都围了个严严实实。

1994年塔利班崛起之前，阿富汗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各派军阀割据



一方，互相攻伐。军阀之间时而勾结，时而反目，生灵涂炭，留下了一片焦土。塔吉克武装的领导人拉巴尼占据了喀布尔地区。他自组政府，并自命为总统。拉巴尼的地盘还包括阿富汗的东北部。西部的三个省份则是伊斯梅尔·汗的领地，其中心位于赫拉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三个省份是普什图人的主要聚居区，这三个省或者被本地的舒拉统治，或者处于贾拉拉巴德的圣战组织的掌控之中。希克马蒂亚尔则在喀布尔东部和阿富汗南部的一小块领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而拉希德·杜斯塔姆的王国则处在阿富汗的北部。势力最大的时候，乌兹别克军阀占据了整整六个省的领土。1994年1月，杜斯塔姆武装和拉巴尼政府反目成仇，前者转而和希克马蒂亚尔结成同盟，兵分两路围攻喀布尔。

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省则是哈扎拉人的控制区域。以坎大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没有固定的主人，无数的军阀和土匪在此恣意横行、鱼肉百姓。阿富汗南部的部族关系十分复杂，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普什图人群龙无首，而巴基斯坦又不愿向势力最大的杜兰尼部伸出援手，巴方的代理人是希克马蒂亚尔。总之，一切情况都注定了居于此地的人们只能陷入内斗之中不能自拔。

坎大哈城本身就是各派军阀割据的地方，其危险程度让国际救援组织为之却步。城市内的一切事物，都可能被军阀卖到巴基斯坦换成金钱。电话线、电线杆、树木、工厂、机器统统被砍伐、拔除、变卖、拆卸，就连压路机最后都成了商人手中的金属碎片。各派军阀都习惯强占民居和农田，原主人被强行逐出家门，他们的财产则成了战利品，被军阀打赏给走狗们。这样的暴行，只是军阀蹂躏坎大哈地区的冰山一角。无数的年轻男女横遭绑架，以满足军阀的兽欲；集市中的商贩也是军阀的盘剥对象，他们时刻面临着被抢劫的危险；军阀们还把战场搬到了大街上，扰得城市秩序大乱。在军阀势力的压榨下，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难民不能返回家园，更多的难民被迫背井离乡，踏上逃往奎达的路。

在军阀横行的阿富汗南部，不但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当地黑帮走私的财路也大受阻碍。1993年，笔者曾经在奎达到坎大哈的交通运输线上走过一遭。沿途不过130多英里，却一直走走停停，颇不顺畅。至少有20个武装分子组织设卡拦路，索要财物。当时，走私帮派都想打通奎达和伊朗之间

的走私通道，把自己的货物卖到刚刚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去。但路上军阀盘剥太重，让各大走私帮派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随着苏军的远去和纳吉布拉政权的坍塌，很多圣战组织战士放下了武器。有的人解甲归田，有的人回到奎达和坎大哈在当地的宗教学校继续学业或执掌教鞭。这批人对当时的阿富汗时局十分不满。哈桑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奥马尔、高斯、穆罕默德·拉巴尼（并非当时的阿富汗总统拉巴尼），还有我本人都来自乌鲁兹甘省，互相之间十分熟悉。后来，我回了奎达的宗教学校工作。不过，每当我们四个讨论起人民的苦难、军阀的横暴，都非常气愤。大家有着共同的看法，所以就有了共同的行动。”

对于哈桑的意见，高斯深表同感。这位后来官至塔利班政权外交部长的独眼毛拉认为：“为了扭转残破的时局，大家常常讨论得废寝忘食。举义之前，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认为行动必将失败。不过，我们都相信自己是沿着安拉和圣徒的足迹在前行。我们之所以能有一些进展，都是安拉保佑所致。”【10】

除了这几位后来成为塔利班创始人的圣战组织老兵，他们的战友也十分关心阿富汗南部的惨状。后来塔利班政权的公共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巴斯便是其中的一位。阿巴斯说：“许多人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我本人来自查布尔省的卡拉特市（位于坎大哈北部，距坎大哈85英里），在宗教学校就学。不过，国家的状况如此糟糕，根本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国家的前途问题。”阿巴斯还认为：“原有的圣战组织无法实现阿富汗的和平大业。因此，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了赫拉特，投奔伊斯梅尔·汗设在当地的舒拉。不过，伊斯梅尔·汗的武装没有找到解决战争的方法，反而让事情愈来愈糟糕。最后，我们转道前往坎大哈，和奥马尔共商大计。”

圣战组织的老兵们虽然在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却都有力挽危局的心。经历了无数次的思想碰撞之后，老兵之间有了共识，并草拟了一份救国救民的行动章程——建立和平环境、解除军阀武装、确保教法统治、捍卫领土统一和伊斯兰教的地位。时至今日，这个章程仍然是塔利班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基本纲领。宗教学校是许多圣战组织成员离开战场后的人生第一站，不过，他们并不是传道授业的“毛拉”，而是辛勤求学的“塔利卜”（talib），这个波斯语词汇代表“宗教学校的学生”。一群“塔利卜”选择以“塔利班”



（塔利卜在波斯语中的复数形式）为名，既和圣战组织中的派系斗争厘清了关系，又代表了老兵们不求政治权力、一心只为救民的情操。

奥马尔和他的追随者都是圣战运动的参与者，但是，他们反对部族主义，对圣战组织原有领导层的堕落也深感不满。这些人自命清高，他们想要引领圣战的方向、改造社会的环境，清除一切腐败，还阿富汗一片伊斯兰的纯净天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并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接受了教育。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的各大圣战组织，也都以巴基斯坦为基地进行活动。因此，年轻一代的塔利班分子并不了解自己祖国的今昔，他们的头脑中只有1400年前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盛世。重现那个年代的辉煌，也就成了这些年轻学生的奋斗目标。

在这群学生之中，奥马尔并没有出众的政治才干，也缺乏过人的军事才能，他之所以成为领袖，纯粹是因为他对于伊斯兰信仰那份不二的虔诚。这是不少塔利班分子的看法，哈桑便是这样评价奥马尔的：“奥马尔毛拉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是大家选择的结果。在一干同侪之中，他的虔诚堪称表率。我们把他选为领导，是他给了我们帮扶民众的权力。”至于奥马尔本人眼中塔利班运动的宗旨，他在接受巴基斯坦记者优素福扎伊（Rahimullah Yousufzai）的采访时有着清晰的表述：“我们举起武器，是为了实现阿富汗圣战的目标，并且打倒所谓圣战组织的统治，拯救饱受摧残的人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对万能的安拉的信仰。安拉可以保佑我们获胜，也能把我们推入失败的境地。”^{【11】}

世界各国领导人之中，穆罕默德·奥马尔大概算是最具神秘色彩的一个。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有幸见过这位塔利班领袖，采访过他的西方记者人数为零。奥马尔甚至连一张可供存照的新闻相片都没有。1998年10月，奥马尔第一次接受了联合国官员的拜会，在那个时候，塔利班已经有了将近四年的征战史。这位联合国官员便是拉赫达尔·布拉希米（Lakhdar Brahimi），时任的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当时伊朗随时可能发兵阿富汗，这也就是那次会谈的由头。奥马尔居住在坎大哈，他只去过喀布尔两次，每次的逗留时间都十分短暂。整理这位神秘人物的生平纪略十分困难，需要借助全体阿富汗人和各国驻阿富汗的外交官的集体记忆方可拼凑而成。

奥马尔大约出生在1959年，他的家乡诺德（Nodeh）是一个邻近坎大

哈的小村子。奥马尔家境贫寒，家中没有一寸土地。他所属的霍塔克部落是吉尔扎伊部普什图人的一个分支。1721年，霍塔克部首领米尔·瓦伊斯（Mir Wais）占领了伊斯法罕，由此在伊朗确立了吉尔扎伊部的统治。不过，瓦伊斯的帝国很快被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的势力取代。

年轻时的奥马尔没有社会地位，在部落中毫无名望可言。坎大哈当地的名流士绅都表示，自己原先有眼无珠，对这位大人物及其家族闻所未闻。20世纪80年代圣战战火熊熊之时，奥马尔一家迁居乌鲁兹甘省的塔林科特（Tarinkowt）。这是阿富汗最为偏僻难行的地区，苏联军队甚少涉足。不久之后，奥马尔的父亲去世，照料老母、提振家声的重任因此落到了奥马尔的肩上。

为了寻找活计，奥马尔来到了坎大哈省梅万德（Mewand）地区的辛格萨尔（Singesar）村。他成了村里的毛拉，还开了一家伊斯兰学校。奥马尔自己在坎大哈也有学业，不过，苏军的入侵和塔利班的创立让他的学生生涯两次中断。^{【12】}

1989—1992年，奥马尔作为伊斯兰党的一员，在内克·穆罕默德（Nek Mohammed）的领导下抗击纳吉布拉政权。战争给奥马尔带来了四处创伤，其中的一次夺走了他的右眼。

辛格萨尔村可以算作塔利班的根据地，不过，此地看上去跟其他的普什图人村庄并无二致。村里到处都是土砖房，茅草和泥巴的混合物构建的屋顶，此外，四周的高墙是普什图式民居的一种传统，专为了看家护院而设。村屋之间的道路又窄又烂，遇到下雨就成了泥泞一片。奥马尔开办那所宗教学校还在继续着自己的使命，校址设在一所小土屋里。屋里的地板很脏，一地的床垫便是学生们睡觉的地方。奥马尔有三位妻子，她们都生活在村子里。三位夫人深居简出，偶尔出门也是大袍缠身。奥马尔的第一位和第三位妻子是乌鲁兹甘省的同乡，而二太太古尔贾娜（Guljana）则是辛格萨尔本地人，她在1995年嫁给了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和三位妻子育有五个孩子，他们都在父亲的宗教学校里上学。^{【13】}

奥马尔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一脸浓密的黑胡子外加头上的黑色头巾是他留给外人的惯常形象。这位塔利班领袖喜欢开玩笑，很有冷幽默的味道。不过他不喜欢见客，尤其不习惯接待外宾。面对陌生人的到访，奥马尔往往表现得很局促，甚至有点害羞。不过和组织内的同志在一起的时



候，奥马尔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

塔利班刚刚成立的那段日子里，奥马尔仍然不改亲民的作风，他总是前往坎大哈最大的清真寺进行祈祷活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利班领袖越来越不愿意外出。奥马尔在坎大哈的住所位于塔利班的行政中心，他很少离开自己的这一处宅邸。即便是辛格萨尔村，奥马尔也很少回去。实在要回村视察，他的周围必定是保镖成群，一个日本进口的豪华越野车队前呼后拥地跟随领袖出行。车窗黑乎乎的，外人无法从中窥视到更多的秘密。

奥马尔很少在舒拉会议上发言，更多的时候，他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塔利班最高领袖的个性过于腼腆，自然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演说家。虽然以他为主角的传奇故事不少，不过奥马尔还是缺乏传奇色彩。塔利班领导人的一天基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他在那里接待来访者。一开始，领袖和前来拜见的下属一道坐在水泥地上促膝交谈。后来，奥马尔移驾到了一张床上，这显示了他的领袖地位。每当领袖和军队将领、普通士兵、教士、法官进行会谈的时候，他的几位秘书总在一旁进行笔录。一般情况下，办公室里的无线电话总在鼓噪不停，因为全国各地的军事指挥官都需要向奥马尔汇报情况。

塔利班会议的最大特色是一种小纸片，达里语称为“奇特”（chit），那上面记载着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的指示。纸片上的内容多种多样，有下达进攻的军令，也有敦促地方官员侦办案件的政令，甚至有传达给联合国调停专员的口信。塔利班和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常有书信往来，信函的内容，往往交给巴基斯坦顾问起草。

笔者收藏了不少这种小纸片，它们大都是塔利班早期的通行证。当年，正是这些破烟盒和包装纸帮助笔者在阿富汗穿州过省。现在，通行证的材质已经大有进步。奥马尔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锡皮保险箱，里面满是最新的军令和状纸，可以随时分发给下属和百姓。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奥马尔的保险箱又多了一个，这一次装的是美元。两个保险箱承载着塔利班运动的全部财富。

瓦基尔·艾哈迈德（Wakil Ahmad）是奥马尔的官方发言人。作为领袖的亲信，瓦基尔·艾哈迈德总是陪伴奥马尔出席塔利班的重要会议。这位年轻的毛拉来自喀喀尔部，后来进入宗教学校求学，师从奥马尔。加入塔利

班后，瓦基尔·艾哈迈德先后担任过奥马尔的随从、司机、翻译和书记员，甚至为自己的老师兼领袖尝膳。很快，他又负责联络来访的外国使节和援助组织代表，在阿富汗四处穿梭走访军事指挥官，并同巴基斯坦官员进行交流。作为奥马尔的发言人，瓦基尔·艾哈迈德是外国记者了解塔利班的主要信息来源。不过，如果记者批评塔利班的火力过猛，发言人会主动出面灭火（发言人变成了行刑人）。瓦基尔不但是奥马尔的耳目，还扮演着看门狗的角色。任何人要面见塔利班最高领袖，必须先过瓦基尔这一关。

塔利班人少势寡，坎大哈军阀凶恶残暴。奥马尔和他的手下如何以弱胜强的故事版本众多，其中最可信也是流传最久的一种说法大致如下：1994年春天，辛格萨尔村的老街坊告诉奥马尔，一个军阀头目掳走了两位妙龄少女，扯掉了她们的头巾，强拉到兵营施行强暴。奥马尔立即召集30名手下，拿上16条枪，对军阀的老巢进行了突袭，解救了少女，祸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坦克的炮筒上示众。同时，塔利班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需物资。后来，奥马尔曾经回忆：“我们讨伐了那些堕入魔道的穆斯林。看到妇女和穷人惨遭残害，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14】}

几个月后，坎大哈的两派军阀发生了武装冲突。两位有恋童癖好的军阀看上了同一位少年，最终酿成了一片混战，殃及无数平民百姓。奥马尔的队伍再次挺身而出，解救了被困少年。此后，塔利班帮助当地百姓扫除了不少不平之事，俨然就是除恶济贫的绿林中人，奥马尔则成了阿富汗的罗宾汉。由于这位义侠既不求财也不求物，他的民望更是水涨船高。当然，奥马尔的帮助也不是完全无价的，他的唯一要求是恳请众位坎大哈乡亲一起加入到建设公正的伊斯兰社会的行动中来。

同时，奥马尔的密使正在各派军阀之间穿梭游说、寻求支持。他们在赫拉特拜见了伊斯梅尔·汗。9月，塔利班创始人之一穆罕默德·拉巴尼亲自出马，前往喀布尔并同拉巴尼总统举行了会面。当时的喀布尔政府完全处于孤立境地。任何的普什图人武装都会被拉巴尼政权拉拢，以作为抗击希克马蒂亚尔的力量。当时，希克马蒂亚尔武装仍然将喀布尔重重围困，拉巴尼总统显然希望塔利班能前来救驾解困。为此他开出了金钱援助的价码。

不过，塔利班最为仰仗的后台始终都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是许多塔利班分子事实上的故乡，他们在这里出生，然后在伊斯兰教士协会（JUI，也称为“伊斯兰乌里玛协会”）开办的宗教学校里接受教育。伊斯兰教士

协会的领导者是毛拉纳（Maulana）·法兹鲁尔·拉赫曼，此人生性多变，他的党派信仰原教旨主义，在寓居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和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人当中极有威望。更重要的是，拉赫曼和贝·布托总理关系密切，在巴基斯坦政、军、情报三界都有人脉。通过拉赫曼的引荐，巴基斯坦的权贵们第一次对塔利班这颗阿富汗新星有了认识。

此时，巴基斯坦的对阿政策正处于摇摆之中。苏联解体之后，几届巴基斯坦政府都想开辟一条前往中亚各国的道路。不过，战乱频发的阿富汗正好横亘在巴基斯坦人的中亚之路中间。因此，巴方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他们可以继续全力支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夺取喀布尔，在阿富汗确定一个亲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政权；也可以选择出卖自己的普什图盟友，迫使冲突各方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最终，稳定的阿富汗也会为巴基斯坦的中亚梦让开一条路。

一番权衡之后，巴基斯坦军方得出结论：一个稳定而又亲近南邻的阿富汗需要普什图人才能掌控。所以，巴方继续力挺希克马蒂亚尔武装。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军队中占很大比例，达到20%。而且，他们还拥有势力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足以影响三军情报局和军方的决策。虽然巴基斯坦方面为了希克马蒂亚尔的事业殚精竭虑、全力奉陪，但这位军阀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1994年之前，希克马蒂亚尔的武装连吃败仗、奄奄一息。他所提倡的极端主义并没有赢得大多数普什图人的心，反而滋生出了众多派系、互相对立。这样一位败军之将，巴基斯坦方面显然不希望继续与之瓜葛。伊斯兰堡方面急切渴望一个希克马蒂亚尔的替代品，能担当起阿富汗普什图人的共主。

1993年，贝·布托当选巴基斯坦总理。新官上任的布托女士十分渴望一条顺畅的中亚通道。最便捷的选择，莫过于先从白沙瓦抵达喀布尔，然后向北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来到马扎里沙里夫，穿越阿乌边境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小城铁尔梅兹（Termez）。不过，喀布尔附近的战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条捷径被堵成了死路。向北走不通，巴基斯坦方面转而从阿富汗南部寻找突破口。一条新路横空出世，那就是从奎达到坎大哈，然后经赫拉特最后到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条新线得到了巴基斯坦国内上下一致的欢迎，无论是政府官员和普什图军阀，还是伊斯兰教士协会以及走私分子，都对南方路线表示全力支持。相比喀布尔地区，阿富汗南部还算平

安。只要花钱打点几个军阀，便可以一路通行顺畅。

1994年9月，巴方调研人员和情报部门从本国边境小城查曼出发，一路北进前往赫拉特。此行的目的在于考察路况。同月，身为普什图裔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斯鲁拉·巴布尔也来到查曼进行视察。坎大哈的军阀们对巴基斯坦人的计划满怀疑虑。他们担心，这条路是巴方武力镇压的前奏。埃米尔·拉赖（Amir Lalai）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军阀在写给巴布尔的信中直言：“巴基斯坦承诺帮助我国重建公路。我个人认为，修路不会自动带来和平。只要邻国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平的来临肯定迟迟无望。”^{【15】}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军阀的磋商并没有停止，坎大哈各派势力和盘踞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都是谈判的对象。

1994年10月20日，巴布尔先后访问了坎大哈和赫拉特两地，同行的还有六位西方外交官。这次阿富汗之行并没有向拉巴尼总统作任何通报。^{【16】}巴布尔一行之中有铁路、公路、电话和电力方面的多位专家。据巴布尔自己介绍，他希望能从国际机构那里获得3亿美元的资助，以重建奎达通往赫拉特的公路。10月28日，布托、伊斯梅尔·汗和杜斯塔姆三人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会面。巴基斯坦总理敦促两位军阀尽快接受巴方的公路方案，方便巴基斯坦的卡车司机安全顺利地前往中亚各国，代价不过是一点儿过路费而已。

不过，就在布托和阿富汗军阀的会谈之前，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严重动摇了坎大哈各派势力对巴基斯坦的信任。12月12日，200多名来自坎大哈和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塔利班分子来到巴阿边境的斯平布尔达克（Spin Bardak）口岸。此地离查曼并不算远，来往巴阿两国的走私分子常在这里歇脚休整、补充燃料。不过，在希克马蒂亚尔的控制下，巴基斯坦来的走私分子不能随意穿越国境。唯一的办法是让巴基斯坦的卡车在口岸卸下货物，然后阿富汗方面的卡车把东西装车运走。燃料是走私生意的大宗货物，阿富汗的军阀们需要石油供养战争。走私分子做梦都想控制斯平布尔达克，为此，他们向奥马尔捐助了大笔军费，数目高达几十万巴基斯坦卢比。同时，走私分子还承诺按月向塔利班方面提供资金。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塔利班扫荡斯平布尔达克、保证走私安全的基础上。^{【17】}

塔利班军队兵分三路，直扑希克马蒂亚尔的大营。这场战斗虽然短暂，但却十分激烈。希克马蒂亚尔方面付出了7死数伤的代价，而塔利班不

过只损失了一名士兵。塔利班攻克斯平布尔达克之后，巴基斯坦方面随即为奥马尔的武装大开方便之门。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在斯平布尔达克附近有一座军火库，在巴方的默许之下，其中的各种武器军需任由塔利班取用。这座军火库颇有些历史。按照《日内瓦公约》，巴基斯坦不能从本国领土向阿富汗冲突各方提供武器。1990年，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规避这一条例，特地把军火库搬到了两国交界的斯平布尔达克。军火库里储藏了1.8万多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十几门大炮、大量的军需物资和许多军用车辆。【18】

斯平布尔达克一失守，坎大哈的各位军阀自然是坐立难安，他们纷纷谴责巴方袒护塔利班。不过，虽然大敌当前，坎大哈的实力派把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内斗上。这边塔利班和军阀矛盾见长，那边巴布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已经组建了一支30辆大卡车的运输队，搭载着大量的机器准备前往阿什哈巴德。当时，有一位驻坎大哈的巴基斯坦官员向笔者表示：“我告诉巴布尔，因为坎大哈那些地方派别持反对意见，我们的行程应当推迟两个月。不过巴布尔坚持立即出发。坎大哈方面怀疑我们的车队在运输军械，为将来巴基斯坦军队的入侵做准备。”【19】

1994年10月29日，巴布尔的车队从巴基斯坦军方的国家物流基地（NLC）出发。这个基地建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是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向阿富汗供应美制武器的中转站。车队之中藏龙卧虎，80名司机个个都有从军经验，内务情报局的业务精英伊玛目（Iman）上校也一路随行。伊玛目上校当时在巴基斯坦驻赫拉特领事馆任职，在阿富汗南部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此外，巴布尔的队伍里还有两位塔利班代表——毛拉·博利扬（Mullah Borjan）和毛拉·图拉比（Mullah Turabi）（此后，两人都参加了攻打喀布尔的战役，博利扬在战斗中身亡）。行至塔赫提-普尔（Takht-e-Pul），巴布尔一行遇到了麻烦。一群军阀突然出现在这个离坎大哈12英里的地方拦住了车队的去路。拦路者包括埃米尔·拉赖、乌斯塔德·哈利姆（Ustad Khalim）以及控制坎大哈机场的曼苏尔·阿哈克扎伊（Mansur Achakzai）。在他们的指令下，巴布尔的车队被迫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安营扎寨。几个月后，笔者正好路过这个小山环抱的地方，巴布尔一行留下的篝火和口粮遗迹尚存，仍然清晰可见。

军阀拦路不仅是为了贪图钱财，他们还想拿一点车队的货物。此外，军阀们希望巴方停止对塔利班的支持。军阀和伊玛目上校在坎大哈讨价还

价，巴基斯坦政府却在伊斯兰堡一言不发。巴方的新闻封锁持续了三天，没人知道巴布尔的车队遭到了劫持。一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我们担心，曼苏尔武装极有可能将武器藏在我方的货车上，然后栽赃陷害我国。因此，我们曾经考虑武力解决，特种部队（巴基斯坦）和伞兵营随时待命。不过，行动的风险太大，最终我们授权塔利班前去救援。”1994年11月3日，塔利班突然对劫匪发起攻击。曼苏尔的手下误以为这是巴基斯坦军方在行动，于是一哄而散。曼苏尔本人被迫逃进沙漠，后来被俘。他和十个亲信骑兵都被处死，尸体悬挂在坦克炮管上示众。

同一天夜里，塔利班武装向坎大哈市区大举进军。战斗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天，军阀的势力基本被肃清。毛拉·纳吉布（Mullah Najib）是坎大哈军阀中的佼佼者，他手下人马超过2 500人，却未放一枪就宣布投降。事后，纳吉布的几位亲信声称他们的老上司接受过巴基斯坦的贿赂，所以才有不战而降的举动。纳吉布的条件是保住自己的武装。塔利班收编了纳吉布的人马，纳吉布本人则被迫隐退，回了自己位于坎大哈郊外的老家。这一次，塔利班缴获了十几辆坦克，还有装甲车、军车、武器。最大的收获来自坎大哈机场，六架苏-27战斗机和六架运输直升机落入了塔利班之手。这些空中武器都是苏军侵略的遗产。

几周之内，塔利班再次令巴基斯坦方面震惊。这支默默无闻的力量闪电般地攻下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仅仅付出了几十条命的代价。当时，伊斯兰堡所有的外国使节和观察家一致认为塔利班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力捧对象。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胜利深感高兴，而伊斯兰教士协会方面更是欢欣鼓舞。巴布尔神采飞扬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私下里，内政部长甚至把塔利班称作“自己人”。不过，塔利班却适时地显示了独立性，他们口头否认了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并声称自己不是任何势力的傀儡。1994年11月16日，高斯发表声明，宣称巴基斯坦将来若要向阿富汗派遣车队，需要事先征得塔利班的同意，而且巴方不能和塔利班以外的军阀组织随意交往。根据高斯的声明，巴基斯坦籍卡车得到了进入阿富汗境内运送货物的权利，巴国走私分子朝思暮想的美梦终于成真了。^{【20】}

在塔利班的管制下，进入阿富汗的卡车车队再也不用经受层层盘剥，他们只需要把买路钱一次性交给奥马尔武装，然后就可以畅通无阻。同时，塔利班还担起了路政巡逻的职责。走私分子们欣喜若狂，当年12月，



一支50辆卡车组成的巴基斯坦车队满载着土库曼斯坦出产的棉花，成功穿越阿富汗境内抵达奎达，第一次完成了联通中亚的历史使命。这次土库曼斯坦之行一共花费了20万卢比（相当于5 000美元）。与此同时，塔利班的感召力也越来越大，不少在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境两省求学的阿富汗籍普什图人纷纷回国投奔奥马尔。这些阿富汗年轻人的行动，深深地感召了他们在伊斯兰教士协会的宗教学校里的巴基斯坦同学。巴基斯坦人对阿富汗的伊斯兰革命心向往之，自愿来到阿富汗投奔塔利班。截止到1994年12月，塔利班一共从阿富汗接收了1.2万多名学生兵。

巴基斯坦当局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质疑和谴责。1995年2月访问马尼拉期间，贝·布托不得不出面辟谣，为自己的政府和塔利班划清界限。她说：“我国并没有干涉阿富汗内政，也没有扶植任何的代理人。”【21】

其后，巴基斯坦总理再次声称，本国政府无力阻止人员越境投靠塔利班。“拉巴尼先生的战争我们可无法代劳。如果阿富汗人要越过边界回国参战，我国无权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家和家人都在那边，我们如何能阻止人家回国团圆呢。”【22】

塔利班所倡导的伊斯兰教法之严厉，在伊斯兰世界里史无前例、实属罕见。很快，这一套教法体系便被推广开来。在塔利班的规定下，女性不得接受教育，也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电视机完全销声匿迹；一切体育和娱乐活动也在禁止之列；所有男性都必须蓄须。三个月之内，塔利班运动席卷了阿富汗的十二个省份，他们砸除军阀设下的路障，解除军阀的武装。随着塔利班的北进步伐，沿路的军阀逃的逃，降的降。奥马尔和他的学生军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第 2 章

赫拉特，1995年：安拉的无敌勇士

1995年3月，死亡沙漠（Dashte-e-Mango）边缘的公路上尘土飞扬。这条路的一端是坎大哈，另一端连接着350英里之外的赫拉特。公路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援建的产物，路的两旁是世界上最缺水的沙漠，气候酷热难熬。经过几十年的碾压，原就十分狭窄的路面愈加坑坑洼洼、颠簸难行。坦克履带和飞机轰炸的痕迹随处可见，不少桥梁已经破损。来往车队每小时只能前进20英里。

此时，塔利班军队正在这条路上行军，一辆辆日本造的双门皮卡车组成了一道洪流。这支汽车部队的目的地是赫拉特，塔利班士兵个个武装到了牙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与此同时，不断有车辆向着相反的方向驶去，伤兵担架塞满了车厢，一道返回坎大哈的还有伊斯梅尔·汗（Ismael Khan）的不少手下。他们是在保卫赫拉特的战斗中被塔利班俘虏的。

塔利班攻克坎大哈，打破了阿富汗军阀势力之间的均衡局面。奥马尔手中不但掌握着十二个省的地盘，而且他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赫拉特和喀布尔的郊区。在坎大哈，由于长官的严格管束，士兵的嘴都很严。如果想要了解最新战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跟着部队在路上来回奔波，和几十个塔利班士兵一起挤在狭窄的车厢里。身边放着一堆堆的军需、火箭、迫击炮和小麦面粉，完全逃开了长官的逼视，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往往很愿意敞开心扉，和笔者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据士兵们介绍，自坎大哈陷落以来，塔利班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先



是两万多名阿富汗难民和几百个巴基斯坦宗教学生越境前来投奔。后来随着塔利班武装的挥师北上，一路上不断有普什图人加入组织。这些新生力量大都非常年轻，介于14~24岁之间。当然，他们没有什么战争经验。不过作为普什图人，小伙子们能够非常熟练地操纵武器。

很多塔利班士兵都在巴基斯坦出生，随后在俾路支斯坦或者西北边境省的难民营里度过自己的早年岁月。巴阿边境上的几十家宗教学校就是他们的课堂，阿富汗的毛拉和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则是他们的师长。士兵们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包括古兰经、先知的圣训以及一点点伊斯兰教法。他们的老师学识并不渊博，只能算粗通文墨。在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师生的知识程度一样可怜。一些年轻士兵甚至对自己祖国的历史都不甚了解，至于十年前那场反侵略的圣战，他们也没有什么概念。

在笔者看来，塔利班的年轻人和十几年前圣战组织的成员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当年那批人对自己部族的血缘和历史十分熟悉，个个都怀抱着沉重的乡愁。提到阿富汗的历史掌故，圣战老兵们更是如数家珍。他们见过一个和平的、没有内战也没有外敌入侵的阿富汗，他们的后辈可没有这个缘分。小到自己的部族、长辈和邻里，大到多民族的社会环境，祖国的一切对于年轻一代的圣战士兵都陌生之极。

塔利班士兵对过去一无所知，对未来也毫无计划，残酷的现实占据了他们的生活。这些年轻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因为内战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安宁、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追求财富和知识的权利。他们十分好战，因为战争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依靠。他们都有着朴素的伊斯兰思想，这种充满清教徒色彩的意识形态完全来自村里毛拉的灌输和影响，也是他们唯一的精神食粮。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技能，耕田、放牧和制作手工艺品曾是他们父辈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是他们对此一窍不通。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这批年轻的阿富汗人很多都属于流氓无产者（lumpen proletariat）。他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塔利班组织，互相之间以兄弟相称。由于多是孤儿出身，他们从小便生活在一个没有女性的环境里，母亲、姐妹、其他女性亲属统统缺位。有些人虽然亲人俱在，却一直生活在严厉的家规之中，或者身处宗教学校。这些地方从来不对女性开放，连亲属间的探望都是一种奢望。

传统的普什图部族社会虽然保守，但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男女亲属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安然相处。相形之下，这些塔利班年轻士兵的困苦生活中完全没有异性的色彩。

毛拉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解学生要远离女人，因为那是诱惑的象征。真正的穆斯林必须排除杂念，全心全意地侍奉真主。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无怪乎年轻一代的塔利班分子能心安理得地干出下面的勾当：在坎大哈，他们将妇女禁锢在家中，不许工作、不许就学、不许购物。总之不能外出半步。他们不了解异性，对另一半的人类充满了恐惧。毛拉的话他们深信不疑，虽然这些充满性别歧视的原始观念在伊斯兰教法里找不到任何根据。他们认为禁锢妇女是“真正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他们的前辈（80年代的圣战组织）并没有走到这一步。妇女问题也成为了前后两支圣战武装的主要区别。

对于塔利班里的年轻人来说，兄弟一般的情谊不单单给战斗提供了宗教上的理由，还代表了生命中的一切。有了这种兄弟情，自己的人生才有了意义。塔利班的这种军事宗教体系并非伊斯兰的产物，反倒是借鉴自基督教。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讲求纪律、富于煽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基督教精神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的穆斯林深受其害。^{【23】}塔利班士兵认为，只有安拉的圣战士才能赢得战争。起兵的最初几个月，前线捷报频传、攻无不克。顺利的形势助长了塔利班分子头脑中宗教神话的膨胀。一次次胜利让年轻士兵们笃信，自己就是安拉的圣战士，自己的信仰才是伊斯兰教的真谛。

不断有人投奔塔利班，而塔利班也顺势北进，在未放一枪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乌鲁兹甘和扎布尔两个省份。平日里横征暴敛的军阀非常清楚民心的向背，塔利班一来他们便望风而降，并将所有武器一并奉上。

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一路前行，很快便和贾法尔·阿昆查德（Ghaffer Akhunzadeh）的部队狭路相逢。20世纪80年代，后者的部队长期盘踞在赫尔曼德省，并控制了当地的鸦片种植业。塔利班遇到了阿昆查德部属的顽强抵抗。不过，奥马尔的部队巧妙地玩弄了一套离间计，他们支持一些小毒枭攻打阿昆查德，并通过贿赂得到了其他势力的支持。1995年1月不到，赫尔曼德省落入塔利班之手。大军继续西进，来到了坎大哈-赫拉特公路边的小城迪拉腊姆（Dilaram）。这里是三个省份的交界处，处于伊斯梅尔·

汗的管辖之下。同时，北路的塔利班军队也逼近了喀布尔，所到之处都是普什图人聚居地。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倒是招降了大批士卒百姓。

阿富汗南部人民以普什图裔居多，虽然局势混乱，不过当地军阀山头众多、实力不足，统统不是塔利班的对手。但是，志在统一阿富汗全境的塔利班很快便和真正的实力派军阀短兵相接，摆在他们面前的地区民族众多、形势更加复杂。1995年1月，所有军阀结成同盟，共同向拉巴尼政府发起军事挑战。

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勾结在了一起。他们的盟友还包括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人，后者的领地就包括喀布尔的一部分。为了促成这个三角联盟，巴基斯坦费力不少。希克马蒂亚尔仍然是当时伊斯兰堡当局的头号宠臣。当年年初，巴方向希克马蒂亚尔武装提供了大量火箭炮，帮助自己的代理人攻击喀布尔。不过，巴基斯坦方面对塔利班的崛起十分震惊。贝·布托政府对这支新生武装表示支持，但是，情报部门仍持保留意见。三军情报局的官员们认为，塔利班最终不过是一支阿富汗南部的割据力量而已。

在希克马蒂亚尔眼里，塔利班是一个心腹大患。因此，这位军阀一边用火箭攻击喀布尔，一边准备阻截塔利班的北进步伐。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对喀布尔的袭击造成了大量死伤，大批城市建筑因此遭到毁坏。1995年2月，塔利班军队占领瓦尔达克，他们的脚步离喀布尔只剩下35英里。希克马蒂亚尔的根据地第一次感受到了新生势力的威胁。塔利班的闪电战还在继续，2月10日，麦登-沙尔（Maiden Shahr）陷落。这是一场造成两百多人死亡的激战。2月11日，塔利班武装又占领了穆罕默德·阿迦（Mohammed Agha）。北有政府军，南有塔利班，希克马蒂亚尔武装成了瓮中之鳖，士卒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

2月14日，塔利班武装夺取了希克马蒂亚尔位于恰拉斯亚卜的根据地，后者麾下的残兵败将纷纷向东逃窜，直奔贾拉拉巴德而去。拉巴尼总统的政府军也在马苏德武装的掩护下，全员撤入喀布尔。此前，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封锁公路长达数月，塔利班占据恰拉斯亚卜后，立即宣布废除路禁。运送食物的车队得以进入阿富汗首都。奥马尔的这一举措为自己的组织在喀布尔市民中赢得了不少印象分，为塔利班出钱出力的巴基斯坦走私团伙也大为满意。接下来，塔利班和马苏德武装走到了对抗的边缘。虽然联合国方面一直在为停火协议摇旗呐喊，却迟迟得不到军阀们的回应，他们的

代表、突尼斯人马哈茂德·梅斯蒂里也备受冷落。

马苏德的敌人之中，希克马蒂亚尔已经溃败，塔利班的威胁也并不紧迫。相比之下，固守喀布尔南郊的哈扎拉人对塔吉克军阀最具威胁。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团结党（Hizb-e-Wahadat）是他们的政治组织。为了争取时间，马苏德不得不和塔利班方面进行谈判。双方在恰拉斯亚卜会面了两次，毛拉·拉巴尼、博利扬和高斯都参与其中。这还是塔利班和自己的最大敌人首次打交道，此后的四年，双方以阿富汗为舞台进行了多次战争。这次会谈之中，塔利班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拉巴尼必须辞去总统一职，而马苏德必须投降。这显然不能让对方满意。在和马苏德讨价还价的同时，高斯一伙也和哈扎拉人搭上了线。

不过，塔利班并没有忘记梅斯蒂里和联合国。他们向调停专员提出，如果联合国需要塔利班参与和平进程，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首先，塔利班作为“中立部队”进驻喀布尔；其次，由“品行良好的穆斯林”组成临时政府；最后，阿富汗的三十个省份都必须派出代表加入政府。总之，塔利班希望一手操控阿富汗的未来政局，对此，无论是拉巴尼总统，还是联合国方面都不可能点头答应。

同时，马苏德横下了一条心，准备同所有敌人同时开战。1995年3月6日，马苏德武装向哈扎拉人发动突然袭击，坦克大军飞速开进喀布尔南郊。哈扎拉人顿时溃不成军，逃出了首都地区。哈扎拉人四处溃散，自然也停止了抵抗塔利班的步伐。他们不但为塔利班打开了通往首都的门，还义务资助了奥马尔的武装不少武器。不过，在梅乐乐（Mêlée）城的交接仪式上发生了一起意外。哈扎拉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尔·阿里·马扎里（Abdul Ali Mazari）突然身亡。哈扎拉人认为，他们的首领被塔利班分子推下直升机而一命呜呼。当时，塔利班准备将马扎里押送到坎大哈软禁起来，哈扎拉首领并不打算束手就擒。在他试图夺过一把冲锋枪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马扎里的死因真相究竟如何，仍然扑朔迷离。不过，阿富汗的什叶派信徒十分肯定凶手就是塔利班。他们的后台——伊朗政府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哈扎拉人一直矢志报复，两年之后，他们成功地在阿富汗北部剿杀了两千多名塔利班分子。哈扎拉和普什图、什叶派和逊尼派，一场民族和宗派之间的大对立、大仇杀因为马扎里的死拉开了序幕。

塔利班攻克哈扎拉人领地的行动，让马苏德十分恼怒。很快，5月11



日，马苏德军队夺回了喀布尔南郊，塔利班方面因为这场血腥的巷战付出了沉重代价，数百人死亡。这是塔利班部队的第一场大仗，也是他们吃到的第一个大败仗。马苏德武装富有战斗经验，塔利班相形见绌，指挥体系的脆弱和战术的幼稚暴露无遗。

此前，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连战连捷，不但因为那是普什图人的家园，更因为当地连年战乱，百姓渴求太平，塔利班便是当地人民心中的和平使者。现在，普什图人的子弟兵遭到了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武装的羞辱。在阿富汗南部的时候，军阀武装都有着墙头草的劣根性，而塔利班也习惯采用金钱收买的伎俩不战而屈人之兵。贿赂一直是塔利班的利器，随着毒品贸易、走私活动和外国援助的增加，塔利班的银弹攻势也在随后几年内愈发猛烈。此外，塔利班军队一路上缴获了不少装备，其中包括枪械、坦克甚至直升机。在塔利班统治区，旧军阀的部队被缴械，秩序和法律得到了加强，严厉的伊斯兰教法被推广开去。由于路禁的开启，食品价格大为下降。这些政策对长期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民来说如同甘霖。因此，虽然喀布尔一役是一个重大挫折，却并不是塔利班命运的转折点。

塔利班在喀布尔吃了瘪，于是很快调整战略方向。大军西进直指赫拉特，准备逼迫伊斯梅尔·汗就范。1995年2月底之前的几番激战之后，塔利班武装占领了尼姆鲁兹和法拉。这两个省份原来都是伊斯梅尔·汗的战略要地，距离苏联军队的空军重镇信丹德（此地位于赫拉特南郊）已去不远。拉巴尼政权对塔利班的军事进展忧心不已。一旦伊斯梅尔·汗举手投降，塔利班便可以全力进攻喀布尔。马苏德出动了大批飞机，对塔利班前线进行轰炸。同时，两千多名身经百战的塔吉克裔士兵也被空投到了信丹德附近，参与保卫机场和赫拉特的战斗。塔利班方面没有任何空中力量，后勤供应也十分薄弱，再加上组织不力，信丹德的战斗让奥马尔的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4月之前，塔利班武装被迫撤出了信丹德，一路败退之下，不少刚刚被占领的土地旋即丢失。此外，三千多人在溃逃中死亡，几百名伤员也因为缺医少药而被抛在沙漠中等死。糟糕的后勤状况甚至不能供应塔利班士兵的饮水和食粮。在逃回坎大哈的途中，一名叫萨利赫·穆罕默德（Salih Muhammed）的士兵向笔者袒露了战争的感想。他说：“这么严酷的环境我们还是第一次经历。每天敌机都要光临10~15次。既没有水，也没有吃

的，我的许多战友都是活活渴死的。至于我们的指挥官，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弹药也耗尽了，这样的处境真是悲惨。”【24】

此时的塔利班可谓两线受阻，一方面，西、北两条战线同时遭到政府军的迎头痛击；另一方面，组织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指挥同样混乱。塔利班的和平使者形象濒临崩裂，一场苦战之后，阿富汗人民发现奥马尔等人的所作所为跟以前的军阀武装并无二致。拉巴尼政权在喀布尔和赫拉特的统治暂时得到了巩固。1995年5月之前，政府军仍然占据着6个省份，势力范围遍布喀布尔附近乃至整个阿富汗北部。而伊斯梅尔·汗则拥有阿富汗西部的3个省份。塔利班本来已经坐拥12个省份，却又因为战争失利丢掉了4个。不过，塔利班并没有放弃攻打赫拉特的企图，普什图人控制的各大走私团伙也在为奥马尔武装摇旗呐喊。赫拉特位于通往伊朗和中亚的必经之路上，是走私团伙做梦都想拿下的交通重镇。

在众多的圣战组织领导人之中，伊斯梅尔·汗的威望无与伦比。而在阿富汗各地的人民之中，赫拉特人民为抵抗苏联入侵付出的努力也是无与伦比。伊斯梅尔·汗原是一名职业军官，他拥有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思想。苏联方面认为，说波斯语的赫拉特人拥有阿富汗最高的文化水准，他们秉性温驯、厌恶战争。赫拉特人上一次拿起武器，还要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1837年波斯人大举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苏军很快将信丹德辟为阿富汗最大的空军基地，军官家属纷纷入住，他们满以为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

事实让苏联人跌破了眼镜。1979年3月1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城市暴动席卷了空军基地，无数的苏联军官、顾问和军属被杀。伊斯梅尔·汗率领的警备部队趁机哗变，将军中的苏联人员和亲苏分子一网打尽，并把缴获的武器分发给当地人民。这次事件当中约有数百名苏联籍人员遇害。莫斯科当局害怕事态扩大，300多辆坦克从土库曼斯坦大举南下，对赫拉特暴动进行镇压。苏联人的空中打击毁掉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即便到了现在，时光走过了15年，赫拉特城里的很多地区还是瓦砾遍地、弹坑密布，形如月球表面。苏军的报复造成了两万多名赫拉特人身亡。伊斯梅尔·汗被迫逃往乡下，他的游击队也随之转入农村地区进行活动。数万名赫拉特居民则逃往伊朗，成了难民。此后的十年之中，伊斯梅尔·汗的武装一直在和苏联占领当局进行艰苦的游击战，经过努力，赫拉特的农村地区基本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人民也对他们赞颂有加。苏军撤离之后，伊斯梅尔·汗凭

借着战争时期积累下的巨大声名，很快便将赫拉特纳为自己的地盘。

作为阿富汗文明的摇篮，赫拉特这座绿洲小城的历史已经接近5 000年。这片土地群山延绵，山脚下的河谷中尽是良田，延绵200多平方英里，富饶程度为中亚之最。希罗多德（Herodotus）把赫拉特比作中亚的粮仓。巴布尔大帝也对这里极尽溢美，他曾经写道：“普天之下难以找到赫拉特这样的城市。”英国殖民者来到赫拉特，也生出几分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情思。康诺利（Connolly）是英国著名的探险家，曾在谍海浮沉多年。他对赫拉特的赞美体现在1831年的一篇日记中：“山中景色极美，小村、花园、葡萄架、玉米田。四下流出无数条涓涓细流，它们闪着银光，蹚过田野，把一切照得亮亮堂堂。”【25】

几个世纪以来，赫拉特一直处于争端的风口浪尖，西边是波斯帝国，东边是突厥部落。这里的人早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城中的清真寺建于公元7世纪。1200年，古尔王朝（Ghorid）又对庙宇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中世纪的赫拉特同样是一座基督教重镇，聂斯托利派在这里生根发芽。伊斯兰教苏菲派同样把赫拉特当做隐修的所在。修士们出则按照纳克什班迪（Naqshbandi）和奇里斯蒂亚（Chistyia）两大教团的规矩潜心研修，入则担任君主身边的股肱重臣。哈瓦贾·阿卜杜拉·安萨里（Khawaja Abudullah Ansari）是赫拉特城的守护神，这位苏菲派贤哲同时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1088年去世之前，他在阿富汗拥有大批追随者。1222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横扫赫拉特，铁蹄之下，这座有16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0人苟延生还。不过，仅仅过去了两个世纪，赫拉特便再次迎来了历史的高峰期。

跛子帖木儿的第四子，帖木儿帝国的继承人沙哈鲁（Shah Rukh）将国都从撒马尔罕迁到了这里，在君主和皇后古哈尔·沙阿德（Gowhar Shad）的悉心经营下，这座古老的城市再现了一片盛世气象，繁荣程度胜似当年。

突厥人原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波斯语族人民则代表着定居的耕作文化。帖木儿帝国很好地将两种传统结合了起来。沙哈鲁和古哈尔从波斯、印度和中亚各地收罗能工巧匠，在赫拉特大兴土木。一座座清真寺，经学校、公共浴室、图书馆和宫殿拔地而起。赫拉特的市场里应有尽有，地毯、珠宝、刀具、盔甲和瓷砖都精美之极。当时，在这里还生活着著名的比哈扎德（Bihzad）——最负盛名的波斯细密画巨匠。沙哈鲁的宰相阿里·谢赫·纳瓦依（Ali Sheikh Nawai）曾经自豪地宣布：“在赫拉特每跨一

步，都会踢到一位诗人。”^{【26】}纳瓦依本人也有着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非凡的文学成就。这位赫拉特的优秀儿子开创先河，一改用波斯语写作的传统，转而用突厥语抒发诗意，因此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心目中的诗圣。著名的波斯诗人贾米（Jami）和纳瓦依一样才华横溢，他们最后都长眠在了赫拉特土地上。沙哈鲁的儿子兀鲁伯（Ulugh Beg）也在赫拉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帖木儿帝国的第三代君王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撒马尔罕建立的天文台世界闻名。1665年，牛津大学出版了这位君主钦定的历法和星象图，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其精确程度仍然让人吃惊不已。

古哈尔·沙阿德向来热衷于修建清真寺。1417年，王后的又一个建筑杰作在赫拉特近郊竣工了。这一次落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寺庙，还有相关的宗教学校。古哈尔本人的陵寝也坐落在清真寺旁边。陵墓四周的高墙镶嵌着蓝色的波斯瓷片，花纹装饰点缀其间。同样是蓝色的穹顶上，白色的经文闪闪放光。时至今日，古哈尔陵寝仍然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典范。1937年，罗伯特·拜伦曾经发出如此的感叹：“这座建筑的颜色不但是人间至美，天上也难得见识几回。”^{【27】}古哈尔一生主持修筑了300多座各类建筑，遍布阿富汗、波斯和中亚各地。这位女王的墓志铭言简意赅，把她比作“当代的比尔吉斯”。的确，古哈尔的八十岁生涯，和传说中的那位示巴女王十分相似。^{【28】}不过，这个建筑杰作在1885年遭遇了一场浩劫，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几乎将其摧毁殆尽。后来，苏联军队为了抵挡圣战组织，又把这里变成了雷区。

1979年苏军的侵略对赫拉特造成的破坏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蒙古人。1993年，伊斯梅尔·汗曾经告诉笔者：“赫拉特是全世界破坏最严重、地雷最为密布的城市。而且我们没有一点外援。”^{【29】}不过，虽然时局艰难，伊斯梅尔·汗还是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统治机制。他辖下的三个省内的裁军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而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机构也初具规模。

伊斯梅尔·汗身材矮小、生性机灵，脸上常常挂着狡黠的笑，看起来不像个47岁的人。在他的地盘里，学生一共有7.5万人。其中赫拉特的各所学校的学生总数为4.5万人，在1993年之前，学生中半数都是女性。1993年，笔者随伊斯梅尔·汗参观过一所位于阿图恩-赫尔维（Atun Heirvi）的学校。1500名女生在此就学。由于没有教室、课桌、课本、纸张和墨水，学校一切教学活动都在露天进行，学生们也只能席地而坐。赫拉特人尊重教

育的传统可见一斑。塔利班治下的坎大哈则是另一番光景，在那里，45所非宗教学校被迫关门，只有3所苟延残喘。塔利班攻占赫拉特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女学生统统遣散，甚至不能在家里接受教育。

1995年之前，伊斯梅尔·汗的统治渐渐露出败象。他所建立的征兵制度臭名昭著、腐败不堪，常常鱼肉百姓，最后不得不重新把武装交还给普通民众，以便抵抗塔利班的军事攻势。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军队之中，伊斯梅尔·汗的官僚系统已经完全腐烂。外来的车队如果想过境赫拉特，必须付出1万巴基斯坦卢比（约300美元）的高昂代价。于是，伊斯梅尔·汗武装和巴基斯坦的走私集团也结下了怨仇。塔利班方面对伊斯梅尔·汗的窘境十分清楚。瓦基尔·艾哈迈德曾经向笔者表示：“伊斯梅尔·汗外强中干，他手下的兵丁长期领不到军饷，根本没有战斗力。手下官僚腐败无能，已经让伊斯梅尔·汗失道寡助。现在他只能指望马苏德拉他一把了。”^{【30】}

在军事上，伊斯梅尔·汗也出现了一次大失策。他满以为屡战屡败的塔利班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于是悍然起兵，对奥马尔武装进行追击。借着强劲的机动力量，伊斯梅尔·汗武装很快夺下了迪拉拉姆，一周之后又顺利进入赫尔曼德省，直逼塔利班的老巢坎大哈。不过，伊斯梅尔·汗武装的战线拉得过长，同年夏天，塔利班的元气也大大恢复。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援助了大批武器、军需和车辆，三军情报局则重塑了塔利班的指挥系统。此外，在巴方情报部门的撮合下，塔利班和杜斯塔姆武装达成了秘密协议。乌兹别克军阀的技术人员来到坎大哈维护塔利班缴获的米格战斗机和直升机。奥马尔因此有了自己的空军力量，同时，杜斯塔姆武装的飞机开始轰炸赫拉特。

为了抗击伊斯梅尔·汗的攻势，塔利班出动了2.5万多人，其中有不少士兵刚刚从巴基斯坦初来乍到。有一定战斗经历的老兵们挤在达特桑皮卡车中，开赴前线去打乱伊斯梅尔·汗的补给供应。8月底，伊斯梅尔·汗武装在吉里什克（Girishk）落入了塔利班的埋伏圈，遭遇大败，不得不抽身退却。几天之内，双方的攻守态势完全颠倒，塔利班趁势长驱直入，逼近信丹德。9月3日，信丹德失守。两天之后，塔利班再次发起闪电攻势，伊斯梅尔·汗的武装乱作一团。赫拉特落入前者控制，而后者则带着数名亲信及几百名士兵潜逃伊朗。赫拉特的失守在喀布尔引发了一场骚乱。亲政府势力对塔利班的胜利大为恼火，在守卫的默许下，他们围攻了巴基斯坦大

使馆。拉巴尼本人也出面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企图颠覆自己的政权，两国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赫拉特一役后，塔利班控制了整个阿富汗西部，其中包括大片的阿伊边境地区。对于奥马尔武装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对一个非普什图人聚居区进行有效统治。塔利班大肆逮捕异己、关停学校、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和种种社会禁锢措施。赫拉特不是坎大哈，胜似坎大哈。普什图人操纵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从军事守卫到政府部门，本地土著没有一点参与的余地。很多南方来的新主人对波斯语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

塔利班统治赫拉特的几年中，没有一个本地人能登堂入室进入政府谋得一官半职。赫拉特原住民向来鄙薄普什图人，认为这帮南方佬愚昧无知，对赫拉特的历史和文脉也是一无所知。现在他们居然爬到了自己头上，实在是不可忍受。不过，在外来者的武力威胁之下，赫拉特人唯一的反抗途径不过是去贾米的墓前凭吊怀古，吟诵这位诗人最后的话语，抒发愤懑之情。贾米曾经写道：

“当你的脸从我面前消失，好像月亮消失在深夜之中。我留下了星星的眼泪，虽然漫天星光灿烂，却也无法照亮我心中的黑暗。”^{【31】}

赫拉特的失守敲响了拉巴尼政权的丧钟。当年10—12月，塔利班乘着得胜之势，继续向喀布尔发起猛攻。他们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斗。马苏德的反击曾经将塔利班击退，并造成数百名士兵死亡。不过，奥马尔的武装并没有后退的意思，强攻不行，那就智取。事实证明，塔利班的“银弹”远比炮火奏效，马苏德阵营因此出现了裂隙。

第 3 章

喀布尔，1996年：信徒的领袖

1996年的早春，气候寒冷，几百名毛拉汇聚到了坎大哈。他们有的坐吉普，有的搭卡车，有的甚至选择骑马，总人数超过了1 200名，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西部，有的来自中部。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千奇百怪，有的住政府办公楼，有的在军事工事里栖身，有的选择在集市里铺上一条毯子席地而居。一个小小的集市里挤下了几百个毛拉。

这是一次毛拉和教士的大聚会，在阿富汗的现代史上首屈一指。至于各地的军阀头目、部落长老、抗苏战争中的各位英雄以及阿富汗北部非普什图地区的代表，统统都不在与会之列。奥马尔只邀请了宗教界里的普什图同胞一齐商讨国事，讨论阿富汗未来的宏伟蓝图。通过这样一次大会，塔利班可以获得作为中央政府的合法地位，这便是奥马尔的如意算盘。

塔利班围困喀布尔已经有10个月了，拉巴尼的城池却还是岿然不动，倒是攻城者的伤亡数字不断攀升。随着寒冷冬季日益临近，塔利班温和派主张和拉巴尼政权展开谈判。但是，强硬分子绝不会放弃征服全国的梦想。各个普什图部落的意见也不统一，奥马尔的坎大哈同乡坚决拥护领袖，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而那些新近依附塔利班的部落代表则希望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旁观者清，那些了解阿富汗局势的外国人非常清楚塔利班的处境。联合国调停官员马哈茂德·梅斯蒂里（Mahmoud Mestiri）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告诉笔者：“塔利班拿不下喀布尔，而马苏德武装也无力进占坎大哈。

如果喀布尔一役失败，塔利班将会怎样？即便塔利班占领喀布尔，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人们会接受他们那一套宗教制度吗？”^{【32】}连续两天两夜，舒拉一直在开会磋商。会议通宵达旦，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阿富汗政治和军事的未来，到宗教法律的具体实施，再到塔利班控制区内女子受教育的问题。这次会议进行得十分隐秘，期间外国人甚至不允许进入坎大哈。连巴基斯坦的外交和情报官员，包括大使卡兹·胡马雍（Qazi Humayon）和驻赫拉特总领事伊玛目上校也在被驱逐之列。

为了弥合各部落之间的嫌隙，奥马尔的坎大哈亲信决定把自己的领袖推举为“信徒的领袖”（Amir-ul Momineen）。这个头衔至高无上，它象征着伊斯兰圣战的领导权，也是阿富汗伊斯兰国国家元首的封号（“阿富汗伊斯兰国”是塔利班政权的新国号）。1996年4月4日，奥马尔在坎大哈市中心的一座建筑上现身。塔利班领袖身披先知的斗篷，这还是此圣物60年来首次现身。奥马尔把先知的圣物披上又脱下，反复数次，楼下的毛拉们一直兴奋不已。他们高喊着“信徒的领袖”的名号，为奥马尔鼓掌欢呼。

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各位圣徒也是高呼忠诚的颂词将哈里发·奥马尔（Caliph Omar）推选为穆斯林的领袖。看看历史，看看今昔，场景是何其的相似。一场成功的政治表演让奥马尔顺理成章地成了阿富汗人的共同领袖，而且大有担任全世界穆斯林领导者的势头。塔利班宣布对拉巴尼政权发动圣战，并绝不会和任何对手展开谈判。至于妇女教育问题“必须在阿富汗合法政府建立后”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教士会议以奥马尔和强硬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33】}

奥马尔的行动在全体阿富汗人乃至全球穆斯林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个乡村毛拉，既没有部落贵族的背景，也没有继承先知的血胤，甚至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宗教教育，如何能担当得起“信徒的领袖”？自1834年以来，这个尊贵的称号一直从缺。上一个以“信徒的领袖”自居的阿富汗人，是当时的国王杜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ohammed Khan）。这位国王之所以揽下这个头衔，目的是向盘踞在白沙瓦的锡克教徒发起圣战。如今，奥马尔为了发动内战、屠杀同胞，竟然胆大包天地进行僭越。更重要的是，一位“信徒的领袖”的诞生，必须通过全国宗教界领袖的公认。塔利班方面狡辩道，会议的参加者都是古兰经中所说的“ahl al-hal o agd”，即是“决定民心聚散的人士”，他们的意见和决定代表了

阿富汗全体穆斯林。

“信徒领袖”的头衔给了塔利班头目亟需的统治合法性，以及普什图人的无上拥戴。奥马尔的权势一时无边，让其他的圣战组织领袖望尘莫及。同样，这个神圣的名号还给了奥马尔隐居的理由，他可以正大光明逃避日常的政治活动和外国记者的采访要求。而且，“信徒领袖”的光环还让奥马尔的政治身段变得更加柔软。无论是组织内的领导事务，还是和反对派打交道，奥马尔都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信徒领袖”的身份让他在和敌人的谈判中占据居高临下的地位。

虽然“信徒领袖”一职让奥马尔如获至宝，除此之外，塔利班牵头组织的教士协会在其他方面却罕有进展。塔利班准备如何领导这个国家？而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才能实现？直到塔利班攻下喀布尔，这些敏感的问题统统没有答案。瓦基尔对此表示：“我们的一些内部事务之所以没有向公众公开，因为组织的实力还很薄弱，总理和总统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他还认为：“伊斯兰教法不允许世俗政治和政党活动。因此，我们不向官员和士兵发放饷银，只提供食物、制服和武器。我们要效法1400年前先知的生活方式，圣战便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再现先知的时代，我们只是把过去14年来阿富汗人民一直渴求的东西付诸实践。”^{【34】}另一位塔利班领导人更为言简意赅，他说：“我们可以把爱献给敌人，但他们只有失败后才可爱。”

此前一天，塔利班的密使和梅斯蒂里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会晤。联合国调停专员被告知，塔利班方面已经准备和拉巴尼总统进行妥协。^{【35】}梅斯蒂里对此十分期待：“如果塔利班方面准备和谈，拉巴尼总统一定愿意奉陪。”不过，塔利班教士会议的最终结果让专员先生和联合国方面的努力统统落空。当年5月，梅斯蒂里辞职。

塔利班举行教士会议的另一大诱因，来自于拉巴尼政权在政治上的节节胜利。不但各派反塔利班势力都有向喀布尔靠拢的趋势，而且拉巴尼本人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强。拉巴尼政权驱逐了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和哈扎拉人的势力，塔利班的攻势也一度退潮。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拉巴尼总统要扩大自己的势力正逢其时。这一次，拉巴尼拿出的手段是改组政府。

拉巴尼向其他军阀许诺，喀布尔政权将进行改组，而各派势力都会受邀入阁。1996年1月和2月间，拉巴尼的特使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l



Rehman) 分别在萨罗比、马扎里沙里夫和巴米扬会见了希克马蒂亚尔、杜斯塔姆和伊斯兰团结党的负责人。2月，阿富汗境内所有的武装势力都已经接受了总统的和谈建议，他们都答应派出十人代表团和政府军方面展开谈判。塔利班当然不在此列，奥马尔仍然厉声要求拉巴尼下台。

几周之后，伊斯兰党（Hizb Islami）授权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就分享权力展开谈判。

拉巴尼的合纵连横让巴基斯坦方面心急如焚。巴方使出浑身解数准备拉塔利班一把，要将各路武装团结到奥马尔一边，共同打击拉巴尼的政府军。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将希克马蒂亚尔、杜斯塔姆和贾拉拉巴德舒拉的各位头面人物以及伊斯兰团结党的部分领导人请到伊斯兰堡，试图劝说各派和塔利班组成同盟。各位阿富汗军阀的巴基斯坦之行从2月7日持续到了13日，前后长达一星期，总统法鲁克·莱加里（Farooq Leggari）和总参谋长杰汉吉尔·卡拉迈特（Jehangir Karamat）都参与了游说活动。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各方联合进攻喀布尔，塔利班从南部起兵、希克马蒂亚尔从东边发难，而杜斯塔姆则从北方南下。^{【36】}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布尔专门拨款300万美元，帮助塔利班修葺了查曼-托尔甘地公路（Chaman to Torgundi）。这条公路南起巴阿两国交界处，北到土库曼斯坦边境。不过，得到好处的塔利班却拒绝派员参加巴方的亲善会议。

虽然巴布尔和伊斯兰教士协会的法兹鲁尔·拉赫曼等人一心促和，奥马尔等人却不领情。塔利班将其他军阀势力指责为信奉共产主义的民族叛徒，谈判断无可能。

巴基斯坦方面组织反政府联盟的努力最终落了空，拉巴尼的胆子也更大了。3月初，阿富汗总统率领一个60多人的代表团，旋风般地访问了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此次行程之中，拉巴尼一再请求各国增加援助，并提供军事支持。伊朗、俄罗斯和印度三国是拉巴尼政权一贯的后台。三国政府一致认为，阿富汗的冲突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万一拉巴尼政权失势，由此而来的后果不但是政局混乱，宗教极端主义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赫拉特的失守让伊朗当局十分恼火。塔利班势力不但有着强烈的反什叶派立场，更有伊朗的战略对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撑腰。俄罗斯方面也更加信任拉巴尼政权。在他们看来，拉巴尼比塔利班更为温和，身段也更为柔软，不会对中亚各国的稳定带来威胁。而

且，莫斯科当局急切希望塔吉克斯坦内战尽快结束。这场内战已经持续四年，一方是信奉新社会主义的政府军，一方是和阿富汗军阀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印度力挺拉巴尼的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塔利班身后站着巴基斯坦。

伊、俄、印三国都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俄方参与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修缮工作，不但提供了技术支持，还利用飞机从本国国内、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等地调运了大批武器、军需和燃料，作为送给拉巴尼政权的礼物。伊朗的空中通道联通了本国东部的马什哈德和巴格拉姆，源源不断地送去各种武器。根据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报告，仅仅一天之内，就有满载援助的13架伊朗飞机降临巴格拉姆。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拉巴尼政权的什叶派盟友以单价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5枚“毒刺”地空导弹（1986—1987年之间，美方向圣战组织提供了900多枚毒刺导弹。1992年之后，中央情报局试图回购这些武器，但结果不甚理想）。^{【37】}伊朗方面还在马什哈德附近设立了5个训练营，伊斯梅尔·汗手下的5 000多名士兵在此受训。此前，由于马苏德武装大肆屠杀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伊朗方面曾经十分愤怒。1年过去后，为了力挺拉巴尼政权，德黑兰当局不得不强压怒火。可见这一笔大力资助真是得来不易。由于战乱，阿富汗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空基地早已迁往新德里，印度政府当然责无旁贷。而且，新德里当局还向拉巴尼政权捐赠了一架运输机，以及一些飞机部件、地面雷达和现金。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加大了援助塔利班的步伐。巴基斯坦出面提供了一系列通信系统，其中包括无线和有线两套设备。巴方还整修了坎大哈机场，向塔利班空军捐助了大量零配件和武器。来自伊斯兰堡当局的食物、燃料和火箭等军需供应更是从没有停止过。沙特阿拉伯方面则包揽了塔利班的燃料和金钱来源，他们的援助项目还包括几百辆皮卡车。这批物资都是经由迪拜空运到达坎大哈。

外国势力的横加干涉让美国方面十分担心。经过四年的冷处理后，华盛顿当局再次对阿富汗问题萌发了兴趣，开始投身到和平运动当中。汉克·布朗（Hank Brown）在参议院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委员会任职，这位国会议员也是六年来第一位访问喀布尔的美国民意代表。布朗在阿富汗各地访问周旋，他甚至提议各派武装前往华盛顿进行会谈。^{【38】}



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宾·拉斐尔（Robin Raphel）也在同一时间访问伊斯兰堡，她向巴方转达了美国的阿富汗政策。1996年4月19日，拉斐尔开始了自己的阿富汗-中亚之旅，此行期间，她在喀布尔、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和中亚三国之间来回辗转。助理国务卿在喀布尔宣称：“我们不是来干预阿富汗内部事务的。作为阿富汗的朋友，我们的目的只是劝说各派力量坐下来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关心的是，如果政局不稳定，一切经济建设都无从谈起。”^{【39】}拉斐尔所谓的经济建设其实就是一条天然气管线。这条管线一头挑起土库曼斯坦，一头连接着巴基斯坦，途中经过阿富汗的国土。管线规划出自美国优尼科公司，凝结着这家石油巨头的心血。美国政府希望阿富汗各派就管线问题达成共识。为此，华盛顿当局多次督促巴基斯坦方面同拉巴尼政权进行沟通，以便让拉巴尼和塔利班分子坐到谈判桌两端。

美国方面的阿富汗政策全面开动。1996年4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后作出决议，宣布对阿富汗实施禁运。这还是六年以来，安理会第一次讨论阿富汗议题。拉斐尔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期望彻底阻止地区各国对阿富汗的干涉行为；二是意图借用联合国的权威，逼迫阿富汗各派进行和谈。^{【40】}

克林顿政权和塔利班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两者都施行强烈的反伊朗政策，而且，塔利班在美方力主的中亚天然气管线路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打压伊朗，美国国会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2 00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伊朗方面认为，这笔钱完全流向了塔利班。对于伊方的指责，华盛顿当局一直予以否认。贝·布托总理多次派员前往美国，敦促美方公开支持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立场。不过，虽然美、巴、塔利班三方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美国政府却拒绝充当阿富汗内战的干预者。对于美国力挺塔利班的传言，拉斐尔恼怒地给予否认，助理国务卿亲口向笔者证明：“我方在阿富汗内战中沒有倾向，也没有盟友。”

此外，美方并不看好塔利班的政治前途，他们怀疑塔利班能否很快入主喀布尔。在拉斐尔看来，这个组织内部矛盾重重，缺乏斗争经验，领导层缺乏魄力，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而且，塔利班的顽固态度已经惹恼了其他军阀。拉斐尔评价道：“塔利班弱点太多，而马苏德武装日益壮大。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有失衡的趋势。塔利班想要统一阿富汗已经不太可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是他们的极限。当然，塔利班在普什图人聚居

的阿富汗南部还是很稳固的。”^{【41】}

拉拢塔利班的同时，美国也在和其他军阀暗通款曲。不少军阀都受邀前往华盛顿访问，杜斯塔姆将军是其中的第一人。1996年4月11日，杜斯塔姆在华盛顿和美国官员进行了会谈。6月25—27日，一次空前的会议在华盛顿开幕，与会各方来自阿富汗的各派军阀，而主持者则是前面提到的参议员汉克·布朗。不过，1996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华盛顿当局也无心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进展。因此，虽然阿富汗境内的毒品和武器走私问题让美方十分头疼，但美国人的行动始终十分有限。

美方对塔利班的三心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巴基斯坦牵头的反拉巴尼联盟的失败。5月，希克马蒂亚尔的1000名属下来到喀布尔，帮助政府军对抗塔利班。这一举动进一步打击了巴基斯坦的企图。1996年6月26日，希克马蒂亚尔亲自来喀布尔，这还是这位军阀头子十五年来第一次驾临首都。这一次，希克马蒂亚尔是为了就职而来，他刚刚被拉巴尼任命为政府总理，而他的党派在内阁中占据了9把交椅。当天，塔利班的火箭炮袭击了喀布尔，这次报复行动一共造成6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拉巴尼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政治联盟进展顺利。很快，阿富汗总统来到贾拉拉巴德进行回访。拉巴尼此行的目的是拉拢当地的舒拉，他宣称，政府军尊重所有军阀，愿意和他们一道携手共进。各方可以在贾拉拉巴德召开会议，选举出新的国家元首。8月之前，杜斯塔姆也加入了同盟之中，乌兹别克军阀重新开放了萨朗公路。这条路是连接喀布尔和阿富汗北部的生命线，此前已经关闭了一年多。拉巴尼提倡的“阿富汗内部对话”大有成真的势头。阿富汗总统本人告诉笔者：“越来越多的敌对势力会加入我们的联盟，然后形成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轴心。我一直在为此努力，为的就是新的临时政府早日形成。”^{【42】}拉巴尼的成功深深地刺激了塔利班。坎大哈方面十分清楚，自己必须在拉巴尼联盟大功告成之前尽快夺取阿富汗政权。

在1996年一年中，喀布尔城外的塔利班军队一直用火箭攻击阿富汗首都。仅仅4月，就有866枚火箭落入喀布尔，180名平民死亡，550人受伤，大量建筑受损，这一幕让人想起了1993—1995年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对喀布尔的攻击。7月，塔利班的火箭差点让德国外交官诺尔伯特·霍尔（Norbert Holl）送了命。霍尔是联合国调停专员，当时刚刚上任，这次喀



布尔历险记让他又惊又怒：“居然胆敢向和平使团开枪。朝客人身上吐唾沫难道是你们的待客之道？”这是霍尔怒斥塔利班的话。【43】

除了高密度的火箭攻击，塔利班还加强了地面攻势，向位于喀布尔南部和西部的马苏德武装阵地发起猛攻。那年5月末的一天，笔者正在喀布尔附近的战场上，脚下是一座泥泞的小山包，身旁是马苏德的部队。通过眼前的望远镜，我能看见一队队的塔利班军车正沿着山谷中的小路向马苏德武装的阵地逼近，他们的头上，塔利班的大炮一直轰鸣不停。炮声隆隆回荡在群山之间，笔者当时不禁有点头晕耳鸣、双膝发颤。而我身边那些枪手更加倒霉，他们没有保护耳朵的东西，估计都聋了。

马苏德武装的阵地上一片忙乱，满载兵员和物资的卡车在泥泞的山路之间上下奔波，不断为前线补充新鲜血液。马苏德武装的一名指挥官认为：“塔利班的军需物资真是丰富无尽。虽然他们的枪手缺乏准星，但坦克和皮卡车的攻势还是十分有效。比起一年之前，已经大有进步。”他还补充说：“当然，塔利班军队的战术仍然很幼稚，更多是靠战场上的血勇在拼搏。至于战术，还真的看不出来。”塔利班无法组织足够多的人力和火力，不能在马苏德的阵地上找到入城的突破口。对手总是能打破塔利班的部署。

不过，虽然马苏德控制了喀布尔附近的运输线，但他手下兵力有限。25 000多人的武装无法对来犯之敌形成有效反击，也无法将塔利班赶回南方去。

塔利班拒绝和谈的顽固态度一度让巴基斯坦方面恼怒不已。不过，塔利班鼓吹的冬季攻势，再次成功地争取到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1996年7月，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访问伊斯兰堡，巴沙双方讨论了攻克喀布尔的新方案。最后，两国都加强了对塔利班的援助。图尔基结束访问两个月不到，塔利班军队再次出击。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贾拉拉巴德。在巴、沙两国的策划之下，哈吉·阿卜杜尔·卡迪尔（Haji Abdul Qadeer）成功叛逃。传言说，贾拉拉巴德舒拉头面人物从巴基斯坦方面受贿1 000万美元。此外，巴方还承诺保护卡迪尔在巴基斯坦的财产和银行账号。【44】

1996年8月25日，塔利班武装突然对贾拉拉巴德发起袭击。塔利班主力还在路上进军的时候，数百名武装分子突然从东边直逼贾拉拉巴德城下。这些人都来自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不用说，他们的行动背后有巴方的

授意。贾拉拉巴德城内立即陷入一片大乱，舒拉分崩离析，9月10日，卡迪尔逃往巴基斯坦。一天后，省长马哈茂德和他的6名保镖在逃往巴基斯坦的路上遭遇刺杀，统统一命呜呼。当晚，毛拉·博利扬率领着塔利班车队开进贾拉拉巴德城内，守军只进行了短暂的抵抗，70多人在战斗中死亡。

此后的几天内，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拉赫曼和库纳尔三省相继落入塔利班之手。9月24日，塔利班军队兵临萨罗比（Sarobi）城下，此地距喀布尔只有45英里，是首都的门户。塔利班的攻势十分迅猛，而且来自四面八方。政府军招架不住，只得全数退回喀布尔。阿富汗首都的东大门完全洞开，塔利班也乘胜追击尾随溃退的政府军部队攻入喀布尔地区。塔利班的另两支部队也在向喀布尔进军，一支从南边出击，另一支则从萨罗比南下，夺取了巴格拉姆，占据了马苏德武装唯一的空中补给线。

塔利班的迅猛攻势让拉巴尼政权十分震惊。9月26日，马苏德下令撤军，并对喀布尔进行疏散。此后数小时，塔利班军队踏入喀布尔市区内。残余的马苏德武装一面抵抗塔利班，一面将城中的武器库悉数破坏。他们的首领则带着大批重炮和装甲车向北逃窜。马苏德的选择是明智的，一来塔利班的攻势确实迅猛，自东西南北四方扑面而来，二来死守孤城会造成重大伤亡，塔吉克军阀可不想日后被喀布尔市民唾骂。这一仗，塔利班取得了完胜。“无论是政府军还是游击队，还没有哪一支阿富汗武装能在如此大的战场上发起有效而连续的攻击行动，简直是战争效率的典范。”^{【45】}

占领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立即处决了纳吉布拉。这位前总统死时正好50岁，1986—1992年期间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1992年下台后，纳吉布拉一直藏身在联合国驻喀布尔的一处建筑内。当时，联合国组织临时政府的计划被迫流产。不久后，圣战组织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原想混在联合国调停专员贝农·塞万（Benon Sevan）一行人之中逃出首都。但是，圣战组织拦下联合国官员的队伍，而纳吉布拉也被迫滞留喀布尔。好在，各派军阀都对联合国驻喀布尔机构的豁免权尚存一丝尊重，纳吉布拉暂时没有性命之虞。不过，纳吉布拉的家人早早就已经潜逃国外。1992年之后，他的太太法塔娜（Fatana）和三个女儿一直在新德里定居。

联合国要为纳吉布拉的死负部分责任。萨罗比陷落的当天，纳吉布拉曾经向伊斯兰堡的联合国机构求救。纳吉布拉希望霍尔把他和他的三个亲信——其中包括自己的弟弟沙哈普尔·艾哈迈扎伊（Shahpur Ahmadzai）、



一名秘书和一位保镖带出火海。不过，联合国官员对此态度漠然。倒是马苏德伸出援手，为前总统一行人的逃亡提供方便。9月26日下午，马苏德的一位得力干将拜见了纳吉布拉。马苏德方面表示，前总统可以跟随政府军逃往北方，并承诺保障他的安全。但是，纳吉布拉回绝了马苏德的好意。前总统一向倔强，十分好面子。他认为，自己如果和塔吉克人同流合污，恐怕无颜面对普什图乡亲父老。^{【46】}当时，联合国驻喀布尔机构还剩下3名守卫，塔利班的隆隆炮声早就吓破了他们的胆。敌人未到，3人早已逃之夭夭。无奈之下，纳吉布拉向伊斯兰堡再次发信求援，这也是他最后的呼声。一切都已经太迟。凌晨一点钟左右，5名塔利班士兵站在了前总统面前，为首的据说是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这位毛拉原是赫拉特地方首长，现在负责攻打喀布尔的军事行动。拉扎克事后宣称自己下达了处死纳吉布拉的命令。^{【47】}

塔利班分子将纳吉布拉及其兄弟打得半死，随后将几名俘虏扔上汽车，连夜押送到总统府。前总统在自己的官邸里遭到阉割，然后被挂在车后拖行。皮卡车绕着总统府行驶了几圈之后，塔利班分子一枪打死了奄奄一息的纳吉布拉。纳吉布拉的兄弟也遭受了同样的虐待后被杀。两人的尸体被悬挂在总统府外的一处交通指挥亭上示众。悬尸处距离联合国代表处只有几个街区。

天色发亮之后，许多好奇的市民都发现了这两具尸体。只见尸身伤痕累累，脖子上拴着电线，指尖还夹着未灭的香烟，硬币盈满了他们的口袋——这是在隐喻纳吉布拉的贪污行径。前总统的另两名随从一度死里逃生，不过最终还是落入塔利班之手。一番折磨之后，两人的下场和他们的雇主完全一样。

纳吉布拉的惨死只是塔利班暴行的开始。显然，这场血腥表演是为了恐吓全体喀布尔市民。毛拉·拉巴尼成了喀布尔的新市长，他指责纳吉布拉是共产党分子，长期虐待人民，因此被塔利班处以死刑。纳吉布拉的罪行不容否认，但是塔利班的暴行也十分骇人，完全和伊斯兰信仰的宗旨背道而驰。塔利班未经审判便处死了一位前总统，而且还悬尸示众，一系列行径引发了喀布尔市民的强烈反感。此后，塔利班又禁止人们按伊斯兰教仪式安葬纳吉布拉，这进一步点燃了喀布尔人的怒火。不过，奎达和白沙瓦等地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仍然怀念纳吉布拉，他们为这位前总统举行了祈

祷仪式。最后，纳吉布拉的尸体被移交国际红十字会，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位于帕克提亚省的加德兹。前总统的艾哈迈扎伊部族同胞最终埋葬了他的尸体。

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暴行普遍报以谴责，伊斯兰国家的谴责声浪尤其高涨。塔利班不但公开羞辱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更让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脸上无光。联合国很快发表声明：“前总统横遭残杀，不但是对联合国办公机构豁免权的严重侵犯，更是对长期以来所有和平努力的挫伤。”塔利班对联合国的谴责置若罔闻，杜斯塔姆、拉巴尼和马苏德先后被缺席判处死刑。

塔利班在喀布尔立足未到24小时，就立即颁布了严厉的伊斯兰教法，其苛刻程度举世罕见。根据规定，所有妇女都不得参加工作。实际上，当时喀布尔四分之一的服务产业都掌握在妇女手中，而基础教育产业更是女性劳工的天下。此外，医疗服务从业者也以女性居多。所有女子学校全部遭到关停，7万多名女学生被遣散回家。此外，女性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衣禁令，从头到脚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都马虎不得。在喀布尔，有2.5万个家庭失去了男主人，生计完全系于妇女外出工作挣来的辛苦钱，有时还需要联合国的资助才能勉强糊口。塔利班的禁令一出，这些家庭顿时面临着困以待毙的境地。苛刻的法条每天都在增加。1996年9月28日，喀布尔电台发表的一则新闻就是其中代表：“犯有偷窃的人将被砍去手足，通奸者将被处以石刑，而饮酒者遭受鞭刑。”

电视机、录像带、卫星接收器、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象棋、足球、放风筝等游戏活动也在被禁止之列。喀布尔电台更名为沙里亚电台，从此和音乐节目彻底绝缘。塔利班在赫拉特等地推行自己的极端政策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但喀布尔毕竟是喀布尔，是一个国际媒体云集的地方。很快，塔利班的严刑峻法第一次被公诸天下。塔利班设在喀布尔的统治机构是一个6人舒拉，其中的6把交椅全被杜兰尼部普什图人占据，喀布尔土著没有一点立足之地。舒拉的首领是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其他成员还有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高斯、情报部长埃米尔·汗·穆塔基，以及赛义德·哈亚苏丁·阿迦（Syed Ghayasuddin Agha）、法基尔·穆罕默德和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

舒拉中的6位毛拉没有一位曾有过在大城市居住的经验，其中更有好几



位从来未到过喀布尔。当时，这个城市已经初露现代化的模子，120多万人在此栖居，其中的普什图人只是少数族群。根据6位毛拉的指示，城市里出现了一批新面孔——宗教警察。他们在城市四处活动，施行所谓的“教法”。仿佛这里已经不是阿富汗的国土，而是置身于外国占领之下。治理大城市和管理一个小村庄之间的区别，塔利班分子始终没搞明白。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是塔利班的眼中钉，统一全国的道路上，这位塔吉克军阀是最后的劲敌。

20世纪80年代的圣战中走出了一批军事领袖，马苏德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富于指挥才能，也很有个人魅力。由于出生在喀布尔北部的潘杰希尔谷地，这位塔吉克裔军阀有着“潘杰希尔之狮”的英名。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队前后7次进攻潘杰希尔地区，马苏德7次率兵反击、保持不败。苏军将领对这位老对手十分佩服，尊他为常胜将军和游击战的大师。马苏德手下的2万多名士兵对首领死心塌地。1992年，马苏德武装击退希克马蒂亚尔部队，又消灭了苏联扶植的傀儡政府，成功入主喀布尔城区。这次胜利把马苏德的声名推到了巅峰。不过，4年的政府军生涯磨光了马苏德武装的斗志，他们变得腐败堕落，欺压百姓、偷窃商铺、强占民宅等恶行都是家常便饭。因此，当塔利班攻进喀布尔的时候，阿富汗首都的老百姓对这股新势力十分欢迎。

1953年，马苏德出身一个军人家庭。他曾在法国人开办的伊斯蒂加尔高中就学。后来，马苏德参与了推翻达乌德政权的学生运动。他曾在家乡组织起义，遭到失败后于1975年逃往印度。此后，马苏德长期寓居白沙瓦。流亡期间，马苏德和曾经的亲密战友希克马蒂亚尔反目成仇。两位领袖之间的矛盾，成了此后20年内各派圣战组织不能组成联合政府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虽然是马苏德的第二故乡，该国政府却先是支持希克马蒂亚尔，后来又站在塔利班一边。因此，马苏德的反巴立场根深蒂固。圣战期间，马苏德坚持认为阿富汗的斗争应该由阿富汗人指挥，并多次要求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交出指挥权。不过，巴方手中掌握着美国支援的各种武器，他们和马苏德之间的仇恨延续至今，仍未消散。

1992年，马苏德占领喀布尔。巴基斯坦方面对此大为惊讶，他们原以为阿富汗首都的新主人应该是南方的普什图裔，没想到却被北部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占得先机。

马苏德不信任所谓的和平努力，而各种和平进程也都不会找这位塔吉克军阀商议。马苏德缺乏政治智慧和手腕，他不相信所谓的塔吉克—普什图联盟是带来和平的唯一途径。虽然在军事上百战百胜，马苏德在弭平民族矛盾、缓和派别纠纷方面的成绩却十分可怜。他的最大问题来自他的出身——一个塔吉克人。这个民族上次占据喀布尔还是在1929年。而且在历史上，他们一直被普什图人深深地猜忌。

占据喀布尔的几年间，马苏德那清高的脾气一直没有变。他拒绝任何的政府职位，虽然身为军队实际上的指挥者，却始终不肯接受国防部长的官衔。1996年5月，塔吉克军阀曾经向笔者表明了自己不愿为官的缘由：“有一句波斯谚语说得好：‘坐椅子不如坐在地上。’”不久之后，塔利班军队就将这位军阀赶出了喀布尔。马苏德当时还对我说：“巴基斯坦一直想占领阿富汗，建立听命于伊斯兰堡的傀儡政府，把这个国家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巴基斯坦人的阴谋不会得逞，我们会为独立和自由奋斗到底。”

马苏德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两位秘书轮流守候在他的身边。这位军阀平时只睡4个小时，由于害怕刺客，他每个晚上的栖息地都不一样。马苏德和手下关系十分紧密，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在战况最激烈的前线，总能找到马苏德身先士卒的身影。塔利班军队占领喀布尔后，马苏德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塔利班随时可能乘胜追击，占领全国，而马苏德一直没有放弃抵抗。1999年，这位塔吉克军阀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时年46岁。25年来，马苏德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生涯。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马苏德武装被迫北撤。他们沿萨朗公路节节后退，朝着潘杰希尔的大本营逃去。塔利班军队一路追击而来。马苏德的士兵们不得不躲到群山之中，并故意制造山崩挡住追兵的来路。塔利班曾向潘杰希尔发起猛攻，但是没能得到任何成果。追兵夺取了萨朗公路两旁的诸多城镇，最后在萨朗隧道附近遭遇阻截。让塔利班吃瘪的是杜斯塔姆武装，他们从马扎里沙里夫一路南下，正好和北上的塔利班武装正面相迎。当时，杜斯塔姆的立场尚不清楚，但乌兹别克军阀拒绝和塔利班合流共进。1996年10月8日，前总统拉巴尼曾和杜斯塔姆展开谈判，希望后者在塔利班和马苏德之间保持中立。这次谈判最终以破裂告终。塔利班方面也不能容忍杜斯塔姆在阿富汗北部的统治地位和自治要求。巴基斯坦方面企图撕裂杜斯塔姆和马苏德之间的联盟关系，未能收到任何效果。不过，杜



斯塔姆十分清楚，虽然自己和马苏德之间有重重矛盾，但塔利班却是所有非普什图裔阿富汗人的公敌。因此，1996年10月10日，拉巴尼、马苏德、杜斯塔姆和哈扎拉人领袖卡里姆·哈里里（Karim Khalili）在信詹（Khin Jan）举行会谈，各方协议组成了“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共同抵抗塔利班。这也是反塔联盟的雏形，它预示着内战将进一步延长。

塔利班北伐的速度过于冒进，很快便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这一切都被马苏德看在眼里，1996年10月12日，塔吉克军阀沿公路南下发起反击，夺回了多个城镇，几百名塔利班士兵在逃散过程中或是被杀，或是被俘。10月18日，马苏德武装重新夺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并开始对喀布尔机场进行炮击。杜斯塔姆的空军部队也顺势前来，对喀布尔城区内的塔利班目标进行了轰炸。一场激战下来，数千名平民死亡，萨朗公路沿线的5万多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这些居民潮水般地涌进了喀布尔，而另一股难民潮正向着相反的方向奔流而去。大批喀布尔市民逃出城市，直奔东部的阿巴边境。他们大多是塔吉克人或哈扎拉人，一直想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他们离去后，喀布尔城里发生了大搜捕。惨重的伤亡形势，让塔利班不得不拿出了抓壮丁的伎俩，他们四处搜索青壮年男子，甚至冲入清真寺强拉民夫。无数名青年被迫入伍充当炮灰。几千名志愿者从巴基斯坦越境前来，为了解决塔利班的兵员荒，一些巴基斯坦教士甚至关闭了自己的伊斯兰学校，走投无路的学生只得选择为塔利班卖命。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煽动下，每天都有无数的志愿者坐着大客车来到坎大哈和喀布尔，立即投入战斗。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些塔利班的志愿兵在护照和签证政策上大开绿灯。

补充了新鲜血液后，塔利班重新振作，开始了对阿富汗西部的新一轮攻势。他们的目标是赫拉特西北部的巴格迪斯省。1996年10月之前，伊斯梅尔·汗携旗下的2000多名士兵悄悄从伊朗潜回阿富汗的迈马纳（Maimana），杜斯塔姆的空军部队为他们提供了交通方便。伊斯梅尔·汗的武装再次站到了塔利班的对立面。这一次，双方的战场在巴格迪斯省。伊朗方面为伊斯梅尔·汗置换了崭新的武器装备，当然，德黑兰当局的目的在于在阿富汗的军阀中建立一个反塔利班的联盟。11月和12月之交，巴格迪斯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事，参战双方都使用了空中力量为自己助威。结果，5万多名当地居民被迫踏上离乡的路，前往赫拉特省寻求庇护。随着冬

天来临，天气不断转冷，战事却日趋激烈。由于大雪的封堵，联合国救助机构运送物资的行程显得十分艰辛。由于新难民潮的爆发，救助机构更是焦头烂额。

塔利班军队也遭遇了大雪的困扰，不过他们且战且勇，将马苏德武装逼出了喀布尔郊区。截至1997年1月，塔利班部队收复了萨朗公路两旁的失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恰里卡尔都重回塔利班的手中。马苏德武装被迫退回潘杰希尔地区。塔利班军队一路进逼，直接和杜斯塔姆武装交上了手。

喀布尔的陷落以及此后的几轮激战，在整个中亚和南亚地区引发了一片关切。伊朗、俄罗斯和中亚四国都向塔利班发出警告，命令奥马尔的武装不得再向阿富汗北部推进。伊、俄等还公开声称，他们将向反塔联盟提供武装。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特使也到达了喀布尔，他们将满足塔利班的一切要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多次呼吁各方停火，不过，每一次呼吁都石沉大海，了无回声。整个地区俨然形成了两大阵营：沙巴两国和塔利班为一派，反塔联盟及其支持者为另一派。至于塔利班政权渴望的国际地位，至今还没有下落。穆罕默德·哈桑对此又是忧虑，又是渴望，他表示：“我们在世界上缺乏友邦。实际上，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三分之二的国土，首都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曾经为此向我们表示过祝贺。”【48】

奥马尔的态度一以贯之地强硬。塔利班领袖反对向敌人妥协，也反对联合国的和谈建议。他的信仰十分坚定，一心要武力统一全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奥马尔的坚持似乎就要换来回报。1772年以来，喀布尔就一直是普什图统治者的都城。这座古都在塔吉克人的手中沦陷了4年之后，如今又回到了普什图人的统治之下。此前，没人相信塔利班这样一伙学生军能进入首都，可奥马尔和他的部下们创造了奇迹。虽然损失众多，塔利班的声誉还是随着喀布尔一役登上了顶峰。不过，他们的胜利代价沉重。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几乎把整个国家完全撕裂。

奥马尔说过：“战争是欺骗的游戏。”虽然自己的组织节节胜利，这位领袖仍然在坎大哈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不愿意到首都走上一走。对于当时的形势，奥马尔还表示：“为了打下一个省，我们花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接下来的5个省10天之内就完全陷落。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22个



塔利班

省。真主保佑。我们能完成统一阿富汗的事业。无数次的和平谈判都失败了，我们认识到武力统一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途径。”^{【49】}显然，阿富汗北部成了塔利班的下一个目标。

第 4 章

马扎里沙里夫，1997年：北方的屠杀

马扎里沙里夫是反塔联盟在阿富汗北部的最后一处重镇。1997年春天，这座杜斯塔姆控制下的城市面临着塔利班的军事威胁。人们都认为一场大战近在眼前。整整一个冬天，马扎里沙里夫都在恐惧中度过。塔利班的重重包围让城中几近断粮，燃料供应也即将告罄。此外，阿富汗尼对美元的汇率持续上升。一开始提升了2倍，后来由于城中的有钱人纷纷前往中亚避难，又进一步上升了3倍。

阿富汗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塔利班控制的南部，不过，北部地区集中了阿富汗60%的农业资源。战前，阿富汗北部的工矿业产值占全国的80%，天然气资源也占全国总量的80%。20世纪，北部地区一直在喀布尔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保证了阿富汗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持续进行。对于塔利班来说，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阿富汗，首先要收回北方军阀手中的自治权。

当年5月，塔利班的北方攻势终于拉开了序幕。虽然大家都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准备，但是，这场北方战役的血腥程度还是超乎想象，一幕幕的背叛、倾轧、种族清洗，让久经战乱的阿富汗人都吃受不住。中亚地区的经济因此大受影响，陷入了不景气的循环。

杜斯塔姆整个冬天都在马扎里沙里夫郊区的基拉-杰汉基（Qila-e-Jhangi）度过，这个地方又被称为“战争堡垒”。当时，乌兹别克军阀的风头一时无两，杜斯塔姆不但成了中亚各国的红人，还被很多阿富汗人视为最后的救世主。马扎里沙里夫位于辽阔的中亚草原上，这里是兴都库什山



脉的最北端。马扎里沙里夫到坎大哈的距离，正好和坎大哈到卡拉奇的距离相等。这个小城始建于19世纪，各种建筑风格在这里融汇交合、自成一派。护城河、壕沟、宏大的城堡让人恍若置身于欧洲，厚实的泥制城墙和蓝顶的庇护所则有着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同《一千零一夜》里的场景如出一辙。杜斯塔姆的办公室就位于那蓝顶的庇护所内，坦克、大炮和武装到牙齿的守卫忠诚地保护着乌兹别克军阀的安全。时至今日，杜斯塔姆的部队仍然一身傀儡政府时代的制服。蓝顶的庇护所也是乌兹别克军阀会见来宾的唯一场所，不少外交官都曾经造访此地。

杜斯塔姆惯于弄权，为人残酷无情。第一次造访庇护所的时候，笔者就在泥泞的庭院里发现了不少血迹和一些残存的血肉。笔者不得不强作镇定，若无其事地向守卫打听这里是不是刚刚宰了羊，守卫的回答叫人心惊。原来在一小时前，他们的头头在院子里对一位涉嫌偷窃的士兵进行了惩罚。那个倒霉蛋被绑在俄制坦克的履带上，随着坦克的开动，一片片血肉飞溅到了庭院四周。杜斯塔姆和他的守卫全程目睹了这次惨刑。乌兹别克人在中亚以勇猛、残酷而闻名。他们酷爱劫掠，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当时，乌兹别克人的祖先是蒙古大军中的一部分。杜斯塔姆也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位军阀身高超过六英尺，浑身肌肉莽结，活像一头熊。粗野而放肆的大笑是这头熊的招牌，一些乌兹别克人甚至传言，他们领袖那骇人的欢声曾经直接置人于死地。

1955年，杜斯塔姆出生在希比尔干（Shibirgan）附近的一户贫困农家。1978年之前，杜斯塔姆一直务农为生，偶尔做点水管工的活计贴补家用。在他参军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战斗中，杜斯塔姆一路攀升，最终当上了装甲师师长。他所在的部队负责保卫苏军位于阿姆河上哈伊拉坦（Hairatan）港的军事补给线。1989年苏军撤离后，杜斯塔姆的装甲师并未就此解散。由于士兵大多来自朱兹詹省（Jowzjan），这支部队摇身一变成了“朱兹詹军”。杜斯塔姆武装是纳吉布拉手中抵抗圣战组织的利器，他们在阿富汗境内走南闯北，是屡战屡败的政府军力挽狂澜的最后希望。

不过，1992年，杜斯塔姆义无反顾地背叛了纳吉布拉，他还是第一个背叛政府的武装首领。乌兹别克军阀因此落下了反复无常、惯于政治投机的名声。虽然这位军阀痴迷醇酒，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品行良好的穆斯林”。杜斯塔姆几乎和所有军阀都有过盟友关系，一开始和马苏德结

盟，后来又搭上希克马蒂亚尔，然后又同塔利班勾结，最终和马苏德重修旧好。一次次的背盟弃义，他都做得气定神闲。杜斯塔姆的后台数不胜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都曾向他提供过金钱。最近，杜斯塔姆的金主又多了一个土耳其。1995年，杜斯塔姆一手笼络伊朗，一手哄骗巴基斯坦，两大敌对国居然同时伺候他一个人。同年，乌兹别克军阀开始向塔利班武装发难。虽然只控制着北方6个省的领土，杜斯塔姆却是邻国不可或缺的大人物。^{【50】}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都把杜斯塔姆的势力范围当做对抗普什图原教旨主义的缓冲区，杜斯塔姆本人则是唯一可以抵御塔利班北侵的权势人物。^{【51】}杜斯塔姆生性多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普什图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反对态度。早在塔利班崛起之前，这种反对态度就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杜斯塔姆的心中。

马扎里沙里夫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地区之间频繁的走私活动让这座丝路商城重现生机。杜斯塔姆也成立了自己的“巴尔赫航空公司”（Balkh Airlines），把迪拜的走私货品带入阿富汗。同时，陆路上也有大批的走私车队在中亚边境附近活动。马扎里沙里夫距中亚边境只有70英里，这给了杜斯塔姆从事走私的地利。转口税和关税是乌兹别克军阀的两大财源，既稳定又丰厚。杜斯塔姆的部下非常好酒，而且秉性风流。这两大爱好都可以在城里的集市里得到满足，那里面满是俄产的伏特加和法国香水。当然，乌兹别克军阀也有着其他同行有所不及的优点。他的辖区内教育机构众多，医疗系统也运转良好。在当时的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的巴尔赫大学是唯一正常开课的大学。这里有1800多名女性就读，超短裙和高跟鞋在女大学生中属于多数派装扮。

1992年来，持续的战乱迫使数以千计的人争先恐后地逃离喀布尔。在难民们看来，马扎里沙里夫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在这一点上，杜斯塔姆先生确实担起了保护者的责任。逃难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有不少歌手和舞者。喀布尔已经不能容许任何娱乐和音乐活动的存在，唯有马扎里沙里夫留着的一方歌舞升平的空间。同时，这座城市还是朝圣者的必游之地，阿里的坟墓便修建于此。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拉伯帝国的第四位哈里发，伊斯兰什叶派尊崇的圣徒。他身后的居所据说便位于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如今，这里已经变成阿富汗最负盛名的清真寺。马扎里沙里夫的另一处古迹是巴尔赫遗址，这座城市被7世纪入侵的阿拉伯人誉为“万城之

母”。3 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查拉图斯特拉传道的场所，是亚历山大大帝安营扎寨的地方，也是著名诗人鲁米的家乡。查拉图斯特拉（拜火教）的神秘学说、佛学和伊斯兰思想在这里交融。1220年，成吉思汗的大军夷平了巴尔赫，那里的辉煌宣告中止，地区文化和贸易的中心开始转向马扎里沙里夫。

马扎里沙里夫在18年的战火烽烟中屹立不倒，杜斯塔姆因此广受敬畏。马扎里沙里夫居民的耳边从来没响起过炮弹横飞的声音，眼前也没有激烈巷战的街景掠过，他们逃脱了阿富汗其他地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过，好景不长。乌兹别克人的部族历史充斥着血仇和仇杀、争权和夺利、阴谋和诡计、劫掠和奸淫，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爱好的“布兹库什”（buzkushi）之中。这是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一堆骑马的汉子举着鞭子，围着一只无头死羊争来抢去。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政治游戏，都可以在“布兹库什”中得到隐喻。这个游戏没有明确的规则，也没有团队的概念，恰如杜斯塔姆和手下军官之间的关系。

马利克·帕哈拉万是杜斯塔姆武装的二号人物。他的弟弟拉苏尔·帕哈拉万据说死于杜斯塔姆的阴谋。1996年6月，拉苏尔不明不白地横尸在一条壕沟里，当时他身边的15名保镖也无一幸免。因此，马利克·帕哈拉万和杜斯塔姆之间便结下了仇怨。据说，杜斯塔姆已经准备向他的二把手下毒手。两位权势人物之间的嫌隙使得塔利班乘虚而入。在塔利班的金钱攻势下，马利克选择了背叛。1997年5月19日，杜斯塔姆武装的二号人物响应塔利班的号召，起兵反叛自己的顶头上司。^[52]马利克的另外两个兄弟古尔·穆罕默德·帕哈拉万（Gul Mohammed Pahlawan）和哈法尔·帕哈拉万（Ghafar Pahlawan），以及马吉德·鲁济（Majid Rouzi）也一道反出了杜斯塔姆的大营。更为严峻的是，杜斯塔姆武装已经3个月没有发饷了，官兵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塔利班部队从赫拉特和喀布尔两地闪电出击，直指阿富汗北方。同时，以法里亚布省为基地的马利克武装也起兵响应。普什图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竟然达成了联盟。联军所到各省无不望风而降。杜斯塔姆一行153人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又流亡土耳其。途径乌阿边境的铁尔梅兹小镇时，一代军阀甚至要用美元买通自己的手下，才能获得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格。杜斯塔姆的出逃给了塔利班一个天赐良机。不

过，坎大哈军阀并没有吸取过往的教训。他们拒绝分享权力、拒绝放低身段，并继续罔顾马扎里沙里夫复杂的民族状况，一味推行那一套严厉的宗教法律。马利克原以为，自己可以像杜斯塔姆一样做一个北方之王。结果大错特错，塔利班轻而易举地违背了原先的承诺。

在阿卜杜尔·拉扎克（就是那位处死纳吉布拉的凶手）的指挥下，2 500多名塔利班士兵开进了马扎里沙里夫城。他们装备精良，搭乘长长的车队而来。马利克一无所获，他只在塔利班政权中得到了一份代理外交部长的闲职。阿富汗北部对于大多数塔利班成员来说都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不过，这些外来的客人一点都不客气，他们肆意解除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的武装。无数的清真寺在“伊斯兰教法”的名义下被强征而去。中学和大学悉数遭到关停，女学生都被撵回了家。马扎里沙里夫原本是阿富汗最为开放的地方，有着多元的民族背景，现在，塔利班的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这座城市的风貌。

塔利班前脚刚刚进占马扎里沙里夫，巴基斯坦方面立即派出外交官员和情报人员前往阿富汗盟友的新领地，帮助塔利班分子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不过，这次谈判早已经名存实亡。巴基斯坦急不可待地承认了塔利班作为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并且敦促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尽快跟进。^{【53】}这个不成熟的举动激化了阿富汗的对抗形势。马利克等人原本期待一场分享权力的宴会，哪晓得却等来了塔利班的全盘接收。谈判进行到一半，塔利班干脆将马利克囚禁起来，随后又逮捕了伊斯梅尔·汗。赫拉特军阀原本在法里亚布省抵抗塔利班，怎料遭遇马利克的暗算，也落入了塔利班之手。^{【54】}

1997年5月28日下午，塔利班占领者试图解除一队哈扎拉人的武装，哈扎拉人誓死不从。这一事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同胞遭遇不平，马扎里沙里夫城里的哈扎拉人纷纷起义。此后，一场反塔利班大暴动在全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塔利班分子本就不谙巷战，加上不熟悉马扎里沙里夫的地理情况。面对四面八方飞来的子弹和炮火，他们的小汽车往往慌不择路地窜进死胡同。塔利班死伤十分惨重，15个小时之内，600多名塔利班分子殒命，1 000多人被俘。

起义者成功地击毙和抓获了10名塔利班军政长官。塔利班政权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高斯、拉扎克和中央银行行长埃萨努拉（Eisanullah）通

落入敌手。趁着战火的掩护，马利克武装对城市进行了大洗劫，联合国机构也未能幸免。数十名巴基斯坦学生在冲突中丧命，而联合国机构不得不弃城而去。

马利克武装攻势凶猛，很快，阿富汗北方四省（塔哈尔、法里亚布、朱兹詹和萨尔普勒）在5天之内重新回归乌兹别克人的控制之下。阿富汗北部的另外3个省（巴尔赫、萨曼甘和昆都士）则处于拉锯战之中，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数千名塔利班分子和几百位巴基斯坦学生都面临着回乡无路的境地，随后便遭到了马利克武装的拘捕和杀害，尸体草草收殓在万人坑里。同一时期的阿富汗南方也不平静，马苏德也开始了反击战，塔吉克军阀重夺贾巴鲁尔-色拉伊，占领萨朗隧道的南口，切断了塔利班分子南逃的必由之路。马苏德武装渐渐夺回了喀布尔附近的多个地区。一周之前，阿富汗东北部的几个城镇还在塔利班的控制下，马苏德发起反击后，这些地区很快易主。塔利班分子被俘获被杀者多达数百人。在马扎里沙里夫大捷的鼓励下，哈扎拉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打破了塔利班对哈扎腊贾特长达9个月的围困。塔利班部队失去了进入巴米扬谷地的唯一入口，哈里里的部队不得不撤回喀布尔。数千名普什图裔村民也被迫一并南逃、涌向首都。

塔利班起兵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个月。三年多来，马扎里沙里夫一役引发的大规模战争可以说是最大的败仗。5—7月之间的10个星期内，塔利班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 000多人，另外还有3 600多人成了俘虏。^{【55】}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统计，战争致伤的人数多达7 000，受害者既有士兵，也有平民。另外，5—7月之间，还有250名巴基斯坦人死在了异国他乡，550名巴基斯坦公民沦为俘虏。这一数字无疑让伊斯兰堡当局颜面无光。塔利班的大批精锐部队都在此次战争中化为灰烬，组织的士气遭遇了重大的打击。

危局之下，奥马尔通过电话向巴基斯坦的宗教学生发出了呼吁。很快，巴基斯坦境内的诸多宗教学校再次停课，5 000多名学生立即奔赴阿富汗，驰援塔利班。他们中既有阿富汗流亡者，也有巴基斯坦籍人员。塔利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一向避世独居的奥马尔也不得不走出书房，来到喀布尔前线为自己的将士打气加油。

巨大的兵员短缺，让塔利班不得不广开门路，招纳吉尔扎伊部普什图人入伍。吉尔扎伊部聚居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他们的支持不是无条

件的，而塔利班也很难接受了吉尔扎伊人的政治要求。

吉尔扎伊部在苏联入侵时期是反侵略的主力军，如今的塔利班舒拉却被杜兰尼部占据。吉尔扎伊人显然不满于现状，他们要求在舒拉中占据一席之地，否则就不为塔利班出兵出力。对于塔利班在马扎里沙里夫一役的表现，吉尔扎伊部的军事专家们普遍持批评态度。1997年7月，他们的首领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向笔者表示：“马扎里沙里夫一役失误甚多。塔利班和马利克的合约得来过急。正确的做法是延长谈判时间、扩大谈判范围。至于军事上的失策，更是举不胜举。”

哈卡尼出生在帕克提亚省的霍斯特（Khost），1995年加入塔利班，当时担任喀布尔卫戍司令。他身经百战，早在苏联入侵的时候就已经成名。虽然在喀布尔也有官职，但哈卡尼还是对现状充满牢骚。他无法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这也是非坎大哈出身的塔利班分子的共同烦恼。塔利班的一切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奥马尔的手中。坎大哈才是实际的权力中心，而喀布尔只是充门面而已。^{【56】}马扎里沙里夫惨败之后，塔利班拨下大笔经费，让哈卡尼回乡招募新兵。很快，哈卡尼带着3 000多名子弟兵返回前线。不过，此时的他仍然手中无权，吉尔扎伊新兵的指挥棒仍然在坎大哈出身的军官手中。这种人事安排导致开小差的状况泛滥成灾。两个月之内，便有300多名士兵临阵脱逃。坎大哈附近的村民也都纷纷逃避兵役，拒绝让家中男丁为塔利班效力。塔利班第一次陷入了严重的人员危机。

中亚各国对自家后院内的武力纷争十分警惕，他们认为，阿富汗内战必然升级，最终会殃及自身。随之而来的难民潮也会让脆弱的国境线难以招架。于是，各国都史无前例地提高了军事警戒。3 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在乌阿边境上枕戈待旦，另有25 000多名俄军在塔阿边境上整装待发。驻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部队和当地军事力量也都提高了警戒级别。乌土两国都关闭了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在铁尔梅兹，乌兹别克斯坦军队的直升机和内河船艇四处警戒，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阿姆河上的大桥被封锁，将阿富汗和中亚彻底隔绝开来。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艾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的请求，俄罗斯方面派出了10个营的兵力前往该国。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并不接壤，但阿卡耶夫也不忘未雨绸缪。同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牵头组织了一次独联体（CIS）国家紧急会议，阿富汗危机是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



会议上，俄罗斯外长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承诺俄方将拿出“强劲而有效的行动”以应对塔利班可能的挑战。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西部接壤，该国政府向来以中立地位自居，和塔利班也有外交关系。不过，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战斗还是让土库曼人惊讶不已。9 000多名阿富汗籍土库曼人越境逃入祖国寻求庇护，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伊朗方面表明了对反塔联盟的支持态度。同时，德黑兰当局还呼吁俄罗斯、印度和中亚各国同仇敌忾，一起抗击塔利班。伊朗外长阿里·阿克巴·维拉伊提（Ali Akbar Velayti）还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介入阿富汗事务。塔利班政权对于邻国的态度十分不满。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巴斯说：“伊朗和俄罗斯公然支持我们的敌人，他们向反塔联盟提供可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伊朗甚至派出了22架飞机前往马扎里沙里夫，为我们的敌人提供武器。”【57】

伊朗和中亚各国的外交官员也是心怀不满，他们指责的对象是巴基斯坦。伊方认为，南亚大国不但一向支持塔利班，政府总理谢里夫还为塔利班一周之后的军事行动打掩护。各国首脑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召开峰会，谢里夫在会议上承诺约束塔利班，并会阻止战火向北蔓延。当时，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官曾向笔者表示：“巴基斯坦在中亚的政治信誉已经降到了零。”【58】

不过，塔利班的北方攻势的确还有一丝积极影响。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已经延续了四年，交战双方一度不依不饶。但是，在塔利班的威胁下，塔吉克斯坦内战双方不得不加快了协议步伐。很快，在联合国和俄罗斯方面的斡旋下，塔吉克斯坦政府军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达成了和解。双方于1997年6月27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和平协定。塔吉克斯坦和平的奠定，让马苏德为之一振。这位塔吉克裔军阀可以再次退回塔吉克斯坦境内，享用俄罗斯提供的空军基地。马苏德的空军基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库里亚布。通过这个基地，伊朗和俄罗斯方面向塔吉克军阀提供战备物资。随后，这些物资被转运到潘杰希尔谷地，以便战备所用。

由于杜斯塔姆的暂时隐退，反塔联盟内部面临着力量重组。1997年6月13日，各派武装协议组成了“拯救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马扎里沙里夫成了阵线的首府所在。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再次出任总统，马苏德担任国防部长。各派武装共同承诺将组成新政府，部族长老、宗教领袖和技术官僚的

利益都将得到照顾。不过，马利克、马苏德和哈里里三派争吵不休，而且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矛盾重重，合作已经变得不可能。

钩心斗角的根源来自马利克，其他领袖对于这位有反叛前科的乌兹别克军阀并不信任。马利克在军事上也遭遇挫折。滞留在北方的2 500多名塔利班分子成功打破乌兹别克武装的封锁，占领了昆都士及附近的机场。塔利班对这块土地十分重视，不断派遣空中力量，为昆都士守军投送物资、增加人员。马利克拿北方的塔利班孤军毫无办法，而马苏德武装却渐渐逼近喀布尔。

7月中旬，马苏德武装打破战争僵局，重新夺回了恰里卡尔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数百名塔利班士兵被杀。不到9月，马苏德武装再次逼近喀布尔，距离阿富汗首都只有20英里。交战当中，马苏德和塔利班双方都毫不吝惜地大量使用重炮和火箭，猛烈的火力之下，喀布尔北部的肖马里山谷（Shomally）毫无遮拦，近18万平民百姓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塔利班军队自然也无法继续坚守。撤退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向水井中投毒、炸毁水渠、破坏水坝，种种手段都是为了逼迫当地的塔吉克居民背井离乡。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内容只剩下残害百姓了。军阀不但剥夺人民的生命，也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喀布尔附近的农业区完全荒废，陷入荒芜。

反塔联盟对喀布尔形成了合围之势。马苏德武装占据了西部和北部阵地，而东部和南部阵地则由哈里里的哈扎拉武装驻守。攻城行动一触即发，不过，各派势力也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敌人内部四分五裂，塔利班当然有了守城的自信。哈卡尼宣称：“我军占据了昆都士，将敌军完全切成两半。北方军阀内部嫌隙很大。比如，乌兹别克军阀肯定信不过马利克这个叛徒。现在，马利克想要洗清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派武装单独的兵力很少，我军可予以各个击破。我们的敌人必须团结，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59】

哈卡尼的判断没有错。9月，塔利班部队奇袭昆都士得手之后不久，反塔联盟内便掀起了对马利克的一片怀疑。塔利班在昆都士站稳脚跟后，很快又在当地普什图居民的帮助下继续扩大战果，向马扎里沙里夫方向挺进。9月7日，塔利班军队攻占塔什库尔干，这给马扎里沙里夫造成剧烈震动。此时，乌兹别克军阀发生了内讧，忠于杜斯塔姆的部队向马利克武装



发难，争夺十分激烈。杜斯塔姆的亲兵焚毁了叛徒的住宅，马利克被迫逃往位于法里亚布的大本营，后来干脆逃往土库曼斯坦，最终去了伊朗过流亡生活。

一场政变后，杜斯塔姆结束了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涯，戏剧性地重返马扎里沙里夫。在老军阀杜斯塔姆的指挥下，马利克武装灰飞烟灭，塔利班军队也被赶出了马扎里沙里夫地区。整个城市再一次陷入混乱，乌兹别克民兵四下劫掠，联合国援助机构一年内第二次遭遇厄运，人员纷纷逃散。塔利班武装一路向南逃去，途中经过马扎里沙里夫南郊的卡兹勒·阿巴德（Kazil Abade）村。坎大哈军阀就在这个小村庄大开杀戒，至少有70多名哈扎拉村民遇难，一说死亡人数超过百人。苏哈拉布·鲁斯塔姆（Suhrab Rustam）幸运地逃过了塔利班的屠刀，据他回忆：“塔利班军队来得非常之快，70多人被杀，其中很多遭到割喉。还有一些被剥了皮，奄奄一息。”【60】

塔利班部队一路溃退到了昆都士，杜斯塔姆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不过，哈扎拉武装早已占据了马扎里沙里夫，乌兹别克军阀只得放弃自己的首府，迁往希比尔干。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对立破坏了反塔联盟的平衡。杜斯塔姆的敌人还不限于哈扎拉武装，他还得对付马利克的支持者。乌兹别克军阀把昔日部下的种种暴行一一公之于众，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杜斯塔姆武装在朱兹詹省希比尔干附近的达施特拉伊利（Dasht-e-Laili）沙漠中发掘出20多座填埋坑，其中有2000多具尸骨，都是被俘的塔利班士卒。杜斯塔姆一面归罪于马利克，一面向塔利班和联合国发出收殓尸体的邀请。为了表达善意，杜斯塔姆释放了在押的200多名塔利班战俘。【61】

联合国调查显示，被杀的塔利班士兵大多遭遇过虐待，死前已经长时间没有进食。据负责调查事务的联合国官员朴中勋（Park Chong-hyun）介绍：“囚徒的死令人发指。看守以交换战俘的名义将他们骗上大卡车。一行人来到水井旁边，警犬在一旁眈眈相向。井水有10~15米深，囚徒们被推下井里。对于那些反抗者，看守先是一枪击毙，然后将尸体投入井中。最后，看守向井内投入手榴弹，炸毁井壁，再用推土机将水井彻底掩埋。”【62】

证言陆陆续续浮出水面，一场种族清洗慢慢现出原貌。马利克的亲信萨利姆·萨哈尔（Salim Sahar）此时已经被杜斯塔姆逮捕，他坦承了自己的

所作所为：“趁着夜深人静，我们押解着150名塔利班囚徒走出牢房，登上货柜车，他们的双眼被蒙，双手反绑。一路来到沙漠中央地带。我们将囚徒们分列成排，每排10人。然后齐齐开火，将尸体投入事先挖好的洞里。这种情况持续了6个夜晚。”^{【63】}一车车的囚徒就这样遭到屠杀，内战双方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马利克的另一位副手说：“那些囚徒被拉出货柜车的时候，皮肤都已经变黑，毕竟那里面又热又缺乏氧气。”据这位副手介绍，至少有1 250名塔利班囚徒死于这种货柜车开道的屠杀之中。

血腥的种族清洗，以及激烈的夏季攻势，让阿富汗北部的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普什图人和非普什图裔民族之间的仇视达到巅峰，一条南北界限将阿富汗劈成两半。种族清洗、宗教迫害不仅仅是某一派别的恶行，而是所有阿富汗军阀共同的冤孽。

塔利班分子屠杀哈扎拉人，并将塔吉克居民驱逐出肖马里山谷。乌兹别克和哈扎拉武装也杀害了大批塔利班俘虏，并在阿富汗北部和喀布尔附近多处地区对普什图村民进行清洗。哈扎拉武装还强迫普什图百姓改宗什叶派。由于激烈的内战，至少有75万居民失去家园，难民潮再次泛滥开来，北到马扎里沙里夫、南至赫拉特和喀布尔附近。当时，联合国原本正在规劝滞留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回国定居，碍于时局，这个任务肯定无法达成。

更糟糕的是，阿富汗的几大邻国在内战中各自扶植代理人，他们的煽风点火加剧了民族冲突和宗派之争。

内战之中受伤最深的除了广大普通百姓，就要数联合国了。联合国调停专员霍尔遭遇了三重失败。首先，他曾向塔利班表明联合国的中立立场和和平心愿，对方未予理睬；其次，霍尔承诺保护少数族群利益的宣言也没能得到反塔联盟的接受；最后，调停专员先生更是在各大邻国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没人在乎联合国的态度。霍尔对此十分愤怒，他激烈地抨击了外部势力对阿富汗内战的干预：“有一股势力蓄意破坏和平进程，我们的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我个人并不认为阿富汗的各派领导人是傀儡，但他们好像确实要从某种外部势力那里得到军需支持。”^{【64】}一个月之后，霍尔挂冠而去。

塔利班领导层无疑是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他们对联合国章程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联合国宪章是何物。面对来访的调停专员，奥马尔拒绝现

身，而他的手下对联合国的停火协议冷嘲热讽。霍尔一行对奥马尔的倨傲十分不满，塔利班对联合国方面也是满腹怨气。联合国冷对马扎里沙里夫的战情，安理会甚至拒绝插手此后的大屠杀。更有甚者，阿富汗的联合国席位仍然被拉巴尼的代表占据。

塔利班对联合国的愤恨还来自于自身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的胃口实在太大，外交途径无法予以满足。塔利班分子深信，联合国和西方世界是一丘之貉，他们反对伊斯兰，反对沙里亚法。此外，塔利班方面还公开指责联合国勾结周边国家，拒绝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

联合国的麻烦远不止于此。漫长的战争吞噬了无数的援助款项，西方各国原本怀有一腔热忱，后来也渐渐进入了“捐赠疲劳”的阶段。投入阿富汗的钱物数量不断降低，塔利班对妇女的歧视政策更是让西方援助加速地背身离去。为了维持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方面苦苦规劝塔利班改弦易辙、从善如流，塔利班政权则是置若罔闻。

塔利班还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救助妇女的行动横加干涉。重压之下，这些组织不得不离开阿富汗。塔利班方面甚至故意挑起事端，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撤离制造条件。塔利班担心，联合国机构的存在会导致西方思潮泛滥成灾。9月底，塔利班向联合国驻坎大哈机构的三位长官下达逐客令。事件源于一张面纱，一位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工作的女律师忘了佩戴这种装束，导致塔利班方面大为不满。三位联合国官员出面为手下主持正义，结果遭到驱逐。11月，塔利班逮捕了四名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难民署的工作被迫全面停摆。随后，由于塔利班禁止妇女接受课程教育，“救助儿童会”也步上了离开的道路。虽然冬天临近，阿富汗人民饱受食物短缺的折磨，联合国救援组织也爱莫能助了。

很快，塔利班的妇女政策再次引发了世界舆论的谴责。1997年9月28日，宗教警察居然把欧盟人权事务官员艾玛·伯尼诺（Emma Bonino）和19名记者投入监狱，羁押长达3小时之久。伯尼诺等人是在参观一家欧盟开办的医院时被捕的，当时，他们探望病人，并拍照片，这可犯了塔利班的大忌。按照他们的法律，一切摄影活动都在禁止之列。

伯尼诺女士怒不可遏，她告诉记者：“这就是暴政国家中人民生活的一个实例。”^{【65】}塔利班随后为自己的野蛮举动表示了歉意。随后，西方人捐资的热情再次受到打击。塔利班宣布，妇女不得和男子同时就诊，而喀

布尔当时只有一家专门的女子医院。

塔利班的种种劣行，让克林顿当局对他们的好感消失得一干二净。美国的妇女运动团体打着为阿富汗女性争取利益的旗帜，在国会和政府之间来回请命。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就塔利班事务评价道：“我们反对塔利班，因为塔利班践踏人权、歧视妇女儿童，对人类的尊严毫无尊重。”这一番美方指责塔利班的最强音发表于11月18日，当时国务卿正在伊斯兰堡进行访问。奥尔布赖特的发言被看做是美方厘清自己的举动，华盛顿当局想和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的亲塔政策保持距离。不过，面对这些国际压力，塔利班似乎毫无触动。西方的批评只是深化了坎大哈军阀的反西方情绪。

巴基斯坦和坎大哈等地的教士们纷纷向奥马尔进言，要求驱逐阿富汗境内的所有西方机构，因为这些外国人都与伊斯兰信仰为敌，而且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66】}

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任命了新的调停专员。这一次担此重任的是阿尔及利亚前外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嘱托，调停专员需要周游相关各方各国，并在最后向安理会呈交相关的调查报告。8月14日—9月23日期间，布拉希米连续访问了13个国家，阿富汗是其中的重要一站。调停专员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国际社会必须向阿富汗的各个邻国施加压力，阻止他们干预内战，扶植代理人的行径。当年10月，在安南的提议下，一次“相关国家会议”拉开帷幕，这就是俗称的“6+2”会议，与会国包括阿富汗的6个邻国，以及美国和俄罗斯。^{【67】}布拉希米希望此次论坛可以开启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话之门，甚至成为美伊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契机。同时，布拉希米也希望借此机会促成阿富汗冲突各方之间的谈判。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阿富汗的和平。

11月中旬，安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阿富汗问题相关报告。报告内容让人失望，安南史无前例地严厉批评了阿富汗的各个邻国。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又特别指责了伊朗和巴基斯坦。安南认为，这些国家将联合国当成了遮羞布，并一直利用联合国向冲突各方提供军事援助。^{【68】}他说：“外来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源源不绝地涌入阿富汗，助长了战火的蔓延和持续。有些军阀本来拥有一定的和平意愿，可是也在外国援助下放弃了。外部势



力不是大肆支持各派武装，就是冷眼旁观，完全置外交斡旋于不顾。”同时，安南也对各派军阀进行了抨击：“阿富汗各个武装派别领导人都只顾本派别的利益，无视国家利益。他们不愿意携手共进，达成民族和解、国家团结。军阀、恐怖分子、贩毒集团等利益团体勾结在一起，战争让他们大发横财，而和平则会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69】

不久以后，伊斯兰联盟（OIC）峰会在德黑兰举行。安南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联合国秘书长直率地批评了各国对阿富汗冲突的冷漠态度。作为长期的国际孤儿，阿富汗问题终于登上了国际外交的记事日程。不过，国际努力无法阻止塔利班征服阿富汗北部的野心，也无法阻碍反塔联盟抗击塔利班的决心。

第 5 章

巴米扬，1998—1999年：永无休止的战争

阿富汗中部的哈扎腊贾特（Hazarajat）是哈扎拉人的家乡，这里的气温已经跌到了零下。兴都库什山脉终年积雪，巴米扬省便位于这群山之间。这时，一群面黄肌瘦的哈扎拉小孩正在玩一种类似于“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游戏的名字很有趣——“塔利班”。哈扎拉人正在经受缺衣少食的痛苦，孩子们只有在游戏中打击“塔利班”才能换取一些“精神小麦”作为“食粮”。由于山势陡峭、耕地稀薄，大人们虽然辛苦地开山辟地，种植庄稼，却只能收获一些树根和浆果，以及一点点的土豆，这些东西便是孩子们食谱的全部内容。战争让哈扎腊贾特的土地大片荒废，只有10%的耕地得到耕种。那一年的小麦因此歉收。

哈扎拉人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坚持独立自主。1997年8月开始，塔利班便封锁了哈扎腊贾特通往南、西、东三方的大道，以迫使哈扎拉人屈服。当然，北面的大道仍然敞开着，不过，那里早已经是一片混乱，食物紧缺的状况和哈扎腊贾特一样严重。而且，由于大雪封路，海拔7 500英尺的巴米扬省难以得到外界的援助。巴米扬的30多万哈扎拉人忍饥挨饿，而邻近的古尔、斯平瓦尔达克和加兹尼省一百多万人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几个月以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一直在和塔利班举行谈判，希望后者为运送救援物资的车队网开一面。塔利班对此并不理睬。同时，巴基斯坦却向塔利班方面提供了60万吨小麦。至于巴米扬的饥民问题，巴方只字未提。联合国对此十分愤怒。20多年来，这还是阿富汗冲突各方第

一次用粮食作为武器。由此可见，长期以来的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对阿富汗的戕害。

历史上，哈扎拉人一直是普什图人的仇敌。但双方的仇恨达到现在这种程度，还是历史上的头一遭。哈扎拉人普遍身材矮小，体态敦实，带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他们的来历确实跟蒙古人有些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哈扎拉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队与当地塔吉克和突厥居民通婚融合产生的民族。1222年，蒙古大汗的孙子在攻打巴米扬的战争中殒命，而成吉思汗在这里展开了血腥的报复。^{【70】}

1000多年前的巴米扬是印度的佛教中心，由于身处丝绸之路，这里还是东罗马帝国连接中亚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必经通道，是商旅和行人休憩的场所。即便在伊斯兰教席卷中亚之后，巴米扬仍然为当地的佛教信仰提供庇护。公元827年，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曾经到达此地，当时这里仍然是一个佛国。直到11世纪，伽色尼王国（Ghazni）才把伊斯兰信仰在巴米扬的群山发扬光大。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两座大佛矗立在这一地区。两尊佛都有着1500年以上的历史。它们依山而建，体积巨大，一座高达165英尺，另一座也有114英尺。时光流逝，风吹雨打，佛像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但是，大佛的影响仍然不可估量。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中亚地区成了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融合地。这一点在佛像身上体现得很清楚，既有印度风格，又披着希腊式的长袍。在古代，无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释迦信徒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巴米扬虔诚参拜他们的偶像。

在古代，巴米扬山谷一度万僧云集，梵光普照。那个时候，大佛两旁的悬崖上遍布着佛龛。到了今天，昔日的菩萨罗汉安坐的地方都成了难民的庇护所。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喀布尔，他们的出走完全是被塔利班所逼迫。塔利班政权曾经宣称，一旦占领巴米扬，他们将会彻底捣毁巴米扬山谷。此等狂言震惊了世界佛教界，抗议的声音遍布全球，远从斯里兰卡和日本而来。其实，塔利班已经对大佛周边地区进行了8次轰炸，大佛的壁龛因此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1893年之前，哈扎腊贾特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不过，随着普什图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l Rehman）占领此地，哈扎拉人便开始了苦难之旅。拉赫曼实行铁腕统治，杀害了数千名哈扎拉人，捣毁了当地的清真寺，大批哈扎拉人被掳往喀布尔成为奴隶。

现在，巴米扬地区生活着300万~400万哈扎拉人，他们是阿富汗最大的什叶派群体。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派争斗由来已久，塔利班的介入更是火上浇油。塔利班认为什叶派信众是“伪教徒”（munafaqeen），他们的信仰和伊斯兰的真谛相去甚远。而且，哈扎拉妇女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还是当地防卫的主力军。不少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妇女甚至投身政坛，他们在团结党（Hizbe-Wahadat）的80把交椅中占据了12席。这种现象在塔利班分子看来，完全属于异端。此外，哈扎拉妇女活跃在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事业之中。而团结党一贯致力于消除文盲和贫困，提供医疗和卫生保障，种种活动之中都活跃着广大妇女的身影。这其中也包括战场，塔利班士兵在5月的马扎里沙里夫战场上便吃过她们的苦头。那些逃离喀布尔的女教授把自己的大学搬到了巴米扬。这所大学的寒酸程度可谓世界之最，教室都是茅草屋，没有电力和供暖，藏书也少得可怜。

胡麦拉·拉西（Humera Rahi）博士在巴米扬大学教授波斯文学课程，此外，她还是抵抗组织诗界的领袖人物。博士曾经告诉笔者：“我们仇恨塔利班。他们与一切文明事务和文明人为敌，特别是阿富汗文化和女性。他们的作为玷污了伊斯兰，玷污了阿富汗。”拉西和她的同事们反感塔利班，而塔利班一定不会喜欢这群女士的着装风格——超短裙加高跟鞋。拉西的诗作被哈扎拉人广为传颂，经过普什图人几个世纪的压迫，这些文学作品已是这个民族的骄傲。其中的一首诗写道：

“哈扎腊贾特的无敌之师，胜利属于你们，安拉保佑你们。敌人的胸膛就是你们手中枪的目标。你们就是赢家，就是胜利。安拉和你们同在。我在午夜为你们祈祷，清晨为你们哭泣。孩子们高唱‘安拉，安拉’，眼泪和叹息伴随着你们。”^{【71】}

长期以来，哈扎拉人忍受着喀布尔统治者的封锁、压迫和歧视政策。不过，现在他们的地位非比寻常，十分关键。5月份的马扎里沙里夫攻防战中，哈扎拉武装的参与是战胜塔利班的重要因素。此后的10月战役，哈扎拉人再次凸显了自己的重要性。另外，哈扎拉武装还多次打退了塔利班对巴米扬的进攻。在乌兹别克—塔吉克—哈扎拉三方同盟之中，哈扎拉人一度是最弱的一环。不过，乌兹别克武装受内讧所困，塔吉克武装则在喀布尔附近陷入僵局，哈扎拉武装的领导人觉得，本民族崛起的时机来到了。

“我们背靠兴都库什山脉，面对塔利班和他们的巴基斯坦主子。我们只能



战斗，绝不投降。”这番豪言壮语出自伊斯兰团结党助理主席库尔班·阿里·伊尔凡尼（Qurban Ali Irfani）之口。当时，助理主席先生和笔者正挤在火炉边取暖。屋外就是雄伟的大佛，皎洁月光下，景色分外清晰。

哈扎拉人从最近的战果中获得了不少自信。艾哈迈德·舍尔（Ahmed Sher）年龄只有14岁，不过已经有了两年的战斗经验。“我们将阿富汗北方从塔利班的魔掌中拯救了出来。”小战士说道，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握得很紧。哈扎拉人并不缺乏盟友，伊朗一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在德黑兰当局的援建下，巴米扬有了一条2英里长的军用公路。整个冬天，卡里姆·哈里里都在德黑兰、莫斯科、新德里和安卡拉之间辗转度过，寻求各方的进一步军事援助。

不过，哈扎拉人有点过于自我膨胀。这个民族的武装规模虽然有限，但并不缺乏内讧，地盘、影响力和外国援助是各派争夺的重点。马扎里沙里夫被伊斯兰团结党控制后，党内的各派力量马上瓜分了这个城市，随即便是无休止的派系冲突，激烈程度不下于乌兹别克武装之间的内讧。哈扎拉人的派系斗争不但把马扎里沙里夫变成了战场，还让反塔联盟陷入了政治危机。伊朗和俄罗斯的情报官员不得不为调解联盟内部矛盾而殚精竭虑，伊俄方面不但要解决哈扎拉人的内部纷争，还得平衡哈扎拉武装和杜斯塔姆之间的恩怨。乌兹别克军阀如今已经回到了希比尔干，并在那里重建自己的势力。冲突各方都不愿退让半步。1998年2月，乌兹别克和哈扎拉武装在马扎里沙里夫展开激战。同时，马苏德来到德黑兰，塔吉克军阀的初次伊朗之行带着拯救反塔联盟的任务。马苏德希望伊朗政府尽快出手，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塔利班方面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加强了对巴米扬的包围，为再次攻打马扎里沙里夫做准备。

冬天里的法里亚布省，战争仍在继续。1月，塔利班在这里再次犯下了一桩屠杀罪行。600多名乌兹别克村民遇害。西方援助机构事后的调查表明，这些村民被强制驱赶出家门，然后成排成排地被枪杀。在喀布尔，塔利班所谓的宗教法律愈加严苛，在坎大哈和喀布尔，塔利班当局每周都要进行砍手、鞭打、石刑之类的公开“表演”。塔利班的行径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1998年的国际妇女节特别关注在塔利班统治下困苦挣扎的阿富汗妇女，美国参议院关于阿富汗性别政策的听证会也吸引了广泛注意，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等名流都加入了批评塔利班的队伍。

同时，塔利班的所谓沙里亚生活方式也处于稳步推行之中。根据塔利班的新规定，每位男子的胡须需要达到一定的长度。而新生儿的名字也必须来自塔利班给出的“穆斯林姓名表”上。随着仅有的几所家庭学校遭到关闭，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进一步被剥夺。宗教警察密布街头，而女性完全从大街上绝迹。宗教警察甚至要求每户人家都将自家窗户涂黑，以防家中女性的身影暴露于外。塔利班为女性划定的生存空间只限于家里，终日不见阳光。此外，塔利班强硬派还建议驱逐所有的联合国援助组织。为了达到目的，塔利班进行了一系列挑战联合国耐心的试验。

1998年2月24日，联合国救援机构终于走了。此前，塔利班分子多次殴打联合国工作人员，言语威胁更是数不胜数。穆罕默德·哈桑表现得尤其凶悍，独腿毛拉将一把椅子扔向一位联合国官员，然后又试图掐住对方的脖子。要知道，哈桑一直以秉性温和而著称，而那位官员不过是挡了他的路而已。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组织负责人阿尔弗雷多·维希·赛斯特里（Alfredo Witschi-Cestari）访问喀布尔的要求也被塔利班拒绝。联合国一直反对塔利班包围哈扎腊贾特的行动。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向笔者抱怨说：“在北部，我们的救援人员的安全完全不能得到保证。而阿富汗的南部则有难缠的塔利班。北部的问题是无政府，而南方的问题则是坏政府。”^{【72】}

虽然牢骚满腹，但布拉希米仍然尽职尽责，竭力撮合塔利班和反塔联盟之间的和平谈判。对于调停专员的建议，塔利班表现得不甚积极。他们认为，所谓的谈判增加了敌人的合法性。不过，塔利班并不完全拒绝接触，坎大哈军阀提议双方各自派遣教士进行谈判。此后的几个月内，双方为教士的人选争吵不停。为了促成和议，联合国特地邀请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前去阿富汗进行劝解。理查德森当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是克林顿总统在外交上的救火队长。1998年4月17日，理查德森来到阿富汗，力图促成教士会议的召开。

塔利班和反塔联盟都急切地希望讨好美方。理查德森这个人向来喜欢排场，塔利班的招待果然没让他失望。代表先生收到了大量的地毯、马鞍和缠头巾作为礼物。访问喀布尔的时候，随行的美国电视记者意外地享受到了一次特权。塔利班特许他们拍摄自己的领袖，奥马尔因此完成了电视首秀。星期五本该是在足球场“表演”鞭刑和砍手的日子，为了表达对理查德森的尊重，塔利班方面特地推迟了当天的工作日程。塔利班向美国人



作出两项保证，一是减轻对哈扎腊贾特的包围；二是和联合国就性别政策进行谈判。不过，理查德森甫一离开，奥马尔便反悔，收回成命。

4月底，双方的教士代表来到伊斯兰堡进行初次接触。4天之后，塔利班和反塔联盟同意各派20位教士组成和平委员会，磋商解决诸如停火和换俘之类的问题，塔利班解除对哈扎腊贾特的包围当然也在讨论范围。不过，塔利班随即拒绝指派代表团。不到5月，谈判宣告破裂。而塔利班也为新一轮的攻势作好了准备。

塔利班一面备战，一面继续着对联合国的冒犯。6月，塔利班禁止妇女前往普通医院就医，并且规定，所有来阿的联合国女性穆斯林工作人员必须有一名血亲陪伴身边。为了讨好塔利班，也为了更好地接近阿富汗妇女，联合国大规模招聘女性穆斯林作为驻阿人员。没想到塔利班竟然见招拆招，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塔利班还规定驻喀布尔的所有非政府组织迁出原址，移居破败的综合技术大学。当时，喀布尔一共有30家非政府组织进行援助工作。其中的22家都对塔利班的要求表示反对。这些组织表示，如果塔利班继续蛮横干涉，他们就将停止在喀布尔的一切活动。塔利班方面却不为所动，宣称自己的命令没有任何商榷余地。

欧盟方面继续着自己在塔利班控制区的援助活动。布拉希米对此十分不满，他公开表示了联合国的态度：“塔利班一直在为我们的工作设置人为障碍。他们必须清楚，我们面临的限制一直在增加。对此，那些为阿富汗慷慨解囊的国际组织一直在抱怨。”^{【73】}塔利班方面也不妥协。1998年7月20日，塔利班运用强制手段关闭了所有非政府组织驻喀布尔的办公室，一场驱逐工作人员的行动随之拉开序幕。同样是在这一天，此前被绑架的两位联合国阿富汗籍工作人员重新现身。他们是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穆罕默德·哈比比（Mohammed Habibi）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穆罕默德·巴哈萨里亚尔（Mohammed Bahsaryar），不过两人都死了，尸体在贾拉拉巴德被发现。对于这次事件，塔利班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非政府组织对于喀布尔市民很重要，这座城市的120万人口之中，超过一半要仰仗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维持生计。妇女儿童是塔利班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城市的食品供应和医疗卫生也遭受冲击，更别提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自来水供应了。无数的市民被迫乞讨，塔利班的吉普车从他们身边穿梭而过，无动于衷。这就是塔利班对待民间疾苦的一贯态度——冷漠。

该政权的建设部长卡里·迪恩·穆罕默德（Qari Din Mohammed）声称：“穆斯林相信，至高无上的安拉会养育一切生灵。至于那些西方组织，离开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并没有从中作梗。”^{【74】}

同一时间，塔利班成功获取了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方面的支持，继续自己北伐的军事冒险。6月中旬，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阿尔·费萨尔来访。沙特方面为塔利班提供了400多辆皮卡车以及大量金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拿出20亿卢比（折合500万美元），作为塔利班的后勤专款。三军情报局的官员们是坎大哈的常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塔利班作好军事准备。同时，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和宗教学校再次成了塔利班的兵源地，大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年轻人从那里启程，踏上为塔利班卖命的道路。3月，伊朗、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大了对反塔联盟的支持力度，大批武器、军需和燃料流入阿富汗北方。^{【75】}伊朗当局干脆开通了一条从马什哈德通往巴米扬的武器运送专线，以供哈扎拉武装使用。马苏德也得到了俄、伊两国的大力援助，塔吉克南部的库里亚卜机场就是马苏德的武器市场。塔吉克军阀可以从这里得到大批装备，支持自己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活动。

7月，塔利班军队从赫拉特挥师北上。12日迈马纳陷落，驻守当地的杜斯塔姆武装遭遇大败，100多辆坦克和军车落入塔利班之手。此外，塔利班还俘虏了800多名乌兹别克士兵，这些杜斯塔姆武装人员大多被屠杀。8月的第一天，塔利班攻陷了杜斯塔姆位于希比尔干的大本营。

此前，乌兹别克军阀的几位部下已经倒在塔利班的金元之下，他们的叛变助长了塔利班的胜利。杜斯塔姆逃往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再次流亡土耳其。首领的潜逃让杜斯塔姆武装士气大跌，那些把守马扎里沙里夫东部门户的乌兹别克民兵早已被塔利班买通。如此一来，城外的1500多名哈扎拉精兵一下子暴露在塔利班的突然攻势之下。8月8日，塔利班突然发起攻击，哈扎拉人毫无防备，很快落入敌人的包围圈。经过一番血战，只有100名哈扎拉士兵逃出重围。上午10点不到，塔利班军车进入马扎里沙里夫，让那些刚刚开业的小商贩惊愕不已。^{【76】}

塔利班随即在马扎里沙里夫城里展开血腥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清洗。一年前的惨痛经历让塔利班方面决意复仇。后来，据一名塔利班军官披露，奥马尔给了手下两个小时的屠城时间。实际上，屠城整整持续

了两天。塔利班分子杀红了眼，他们驾驶着军车横冲直撞，扫射一切活动物体——小商贩、推手推车的人、妇幼商店店主，各色人等惨遭涂炭。山羊和驴也没能逃过被杀的厄运。根据伊斯兰教习俗，死去的人应该及时得到收殓。塔利班分子完全置教义于不顾，街上横尸遍地、血污四溅，死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名侥幸逃脱的塔吉克居民介绍当时的场景：

“他们到处开枪，任何在街上的人都会被打死，事前没有任何警告。开始的六天，没人敢去收殓尸体。野狗吞食人肉的事情到处都是，气味令人作呕。”【77】

那些逃回家的人也没能求得平安。塔利班士兵很快便破门而入，整个城市彻底沦为屠场。那位塔吉克居民继续讲述他自己的经历：“许多人死前挨了三枪。一枪打头，一枪打胸，一枪打爆生殖器。侥幸逃生者把亲人的尸体埋进自家的菜园。很多妇女都被强暴。”另一位40岁的塔吉克妇女现身说法：“塔利班闯入我家，杀死了我丈夫和我的两个兄弟。他们每人都挨了三枪，喉管也像牲口一样被切开了。”这位女士就这样成了寡妇。【78】

经过一天的无差别屠杀，塔利班接下来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暴行。他们的目标直指哈扎拉人。一年之前，塔利班首次涉足马扎里沙里夫的时候曾经犯下一个错误——没有向导。这一次，塔利班部队吸取了教训，队伍中多了不少本乡本土的普什图人。他们都是希克马蒂亚尔的手下，对马扎里沙里夫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接下来的几天内，巴尔赫省的普什图人带着坎大哈来的同胞走访哈扎拉人的聚居地，深入每家每户搜寻反抗分子。但是，塔利班很快便大开杀戒，很多受害者并非他们想象的哈扎拉人。“我亲眼看见一名塔吉克少年被杀。他的父亲在一旁大放悲声，并向塔利班分子哭诉：‘我们是塔吉克人！’塔利班分子十分诧异。‘为什么你不早说呢？’他问。那做父亲的可怜人答道：‘可你根本不给我机会啊！’”【79】

几千名哈扎拉人很快便盈满了整个马扎里沙里夫监狱，多余的囚犯很快被装上厢式货车，不少人因此窒息身亡。更多的哈扎拉囚徒被直接带到达施特拉伊利沙漠的边缘。一年之前，无数的塔利班俘虏在这里被枪杀。如今，塔利班如法炮制，效法哈扎拉人的手法杀害囚徒。一名目击者回忆道：“他们一共带来了3车人，从马扎里沙里夫来到希比尔干。打开车厢门的时候，里面只剩下3个人还活着。其他300多个都死了。那3个人最后都逃过一死，改判为监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就坐在一旁。”【80】慑于

塔利班的暴行，无数人选择逃离。逃难者们徒步离开了马扎里沙里夫，不过，其中的很多人没能逃过塔利班蓄意的轰炸，最终仍然死于非命。

塔利班的目的是彻底清洗阿富汗北部的什叶派势力。毛拉·尼亚孜曾下令处死纳吉布拉，塔利班拿下马扎里沙里夫不过几个小时，他便被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在清真寺里，塔利班的毛拉们向城市里的什叶派信徒阐明了三大原则：什叶派信众或者改宗逊尼派，或者去伊朗，或者只有一死。除此三项，他们别无选择。一切什叶派特有的宗教仪式都被禁止。新官上任的尼亚孜在城中最大的清真寺发表宣言：“去年，你们哈扎拉人背叛我们，对我们进行杀戮，躲在自家向我们射击。如今，我们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哈扎拉人根本就不是穆斯林，我们必须消灭这些异教徒。你们可以离开阿富汗，如果要留下就必须真心皈依伊斯兰。你们如果选择逃离，只有被捕一途。你们要上天，我们可以抓住你们的脚把你们拽下来。你们要入地，我们可以拽着你们的头发把你们拉起来。”^{【81】}马扎里沙里夫发生的一切，和塔希图斯（Tacitus）笔下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情景有着惊人相似——“罗马军队制造荒无人烟的场景，并把这种场景称为和平。”

由于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很难估计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根据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测算，受害者5 000~6 000人。有一个事实十分清晰，塔利班还在迈马纳和希比尔干对当地的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人进行过类似的屠杀。笔者认为，7、8月之间一共有6 000~8 000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反塔联盟遭受的严重伤亡。塔利班利用杀戮手段，蓄意在北部民众之中制造恐怖氛围，以求彻底打消他们的反抗意志。事实证明，这一图谋是失败的。

塔利班屠杀的目标不仅限于哈扎拉人，他们还瞄准了当地的伊朗籍居民。这一举动引发了世界性的谴责声浪，几乎使两国爆发战争。毛拉·杜斯特·穆罕默德带领着一队塔利班人员进入伊朗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杜斯特的人马中包括部分巴基斯坦籍人员，他们都来自“巴基斯坦先知之友”，强烈仇视什叶派。杜斯特一行逮捕了领事馆中的11名伊朗人，其中有外交官、情报人员以及一名记者。这些伊朗人都被带进地下室，然后遭到枪决。为了保卫领馆安全，德黑兰方面提前和巴基斯坦当局取得了联系。伊朗人早已得知，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官员们就在塔利班入城的部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领馆中的伊朗籍人员还以为杜斯特等人是来保护



自己的，一开始还向这些刽子手表示欢迎。【82】塔利班方面还逮捕了45名伊朗籍司机，他们的罪名是向哈扎拉武装运送武器。

面对伊朗的追问，塔利班一开始支支吾吾，不愿透露领馆人员的去向。很快，随着伊朗方面的震怒，以及国际抗议带来的压力，塔利班被迫承认了外交官的死讯。不过，据塔利班官方声称，此次事件纯属几个叛徒的个人行为，和组织命令完全无关。不过，有可靠消息透露，杜斯特曾用无线电话向奥马尔请示如何处置在押的伊朗人员，而塔利班领袖下达了必杀令。这个故事不知真假，但伊朗人对此深信不疑。讽刺的是，杜斯特回到坎大哈后不久便进了监狱。因为这位毛拉风流成性，居然把两位哈扎拉情妇带回了家。结果他的太太直接到奥马尔面前告了丈夫一状。塔利班拐走了400多名哈扎拉妇女以充实后宫。【83】

至此，塔利班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占据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土地。根据某些巴基斯坦官员的鼓吹，塔利班分子开始憧憬国际社会对自身合法地位的承认。这一形势让一位客人振奋不已，他就是沙特阿拉伯异议分子本·拉登。此前，本·拉登宣布向美国政府和沙特王室发动圣战，因此被驱逐出境，公民权也遭剥夺。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连续遭遇爆炸，造成224人死亡，4600人受伤，这是一起本·拉登信徒策划并执行的恐怖事件。作为报复，美军用导弹袭击了基地组织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训练基地。数十枚巡航导弹瞄准6个目标而去，20多人身亡，30余人受伤。美方认为，本·拉登就在袭击目标之内，不过沙特人幸运地躲过一劫。实际上，死伤者中并没有阿拉伯裔人员，送死的大多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籍人士，他们当时正在为将来潜入印控克什米尔作准备。

塔利班对美军的袭击十分愤怒，阿富汗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反美游行。数家联合国机构遭到暴民破坏。奥马尔直接对克林顿进行了一番人身攻击，塔利班领袖讽刺道：“袭击阿富汗不过是克林顿的个人决定，为的是转移美国人民的注意力。克林顿那档子事已经证明了他的人品。他是个骗子，而且不知羞耻。”塔利班领袖句句话锋直指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的丑闻。同时，奥马尔还宣布，本·拉登不但是塔利班的客人，更是全体阿富汗人的贵宾。阿富汗人民绝不会出卖宾客，把拉登交给美国人。塔利班领袖干脆认为：“美国政府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84】受安全形势所迫，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得不撤出喀布尔。不过，悲剧还是发生了。一

名意大利籍军事观察员中弹身亡，另有一名法国外交官受伤。凶手很快遭到拘捕。两名行凶者——哈克·纳瓦兹（Haq Nawaz）和萨利姆（Salim）都来自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同系伊斯兰解放组织（Harkut ulAnsar）成员。

伊朗方面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声浪还未退却，塔利班再次出击，兵分三路对巴米扬地区发动进攻。1998年9月13日，战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不少哈扎拉武装指挥官向塔利班投降。卡里姆·哈里里（Karim Khalili）等人则选择逃亡，城中的大部分居民跟随领袖一起出逃。塔利班先头部队入城之前，难民多已经潜藏进了附近的山区地带。迫于国际压力，塔利班占领者不得不对人权表现出些许尊重。奥马尔命令部下收敛行动，切勿滥杀当地的哈扎拉人。不过，几星期之内仍然爆出不少塔利班杀戮平民的新闻。据称，巴米扬附近一座村庄里便爆发了一起惨案，50位老人不幸遇害。这些老人原本跟随村里的青壮年一起出逃，但是人老体衰，落在后面，最终遭塔利班毒手。^{【85】}

另一桩悲剧发生在9月18日，当时，塔利班刚刚入主巴米扬地区5天。受害者是巴米扬引以为豪的那两尊石刻大佛。塔利班分子表现得极为不敬，他们用炸弹毁坏了佛像的头部，并向佛像的腹股沟处发射火箭弹。佛身遭到严重破坏，佛龕内的精美壁画也完全损毁。作为阿富汗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大佛已经在巴米扬地区存在了近2 000年，安然度过岁月风霜的考验，经历蒙古大军的冲击而屹立不倒，不料最终却毁在了塔利班分子的手里。这显然不是伊斯兰教义教导的结果，只是塔利班分子个体的暴行。

巴米扬的陷落让伊朗当局忍无可忍。德黑兰方面大谈自卫权问题，并搬出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作为佐证。几个月前，美军在用火箭袭击喀布尔之前也是这么做的。一周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ullah Ali Khomeinei，译者注：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职，和“莫拉维”、“毛拉”、“毛拉纳”、“卡兹”等相似）发出警告，称整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面临一场空前的大战。哈梅内伊谴责巴基斯坦方面助纣为虐，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为塔利班的巴米扬行动开辟道路。伊斯兰堡当局对此坚决否认，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同时，伊朗当局大秀肌肉，调动飞机、坦克以及70万革命卫队队员在伊阿边境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其规模创造了同一地区演习的历史纪录。10月，20万伊朗国民军（译者注：伊朗武装力量分为革命卫队和一般军队。前者在伊斯兰革命中崛起，后者

则是萨法维王朝时代保留下来的正规军)再次开赴边境展开军演。塔利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也派遣了5 000多人驻守边防,防止伊朗入侵。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可能的军事行动十分不安。于是,布拉希米再次奔赴中亚进行调解。10月14日,奥马尔在喀布尔会见了布拉希米,这还是塔利班领袖第一次和来自巴基斯坦以外的联合国官员打交道。奥马尔向联合国方面作出三项承诺:释放在押的伊朗司机、归还遇害伊朗外交人员遗体,并和联合国协调关系。此后,伊、阿矛盾渐渐平息。

塔利班忙于应付伊朗,马苏德得到了喘息之机。塔吉克军阀开始收拢旧部,那些尚未投降的乌兹别克和哈扎拉士兵也是他招罗的对象。同时,伊朗和俄罗斯的大批援助已经到手,这一次,马苏德武装得到的新武器中包括军车和直升机。

随后,马苏德出其不意地向阿富汗东北部发起反击,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了大片土地。塔吉克军阀的辉煌战果在塔阿两国敏感的边界线附近体现得最为完美。塔利班在这次10—11月之间的军事行动中损失了2000多人。不少塔利班分子既无战斗勇气,也无战斗能力,他们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抵抗,随后便向马苏德缴械投降。12月7日,马苏德等反塔联盟领导人在潘杰希尔谷地里举行会议,塔吉克军阀在会上当选为反塔联盟总司令。随着乌兹别克和哈扎拉势力的衰亡,马苏德和他的塔吉克子弟兵成了反塔联盟最大的希望。不少普什图军阀也投奔到了马苏德的门下,一齐反抗塔利班。

阿富汗的地缘形势原本就十分脆弱。两年多来一系列的事件——塔利班的进攻、屠杀哈扎拉人的暴行、阿伊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导弹的突然来袭——更是让这种脆弱的平衡面临瓦解的局面。俄罗斯、中亚诸国和土耳其对塔利班的种族清洗十分愤怒,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因此成了这些国家谴责的对象。随着各国大打口水仗,地区内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1998年8月25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五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齐聚塔什干,五国之间达成协议,为应付塔利班的威胁组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攻守同盟。

当时,阿富汗周边的紧张形势很可能诱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塔利班政权和伊朗当局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战端一开,一向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难免不被波及;西方投资者和石油公司会因此中止在里海沿岸地区进

一步投资的计划；原教旨主义的幽灵很可能趁机侵入中亚各国，反美情绪也在这些贫弱的国家里越来越有市场；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日渐壮大，矛盾随之增加。

塔利班拒绝组织联合政府，拒绝改变性别政策，拒绝按照国际外交规则行事。他们的拒绝态度让国际社会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联合国救援机构因被塔利班拒绝而无法重返喀布尔。美国一心希望逮捕本·拉登，但塔利班方面只是拒绝，并不配合。沙特阿拉伯和塔利班关系紧密，却也对盟友对本·拉登的包庇非常恼火。为此，沙特方面甚至撤走了驻喀布尔的外交代表，并停止一切官方援助。如此一来，塔利班的倚靠只剩下巴基斯坦一家了。

1998年12月8日，国际社会长期蓄积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问题做出决议，内容十分严厉，堪称史无前例。决议指责塔利班犯有支持地区恐怖主义、侵犯人权、贩卖毒品和拒绝停火等多项罪行，并威胁可能对阿富汗政权实行无条件的制裁。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南希·索德贝里（Nancy Soderbergh）认为：“恐怖主义以阿富汗为基地，已经泛滥成灾。”^{【86】}对于此次决议，只有一个国家表达了反对意见，那就是巴基斯坦。巴方认为决议内容有偏袒之嫌。结果，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一样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在联合国和美国等多国政府的压力之下，1999年初，阿富汗内战双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当年3月11日，塔利班和反塔联盟的代表应联合国要求来到阿什哈巴德进行谈判。谈判之中，双方同意互换俘虏，而且都有继续谈判的意愿，最终的结果还算完满。不过，4月份还没到，奥马尔再次反悔，塔利班领袖认为马苏德狡诈善骗，不足与之继续来往。

实际上，谈判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不过是缓兵之计。私底下，塔利班和马苏德武装都在为春季攻势进行着战争准备。1999年4月7日，马苏德在杜尚别密会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Igor Sergeyev）。俄方表示将在塔吉克斯坦新建一处空军基地。这座机场的用途之一便是为马苏德武装提供军事援助。塔利班也翻新了自己的装备，并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里招募了更多的学生兵。马苏德和哈扎拉人联手出击，对阿富汗东北部和哈扎腊贾特地区发起了多次进攻。经过血战，4月21日，哈扎拉人重新夺回了巴米扬省。随着整个阿富汗北部再次回归战乱状态，联合国的和平努力



完全归零。

1998年初，安南就阿富汗局势警告国际社会。他断言：“50多万武装人员绑架了一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87】}1998年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多次担心未来的阿富汗会陷入“冲突地区化”，并沦为“大国游戏的新战场”。^{【88】}安南悲观地认为，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军事胜利及屠杀行径和稳定和平南辕北辙，最终只能将阿富汗带入民族分裂的深渊。

1998年还未结束，安南的预言便不幸成真。布拉希米宣布辞职，他猛烈抨击了塔利班的顽固态度。此外，布拉希米还指责外部势力对于阿富汗内战的干涉，以及那些源源不断从巴基斯坦而来的宗教学校学生。布拉希米的辞呈是在10月递交的。此前的7月和9月，塔利班军队两次发动攻势，意图驱逐喀布尔地区的马苏德武装，并彻底切断马苏德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补给线。

塔利班的两次攻势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屠杀政策让首都的北部地区几无行人，20多万老百姓背井离乡。肖马里谷地原本是阿富汗最富饶的农业区，也因战乱变成了一片荒芜。随着冬天到来，各地的难民都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困难。无论是在塔利班治下的喀布尔，还是马苏德控制的潘杰希尔地区，情况一样地糟糕。

布拉希米辞职之后，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印象更加恶劣。10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对塔利班实施部分制裁，切断了进出阿富汗的所有商业航线，并冻结了塔利班的海外账户。美国当局趁机发难，要求塔利班交出本·拉登。

2000年2月6日，一次未遂的劫机事件再次把塔利班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几名阿富汗公民劫持了一架从喀布尔飞往伦敦的航班，并要求前往国外政治避难。4天之后，劫机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4月初，塔利班对马苏德武装发起过几次进攻，结果进攻失败不说，反而丢失了部分土地。塔利班的倒霉事不止于此，3月27日，被他们关押的两名北方联盟领导人成功地逃出牢笼，离开生活了3年的坎大哈，前往伊朗。其中的一位越狱者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斯梅尔·汗，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抗苏英雄也是塔利班的主要敌人。

4月，塔利班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恳请世界各国关注饿殍遍地的阿富汗南部三省，并帮忙救助巴格兰省（Baghlan）严重的蝗灾。当年夏

天，旱情蔓延到了阿富汗全境。不过，塔利班仍然拒绝停火，而国际社会因此也对阿富汗的困苦反应冷淡。3个月之内，联合国救援机构收到的捐款不过800万美元，而他们原计划收获6700万美元。由于旱灾作祟，1—7月之间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5%，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的2—7月之间，阿富汗贬值了近一半。虽然时局艰难，塔利班还是在7月1日向北方联盟发动了夏季攻势。这一次，塔利班投入上千兵力和数十辆坦克，兵分五路扑向对方阵地。北方联盟的阵地位于喀布尔北部，距首都不过30公里。不过，塔利班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他们付出了400条人命的代价，而马苏德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喀布尔附近战事渐渐平息，7月28日，塔利班再次向阿富汗东北部发起攻势，意图切断马苏德武装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补给线。塔利班武装向北方联盟的政治中心塔罗干（Talogan）缓缓推进，一路上多次炮击民用目标。塔罗干战役持续了4个星期，战况十分惨烈，9月5日，塔利班成功占领该地。不过，马苏德武装只是战略撤退，纯粹是为了避免百姓横遭涂炭。马苏德的部队撤入巴达赫尚，当地已经是马苏德控制的最后一块领地。105 000多人也为了避难逃离塔罗干。随着塔利班军队的步步进逼，难民们蜂拥到了塔吉克斯坦边境，他们向塔吉克斯坦方面提出避难请求。塔利班不但占领了塔罗干，还攻克了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界的十几个城镇。咄咄逼人的气势引发了整个中亚的恐慌。

2000年整年，塔利班内部不断爆出不和传闻。领导层出现裂痕的同时，下层的部族居民也对塔利班领导的腐化堕落和强制征兵政策表示了强烈不满。1月13日，喀布尔的货币交易市场遭遇监守自盗，塔利班武装人员从这里偷走的钱折合美元金额高达20万。随后，交易市场在抗议声中不得不关闭数日，阿富汗尼对美元的汇率也一跌再跌。

1月25日，来自阿富汗东部四省（帕克提亚、霍斯特、帕克提卡和加德兹）的部族长老齐齐向塔利班施压，迫使坎大哈军阀更换上述四省的行政长官。塔利班强征兵员的政策是引发长老们怒火的重点。此外，这些地方实力派还反对塔利班的税收政策。塔利班的税不但攀升过快，而且悉数上缴喀布尔中央，地方省份毫无得益。27日，2 000多名霍斯特居民举行了反塔利班游行，他们的行动让塔利班当局始料未及。旱灾当前，塔利班当局却一心想着打仗。阿富汗百姓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指责当局罔顾民生。走



私集团则大力抨击塔利班对本·拉登的包庇。正因为塔利班的“好客”，才招致了联合国的制裁令，走私生意因此大受影响。4月底，空军司令阿克塔·曼苏里（Akhtar Mansuri）等十名塔利班官员遭到逮捕，他们被控帮助伊斯梅尔·汗越狱。

塔利班一向支持邻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对于前来投奔的恐怖分子，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的大门总是敞开的。中亚各国是塔利班支恐政策的重灾区。除了中亚，塔利班的客人来自全球各地，包括伊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一些东亚国家的激进势力。这些外国人都为塔利班卖命。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其中的代表。该组织在阿富汗东北部拥有基地，并曾在1999年夏和2000年两次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军发动袭击。塔利班攻下塔罗干的15 000名精兵之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国外。其中有巴基斯坦籍人员3 000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人员1 000人，以及本·拉登的数百名阿拉伯同胞。此外，来自克什米尔、车臣、菲律宾和东亚国家的极端分子也活跃在塔利班的战线上。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美、俄及地区内各个国家选择携手共进。俄罗斯方面尤其恼怒，因为塔利班政权不但承认了所谓的车臣共和国，还在1月16日为车臣叛匪开设了大使馆。10月12日，伊斯兰堡发生政变，军政府上台后加大了对塔利班的支持力度，帮助阿富汗盟友发动2000年的夏季攻势。此时，巴基斯坦仍然是塔利班在世界上的唯一友邦。巴方的对塔态度当然不受邻国欢迎，中亚各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大受影响。

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多次试图撮合阿富汗冲突各方重启和平谈判，最后都以失败完结。1月18日，西班牙外交官弗朗塞斯克·旺德雷尔（Francesc Vendrell）受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努力下，塔利班和北方联盟于3月和5月先后在吉达进行了两次间接接触。塔利班虽然名义上统一了阿富汗，可是承认他们的国家仍然寥寥无几，国际地位十分孤立。而且，阿富汗的各个邻国都将塔利班斥为“贱民运动”。

第二部分

伊斯兰和塔利班

Islam and the Taliban

第 6 章

咄咄逼人的伊斯兰：塔利班的新型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教一直是阿富汗人生活的中心。他们坚持一天祈祷五次，斋月期间严格守斋，“天课”（Zakat）方面也是苦修不辍（一种救济穷人的修行）。要论虔诚，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少有人能和阿富汗人等量齐观。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伊斯兰教还是阿富汗不同文化、不同血缘人群之间的纽带。而“圣战”（jihad）则是驱动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决定力量，在这方面，英国和沙俄已经领教过厉害。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人的全民信仰，无论何种贫富，无论何种政治信仰，无论是共产党人、国王还是圣战组织的士兵，宗教面前人人都一样地虔诚。1988年，笔者和阿富汗被黜国王查希尔·沙阿在罗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采访当中，国王曾经礼貌地打断我的问话，因为祈祷的时间到了，他需要失陪片刻去隔壁房间完成功课。同样，共产党人也坚持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朝着麦加方向跪拜。为了祈祷，圣战组织的士兵们可以暂停战斗。塔利班领袖奥马尔更是勤于此事，他每天都要在坐席上静坐良久，祈祷完毕还要思考组织的发展问题。他的对手马苏德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军阀在密集的战事中也忘不了祈祷，而且能在枪林弹雨的喧嚣中安然入定。

但是，虔诚的阿富汗人从来不敢肯定，自己身旁祈祷的人是不是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传统上，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十分宽容，不同教派、不同宗教、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虽然一些毛拉叫嚷着要消灭异教徒，但宗派争斗根本不会带来激烈的现实问题。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1992年

以前，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犹太教徒在阿富汗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中心的货币市场是他们的天下。每当阿富汗的王公贵族需要发动战争，总得向这些非穆斯林进行借贷，后者也借此大发战争财。

不过，在1992年后，这种宽容共存的古老传统被残酷的内战破坏殆尽。宗派斗争、民族冲突，各种狭隘偏颇的新鲜事物倒是层出不穷。1995年，马苏德武装在喀布尔屠杀哈扎拉人；1997年，哈扎拉武装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塔利班士兵；1998年，塔利班屠杀哈扎拉和乌兹别克平民。一件件的惨剧都属史无前例，阿富汗的民族精神和宗教思想中的闪光点完全泯灭，荡然无存。塔利班迫害什叶派的行径，严重玷污了伊斯兰信仰的名声。许多非普什图人也因为塔利班的恶政选择离开家乡阿富汗。

伊斯兰教逊尼派拥有四大学派，哈纳斐派是其中最为自由的一派。^{【89】}80%的阿富汗人都是哈纳斐派信徒。其余各派在这个国家也有分布，不过信徒较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哈扎腊贾特是什叶派信仰的天下。除了哈扎拉人之外，一些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赫拉特人同样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斯玛仪派（Ismaelis）信徒是阿迦·汗（Agha Khan）的追随者，他们的信仰属于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伊斯玛仪派的领地位于偏僻难行的阿富汗东北部，处在帕米尔的崇山峻岭之中。如今，这里是塔吉克斯坦东北部的一部分，还有部分伊斯玛仪派信徒居住在巴基斯坦北部。赛义德·纳迪尔·沙阿·侯赛因（Sayyed Nadir Shah Hussein）得到阿迦·汗的真传，后来成为了阿富汗伊斯玛仪派信众的领袖，1971年，沙阿·侯赛因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伊斯玛仪派成了反塔联盟中的中坚力量。19世纪，大批印度教和锡克教信徒作为雇佣军跟随英国殖民者来到阿富汗。在这个国家生活近一个世纪后，这些印度次大陆来客大多在1998年离开了。与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布哈拉派的犹太人。不过，仍然有少部分非穆斯林选择留在阿富汗。

哈纳斐派的教义漠视等级，教众组织松散。现代阿富汗的统治者为此十分头痛，他们无法有效动员各位宗教领袖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不过，存在即合理，阿富汗社会结构向来松散，与哈纳斐派的特点一拍即合。在阿富汗的伊斯兰传统中，最小政府思想有着很大的市场。人们希望把政府干预降低到最小程度，崇尚一种远离国家干预的社会生活。部族长老才是实际的决策者，而毛拉阶层的教育程度虽然不高，却也在普什图村民中拥

有很高的地位。在农村，一切生活事务都围绕着清真寺运行。宗教学校散布部落地区各地，无数的宗教学生（talib）在其中读书就学，感悟古兰经的真谛。中世纪的赫拉特一度是阿富汗宗教学校的中心。不过，从17世纪开始，阿富汗的宗教学者大多选择离开故国，去中亚、埃及和印度的知名宗教学校留学，以求得一个教士（ulema）的名分。^{【90】}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还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1925年以来，阿富汗开始实行宗教法律。当时的国王阿曼诺拉·汗（Amanullah Khan）决定建立阿富汗自己的民法体系，政府出面对各位教士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担起宗教法官（“卡兹”，qazi）的责任。1946年，喀布尔大学设立了宗教法律系，学者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教义和现代法律体系结合到一起。阿曼努拉王朝的末代宰相穆罕默德·穆萨·沙菲克（Mohammed Moussa Safiq）有着同样的心愿。沙菲克自幼在宗教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喀布尔大学宗教法律系深造。他还曾远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过学位。1973年，沙菲克被迫下野，6年之后遭到杀害。许多国家都对他的死表示哀悼。^{【91】}

1979年苏军入侵的时候，毛拉们并没有选择加入那些信奉极端的圣战组织。那些更为传统，以部族系统为基础的政党才是他们的选择。比如毛拉纳·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组织和莫拉维·尤尼斯·哈利斯旗下的伊斯兰党。这两位领导人都曾在巴基斯坦的哈卡尼亚伊斯兰学校求学，回国后，两人成立了各自的伊斯兰学校。为了对抗入侵者，两人同样选择揭竿而起，不过他们的组织都十分松散，意识形态色彩较轻，上下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两位宗教人士的武装很快便淹没在侵略和反侵略的浪潮中，而那些极端分子则从美、巴两国获取了大量武器，从而一直在残酷的战争中屹立不倒。

崇尚神秘的苏菲派秉性温和，这种源自中亚和波斯地区的教派在阿富汗也十分流行。“苏菲”即阿拉伯语“羊毛”之意，早期的苏菲派修士常常身披羊毛毡子，他们的信仰因此得名。苏菲派崇尚“道”（tarigah），这种中世纪思想对统治阶级、世俗知识、法律制度甚至毛拉体系都抱有深深的怀疑。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无疑很有吸引力。沉思、舞蹈、音乐等种种仪式是苏菲派求道的基石，信众通过抖动、旋转追寻真理。他们相信，这些身体仪式可以在人体内开辟一个外人不能洞悉的精神王国。著名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7个世纪前曾经这



样描述苏菲派信仰：“皮囊隔绝了人与神性的交流，苏菲派的宗旨便是打破这种桎梏，让人和安拉融为一体。”^{【92】}

苏菲派的两大教团有着超越种族和派别的权威，因此，它们是反苏斗争中各个派别的联系纽带。在两大教团的笼络下，不同的圣战组织得以平等相处，各派领袖也平起平坐。

几个世纪以来，苏菲派纳格什班迪耶教团（Naqshbandiyah）的领导权都在喀布尔的穆贾迪迪（Mujaddedi）家族中代代相传。这个家族声名显赫，不但是宗教领袖世家，历代阿富汗国王中也不乏他们的子孙。1979年1月，傀儡政府为了清除政敌，残忍地杀害了望族的79位成员。希布哈图拉·穆贾迪迪（Sibghatullah Mujaddedi）侥幸逃生，他在白沙瓦组织了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Jabha-I Najat Milli）。希布哈图拉·穆贾迪迪本人对极端主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1989年，他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并于3年后被圣战组织推举为阿富汗首任总统。

苏菲派的另一分支操控在艾哈迈德·盖拉尼（Pir Sayyed Ahmed Ghalani）手中。盖拉尼和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之间有姻亲关系，同时还是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的创始人。和希布哈图拉·穆贾迪迪一样，盖拉尼也主要在白沙瓦活动。两位领袖都是查希尔·沙阿的支持者。除此之外，他们还都是圣战组织中的温和派。他们同样都被美巴情报机构冷落。后来的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以及再后来的塔利班对两位领袖也是敬而远之。直到1999年，两位苏菲派领袖才重返政坛中心。他们建立了“民族与和平联合会”，旨在促进塔利班和反塔联盟之间的和解。

塔利班崛起之前，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土壤并不丰厚。阿卜杜尔·瓦哈卜（Abdul Wahab, 1703—1792年）创立的瓦哈比派（Wahabism）是逊尼派的一支，发源于沙特阿拉伯，崇尚苦修，讲究清心寡欲。瓦哈比派的宗旨在于净化伊斯兰信仰，消除苏菲派思潮在贝都因人中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涨为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滚滚财源。此后，向海外推行瓦哈比主义思想成了沙特当局的国策。这种思潮首次进入中亚地区是在1912年。当年，出生在麦地那的沙特人赛义德·沙里·穆罕默德（Sayed Sali Mohammed）将瓦哈比主义带到塔什干和费尔干纳河谷。后来，在中亚和英属印度的双边影响下，阿富汗也出现了瓦哈比派的信徒。不过，在苏军入侵之前，瓦哈比派在阿富汗一直属于绝对少数派。

对于阿富汗的瓦哈比主义分子，沙特阿拉伯从来不吝惜援助。大笔金钱和武器流向瓦哈比派手中，一些支持者也随之流入了他们的门下。在战争早期，阿卜杜尔·拉苏尔·赛耶夫（Abdul Rasul Sayef）是沙特阿拉伯派驻阿富汗的代表。这位代表是一名阿富汗通，他在白沙瓦成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团结会”（Ittehad-e-Islami）的组织。在白沙瓦，阿富汗的瓦哈比分子又被称为“萨拉菲”（Salafis），他们十分活跃，无论在苏菲派的活动里，还是部族会议上都有他们传教的身影。不过，阿富汗老百姓对瓦哈比主义那一套十分反感。在普通人眼里，瓦哈比派只是一种异国传来的异端思想。不过，一些阿拉伯籍圣战人士仍然小有追随者，比如，奥萨马·本·拉登的门客就不少。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钱和武器的作用而已。

各大圣战组织之中，那些有着极端主义倾向的派别最受美、巴情报部门的青睐。它们因此成为圣战的核心力量。1975年，阿富汗曾爆发过一场旨在推翻达乌德总统的兵变，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都参与其中。兵变失败后，两人双双逃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当局把阿富汗极端势力当作向阿富汗政府施压的工具。巴方控制着极端组织，而这些极端组织又掌控了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在齐亚总统的关照下，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武器大多归巴方信任的极端组织使用。不过，后来马苏德选择背叛，甚至严厉抨击巴基斯坦政府，巴方自然也断绝了援助。

极端派别的领袖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希克马蒂亚尔是喀布尔大学工程专业毕业，而马苏德曾在喀布尔的法国高中就学。他们思想的源头都在巴基斯坦，该国最为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协会”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的启蒙老师。至于伊斯兰教士协会的渊源，则要追溯到1928年的埃及。这一年，穆斯林兄弟会（Ikhwan ul Muslimeen）在那里诞生。穆斯林兄弟会鼓吹通过革命建立教法国家。其创始人哈桑·阿里·班纳（Hassan Ali Banna）深深影响了一位巴基斯坦青年——阿布尔·阿拉·毛杜迪（Abul-Ala Maududdi）。后者回国后，于1941年创办了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士协会（Jamaat ul Islam）。

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强烈的反殖民倾向。和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不同，兄弟会所主张的反抗活动是伊斯兰化的。旧有的毛拉阶层往往和殖民地中的本土精英互相妥协，兄弟会对此十分不满。他们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殖民政权，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先知穆罕默德在麦

加和麦地那的政治活动便是兄弟会的行动榜样，他们对待现代世界的态度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兄弟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穆斯林共生共荣的乌玛世界，传统的国家、民族、部族观念和封建阶级制度都是应该摒弃的偏见。^{【93】}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士协会和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都信奉这种伊斯兰国际主义，这些极端组织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带有强烈的现代政党特征。像一些共产党组织一样，他们也有着一套严格的体系，以集体领导制、高度神秘的决策过程、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著称。

伊斯兰兄弟会过于仰仗领袖（Amir）的个人魅力，而不是依靠民主的决策机构进行领导。这也是兄弟会政治模式的最大弱点。狂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是制度的产物，只是领袖个人意志和纯洁性的表现，是他效仿先知穆罕默德的结果。因此，极端主义组织早早就将伊斯兰式的道德定为了个人道德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只能在纯粹的伊斯兰极端社会中存在。^{【94】}而且，这种政治模式为个人独裁开了方便之门，希克马蒂亚尔武装便是一个好例子。

不过，与塔利班相比，上述几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反现代的倾向。它们重视妇女教育，也不排斥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它们试图建立一套伊斯兰的经济、银行和外交体系，追求社会制度的公平和正义。不过，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两者的排他性极强。而阿富汗是一个极为多元化的社会，社会、宗教、民族认同等方面都是如此。缺乏对话和包容只会导致严重问题。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想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彻底改变整个阿富汗的社会体系。这些人无视部族隔阂和民族差异，满以为行政命令能解决一切问题。至于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们根本不加以考虑。

极端主义者的失败和不切实际并不是阿富汗一国的个例。放眼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瓦（Olivier Roy）称之为“伊斯兰政治化的失败”。^{【95】}20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往往有两套并行的社会体系，一端是部落、宗族和民族集团，一端是政府和宗教。这是小集体和信仰的对抗，也是一个部族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比照。所谓的乌玛世界才是效忠的对象，国家反而无足轻重。^{【96】}面对这种困局，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也无力解决。

最初，塔利班以伊斯兰改良运动的面目昭示天下。从历史上看，改良

运动改变的不仅仅是信仰本身，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变。由穆斯林组成的游牧部落摧毁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帝国，改变了帝国的原貌。随后，部落组织渐渐城市化，最终走向毁灭。“圣战”理念是这种政治变革的动力所在。西方人往往将“圣战”理解为穆斯林打击异教徒的战争，这是中世纪十字军影响下的偏见而已。实际上，“圣战”的原意是指求道者在修行中经历的内心挣扎，它带领着穆斯林提升自己、帮助他人。安拉用圣战考验穆斯林的忠诚，通过圣战传递自己的意志。“圣战，一种关乎道德戒律的斗争，发生在内心之中，代表着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和忠诚。”【97】

伊斯兰信仰无法容忍那些作恶的统治者，教义允许人民揭竿起义，推翻暴君。“圣战”指向革新，鼓励求变，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便是“圣战”的写照。先知生活的时代无比黑暗，阿拉伯社会腐败不堪。怀着怒火，先知开始了改造社会的过程。如今的塔利班运动也大概如是，在打击那些横暴的军阀的时候，塔利班分子确实秉承着先知的精神。至于从事“圣战”的人是否可以施行杀伐，“圣战”思想本身言之不详。塔利班分子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也是他们屠杀非普什图人的原因。塔利班分子自认为在从事一场消除腐败，反对邪恶的斗争，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却认为，所谓的“圣战”不过是塔利班进行种族清洗的幌子而已。

抗苏战争期间，各派伊斯兰极端分子纷纷起义，群起抗击入侵者。但在塔利班崛起的时候，他们对宗教、圣战和社会变革的理解却缺乏其他派别的响应。塔利班的思想既非源自穆斯林兄弟会，也没有得到过苏菲派或传统伊斯兰思想的启示。1979—1994年之间，阿富汗的历史上有许多的思潮涌现又消失，无数的运动兴起又低迷。塔利班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可以说，塔利班诞生在一个权力的真空之中。此前，阿富汗的三股代表性势力（伊斯兰极端派、苏菲派和传统派）先后在权力争夺中失去民心，相继崩溃。此后，塔利班凭借着完全不同于前三者的思想和见解，继起成为阿富汗政坛的第四势力。

塔利班运动并非没有自己的精神源头，他们信奉德奥班德教派（Deobandism），并将这种思潮推向极端。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推动下，德奥班德派思想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中不断传播，不断发酵。作为哈纳斐派的一支，这个教派在阿富汗有过一段传教历史。在整个伊斯兰



世界之中，塔利班对这种思想有着独一无二的诠释方式。

德奥班德教派发端于英属印度，其秉性并不保守，它旨在改革宗教、团结穆斯林群体，在一个殖民地社会的种种禁忌之中艰难求存。该派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一是穆罕默德·卡西姆·纳诺特维（Mohammed Qasim Nanautawi, 1833—1877年），二是拉希德·艾哈迈德·甘果希（Rashid Ahmed Gangohi, 1829—1905年），后者在新德里附近的德奥班德创建了本教派的第一个宗教学校。对于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来说，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是一处分水岭。起义之中，他们的武装反英斗争遭遇重大挫折，并从此进入了低潮期。英属印度的穆斯林纷纷转向思想领域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之中既有依托宗教的德奥班德派人士，也有亲近西方的改革派分子。后者模仿英国模式建立了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既传播宗教思想，也教授艺术和科学。改革派认为，大学里走出的穆斯林青年将会有媲美英国殖民者的学识，能够和印度教徒的精英阶层展开竞争。

当时的英属印度的穆斯林群体中，旨在改革的各派人士都十分重视教育，德奥班德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教育可以帮助自己的信仰实现现代化。新一代德奥班德分子接受过现代教育，也有过传统的宗教体验，还对宗教法律了如指掌。德奥班德派试图将传统的宗教法律和当时印度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他们限制妇女的社会角色，反对穆斯林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对于什叶派信仰，德奥班德主义以异端视之。塔利班如数继承了上述所有理念，并将其推向极端，极端程度让德奥班德派的肇祖们始料未及。当时，德奥班德派开设的宗教学校遍布英属印度各地，学生中不乏阿富汗人。伊斯兰教抗击殖民主义的命题同样困扰着这些邻国学子。1879年之前，全印度一共有12所德奥班德派宗教学校，无数的阿富汗人在其中求学。不过，他们的名声并不好，主人认为这些外国学生“又吵又缺乏耐心”。^{【98】}1967年是德奥班德派创立的百年诞辰，这时，整个南亚次大陆上已经有9000多所德奥班德派宗教学校生根发芽。

20世纪初的阿富汗政府一直想把境内的宗教学校纳入自己掌控之下，因此，他们和德奥班德派之间有过合作。1933年，德奥班德派教士应邀到喀布尔参加查希尔·沙阿的加冕礼，客人认为自己的教派“培养了可以适应时代变局的宗教人士，可以和伊斯兰世界中的自由政府进行合作，为各

国建设提供忠诚的工作者”。^{【99】}阿富汗政府也筹建几所德奥班德派宗教学校，不过学生并不太多，即便在普什图人聚居的地区也不算热门。

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德奥班德教派在独立的巴基斯坦发展得很快。该派教士成立了伊斯兰教士协会（JUI），这是一个纯粹的宗教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发动信徒。1962年，在毛拉纳·胡拉姆·高斯·哈扎维（Maulana Ghulam Ghaus Hazarvi）的倡议下，伊斯兰教士协会实现了政党化。哈扎维是西北边境省德奥班德派的领袖人物，他的行动很快让整个德奥班德派分崩离析。毛拉纳·穆夫提·马哈茂德（Maulana Mufti Mahmud）便是其中的一派领袖，他接管了西北边境省的宗教权力。西北边境省的新宗教领袖野心勃勃，他所领导的分支派系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1970年，巴基斯坦爆发反对军人专政的竞选运动，马哈茂德在其中扮演了领袖角色。在他的倡议下，反对派提出了一项二十二点声明。声明从反美反帝的立场出发，包含了一个渐进的社会改革计划。伊斯兰教士协会和伊斯兰党一直不和，两党之间的争斗和分歧一直持续至今。^{【100】}

伊斯兰教士协会在巴基斯坦的发展史和本书的主要内容并无关系，不过，德奥班德思想确实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的对阿政策全靠本国的伊斯兰党和希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进行贯彻。而这两个党派都是伊斯兰教士协会的政敌。三军情报局通过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党的关系，将大批援助运送到阿富汗，以支持圣战组织反苏战争。当时，伊斯兰教士协会的领导权已经易手，毛拉纳·法兹鲁尔·拉赫曼（Maulana Fazlur Rehman）接替自己的父亲成为领袖。新领袖在巴基斯坦政坛毫无影响力，阿富汗的德奥班德信仰者人数不多，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不过，伊斯兰教士协会利用这一时期，在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省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大建伊斯兰学校，总数达到几百所之多。学校提供免费的教育、食宿和军事训练，从而吸引了大批学员，其中既有巴基斯坦籍人士，也有阿富汗难民。通过学习和培训，一批阿富汗学员成长起来，成为影响后圣战时代阿富汗局面的重要力量。虽然伊斯兰教士协会在政坛缺乏依靠，但由于巴基斯坦军政府的拨款面向全部宗教学校，各派的学校因此受益。到1988年齐亚政权倒台之前，巴基斯坦全境的宗教学校达到8 000家，此外，还有25 000家未注册的宗教学校分布各地。各类宗教学校容纳学生人数达50多万。同一时期，巴基斯坦国营的教育体制早已崩

溃，穷苦人家的男孩只能选择进入宗教学校接受教育。【101】

位于农村地区和难民营中的宗教学校多由当地的毛拉一手操持。毛拉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德奥班德派思想和理念也并不太了解。他们仅有的一点关于宗教法律的知识来自普什图人的部落经验。沙特阿拉伯方面对于瓦哈比思想一向支持，对于德奥班德派也多次施以金钱援助。因此，德奥班德派宗教学校变成了培养年轻武装分子的储备库。这些武装分子对那些抗苏英雄持强烈批评态度。1992年，圣战组织攻陷喀布尔。虽然在阿富汗发展顺利，伊斯兰教士协会在国内仍然不甚得志，他们在阿富汗南部的影响力一直被情报部门忽视。军政府下台后，贝·布托（1988—1990年）和谢里夫（1990—1993年）先后执政，而伊斯兰教士协会一直被两届政府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

1993年大选中，贝·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获得胜利。与之结盟的伊斯兰教士协会因此受益。他们登堂入室，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102】得势之后，教士协会趁机与军方和情报部门建立起了紧密关系，和前军政府成员纳斯鲁拉·巴布尔（Naseerullah Babar）领导的内政部来往密切。作为普什图人，巴布尔一直在自己的同胞中寻找合作者，帮助本族人重夺阿富汗领导权的同时，也为巴基斯坦方面打通前往中亚的商路。教士协会正好符合内政部长的条件。

在巴布尔的举荐下，法兹鲁尔·拉赫曼当选巴基斯坦国会外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力。任职期间，拉赫曼多次出访美欧各国，为塔利班争取支持。在主席先生的努力下，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各国为塔利班提供了大笔金钱。

德奥班德派既没有强力的领导层，也缺乏地方长老和知名毛拉的支持，他们开设的伊斯兰学校举步维艰。主导学校的各位人物都信奉极端思想，也和伊斯兰教士协会的主流相去甚远。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Maulana Samiul Haq）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哈克先后在巴基斯坦参众两院任职，影响力横跨政教两界。他的宗教学校走出了多位塔利班领导人。1999年塔利班政权的内阁中，至少有8人是哈克的学生。此外，塔利班的多位地方大员、军事指挥官和官员也曾在哈克的学校中就学。【103】此外，哈克的学生还包括两名圣战组织领袖——尤尼斯·哈里斯和穆罕默迪·纳比·穆罕默迪。

哈克的宗教学校“哈卡尼亚”（Haqqania）位于西北边境省的阿霍拉·哈塔克（Akhora Khatak）。这是一排位于伊斯兰堡-白沙瓦公路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一所容纳1500名学生的寄宿学校，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中学和12所规模较小的宗教学校。学校始建于1947年，由萨米乌尔·哈克的父亲阿卜杜尔·哈克（Abdul Haq）一手创办。阿卜杜尔·哈克曾经在德奥班德就学和教书。哈卡尼亚设有伊斯兰研究方面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学年为期8年，博士学年为期2年。学校不收取学生分文，一切办学费用都来自社会捐赠。

1999年2月的哈卡尼亚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北部最受欢迎的宗教学校，一共有15000名学生申请入学，而新增的名额只有400个。萨米乌尔·哈卡是位生性爽朗的虔诚教徒，喜欢开玩笑，胡须像许多穆斯林一样用指甲花染成了橘红色。他告诉笔者，自己的学校总是为阿富汗来的学生预留400个名额。自1991年开始，哈克的学校就开始招收来自中亚各国的学生。当年，学校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共计60人。这些学生都没有任何签证和护照，学成之后，他们都想加入各自国家的伊斯兰反政府组织。

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向来对哈克不够重视，哈克对此深感酸楚。1999年，笔者在哈克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当时，我们在一张硬邦邦的毯子就座，身边是满满一屋子的学生。学生们的脸上留着大胡子，个个手中都拿着1999学年的入学申请表。^{【104】}哈克告诉我：“三军情报局对希克马蒂亚尔和卡兹·侯赛因（Qazi Hussein，阿富汗伊斯兰党的领袖）重视有加，对我们却不闻不问。要知道，在前线抵抗苏军的指挥官中，有80%来自哈卡尼亚。”随后，哈克又大笑补充道：“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率不过5%，三军情报局却把90%的援助都给了他。我们虽然不受重视，但是塔利班崛起之后，阿富汗的人民都站在我们这边。”

哈克还说：“1994年之前，我并不认识奥马尔。因为当时他不在巴基斯坦求学。不过，奥马尔身边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常来看望我，并请教一些问题。我给这些学生的建议是，不要成立党派。因为三军情报局最善于玩弄挑拨离间，唆使内斗的把戏，使得圣战组织永远四分五裂。反之，他们应该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起事。塔利班起义之初，我就告诉三军情报局：‘要让这些学生接管阿富汗政局。’”提到奥马尔，校长显得十分



崇敬：“1996年，我去坎大哈访问，第一次和奥马尔见了面。他能当选‘信徒的领袖’，我感到特别骄傲。这样一位既无金钱，又无家世背景的人却能获得广泛的爱戴，可见他的领袖地位是安拉选定的。伊斯兰思想认为，领袖（Amir）职位应该给予那些能带来和平的人。如果巴基斯坦也爆发伊斯兰革命，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不会是我等无用老朽，一定是一位像奥马尔一样从群众中走出的无名领袖。”相识之后，哈克一直是奥马尔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但在国际关系上为塔利班牵线搭桥，还为奥马尔等人在伊斯兰教法上提供指点。

同时，在哈克的唆使下，大批学生离开巴基斯坦的宗教课堂，前往阿富汗前线为塔利班打仗。1997年，塔利班在马扎里沙里夫遭遇惨败，奥马尔向哈克打电话求援。校长二话不说，立即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把全体学生都推上了阿富汗战场。一年之后，塔利班重夺马扎里沙里夫，哈克联合巴基斯坦境内的12家宗教学校以及自己的阿富汗盟友在西北边境省召开会议，商讨加强塔利班军事力量的事宜。结果，12家学校集体同意停课一个月，并派遣8 000名学生为塔利班而战。除了政府和三军情报局，德奥班德派的宗教学校是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最为仰仗的支持力量，正是他们为阿富汗军阀提供源源不断的学生兵。

卡拉奇郊外的比诺里（Binori）也是伊斯兰教士协会的一处重镇，毛拉纳·穆罕默德·优素福·比诺里（Maulana Mohammed Yousuf Binori）和他的伊斯兰神学大会（Jamiat-ul Uloomi Islamiyyah）在此地生根发芽。优素福·比诺里手下有8 000多名学生，其中来自阿富汗的有几百位。数位塔利班的部长级人物曾经在比诺里求学。比诺里的学校全靠捐赠运行，善款来自全球的45个国家。教师穆夫提·贾米勒（Mufti Jamil）说：“我们获得的捐款是安拉的馈赠。塔利班曾在这里就学，他们把伊斯兰教法严格推广，我们为此十分骄傲。”^{【105】}1997年，一共有600名比诺里学生加入塔利班。当年11月，3名比诺里学校教师被杀身亡，他们的死在卡拉奇引发了大骚乱。学生们砸毁汽车、袭击警察、冲进照片冲洗店殴打店员。这种塔利班式的大混乱，在巴基斯坦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

伊斯兰教士协会的另一个极端分支是“巴基斯坦先知之友”（Sipah-e Sahaba Pakistan），该组织以强烈的反什叶派立场而闻名，为了消灭什叶派信众不惜滥用暴力。塔利班对他们鼎力支持。“巴基斯坦先知

之友”先后屠杀了上百位什叶派信众，1998年，巴基斯坦政府终于痛下杀手予以镇压。危急时刻，塔利班适时地张开怀抱，为“先知之友”的头目提供庇护。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霍斯特开设的训练营里，数百名“先知之友”武装分子在此受训。1998年，这座训练营曾经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时，有数千名“先知之友”人员和塔利班一起作战。

伊斯兰教士协会支持塔利班，而阿富汗人也给了宿主丰厚的回报。正因为塔利班的成功，教士协会才得以登上国际舞台，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幕后推手名闻天下。有了国际地位，巴基斯坦政府和情报部门对这群教士及毛拉另眼相看。教士协会借此还吸引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注意力。阿富汗境内训练营不但有军事功能，还是非阿富汗籍圣战分子的落脚点。苏军撤离后，训练营几经转手，主人从希克马蒂亚尔变成了塔利班，随后又变成SSP等伊斯兰教士协会派别的财产。1996年，塔利班将霍斯特附近的巴德尔训练营交给法兹鲁尔·拉赫曼·哈利勒领导的伊斯兰解放组织（Harkat-ul-Ansar）经营。哈利勒的组织也隶属于伊斯兰教士协会，旗下成员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活动，身影遍布全球，从阿富汗到克什米尔，从车臣到波斯尼亚无所不在。^{【106】}因此，两年之后美军的导弹攻击自然没有放过这块营地。

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不少德奥班德派极端组织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他们的关系自然亲密无间。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之中有的是巴基斯坦籍，有的出生在阿富汗。虽然国籍各异，他们却都来自同一个部族——杜兰尼部，坎大哈和查曼是他们的主要基地。德奥班德派思想反对部族传统、反对封建秩序。塔利班继承了德奥班德派对部族制度的不信任。因此，部族长老难以在塔利班领导层中谋取职务。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极端组织的共同语言不止于此，他们对于什叶派有着同样的仇视。如今，巴基斯坦的德奥班德派分子最希望在本国发动一场塔利班式的伊斯兰革命。

当然，塔利班对于德奥班德主义并非全盘接收。后者崇尚修行，提倡宗教改革，塔利班却嗤之以鼻。此外，德奥班德主义有质疑的传统，塔利班对此也不敢苟同。德奥班德主义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塔利班却认为辩论只会助长谬论。不过，塔利班最终取得了成功。在这一地区，他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极端主义，事后的各种伊斯兰革命都以塔利班为典范，而各国政府都把塔利班式的极端主义视为噩梦。

一些极端分子并不反对现代化，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就是其中的代表。塔利班正好相反，从进步理念到经济发展，奥马尔等人对于一切现代事务毫无兴趣。囿于教育背景，塔利班分子对于许多事情都知之不多，其中包括阿富汗的过去、伊斯兰教的历史、宗教法律的相关知识、古兰经的内容以及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理论发展情况。伊斯兰极端主义所讲究的辩论精神和著书立说的传统，在塔利班的种种行为中也找不到踪迹。塔利班分子既没有发表过正式的圣战宣言，也没有关于阿富汗或伊斯兰历史的学术著作付梓。世界上每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辩论发生，其中必然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也毫不在意。塔利班的这种文盲政策彻底禁绝了思想交流，就连组织内的辩论也变得不可能。

塔利班所谓的纯净化伊斯兰革命为祸甚广。中亚各国虽然遭受波及，危害倒还不算很大。巴基斯坦才是这股新式极端潮流滥觞的重灾区。巴基斯坦政府的统治基础本就十分薄弱，认同危机、经济下滑、民族隔阂和教派冲突时刻威胁着国家稳定，统治阶层腐败无能，毫无进行改革、提供善治的能力。如今，一场浩荡的极端主义浪潮又扑面而来。而且，兴风作浪的不是那些老迈无用的旧团体，而是咄咄逼人的塔利班同路人。

1998年之前，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团体在巴国内的普什图聚居区连下禁令，电视、录像带等事物先后退出了当地的城镇生活。此外，塔利班分子还以宗教法律之名滥施酷刑、屠杀什叶派信徒、强迫人民遵守所谓的着装令和生活方式，广大妇女尤其受到迫害。巴基斯坦当局长期纵容、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各种行动，如今终于自食其果。不过，巴方领导人面对危机却丝毫不以为意，继续着对塔利班的支持和纵容。塔利班的影响同时渗入中亚各国，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地区活动尤其猖獗。为此，两国警方在边境附近的费尔干纳河谷地带展开了联合围剿行动。

随着塔利班及其支持者的活跃登场，一种全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伊斯兰教国家和西方同样感受到了威胁。塔利班拒绝一切人道主义援助，并宣称不会为争取世界承认而改变原则。他们还指控伊斯兰世界中的各国政府腐败无能。塔利班的种种行径在伊斯兰世界引发热议，许多青年人在他们的感染下拿起武器，投奔伊斯兰极端武装而去。塔利班改变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种古老思潮从此有了一副新面孔——它不再拥有和其他社会制度融合的可能。

第 7 章

秘密结社：塔利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塔利班的崛起给普通的阿富汗人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因为这个组织的决策大权并非系于一人之手，而是存在于领导人协商和讨论之间。坎大哈舒拉对此有一番自辩之词，他们认为自己的组织形式完全效法伊斯兰教崛起之初的领导模式——决策过程依靠“信仰者”之间的讨论，同时也对民意敞开大门。此外，塔利班的舒拉和普什图人传统上各部长老协商问题的“支尔格”也有几分相似之处。笔者第一次出访坎大哈的时候，曾被塔利班分子之间的辩论所震撼。在一场通宵达旦的辩论中，各位指挥官、毛拉和普通士兵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而奥马尔负责总结陈词。

许多阿富汗人还对塔利班崛起之初的另一件事印象深刻。他们记得，塔利班分子对争夺统治权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这些武装分子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恢复法律秩序，为将来主导政局的“品行良好的穆斯林”打基础而已。不过，1994—1996年间，塔利班的决策过程发生了变化，变得高度集权和隐秘，带有强烈的专断色彩，普通人无法从中窥视到任何信息。大权在握的奥马尔在坎大哈避居不出，对于这个国家的世情和实事，塔利班的最高领袖既一无所知，也不愿了解。至于阿富汗圣战组织和阿富汗社会主义者犯过的种种错误，塔利班也一一予以重复。1996年之后，塔利班独霸阿富汗的意图更是人所共知。坎大哈军阀自命为阿富汗各民族的代表，并试图通过统一全国予以证明。

圣战组织的腐败堕落是塔利班起义的直接原因。白沙瓦是阿富汗抗苏

战争的大后方。在这座边城里，圣战组织内部早已山头林立，各有重心。各派武装的凝聚力更多地来自领导人的个人号召力，而不是组织和纪律。随着战事的推进，各位领导人对西方援助的依赖越来越大。他们需要外国人的钱和枪，以维持属下对自己的忠心。各派组织在前线的主要精力从驱逐苏军转移到了收买人心，在大后方，各派也是争吵不停。

巴基斯坦的干涉行径进一步撕裂了本就不甚团结的圣战组织。1970年，巴基斯坦军方就曾经在约旦介入“黑九月”事件。80年代军政府的头号人物齐亚·哈克（Zia ul Haq）是当时的行动总指挥，巴军帮助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击退了来犯的巴勒斯坦武装。齐亚政权一面向圣战组织敞开国门提供庇护，一面却十分清楚这些阿富汗客人的危险性。因此，巴基斯坦当局的首要政策便是维持圣战组织各自为政的局面，不给任何武装分子担任共同领袖的机会，从而保证圣战组织完全听命于巴基斯坦，圣战活动完全按照西方大国的指挥棒运转。不过，在此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巴基斯坦方面的态度发生大逆转，转而希望圣战组织精诚团结、协同一致。这种希望在1989年苏军撤离的时候表现得十分迫切。三年之后，纳吉布拉政权的垮台让希望再次出现。不过，阿富汗各派武装之间的嫌隙过于深重，一时间难以完全弥合。即便巴方使出巨款贿赂，也无法将各派圣战组织捏合在一起，这种深入骨髓的分裂局面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阿富汗政治，使得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次次地流产。

身处前线的军事指挥官也影响着反苏斗争的决策过程。眼见各派领袖躲在白沙瓦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广大军官十分不满。但是，领袖们掌握着西方金元和军援物资的分配权，叫军事指挥者奈何不得。援助的稀少和战争的残酷，让军官们不得不暂时抛弃派别之争，前线一派互助提携的景象，和大后方钩心斗角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前线军官甚至想过自组党派。1987年7月，第一次前线军官会议在古尔省召开，来自阿富汗各地的1200多名军官参加会议，伊斯梅尔·汗在其中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会议得出了二十条决议，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在于废除白沙瓦方面的领导权，转而让军官们拥兵自重。“阿富汗的未来应该掌握在那些为国家牺牲、为国家奋战的穆斯林手中。其他人没有资格决定国家的命运。”【107】

1990年7月和10月，300名军官先后在帕克提亚省和巴达赫尚省举行

会议。不过，各派军官在民族问题、个人恩怨上分歧很大，而且他们都希望率先占领喀布尔，会议没能取得任何共识。1992年，圣战组织攻入喀布尔。各派武装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这种矛盾是多方面的，南北军阀互相仇视，普什图武装和非普什图裔民族为主的派别关系也不好。比如，马苏德就一直拒绝向希克马蒂亚尔等普什图武装分子妥协。1992年，塔吉克军阀抢先占领喀布尔，从此彻底葬送了普什图人对他的信任。直到1998年塔利班进占阿富汗北部为止。

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商人和技术官僚组成了抵抗组织领导层中的第三股重要力量。苏军入侵后，他们逃离故国避居白沙瓦。面对大后方的派系斗争，这些人大多选择中立、独善其身。而圣战组织和巴基斯坦当局也对他们不够重视，导致这些专业人士毫无政治权力可言。因此，这些人只把巴基斯坦当作前往第三国的中转点。1992年，百废待兴的阿富汗亟须建设，并向旅居海外的专业人士伸去了橄榄枝。但是，由于此前长期被边缘化的命运，专业人士们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热忱。^{【108】}反苏斗争之中，普什图裔的教士和宗教学校教师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或在后方担任政党领袖，或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不过，这些人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有效的影响力。截至1992年，教士们在圣战运动中的个人影响力已经非常微弱，塔利班式的伊斯兰运动即将取代他们扮演的角色。

塔利班崛起的1994年，原有的圣战组织已经完全腐朽，而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无法拯救自己的组织。阿富汗南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完全陷入战乱，存在一大片权力真空。塔利班对于圣战组织领导层的看法十分贴切，这些老朽已经不复当年，完全沉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其实，塔利班运动的思想源自80年代反抗苏军的圣战组织，组织中几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甚至是塔利班分子的启蒙教师，他们赢得了奥马尔等人的尊敬，却不能让自己在塔利班政权中赢得一把权力交椅。对于圣战组织的军官们，塔利班方面也没有任何好感。塔利班分子认为，正是由于普什图军官们各怀异心，才让马苏德等外族人在1992年乘虚而入占领喀布尔。因此，那些归降塔利班的军阀也没有任何继续晋升的机会。阿富汗的知识阶层和技术精英同样无法得到塔利班的信任。塔利班反对西方和苏联教育体制，而这些人正是那个体制的产物。

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塔利班崛起。国外，北方强邻苏联



分崩离析；国内，圣战组织丧失民心，而旧有的部族体制也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已经布置完好，只等塔利班扫除残局，赢得普什图人的领导权。此后，塔利班的势力在普什图人之中完全一手遮天。他们本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改革，确立部落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重视草根基层的呼声。这样的行为既合乎伊斯兰教的要求，而且也顺应了人民的意志。但是，事实证明塔利班分子无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也志不在此。

塔利班不仅在普什图人之中厉行独断，对于那些外族势力，学生军更是拒绝与之协商和联络。塔利班虽然在阿富汗南部权倾一时，但如果不正视多民族聚居的现实，不建立合乎现实、受不同民族拥戴的集体领导方式，他们的权势断无可能延伸到这个国家的另一半土地上。事实上，塔利班的大权完全集中在所谓的“坎大哈帮”（Kandaharis）手中，其专制程度不下于红色高棉（Khmer Rouge）和萨达姆·侯赛因。

塔利班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最高舒拉，这个咨议机构一直位于坎大哈。塔利班最高领袖奥马尔也十分留恋这座城市，多年以来，他只离开过坎大哈一次（1996年前往喀布尔）。由于最高舒拉和奥马尔的存在，坎大哈是阿富汗实际上的权力中心。最高舒拉由奥马尔的亲信一手操控，他们大多出自杜兰尼部。人们习惯把这个以奥马尔为首的小集团称为“坎大哈帮”，虽然奥马尔的这些亲信中不乏赫尔曼德和乌鲁兹甘两省出生的人士。最初，最高舒拉只有10位成员（参见附录2）。但是，舒拉会议完全向军事指挥官、部落长老和教士开放，参与者多达50人，结构也十分随意和松散。

最初的10位舒拉成员之中，杜兰尼部占据6席，非普什图人的代表只有1位——来自巴赫达尚省的莫拉维·赛义德·希亚苏丁（Maulvi Sayyed Ghiasuddin），不过，这位塔吉克裔长期在普什图人聚居区生活。如果塔利班势力一直限于普什图聚居区之内，这种搭配尚算合理。不过，随着喀布尔和赫拉特先后落入塔利班之手，坎大哈舒拉也失去了广泛的代表性。连吉尔扎伊部出身的人士都无法在舒拉获取一席之地，更别提那些非普什图裔了。坎大哈舒拉仍然是“坎大哈帮”的小天下，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民意机构。

塔利班统治区还有另外两个舒拉，它们只是坎大哈方面的派出机构，随时听命于最高舒拉的意志。其中之一位于喀布尔，由政府部长组成，因

此被称为坎大哈舒拉；另外一个则是军事舒拉，又称军事委员会。1998年，喀布尔舒拉的17名成员之中，至少有8人来自杜兰尼部，3人来自吉尔扎伊部，只有两名非普什图裔成员。喀布尔舒拉的主要职责是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和市政问题，并掌管喀布尔附近的军事指挥权。不过，如果遇到重大问题，喀布尔方面会上报坎大哈舒拉，并由后者作决定。有时候，负责喀布尔方面事务的毛拉·拉巴尼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请示坎大哈方面，比如是否给予某位记者采访许可，或者联合国的某个援助项目。喀布尔舒拉虽然名为阿富汗政府，国家大小事务却都由坎大哈方面讨论处理。每次讨论都耗时日久，许多问题都一拖再拖，不能得到解决。

在喀布尔、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三座城市里，普什图人都并非人群中的大多数。不过，当地的一切大权——省长、市长、警察总长和其他各种官职都被塔利班信任的坎大哈帮完全垄断。这些城市主要通用达里语，但统治他们的塔利班分子却对这门语言不甚通晓，一窍不通的人也不在少数。塔利班设在当地的舒拉中，本地人虽然没被完全排斥，但始终不占多数。不过，塔利班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一点变通性。1998年，塔利班任命了11位省长，其中只有4人是坎大哈帮成员。^{【109】}按照阿富汗政坛的规矩，某一地区的省长和地方官员大多来自当地的精英阶层，各民族之间比例按照当地人口中的民族比例进行分配。塔利班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力安插外人介入各地政局。

不过，塔利班所任命的各位省长大多有名无实。他们一没有足够的金钱，二没有恢复经济、安定难民的能力，对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缺乏掌控力。奥马尔对这些地方大员也施以严格控制，不让他们有占山为王的机会。塔利班领袖常常把手下的省长们召去前线打仗，并且省长的人选也是常常更换。

1997年，塔利班在马扎里沙里夫遭遇惨败。此后，吉尔扎伊部出身的军官中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当时，吉尔扎伊部已经在塔利班军队里担纲主力，可出身该部族的军官一直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无法过问塔利班的政治和军事事务。马扎里沙里夫一役让塔利班赔上了3 000名精兵的性命，另有3 600多人被俘，10位高级军官或被杀、或被抓。因此，塔利班不得不向阿富汗东部的吉尔扎伊部求援。不过，塔利班只打算将吉尔扎伊人当作可驱使的兵源，并不准备为他们打开最高舒拉的大门。而吉尔扎伊部

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为塔利班做炮灰，纷纷当了逃兵。

塔利班的军事组织十分神秘。一切军事大权都掌握在奥马尔手里，但是，这位毛拉没有任何正式的军职在身。奥马尔的直接下级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然后是联席会议的各位将军。喀布尔附近至少驻有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的兵力。不过，塔利班没有一套明确的军衔体系，而各位一线指挥官之间也经常进行调换。1997年马扎里沙里夫大败之后，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北部只剩下昆都士一个据点。三个月之内，这支远征军的司令三易其人，一半以上的普通士兵也被调走，代以毫无经验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宗教学生。所谓的军事舒拉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专门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并对一些战略决定进行实施。不过，军事舒拉没有决策权，一切军国大事、重要决定、资金分配都由奥马尔一人决定。

虽然塔利班加大了统一征兵的力度，不过，不少地区的军官更习惯于自带子弟兵。他们自掏腰包提供军饷、搜集军需物资，并为部下的生死负责。因此，军官渴求一切战争物资——金钱、燃料、食物、交通、武器和军需，所有东西都需要军事舒拉一应提供。很多时候，一些士兵因为需要接受治疗而离开前线，他们留下的位置则由自己的家人替补。这在塔利班军队之中是常事。塔利班部队的规模通常在2.5万~3万人，不过，面对重大战役的时候，这一数字马上便可以急剧膨胀。1999年起，从巴基斯坦前来的宗教学校学生占据了塔利班总兵力的30%多。由于身份原因，他们的服役时间通常很短，常常是一批学生兵告假归去，另一批学生兵又补充前来。这和马苏德军队有着强烈反差，塔吉克军阀的常备军力在1.2万~1.5万人。相比之下，塔利班那种打零工式的募兵制度完全不能创建一支正规部队。

塔利班部队的组织和部落武装制度（lashkar）如出一辙，这也是普什图人的老传统，这种制度的动员能力极强，时而听命于王室，时而为了保卫部族势力范围而斗争，时而参与家族仇杀。参与其中的人都出于志愿，不接受任何金钱报酬，劫掠来的钱物归各自分配。当然，塔利班部队严禁劫掠行为。这种禁令一开始保持得很好，不过1997年在马扎里沙里夫的那场败仗让纪律完全崩坏。

大多数塔利班士兵并无军饷可拿。有些人可以在弃甲归家的时候拿到一份遣散费，不过，有些军官选择一毛不拔。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士兵倒是

可以领到一笔固定军饷。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那些参与过旧军队、经验丰富的老兵。其中包括坦克手、狙击手、飞行员和机械工兵，他们大多是雇佣兵，谁拿钱就为谁卖命，先后控制喀布尔的几位军阀都曾是他们的主人。

军事舒拉的几位成员同样也在政府内阁担任职务，他们的兼职行为更加搅乱了喀布尔的政局。穆罕默德·阿巴斯（Mullah Mohammed Abbas）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毛拉是塔利班政权的卫生部长，同时也在昆都士远征军中担任二把手。随后，他又被抽调到赫拉特前线。6个月之后，毛拉回到喀布尔继续卫生部长的职务。卫生部长本该负责联络驻喀布尔的联合国救援组织，但是阿巴斯这段颠沛的官场经历让联合国方面倍受冷落。毛拉·阿赫萨努拉·阿赫桑（Ehsanullah Ehsan）负责掌管国家银行的同时，还负责指挥一支千余人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全部由“坎大哈帮”组成，阿赫桑为之呕心沥血，银行的事务他倒是关心得不多。阿赫桑在马扎里沙里夫大败中被杀。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也在那场战斗中被俘，不过很快这位赫拉特省省长便被释放。自1994年开始，拉扎克就率领塔利班部队在阿富汗各地南征北讨。实际上，除了那些碍于身体残疾的人，喀布尔和坎大哈舒拉中的每位成员都曾经有过带兵打仗的战争经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塔利班的这种政治文化为自身提供了制度上的灵活性。塔利班领导人且官且将，可以和手下的士兵进行直接接触。不过，领导们身兼数职为塔利班政权的各级组织带来了不少麻烦，喀布尔各大部门尤其深受其害。试想，当一位部长在外边打仗的时候，他的属下自然不敢越俎代庖，下达指令。这种制度不可能培养出称职的部长，不过，也让试图割据一方、收买人心的军阀无所遁形。如果哪位部下权势膨胀，奥马尔一般会将其派往前线进行“隔离”，以观后效。奥马尔的手段为自己巩固了权位，却抽去了塔利班运动的主心骨，也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塔利班高度神秘的决策作风，不但让阿富汗城市居民疏而远之，国际社会、外国媒体和救援组织也是避之不及。入主喀布尔之后，塔利班政府一不准备成立联合政府，二没有提振经济的举措出台。他们的最大追求是国际社会的承认，不过，由于联合政府迟迟难以建立，后者对于塔利班的执政能力大为怀疑。舍尔·穆罕默德·斯塔纳克扎伊（Sher Mohammed Stanakzai）是喀布尔舒拉的发言人，专门负责与联合国援助组织和外国媒体打交道。斯塔纳克扎伊出身吉尔扎伊部，能说英语，待人接物的态度



在一千塔利班官员中比较温和得体。加入塔利班之前，这位来自卢格尔省（Logar）的发言人曾经在印度接受过警察培训。不过，斯塔纳克扎伊没有任何权力，他甚至不能直接联系到最高领袖，遑论为媒体传话之类的任务了。西方媒体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斯塔纳克扎伊的工作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塔利班加紧行动，在喀布尔大肆清除异己。自1992年以来，虽然城市几度易主，但下层官僚一直不变。塔利班的到来终结了不少几朝臣子的职业生命，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哈扎拉裔官员全部丢了饭碗，普什图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清洗行动让政府失去了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许多部门甚至因此停工。

塔利班的工作方式也让人摸不着头脑。根据规定，政府每天只工作4小时，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中午12点结束，无论时局如何一概不变。12点后的时间属于祈祷和午睡。晚上的时间主要用于开会，其中既有社交集会，也有一般会议。有一段时间里，办公桌里没有用于办公的文件，办公室里也没有正在办公的人员，各大部门都是一副如此的景象。这是因为几百名政府工作人员都加入了监督男性公民留胡子的运动之中，办公室里自然没有人回答市民的质询。塔利班越来越像一支占领军，而不是试图赢取民心的政治组织。普通百姓对他们完全失望。

塔利班政权什么时候成立联合政府？塔利班政权什么时候会制定宪法？塔利班政权什么时候进行分权？这些问题摆在塔利班当局面前，要求他们立即给出准确的时间点。对于这些问题，塔利班领导人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位部长认为：“塔利班希望和反对派谈判。不过，谈判应该禁止政党参加。虽然很多塔利班人员都有参加政党的经历，但是伊斯兰教是严令禁止政党活动的。”另一位部长的意见则是：“国家实现和平之后，人民便可以自由选择政府。不过，反对派首先必须放下武器。”另一些塔利班官员更为极端，他们希望本组织垄断政府大权。^{【110】}

1996年之后，塔利班的一切权力实际上完全集中到奥马尔的手中，坎大哈舒拉辩论的次数越来越少。对此，奥马尔的心腹助手瓦基尔并不讳言：“一切行动都由‘信徒的领袖’下决定。所谓咨议机构在我们这里都是不必要的。我们相信，这一切合乎伊斯兰教法。领袖的决议一定是正确的，哪怕那只是他的独家观点。阿富汗不会有国家元首，我们有信仰者领袖就行了。他就是最高的决策者，他反对的东西政府绝不会通过。所谓的

普选完全违背伊斯兰教法，应该坚决禁止。”【111】

奥马尔的决定的首要贯彻者并不是喀布尔政府，而是坎大哈的教士和喀布尔的宗教警察。莫拉维·赛义德·穆罕默德·帕萨纳伊（Maulvi Sayyed Mohammed Panasai）是奥马尔的重要谋士，在抗苏战争时期，他曾经是塔利班领袖在伊斯兰教法方面的启蒙教师。帕萨纳伊宣称，塔利班要用宗教法律结束阿富汗的无法治状态。

1997年，这位顾问曾经告诉笔者：“我们已经在13个省设立了高等法庭，并配备了大量法官。有伊斯兰教法的地方，就有和平和稳定。”【112】帕萨纳伊已经年届八旬，这位老人自称是一位伊斯兰教法体制下的行刑人。这份工作他已经在农村地区干了近50年。早在抗苏战争时代，帕萨纳伊就在积极推动各个圣战组织实行教法统治。

位于领袖脚下的坎大哈伊斯兰高等法院是塔利班统治区最重要的宗教法庭。法庭负责宗教法官的任命事宜。每隔一到两年，各省的助理法官都会齐聚坎大哈，讨论案例，研究伊斯兰教法的实行问题。喀布尔是法务部和最高法庭的所在地，这里也有一套和坎大哈如出一辙的宗教法律体系。喀布尔最高法院每周处理40个案子，下设8个部门，宗教法律涉及贸易、商业、罪犯和民法等多种方面。不过，他们在权限上仍然不及坎大哈方面。塔利班政权的总检察长莫拉维·贾利鲁拉·莫拉维扎达（Maulvi Jalilullah Maulvizada）介绍说：“我们正致力于法律伊斯兰化的进程。那些和伊斯兰教相悖的法律都必须被废除。我们正在对所有法律进行检查，以确定其存废，整个过程可能耗费数年。”【113】

此后，塔利班连遭打击，控制区的经济陷入困境，政治陷入孤立，军事上又连吃败仗。塔利班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大。1997年1月，塔利班强征兵员引发暴乱，这次起义就发生在坎大哈附近，直逼塔利班政权的心脏地带。一场武力冲突之后，双方各有死伤，塔利班势力被迫退出许多村子。村里的长者认为，年轻人为塔利班打仗只有死路一条。一位长者说：“塔利班口口声声要和平，结果给我们带来的却只有战争。”6月，塔利班在坎大哈处决了6名逃兵。瓦尔达克和帕克提亚两省也爆发了反征兵斗争。【114】强制征兵让塔利班更加不得民心，坎大哈方面只得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和难民营里寻找人手。【115】

坎大哈和喀布尔两大舒拉之间一直有些小摩擦。1998年4月，小摩擦突



然演变成了大冲突。当时，美国特使比尔·理查德森刚刚结束阿富汗行程。喀布尔舒拉的首领毛拉·拉巴尼全盘接受了美国人的提议，不过，奥马尔等人在第二天就予以否决。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拉巴尼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有传言这位塔利班里的二号人物已经遭到逮捕。1998年10月，塔利班政权在贾拉拉巴德拘捕了60多人，他们宣称，有人在这座阿富汗东部的最大城市策划军事政变，策划者多为退役军官，都是沙阿纳瓦兹·塔纳伊（Shahnawaz Tanai）将军的手下。1990年，塔纳伊主动脱离纳吉布拉政权投靠圣战组织。1994年之后，这位将军的许多部属开始在塔利班军队中服役。^{【116】}12月，楠格哈尔大学医学系发生学潮，塔利班予以武力镇压，打死一名学生，并造成多人受伤。如此暴行在贾拉拉巴德引发了抗议游行。

拉巴尼的支持者在贾拉拉巴德很有势力，此地的反抗风潮似乎也有他们煽动的功劳。当地的走私大亨也希望塔利班放宽政策。贾拉拉巴德骚乱之后，拉巴尼被召回坎大哈，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好几个月。1998年之前，喀布尔舒拉是塔利班中的温和派阵地，他们希望联合国救援组织重回喀布尔，阿富汗的各大城市能得到更多的援助物资。由于物价持续走高，食物短缺情况严重，而援助物资又迟迟不到位，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舒拉的地方大员都能感觉到民怨在沸腾。尽管如此，奥马尔等塔利班中央领导人都拒绝联合国的深入援助，他们的冷漠态度差点让联合国拂袖而去。

1998年和1999年之交那个冬天的经济形势和天气一样糟糕。连塔利班士兵也能感到寒冬的煎熬，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涉嫌抢劫。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案件发生在1999年1月，6名士兵遭到严惩，被迫献出了自己的右手和左脚，供官方悬挂在树上警示众人，直到这些残肢腐烂为止。观点的不同让塔利班内部嫌隙多多，甚至有引发内部武装冲突的可能。不过，奥马尔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可以借此掌控局面。

最终，塔利班必须靠个人专制维持组织的平衡，他们没有组织机制，对其他民族和观点也缺乏容忍。这一切跟10年前的圣战组织是何其相似。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的矛盾更多在台面下发生，毕竟没有哪一位塔利班领导人愿意开罪奥马尔。这种涌动的暗流很可能让塔利班四分五裂，陷入武装内斗。普什图人内部将再次分裂，而人民的苦难也会更加深重。

第 8 章

消失的性别:女性、青少年和塔利班的文化政策

莫拉维·卡拉穆丁 (Maulvi Qalamuddin) 在喀布尔的办公室非常狭小，其中的陈设少有人能够一窥究竟。实际上，有一半的阿富汗人基本跟这个地方绝缘，因为主人不允许女性进入他的领地。卡拉穆丁身材魁梧，手脚粗大，有一个长长的大鼻子和一对黑眼珠。他那把胡子又长又乱，谈话当中常常和桌面发生接触。卡拉穆丁在喀布尔非常有名，人们对他那副身板望而生畏，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皮发麻。作为本地宗教警察的头子，卡拉穆丁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改变了喀布尔人的生活方式。这里原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但是现在街头已经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卡拉穆丁是“促进道德反对陋俗工作部”(Amar Bil Maroof Wa Nahi Anal-Munkar) 的主要领导。不过，他本人更喜欢将自己的部门的英语译为“宗教监察部”(Department of Religious Observances)。卡拉穆丁手下的警察多达数千，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手持皮鞭、棍子甚至冲锋枪在大街上巡逻。卡拉穆丁很少接受采访，1997年夏，笔者有幸得到一个和这位宗教警察头子对话的机会。我还记得，当天卡拉穆丁又签署了几项限制妇女行动的禁令——不准穿高跟鞋，不许化妆，走路的时候用鞋跟磕出声音的行为也在被禁之列。禁令原文如下：“医院中禁止着所谓时装，禁止化妆。妇女行为应当自重，走路时应保持安静，严禁用鞋跟磕碰地面，制造噪音。”讽刺的是，喀布尔的妇女都依照塔利班消失的性别女性、青少年和塔利班的文化政策的要求穿上了布尔卡 (Burqa) 罩袍，从头到脚包裹得

严严实实，宗教警察如何能透过这层黑布看到高跟鞋和化妆的痕迹？这一点颇费思量。（参见附录1）

此外，那天颁布的新禁令还正式禁止妇女外出工作，连为西方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服务也不行。当然，援助组织的医院部门是唯一的例外。禁令就此规定道：“妇女禁止外出工作，医院职务不在禁止之列。但是，从事医院工作的妇女不能坐在司机身边。阿富汗妇女不得和外国人同乘一车。”除了医院，喀布尔的中小学也是妇女工作者的天下。由于卡拉穆丁的禁令，整个教育行业面临停摆，而阿富汗的下一代也将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许多家庭逃离喀布尔的原因，不过是为自家的小孩找到一所上学的学校而已。

采访当中，笔者曾向卡拉穆丁请教塔利班为何选择剥夺妇女的工作权和教育权。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很是战战兢兢。不过，虽然卡拉穆丁身型有些吓人，一张口却和其他毛拉一样地轻言细语，我必须踮起脚尖才能捕捉到他的声音。卡拉穆丁基本上重复了其他塔利班官员常说的那一套：“如果我们不开展妇女教育，肯定会招人唾骂。不过，目前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他还强调：“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此外，妇女教育需要专门的交通工具、专门的校舍和基础设施。这些东西，目前我们一应俱全。男女大防必须得到保证。我们之中有许多败类不知道如何与妇女礼貌相处。苏军入侵让200万同胞殒命，这都是伊斯兰教法缺位的恶果。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沙里亚国家，塔利班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我的目标也是如此。”

塔利班进驻喀布尔之处，宗教警察常常在街上截获“罪犯”，并对这些胡子不够长的男人或罩袍穿错了的妇女公然施以殴打。对于这种情况，卡拉穆丁也进行了辩白。他说：“我反对我的下属在公开场合打人。我们只是规劝人民按照宗教法律生活。比如，你先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擦撞事故，我们只不过请你下次不要再犯而已。”说到这里卡拉穆丁不由得咧嘴一笑，对自己这番现代感十足的比喻非常满意。

塔利班宗教警察完全模仿沙特阿拉伯的同类部门行事，这些警察都是年轻人，他们大多读书很少，只不过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里受过一点教育而已。宗教警察同时也担任收集情报的任务。在这方面，塔利班的模仿对象居然是80年代傀儡政府的情报机构“阿富汗保安局”（KHAD），这

个简称“卡德”的特务组织后来改称“瓦德”，旗下间谍众多，人数在1.5万~3万之间，此外，还有10万多线人随时待命。^{【117】}卡拉穆丁向笔者坦承，自己的信息来源千奇百怪，涉及方方面面，军队、政府、医院和西方援助机构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在宗教事务方面经验丰富。机构的独立性很强，法务部和最高法院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听从‘信徒的领袖’毛拉·奥马尔的指挥。”

沙里亚电台（前喀布尔电台）是卡拉穆丁的喉舌，常常为宗教警察发布禁令，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参见附录1）下面这条禁令清楚地显示了塔利班对观看体育活动的种种要求：“所有观赛者若要为参赛者加油，须高喊‘真主至大’（Allah-o Akbar）。如遇祈祷时间，比赛应立即停止，所有参赛者和观赛者应就地完成祈祷。”放风筝是喀布尔市民的一项春季游乐，如今也在塔利班禁止之列。妇女参加的一切体育活动也被一并废除。

塔利班的这些禁令毫无道理，在古兰经中完全找不到根据。不过，塔利班分子规定，任何对禁令的质疑都等于对伊斯兰教本身的质疑。实际上，先知穆罕默德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妇女。布罗代尔的话可以为之佐证：“毫无疑问，伊斯兰教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解放妇女。这个目标一开始就已经阐明，并且正在实现的过程中。”^{【118】}不过，塔利班严禁广大穆斯林对自己的禁令说三道四，更反对人们对古兰经提出不同于自己的见解。对于那些外国人，一句“你不是穆斯林，所以无权讨论我们的宗教”就可以让他们闭嘴。总之，塔利班自命一贯正确，他们对于古兰经的释义也是处处正确。不同于他们的意见统统是谬误，是人性弱点的表现，也是缺乏虔诚的反映。塔利班政权的总检察长莫拉维·贾利鲁拉·莫拉维扎达说：“我们不需要宪法，因为沙里亚就是宪法。人民热爱伊斯兰，所以他们都支持塔利班。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表示支持和欣赏。”^{【119】}

阿富汗社会和妇女面临的苦境并非塔利班一家的作用。二十年的战争下来，阿富汗的公民社会和部族体系只剩下一片废墟，一个个的小家庭濒临破碎。面对经济形势的凄风苦雨，阿富汗人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这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末流，每1 000个新生儿中便有163人死亡，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不过是7%。四分之一的孩子没能活到15岁，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一指数不过是10%。

此外，阿富汗每10万孕妇中就有1700多人死于难产。阿富汗的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43岁和44岁，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达到了60岁。在阿富汗，只有29%的人活到了60岁。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数达到80%。只有12%的阿富汗人能享受干净的饮用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指数为70%。其实，许多孩子的死因不过是一点小病，一场麻疹和一次腹泻就能要一个孩子的命。这一切都反映了卫生机构和干净饮水的缺失。【120】

塔利班崛起之前，阿富汗有着惊人的文盲率。90%的女孩一字不识，而60%的男孩和她们同病相怜。战争中，阿富汗农村地区的学校遭受了大劫难，整个系统完全崩溃。塔利班歧视女性的政策让情况更加糟糕。喀布尔失陷3个月之后，塔利班就关停了当地的60所学校，10.3万名女生、14.8万名男生和1.12万名教师（其中7800名为女教师）遭受波及。【121】喀布尔大学也被迫停学，1万多名学生被遣散，其中包括4000多名女大学生。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8年12月的报告，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已经完全崩溃，女孩之中，十有九人未能就学，同时三分之二的男孩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122】

阿富汗人在遭受苦难，外界却对此长期忽略。80年代的抗苏战争期间，外国人在这里大把投钱。苏军撤离后，这个国家就从雷达屏幕上失踪了。从此之后，外国援助变得杯水车薪，尚不足人道主义援助应有的零头。援助由此变成了一次丑闻。1996年，联合国驻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款应为1.24亿美元，不过，直到年底，只有6500万美元到位。1997年，联合国的要求是1.33亿美元，不过只有42%即5600万美元到账。1998年1.57亿美元的预算也只有34%（折合5300万美元）兑现。1999年，联合国突然调低价码，只开出了1.13亿美元的预算，学者巴内特·鲁宾评价道：“如果说阿富汗的现实很丑陋，这种丑陋并不是来自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不但是阿富汗人的镜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一面镜子。波斯谚语有云：‘如果你不喜欢你在镜子里的形象，请不要砸烂镜子，因为那样只能划破你的脸。’”【123】

而喀布尔的妇女们照镜子的时候，只会看到一片愁云惨雾。塔利班来不来，情况都是一样的糟糕。1996年，笔者在喀布尔的一处小食品店里结识了毕比·左哈拉（Bibi Zohra）。这个小店是这位寡妇的全部家当，她带领着一群妇女专干烤馕的生意，为寡妇、孤儿和残疾人提供食物。世界粮

食计划署庇护了40万喀布尔市民，其中包括2.5万个寡妇家庭和7 000个只剩下残疾人的家庭。左哈拉那张泥做的饕坑上满是炮火弹痕。1993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的火箭炮第一次在饕坑上留下了痕迹，其后的损伤则来自两年之后的塔利班。

左哈拉有6个孩子，他们都在母亲身边帮忙，左哈拉的父母也很支持女儿的事业。左哈拉甚至将自家那份薄地捐献出来，为世界粮食计划署作饕房之用。老板娘对笔者说：“看看我这张脸。这上面满是我们家庭和国家的悲剧。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我们只靠联合国的施舍过日子，跟乞丐差不多。这不是阿富汗的道路。女人在这儿过得很苦，累得要死。我们只想过安稳日子，天天都在为和平祈祷。”

左哈拉的孩子们的命运比他们的母亲更为悲惨。这是一片“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修建的操场，背后就是破败的米高扬大楼（Mikoyan Building），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新建的秋千上玩得正开心。这片操场上充满了战争遗留下的纪念品，炮弹弹壳到处都是，一辆坦克已经废弃，炮塔上还有个窟窿，许多树木都曾经遭受火箭炮轰击之苦，枝叶败落。

“救助儿童会”的主管苏菲·艾里欧森（Sofie Elieussen）认为：“妇女儿童在阿富汗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冲击。这里食物稀缺，营养不良的情况十分严重，母亲们对此自然十分忧心。阿富汗妇女深受歇斯底里症、精神创伤和抑郁症的困扰。她们不知道下一次火箭袭击会在何时到来。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大人在杀戮，而他们的母亲无法满足自己的最低需求，阿富汗的儿童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知道这会给他们带来何种冲击。更糟糕的是，阿富汗的儿童互相并不信任，而父母也从不跟下一代交流，甚至从不给自己的孩子解释如今这一切的成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权莱拉·古普塔（Leila Gupta）博士主持的一项调查计划反映了阿富汗青少年面临的困境。大多数孩子都有直面暴力的经历，他们当时都不指望能够生还。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曾经目睹火箭袭击的惨状和破碎的尸块。70%的儿童失去了亲人，并从此不愿相信成年人。古普塔认为：“他们被可怕的回忆、梦魇和孤寂深深困扰。许多人说他们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家庭的价值被战争碾得支离破碎。当孩子不愿相信父母，或是父母无力保护孩子的时候，孩子往往会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



阿富汗战争中，儿童所遭遇的苦难远甚于世界上其他战场。军阀们都喜欢驱使娃娃兵为自己卖命。其中最小的孩子不满12岁，他们大多是孤儿，对于家庭、教育都已经不抱希望，他们也无力幻想有一份安定营生，只得为军阀去当炮灰。塔利班也是娃娃兵的使用者，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数千名未成年人，充当战争机器。这些孩子们甚至可以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负责运送炮弹、押运军需、修筑工事甚至直接上战场搏杀敌人。1998年，国际上爆发一场反娃娃兵风暴。当时，国际上关于“娃娃兵”的年龄定义为小于15岁的未成年人，而抗议人士提议将这一标准提升到18岁。美国、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对此表示反对。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年的报告指出，当时全球一共有30万小于18岁的未成年人被迫从军。^{【124】}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妇女儿童的日子更加难过。

1995—1996年期间，记者曾在喀布尔采访过不少女性市民。当时，妇女还没有从喀布尔大街上绝迹。女士们都明白，如果塔利班占领这个城市，本就困窘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糟糕。纳茜芭·古尔（Nasiba Gul）的意见很有代表性。这位容貌秀丽的27岁单身女性对现代事物很感兴趣。

1990年，纳茜芭毕业于喀布尔大学。采访她的时候，纳茜芭正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业绩十分突出。这位职业女性当时身着一袭长裙，脚踏高跟鞋。当她在城市中穿梭的时候，头上只是马马虎虎地系着一张手帕。很明显，纳茜芭不想遮住自己那张俏脸。她认为：“塔利班所做的就是践踏妇女的人权。没有女人欢迎他们上台执政，那些最为贫穷、最为保守的都不会。伊斯兰教认为男女平等，女性应该得到尊重，塔利班的行径甚至让人们对教义产生了不敬之心。”纳茜芭的担心不幸成真。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全体女性市民都被撵回了家。纳茜芭的事业也无法继续，她不得不逃到了巴基斯坦。

塔利班领导人都来自阿富汗南部，他们的家乡多集中在全国最为贫穷、最为保守、文盲率稳居全国前三的三个省份之中。在奥马尔出生那个小村子，妇女出门必须穿上罩袍，而且女孩子基本都没上过学，因为当地没有任何学校。奥马尔和他的同僚们有着困苦和惨淡的童年，他们和女性之间的接触也少得可怜，甚至为零，这样的经验被塔利班化为政策，并推广到了全国各地。为了解释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塔利班分子甚至动用了古

兰经。不过，阿富汗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极大，民族传统也各不相同，各地之间妇女参与社会的程度自然也大不一样，不存在一个恒定的标准。塔利班分子强制推行布尔卡罩袍和胡须的政策，也完全出于突发奇想，并非阿富汗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行为。

阿富汗南部的保守氛围并不能得到其他地方人民的认可。聚居在东部的普什图人观念就大不一样。这里的人深受巴基斯坦影响，对女孩接受教育一事十分开明，甚至为之骄傲。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东部后，仍有不少当地人坚持将家中的女孩送去乡村学校，或者直接送到巴基斯坦继续学业。在瑞典委员会等援助组织的帮忙下，600多所小学中的15万学生得到资助，其中有3万多名女学生。普什图部落长老坚持为女学生提供教育，塔利班官员虽然不满，却也无能为力。^{【125】}

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中，数以千计的小女孩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普什图人聚居区外的各民族更是鼓励女子教育。阿富汗的民族多元文化是一种力量，这里的民族和部落多如繁星，而妇女可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是一样的浩如星海。

阿富汗的城市地区的文化色彩更是多元，妇女地位也更高。虽然坎大哈民风保守，赫拉特却曾经有过一个摩登的妇女阶层，她们说法语，对德黑兰和王室的时尚风潮亦步亦趋。在喀布尔，40%的妇女都有工作，这一数字在傀儡政府时代和拉巴尼时代都未曾改变。这里的妇女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稳定的工作，她们习惯穿超短裙、高跟鞋和使用化妆品，对于电影、体育、婚礼上的歌舞等活动有着很高的积极性。满足这些需求，才能赢取她们的心。入主这样的地区之后，塔利班本应该放宽自己的性别政策。不过，在塔利班分子眼中，喀布尔是一座罪恶之城，如同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淫乱放荡。因此，宗教警察必须要给这些娘们儿一顿好打，让她们用塔利班的方式走路、说话、穿衣。至于阿富汗北部，塔利班认为那本就是异教徒的天下，当地的伊斯兰信仰亟须经历一场“净化”。

塔利班从不妥协，这种态度来自这个组织内在的政治生态，也由其成员的本性所决定。塔利班分子大多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是一群混迹在战场和难民营之间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的成长环境中几乎没有女性。在宗教学校里，针对女性的一系列严苛规定都体现了男权的威严，也是学生们内心圣战的必要手段。因此，塔利班式社会对妇女的拒绝，无疑是为了满足

其在思想上的合法性。阿富汗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西米·瓦里（Simi Wali）认为：“塔利班反妇女的行径植根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并非教义或文化的产物。塔利班分子是在战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男性。成年以后，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和社会的格格不入。阿富汗社会中，妇女常常扮演着纠正社会行为的角色，因此，她们是阿富汗文化中的权力符号。”【126】

对于妇女问题，塔利班分子有一套固定的说辞。他们认为，如果自己给予妇女更多行动自由或接受教育的机会，就等于面对压力而妥协，从而失去原有的支持者。塔利班方面还称，解放妇女会导致士兵阶层的腐化。到时候，塔利班新兵们的脑子都会被性幻想占据，不会再有战斗的热情。压制妇女俨然成了塔利班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基石，是保障士气、“洁净”社会环境的必要手段。性别政策也是联合国及西方世界和塔利班角逐的主要战场，前者一直试图改变或软化后者的所作所为。而对于后者来说，妥协就是失败，坚持才代表着胜利。

塔利班强硬派分子对外界的批评十分不满。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应该放低身段积极接受塔利班，而塔利班没有义务承认普世人权。总检察长贾利鲁拉表示：“我们要看清联合国所谓的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异教徒的阴谋，他们给予妇女的那种自由只会导致通奸行为和伊斯兰教的崩坏。试想，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境内通奸行为泛滥成灾，必然国将不国，沦入异教徒的掌控之中。到时候，我们的男人将失去男子气概，而女人也无法保护自己。外界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进行。神圣的古兰经不可能为了外人的要求而改变，人们只能按照古兰经的要求而改变自身。”【127】至于伊斯兰教如何败坏在通奸者手中，塔利班分子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普什图部族会议制（Pashtunwali）是普什图人传统的议政方式，在这种制度下，每个部落通过各自的支尔格决定大小事务，作出赏罚决断，遇到土地归属、婚嫁争议和谋杀等棘手问题时，支尔格的决定尤其重要。部落会议制和宗教法律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而塔利班的各种刑罚更多地取材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不过，各地的部落会议制度形式并不一样，在普什图聚居区之外更是毫无影响力。塔利班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强制推行部落会议制和所谓的伊斯兰教法，只能加剧民族之间的冲突和隔阂。而所有

非普什图裔的阿富汗公民都把塔利班看作坎大哈地方军阀推广自身影响力的工具。

塔利班在性别政策上的顽固态度可以用雷打不动来形容。每逢军事上遭遇惨败，坎大哈军阀都会收紧政策的锁链。塔利班高层一贯认为，迫害妇女是保持士气的好办法。捷报和胜利带来的政策后果也是一样的，因为塔利班当局需要对新领地的人民进行一番宗教法律教育。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软化”塔利班的性别政策，其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塔利班分子虽一直承诺要在战争结束后给予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不过这种承诺也渐渐变成了一场空。1995年赫拉特的失陷便是一个昭告世人的信号——塔利班绝不会在性别事务上妥协。赫拉特这座中世纪的清真古城，虽然庙宇和宗教学校遍布大街小巷，却一直有着宽松自由的氛围。这是一个艺术和手工艺之都，细密画、音乐、舞蹈和地毯闻名遐迩。当地女子更是以美丽多情而著称，关于她们的风流传说数不胜数。

时至今日，赫拉特人对古哈尔·沙阿·德王后的一桩轶事仍然是津津乐道。这位跛子帖木儿的儿媳妇在公公去世后把帝国的首都从撒马尔罕迁到了赫拉特，那是1405年的事情。据说有一天，王后去城郊参观清真寺，顺便去附近的宗教学校看看，200位“樱唇娇艳欲滴”的侍女随行前往。为了回避一干女流，宗教学校早早宣布放假，学生各自回家。不巧，一位塔利卜睡过头误了归期。当他猛然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身边站着一位美娇娘。她便是王后身边那200位侍女之一。一段时光过后，侍女匆匆离去，回到了队伍当中。王后立马发现这位部下有点不寻常，只见她娇喘连连，衣衫凌乱，显然刚刚经历了好一番风流快活。宽仁的王后并没有责罚侍女，也没有降罪于那位学生。反而主动成就这一对佳偶，并用一场盛大的婚礼告诫两位年轻人杜绝诱惑的道理。婚礼上，古哈尔赐给新人锦衣和金钱。而且王后还勉励那学生用功读书，因此只允许两人每周相会一次。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它们充分地反映了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人文和自由传统。

这样的地方掌故，塔利班分子显然没有听过，他们对赫拉特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只知道把妇女赶回家中去。赫拉特有着深厚的苏菲派传统，人们习惯去苏菲派先哲的祠堂前追思怀古，如今，这种习惯和传统也被塔利班粗暴地禁止了。伊斯梅尔·汗盘踞赫拉特多年，一直在当地推行教育。他的努力一夕之间便被塔利班破坏大半。后者关停了所有女子学校，

男校也因为女教师被锁在家中而纷纷停课。仅有的几家医院被迫关门，公共浴室禁止开张，女性不得出入集市。赫拉特的妇女们忍无可忍，她们成了这个城市中公然反对塔利班的第一群人。1996年10月17日，100多名妇女在省长办公室外抗议塔利班关闭公共浴室的行为。宗教警察对这群妇女一顿好打，随后将她们统统收监。然后，警察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禁锢妇女的必要性。

这次事件并没能引起国际媒体和联合国方面的关注。不过，当地的几家西方非政府机构意识到了塔利班政策的凶险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为此和塔利班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也没能为赫拉特的年轻女性争来受教育的权利，当地的教育援助项目被迫延期。^{【128】}这些项目迟缓的进展并没能吓阻塔利班，阿富汗军阀意识到，各大援助机构并不想为性别政策和他们闹僵，因此更加地有恃无恐。更有甚者，塔利班方面巧妙地耍了一个手腕，让各大援助机构互相牵制。他们和联合国各大机构逐个对谈，使得对方无法形成合力，而联合国方面只能选择妥协，塔利班迫害妇女的气焰愈加嚣张。一家欧洲非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告诉笔者：“联合国掉进了一个泥潭。他们以为一些小小的妥协能换来对方的欢心，也能使国际社会高兴。事实上，这种行为只能同时开罪塔利班和国际社会。”^{【129】}

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世界终于看清了他们在性别政策上的丑陋面目。世界媒体将塔利班虐杀纳吉布拉和迫害妇女的行径公之于众，联合国也无法继续沉默下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带头对塔利班表示谴责，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欧盟人权事务官员等各界名流也纷纷跟进指责。不过，塔利班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130】}他们关闭了喀布尔所有的美发店、美容店和女子公共浴室。要知道，浴室是当时喀布尔唯一还能提供热水的地方。

裁缝们也收到警告，禁止为女客人量体度身，一切身体数据只能靠记忆完成。各种时尚杂志也被销毁。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染指甲、拍快照、吹口哨、拍巴掌、请外国朋友喝茶……这些事情统统有悖塔利班的规矩。”^{【131】}

喀布尔事件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联合国一直在塔利班问题上无所作为。妇女权益团体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联合国各部门被迫起草了一份联

合声明，强调“维持和促进全体人类平等和尊严”以及“杜绝性别、种族、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歧视行为”。^{【132】}不过，声明中还宣称“我方尊重不同地域的不同风俗”。实际上，联合国表达了妥协的意愿，而塔利班方面也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将在战争结束之后给予妇女教育权。不过，联合国原计划开展8个旨在促进喀布尔妇女收入的援助项目，可是塔利班已经禁止当地妇女参加工作。1996年10月，这些项目被迫全部延期。

此后的18个月内，塔利班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走过了一轮又一轮，都没能得出任何结果。坎大哈的塔利班强硬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决定将联合国的势力从阿富汗完全清除出去。在此期间，塔利班的严苛政策变本加厉。原本还能苟延的家庭学校也被迫关闭，女学生失去了最后一处接受教育的阵地。此外，妇女还被禁止进入公立医院就医。1997年5月，宗教警察殴打了美国非政府机构“救护国际”（Care International）的5名女性工作人员，此后又规定各家援助机构必须接受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内政部、卫生部和宗教警察的联合检查。随后，所有为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女性穆斯林必须由男性亲属陪同，方可来到阿富汗工作。1997年7月，塔利班强令所有35家联合国和非政府援助机构搬出原来的办公楼，迁往破败的综合技术大学安家。为此，欧盟暂时冻结了对阿人道主义援助，而联合国和各大非政府机构干脆从喀布尔撤离。

阿富汗妇女深受塔利班迫害，城市里的阿富汗男性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那些非普什图裔，更是备受煎熬。塔利班规定，喀布尔所有成年男性必须在6个星期之内蓄须，这可难为了哈扎拉人，他们的胡子本来长得就慢。根据规定，男子的胡须必须长过一个拳头。据称，假胡须已经成为阿富汗最大宗的进口项目，而外国人来阿富汗甚至不用护照，只需要亮出一副美髯即可，这当然是个笑话。宗教警察尽职地守候在街口，他们手中的剪刀随时准备消灭那些多余的毛发，而违反发禁的人通常也会被一通好打。

喜欢穿着灯笼裤的男士也必须作出妥协，保证裤管高过踝关节。至于一天五次的祈祷，更是马虎不得，必须严格执行。

塔利班对于同性恋行为更是严惩不贷。坎大哈的普什图人中一度流行变童。军阀们的这种癖好也是奥马尔等人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不过，同性恋行为禁而不绝，对相关人等的惩罚方式也颇为怪异。1998年4月的喀



布尔，2名塔利班士兵被发现同性恋行为，遭到拘捕。两人先是遭到殴打，后来又被五花大绑，装在皮卡车上游街示众。两名犯人的脸还被机油涂得黢黑，以示惩戒。至于那些犯有鸡奸罪的罪犯，他们面临的惩罚和墙有关，从墙上面落下的石头会打在他们身上，从而将他们活活埋葬。这种“伊斯兰”式的刑罚真是闻所未闻。

1998年2月，三名被控犯有鸡奸罪的人在坎大哈被处以死刑。随后，三人被押送到一堵泥砖墙跟前。一辆坦克呼啸而来，三人被埋到了瓦砾堆中。一个半小时之后，一名犯人居然奇迹般地生还。塔利班官方报纸对此事有报道：“尊敬的‘信徒的领袖’（奥马尔）亲临法场，对三名不法之徒执行死刑。”^{【133】}1998年3月，另外三名犯人死于同样的刑罚。毛拉·穆罕默德·哈桑的一番话简要地总结了塔利班内部对于这件事的讨论：“我们的宗教学者并不认同原有的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处罚方式。一些人认为，这三个人犯应该被带到山崖上摔死。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应该被活埋在墙根边。”^{【134】}

对于一切娱乐活动，塔利班也采取扫除的态度。在阿富汗这样一个贫穷而又不平安的国家里，娱乐资源本来就少之又少。阿富汗人原本喜爱看电影，可是塔利班将电影、电视、录像带、音乐和舞蹈一并驱逐出了他们的生活。哈桑曾经向笔者表达了他的娱乐观：“我们知道人民需要休闲活动。他们完全可以去公园散散步，欣赏一下美丽的花朵，从中肯定能感悟出一番伊斯兰的真谛。”^{【135】}塔利班的教育部长毛拉·阿卜杜尔·哈尼非（Abdul Khanifi）则认为，塔利班禁止音乐的原因在于“音乐在头脑中制造的旋律打扰了伊斯兰学习”。婚礼上也失去了歌声和舞蹈的身影，要知道，上百年来，许多艺人都靠在婚礼上表演养家糊口。禁令一下，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国，前往巴基斯坦。塔利班还严禁每户人家在家中悬挂画像、画作和照片作为装饰。穆罕默德·马沙尔（Mohammed Mashal）是阿富汗著名的美术大师，这位82岁老翁的壁画展现了赫拉特500年来的演变沧桑。塔利班居然当着老人家的面将他的心血从墙上抹去。塔利班没有尊重文化的概念，就连一年一度的纳吾肉孜节（Nawrouz）也成了反伊斯兰活动，遭遇被禁止的命运。纳吾肉孜节又称波斯新年，塔利班得势之前，人们通常在这一天走亲访友。同时，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因为有社会主义色彩而被禁绝。什叶派悼念先贤的阿舒拉节（Ashura）自然也不可能继续存在。甚至伊斯兰教

最重要的开斋节（Ramadan）上的各项庆典活动也遭到了严格限制。

伊斯兰世界从来没有对塔利班的倒行逆施作出一丝谴责，阿富汗民众因此十分愤懑。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各国从来没有为阿富汗的妇女教育问题和人权任务作出任何呼吁，也从未对塔利班曲解伊斯兰的行为表示质疑。亚洲的其他伊斯兰国家也一直保持缄默，倒是伊朗方面多次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塔利班迫害妇女。早在1996年，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詹纳提（Ayatollah Ahmed Jannati）就曾经指出：“通过一系列的僵化政策，塔利班禁止妇女就学和工作的权利。而且，这一切都打着伊斯兰的名义得以进行。他们滥施暴力、思想狭隘、迫害妇女而且污蔑伊斯兰思想的名誉，真是罪大恶极。”^{【136】}1998年马扎里沙里夫惨案发生后，伊朗方面更是连发二十条声明，严厉谴责塔利班杀害伊方外交人员的行为。

马扎里沙里夫是拉比亚·巴尔西（Rabia Balkhi）长眠的地方。这位美丽的诗人生活在中世纪，有着悲剧性的一生。在那个年代，巴尔西是第一位用波斯语写诗的女性，她的诗作主要表现爱情。后来，诗人和一名奴隶相爱，并因此送掉了性命。巴尔西的兄长割断了妹妹的手腕，在血泊之中，诗人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首作品。几个世纪以来，乌兹别克的少男少女们都把巴尔西墓当作圣地，他们认为，诗人会保护自己恋爱之路一帆风顺。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之后，巴尔西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段爱情的传说也就此告终。

第 9 章

海洛因之惑：毒品和塔利班的经济政策

距坎大哈市中心两英里的地方有一片望不到边的罂粟田。农民们小心翼翼地在田间劳作，精心护理那一片片又嫩又绿，形同莴苣的罂粟叶。几个星期之前，这些罂粟刚刚在这里生根发芽。一开始，他们仔细翻锄土地，清理杂草，播撒农药，被苏军破坏的水渠也得到修缮，农田重新获得水利供应。几周之内，绿叶发芽，绚丽的罂粟花绽放开来。花瓣凋谢之后，一个硬状花囊显出样貌。

四个月后，便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民们用自制的窄小刀片把这些花囊划出一道伤痕，花囊中会流出一股乳白色的液体，这便是鸦片的原料，价值堪比黄金。一天之内，乳液凝固，形成一坨可以用小刀割开的棕色鸦片块。这种过程每隔几天便会重复一次，直到罂粟无法再分泌出液体为止。生产的鸦片会被集中到一处，形成饼状，并装进塑料袋里以防被水浸湿。随后的事情，便是坐等买主上门。上好的鸦片色泽深棕，质地湿软，只有灌溉充足的农田才能出产。阿富汗各大军阀都从鸦片贸易中获益匪浅，尤其又以塔利班获利最丰。【137】

瓦里·詹（Wali Jan）出身贫苦，靠务农为生，他一面在田地中除草一面告诉笔者：“塔利班可是我们的大恩人。他们保证我们的安全，让我们安安心心种鸦片。我家里有14口人，都等着卖鸦片换点钱为生。”塔利班治下的乡村环境往往不错，既和平又安定，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鸦片贸易保驾护航。瓦里·詹的田地规模并不大，每年大概产出鸦片45公斤。这点鸦



片能为他一家带来1300美元，相当于发了一笔小财。鸦片经过提纯之后就成了海洛因，在伦敦或纽约的卖价是1300美元的50多倍。瓦里·詹对此十分清楚，不过，他十分知足于手头这点小钱。鸦片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处处可见，坎大哈附近的农村出现的重建设施都是因为鸦片钱。这种情况在阿富汗其他地方也不鲜见。

为了鼓励瓦里·詹这样的人多种鸦片，塔利班甚至搬出了宗教为鸦片贸易挡驾。实际上，古兰经中严令禁止穆斯林涉及毒品贸易。阿卜杜尔·拉希德（Abdul Rashid）是塔利班反毒品力量的负责人，专驻坎大哈。他的工作性质耐人寻味，为此，阿卜杜尔·拉希德曾经向笔者专门解释。这位缉毒部门负责人的工作之一是禁止农民种植大麻。理由很简单，“因为很多阿富汗人和不少穆斯林沉迷于大麻”。不过，拉希德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他颇有反讽意义地告诉我：“种鸦片是允许的，这种毒品是西方卡菲勒（异教徒）的最爱，我们穆斯林和阿富汗人不吸这种玩意。”塔利班还出台了多项政策，大力鼓励鸦片种植。拉希德介绍说：“我们允许人们种罂粟，因为罂粟能卖个好价钱。如果我们禁绝罂粟，硬要他们改种小麦，肯定会引发暴动。所以，鸦片继续种，至于小麦可以从巴基斯坦进口。”【138】

对于这种政策，穆罕默德·哈桑从另一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毒品是恶魔，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改种小麦。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国际社会还没有承认我们的政权。”其后两年，奥马尔多次向美国和联合国方面保证将禁绝鸦片种植，当然，这要建立在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上。当时，塔利班政权已经控制了阿富汗90%的国土，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条件。

毒品产业可以提高塔利班的收入，很快，塔利班方面试图将这笔生意完全合法化。刚刚占领坎大哈的时候，塔利班还宣称要彻底扫除一切毒品。当时，美国外交官为此兴奋不已，主动为华盛顿和塔利班之间牵线搭桥。不过，几个月之后，塔利班就感受到了鸦片钱的重要性，况且禁毒行动要冒着得罪广大农户的危险。于是，塔利班转而对鸦片种植户征收天课（zakat）。古兰经规定，天课主要用于救济穷人，按照一次性收入的2.5%进行征收。不过，塔利班并不在乎宗教规矩，他们从每车鸦片中拿掉20%的钱用以“救济穷人”。除此之外，每位军官和省长还要从鸦片贸易中另行榨取金钱，中饱私囊的同时，也有一部分钱成了他们手下士兵的军饷。一

些塔利班官员干脆兼职做起了毒品贸易，并指派自己的亲戚充当中间人。

庇护鸦片贸易的同时，塔利班对大麻种植展开了大力打击。当时，大麻已经成了每个阿富汗卡车司机食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利班的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如果他们有心清除鸦片，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塔利班收缴了大量大麻，多达几百件，堆满了坎大哈的两个大仓库。在塔利班的威严之下，普通人都表示不敢以身试法。不过，仍然有少数农民和瘾君子继续着自己的营生或嗜好，对付他们，塔利班自有一套办法。阿卜杜尔·拉希德介绍道：“对于那些继续种植或吸食大麻的人，我们的政策是毫不留情地痛打一顿，叫他们从实招来。然后，我们把这些人的泡在冷水里，一天两三次，每次几小时，疗效非常显著。”^{【139】}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拉希德干脆去监狱里拉出几个瘾君子，让笔者亲自探问。几名人犯对塔利班的古怪疗法毫不犹豫地表示认同。巴赫特·穆罕默德（Bakht Mohammed）就是他们中的一位，这名小店主因为贩卖大麻获刑三个月。他说：“挨打和泡冷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大麻的影子。”

1992—1995年间，阿富汗每年的鸦片产量一直非常稳定，保持在2 200—2 400吨。1996年，这一数字为2 250吨。联合国禁毒署（UNDCP）的官员认为，这一年仅坎大哈一地的毒品产量便达到120吨，而该省的罂粟田地则达到3 160公顷。1995年，当地有2 460公顷罂粟地，年产鸦片为79吨。1997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并将势力延伸到阿富汗北部。鸦片年产量也因此大幅上升了25%，达到2 800吨。那些从巴基斯坦归国的难民也是鸦片产量增加的一大原因。他们一贫如洗，自然要寻找最容易换取金钱的途径。

根据联合国禁毒署的调查，农民的收益在整个鸦片产业中只占1%，而毒品贩子也不过获得了2.5%的利润，另有5%的收益用于打点关节，方便毒品一路西行前往欧美地区。剩下的大笔利润都为欧美各国毒品贩卖者所得。虽然在整个产业中份额低微，参与鸦片种植的阿富汗农民所创造的金钱仍然不可小觑。他们的人数约为100万，每年收入则超过1亿美元。塔利班方面也因为鸦片贸易获得了至少2 000万美元的税金，这还不算私下搜刮的所得。

1980年起，鸦片贸易所得的金钱就成为各派武装战争经费和私人收入的来源。因为这些鸦片钱，他们才得以在白沙瓦买房买地，置办产业，他

们的代步吉普车和海外账户也是毒品交易的成果。在公开场合，各派军阀都和毒品贸易划清界限，并以此为把柄互相指责。相比之下，塔利班要比自己的前辈坦诚得多。奥马尔武装公开表示无法控制毒品交易。联合国禁毒署和美国方面估计，阿富汗96%的海洛因都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塔利班为鸦片贸易的发展壮大尽心竭力，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但开拓了鸦片的产地，更是开发了新的鸦片销售市场，开辟了新的鸦片运输路线。赫尔曼德省是毒品生产的重地，产量占据了全国半壁。全副武装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满载着毒品离开这里，踏上漫长而又艰险的贩毒之路。这种情况每个月都要发生好几次。有的车队向南前行，穿越俾路支斯坦省的沙漠来到巴基斯坦的海岸地区。另一些人则西行进入伊朗西部，绕过德黑兰后又朝向西南方向前进到达土耳其的东部。还有些人选择东北路线，经赫拉特进入土库曼斯坦。1997年之前，毒贩子们又开辟了空中贩毒线，用大型货机装载毒品，从坎大哈或者贾拉拉巴德出发，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布扎比（Abu Dhabi）或者沙尔贾（Sharjah）。

阿富汗海洛因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中亚各国。早在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俄罗斯黑社会便和阿富汗方面搭上了关系。利用这层渊源，俄罗斯人开拓了一条海洛因通道，将阿富汗的毒品经中亚、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一路销售到欧洲。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也是这条毒品之路上的重镇，后来，两国甚至先后步阿富汗后尘而成为鸦片种植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一度是毒品加工的主要地点。经过一轮打击后，贩毒集团不得不考虑将加工环节转移到阿富汗国内。至于提炼海洛因不可或缺的乙酸酐（Acetic anhydride），则经由中亚源源不断地输入阿富汗。

讽刺的是，海洛因产量大爆炸的源头并不在阿富汗，而在巴基斯坦。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鸦片生产国，年产量达到800吨。1989年之前，全世界鸦片产量的70%都来自巴基斯坦。而且美、巴两国情报部门把毒品交易纳入自己的保护伞之下，使其成为了阿富汗抗苏战争军需供应线的一部分。1992年，曾有人在分析美国禁毒政策失败的原因时谈道：“20世纪80年代之中，大量的腐败、暗箱操作和毒品因素纠缠在一起。导致美方无法将巴基斯坦严重的毒品问题和一些更为迫切的战略任务分割开来。这些战略任务包括地区安全和游击战争。”^{【140】}这种事例并不孤立。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就对那些反共游击队的贩毒行为视而不见。因此，面

对阿富汗圣战组织和毒贩子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人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圣战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联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初露端倪，不过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1983年，巴三军情报局主管阿赫塔尔·阿卜杜拉赫曼（Akhtar Abdurehman）将驻奎达的一干手下悉数免职。这些情报官员全部涉嫌勾结贩毒集团，他们甚至将美军军火出售给自己的罪犯伙伴，而那本该是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军需。^{【141】}1986年，另一名情报官员扎胡尔鲁丁·阿弗里迪（Zahurrudin Afridi）因为贩毒锒铛入狱，他是在前往卡拉奇的路上落入法网的，当时，这位官员身上携带了220公斤高纯度海洛因。阿弗里迪一案也是巴基斯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贩毒案。两个月之后，空军中校哈里鲁尔·拉赫曼（Halilul Rehman）也因涉嫌贩毒被捕，巧合的是，这位军官和阿弗里迪走的是同一条公路，携带的毒品都达到220公斤。拉赫曼平静地供认了罪行，并指出自己并非新手，此前已有4次相同经历。两位巴基斯坦官员所携带的毒品市价颇高，在美国可以卖到6亿美元，相当于每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数额。两位贩毒的官员被一并羁押在卡拉奇，此后，两人神奇地逃出囚笼，不知去向。劳伦斯·利夫舒尔茨（Lawrence Lifschultz）就此评论道：“阿弗里迪-拉赫曼案件揭发了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中的贩毒集团，他们和阿富汗的关系匪浅。”^{【142】}

20世纪80年代，美国禁毒署（DEA）在巴基斯坦派驻了17位全职官员。在他们的调查下，40个主要的贩毒团伙现出原形，其中不少团伙都由高级官员一手操办。80年代的10年之中，这些团伙一直屹立不倒。对于圣战组织和贩毒集团之间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打算深挖大掘。这显然是出于维持阿富汗战争的考虑。为此，中央情报局甚至出手扰乱禁毒署的工作，逼迫一位禁毒署人员辞职，同时调离了多名相关官员。

抗苏战争期间，战争双方都利用毒品交易为自己赚取金钱。以前，一队队的驴子、骆驼和卡车满载着武器进入阿富汗，而返程路上却是无货一身轻。毒品贸易兴起后，这些驴子、骆驼和卡车再也不用空着脊背离开阿富汗。为了让这种武器贸易顺畅一些，美巴情报部门一直在向沿路的普什图部族行贿。很快，部落长老们又因为本国的毒品出口贸易再赚上了一笔过路费。国家后勤集团是巴基斯坦军方经营的运输单位，专门在卡拉奇、白沙瓦和奎达三地之间往返，为阿富汗军阀提供武器。后来，这个集团也

开始为毒贩们提供方便，在回程路上搭载毒品，运至卡拉奇以便出口。80年代毒品贸易猖獗不已，和巴基斯坦军方、政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纵容有莫大的关系。毕竟当时的要务是击败苏军。相比之下，毒品问题实在是无足轻重。

1992年，阿西夫·纳瓦兹（Asif Nawz）成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新任总司令。此后，巴军方开始致力于根除军中的贩毒集团。不过，海洛因贸易早已深入到了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骨髓里。驻伊斯兰堡的西方禁毒组织甚至指出，一些大毒贩甚至在贝·布托（1988—1999年）和谢里夫（1990—1993年）两届文官政府执政时期堂而皇之地成为国会议员。无论是贝·布托的人民党，还是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其中都不乏毒贩的利益代言人。此外，贩毒集团还通过投资产业和贸易行业大肆洗钱。当时，这种黑色经济据说占据了整个巴基斯坦经济的30%~50%，渗透到了这个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苏军撤离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才开始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逼迫伊斯兰堡当局取缔国内的鸦片生产。此后10年内（1989—1999年），西方国家为巴基斯坦提供了近一亿美元，以帮助该国摆脱毒品的困扰。巴基斯坦的禁毒事业卓有成效。1989年，该国的罂粟种植量还高达800吨，1997年这一数字便下降到了24吨，到了1999年，降为2吨。西北边境省实行的粮食换毒品政策也非常成功。不过，巴基斯坦的贩毒集团并未因此而灭亡，邻国的塔利班政权早已为他们打下了新市场。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持续上升，而各大贩毒集团因此获利不小。巴基斯坦刚刚摘下毒品生产国的帽子，又沦为了塔利班毒品的转口通道。塔利班的贩毒通道和80年代的圣战组织如出一辙。贩毒集团、卡车司机、宗教学校和政府机构都是现成的，提供武器、燃料和食物的供应渠道也可以用作他途。

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政府的老毛病又犯了。1998年2月，克林顿当局便指责伊斯兰堡在打击海洛因方面出工不出力。美国政府认为，巴方对于消除毒品毫无诚意，并一再声称毒品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143】}不过，消除毒品并不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专门任务。随着贩毒通道的四通八达，整个地区的毒品消费量大大增加。1998年之前，该地区所生产的毒品中仅有42%供出口所用，剩下的那部分都在本地被消费殆尽。1979年，巴基斯坦的瘾君子数量为零，1999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00万大关。

吸毒和洗钱两大毒瘤腐蚀着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它们还是民族和宗派极端分子扩充实力的有效工具。【144】

据伊朗政府公布的数字，1998年，该国的吸毒者人数为120万。但是，德黑兰方面的一些官员私下向笔者表示，真实的数字已经接近300万。在打击毒品方面，伊朗法律的严厉程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仅仅携带几盎司毒品就足以为一个人招来杀身之祸。【145】而且，伊朗当局禁毒的决心远胜于巴基斯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朗武装力量先后发动多次军事行动，以打击从阿富汗而来的毒品运输行为，2500多名官兵因此失去生命。1998年9月，伊朗和塔利班政权矛盾接近白热化，两国边境早已因此关闭。不过，当月的几周之内，伊朗方面仍然在边境上查获了5吨海洛因。伊阿边境的困局沉重打击了阿富汗的毒品出口生意，塔利班方面因此损失了大量税款。

中亚五国处于阿富汗毒品外销的必经之路上，它们因此沦为了海洛因泛滥的重灾区。1998年，塔吉克斯坦边防力量在本国和阿富汗交界处破获一起贩毒案，查获鸦片1吨、海洛因200公斤。1999年1月，该国总统拉赫马诺夫（Rachmanov）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阿富汗毒品以每天1吨的速度渗透进入他的国家，瘾君子数目因此大幅上升。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则宣称，由于阿富汗毒品的侵蚀，该国的瘾君子人数在1998年增长了11%。

土库曼斯坦的毒品状况也十分严重。笔者曾在阿什哈巴德的几家五星级酒店之外亲眼目睹海洛因交易的过程。酒店内则是另一幅景象，本地和俄罗斯黑帮分子聚居于此，准备去阿富汗“做点生意”。他们个个衣着考究，身边的情妇更是漂亮火辣。1997年，土库曼斯坦官方一共查抄了2吨海洛因和38吨大麻。由于本国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暧昧关系，土库曼斯坦在1999年之前变成了阿富汗毒品外销最主要的通道，该国的腐败官员因此获利不少。【146】1999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曾向笔者表示，他的国家“已经成为毒品交易的通道，大量犯罪活动由此引发”。阿卡耶夫认为，如果阿富汗和平不得实现，缉毒战争永远没有胜利的那一天。阿富汗内战不但是毒品问题之源，还是本地区稳定的最大隐患。【147】

阿富汗引发的海洛因问题在本地区内引发连锁反应，直接威胁到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毒品交易进一步破坏了这些本就脆弱不堪的社会机理，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困局。当地的贫困人口不断上升，随之飙升的是居高不下的吸毒人口。

一位驻巴基斯坦的外国大使认为：“毒品对于本地区的政治有着决定意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我们把毒品看作一种严重威胁，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和某些国家可能面临的经济崩溃完全可以等量齐观。”【148】

持续恶化的毒品问题，迫使国际社会和塔利班进行交流和谈判。经过6个月的秘密会谈，联合国禁毒署和塔利班在1997年10月达成协议。阿富汗方面同意彻底禁绝罂粟种植，而国际社会将为农民提供替代作物。为了在10年内彻底消除塔利班控制区内的所有罂粟，禁毒署负责人皮诺·阿拉基（Pino Arlacchi）认为自己的组织需要2 500万美元的捐款。他非常激动地表示：“阿富汗生产的海洛因供应全球，世界的海洛因有一半来自这里，欧洲的海洛因有80%出自此处。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上半的毒品完全消灭。”【149】联合国禁毒署承诺，会为阿富汗人提供有利可图的种植作物，改善当地的灌溉条件，修建新工厂并出资加强法律建设。

但是，塔利班却从没有执行这一协议。1998年，联合国机构纷纷撤出阿富汗，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彻底破产。6个月之后，笔者再次采访了阿拉基。这一次，负责人先生的口气小了很多。他表示：“阿富汗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关键地区之一。要想在这里消灭毒品，必须先从大处着手，政治合约是最必要的因素。”【150】同时，各大富国捐赠的款额也让人乐观不起来。1993—1997年之间，联合国禁毒署希望从国际社会获得1 640万美元以供阿富汗毒品问题所用，但是，最终落到实处的资金只有预期的一半。

塔利班需要鸦片贸易，从中所得的税款是政权的主要收入，也是支持战争进行的重要动力。1995年，联合国禁毒署认为巴阿之间毒品贸易的年收入高达500亿卢比（折合13.5亿美元）。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30亿美元。这些钱大多用于采购战争所用的武器、军需和燃料等物资。同时，毒品换来的金元还是塔利班士兵的衣食来源和军饷出处。而且士兵们的交通费和津贴也需要卖毒品来解决。80年代的老军阀常常利用毒品贸易中饱私囊，塔利班领导人倒是没有这般恶习。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都继续着苦行僧的生活。真正从毒品贸易中大发横财的是那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贩毒团伙。

除了毒品交易，阿富汗人还有从事多种走私活动的传统。在塔利班的庇护下，这些活动也在发展扩大。走私活动原本主要涉及巴基斯坦和阿富

汗两国，如今波斯湾沿岸各国也牵连其中，并为阿富汗各个邻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大麻烦。这种走私活动又名“阿富汗转口贸易”（ATT），在本书的第15章将有专门介绍。这种“转口贸易”是塔利班最主要的官方收入，每年为阿富汗经济创造30亿美元的产值。坎大哈、喀布尔和赫拉特等地海关都拒绝谈论自身的日收入。不过，每天都有300多辆大卡车从坎大哈出发前往伊朗和中亚，途中将会经过赫拉特。另有200多辆卡车路过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一路向北而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知道各地海关获利之丰厚。走私货物无所不包，从消费品到食品，甚至包括燃料。猖獗的走私不仅动摇了中亚各国的民族工业，降低了政府收入，甚至在某些地区引发了粮荒。这种情况在80年代还没有发生过。

塔利班从走私中所得的全部资金都汇入了阿富汗国家银行。当时，这家银行正试图在阿富汗各大省会建立分支机构。走私得来的资金被处理得十分神秘，根本没有纸面记录显示它们来自何处，又流向了哪里。这笔“官方”收入并不用于战争。打仗的钱另有来源，其中包括贩毒的所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捐款等。奥马尔直接负责战争资金的分配。塔利班的代理财政部长莫拉维·阿里夫拉·阿里夫（Maulvi Arifullah Arif）曾经向笔者解释：“我们的收入来自关税、矿业开采和天课税收。不过，战争所用的资金来自其他的渠道，并不经过国家银行处理。”^{【151】}

战争所用的资金由奥马尔一手操持，这些钱都放在奥马尔那个保险箱里，而那个保险箱直接位于领袖的卧榻之下。如此一来，没人知道塔利班政权一年的预算到底是多少。即便奥马尔愿意打开自己的保险箱，恐怕他的手下也算不清这笔账。因为塔利班的财政部里没有一个够格的经济学家或银行家。

财政部长阿里夫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宗教学校走出来的毛拉，在财政方面确实不是行家。真正的专业人士早已被排挤出局。1997年2月—1998年1月是塔利班政权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当年的政府预算居然只有10万美元。很难想象，这点钱能满足全国行政运作和基建工程的需要。实际上，这10万美元只够给各级官员分发工资。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塔利班的财政事业是多么混乱和艰难。塔利班政权中也有部分人试图发展工业，吸引外来投资，不过领导层对这些事务的热情并不高。莫拉维·艾哈迈德·詹（Maulvi Ahmed Jan）在塔利班政权中负责工矿业管理。当年他抛下了

自己在沙特阿拉伯的地毯生意，回国报效塔利班。艾哈迈德·詹认为：“我们要把阿富汗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国拥有丰富的矿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南部之前，当地没有任何能从事生产的工厂。经过我们的努力，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方面的帮助，许多矿厂重新开工，不少地毯加工企业也重新开业。”不过，艾哈迈德·詹坦承，坎大哈舒拉的心思全都在战争上，几乎没有人对发展经济有兴趣。^{【152】}

艾哈迈德·詹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巴基斯坦的商人尤其得到塔利班方面的重视。任何人只要有投资建厂的意愿，便可以免费拿到一块土地。不过，鉴于阿富汗形同废墟的基础设施状况，一切道路、电力和房屋建设费用都得由投资者自行处理。最终只有少部分巴基斯坦商人表示出了投资意向。这些人大多来自白沙瓦或者奎达，而且此前早就通过走私和非法木材生意从阿富汗赚取了大笔金钱。这一次，他们感兴趣的是阿富汗的矿藏。

1992年来，无数阿富汗人前赴后继地逃离了自己的祖国。经过几轮大规模的外逃难民潮，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和技术人员几乎一走而空，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稍通技术的电话维修员或者电工。占据塔利班政权财政、经济和社会部门的人是一些有过经商履历的毛拉。除了宗教活动，这些人在经商、走私和卡车运输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国家建设不过是为走私生意扩大市场而已。

毛拉·阿卜杜尔·拉希德（Mullah Abdul Rashid）就是这种人。这位军官一脸凶相，1997年4月的一件外交公案让他恶名远扬。当时，一支巴基斯坦巡逻小队正在追击贩毒集团，他们从俾路支斯坦省进入了阿富汗地界，随即被阿卜杜尔·拉希德阻截并逮捕。随后，巴基斯坦士兵被解到坎大哈进行羁押，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阿卜杜尔·拉希德来自赫尔曼德省，塔利班在他的家乡拥有的大理石矿厂都由这位毛拉全权负责经营。这些矿厂总共拥有雇工500多人，其中没有任何矿业工程师，而且相关的开采设备也一应俱全。阿卜杜尔·拉希德的矿厂还经受着缺电的困扰，此外，专业知识的缺乏也是个大问题。阿卜杜尔·拉希德对大理石的了解仅限于用炸弹将其炸成几块。

塔利班吸引外资的兴趣还来自另一桩天然气生意。为了争夺一条经由

土库曼斯坦到达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线的建设权，美国优尼科公司和阿根廷布里达斯公司展开了大斗法。阿富汗作为管线的必经之地，也是两家公司角力的主要战场。这其中的故事在本书的第12章和第13章有详细的介绍。也正是这个故事吊起了塔利班政权吸引外资的胃口。在管线工程的诱惑下，不少商人不惧风险来到阿富汗淘金。淘金者中有阿富汗本地人，也有巴基斯坦的来客。有的人在坎大哈附近到赫拉特公路沿线开掘油井，有的人参与路政建设。1999年，一家美国公司帮助塔利班政权建立了一套联通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的电话系统。这些建设活动对阿富汗经济并没有多大裨益，只是为塔利班和诸多走私者的生意提供了便利。如果阿富汗内战不能告一段落，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能重现，一切真正的外来投资和重建活动都不会有真正进展。而且，阿富汗社会就如一个经济黑洞，一直向周边各国放射着不稳定的冲击波。而各个邻国本来就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阿富汗的基础设施的破损程度十分惊人，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稳定的电力来源、没有电话、没有公路和稳定的能源供应。饮水和食物不是短缺，就是太过昂贵。某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也属于基础人权的東西，到了阿富汗也属于奢望。

经过20多年的战争，阿富汗的城市和乡村遍布着地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国家最为肥沃的土地也被地雷占据，灌溉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因此凋零。1979年以来，一共有40万阿富汗人被地雷夺走生命，另有40万人则因此落下肢体残疾。13%的阿富汗家庭中有人因地雷或死或伤，每个月则有300多人直接受害。联合国和各大非政府组织雇用了4 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阿富汗的扫雷行动，不过，他们至少还得忙上10年，才能基本消除阿富汗主要城市中的地雷危害。1998年的喀布尔已经经历了6年的扫雷工作，不过，这个城市5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仍有40%处于地雷阵之中。【153】

虽然喀布尔地雷密布，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终日在外奔波，为填饱肚子赚取一点点辛苦钱。很多时候，商店里并不缺货。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走私食品琳琅满目，就看有没有钱去买了。在当时的喀布尔，一位外科医生的月收入只有5美元，这还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扶助之下。一般的喀布尔市民每月只能拿到1~3美元的工资。而且，大多数人都受到贫困和失业的困扰，联合国的援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支柱。喀布尔拥有120万人



口，其中的一半都从西方人道主义援助组织那里领取过食物。

联合国在阿富汗陷入了两难境地，看上去，人道主义援助甚至起到了助长战争的作用。军阀们认为，既然联合国方面可以提供一切，自己完全可以逃避对普通阿富汗人的责任。塔利班甚至认为，自己的使命和人民的福祉完全没有干系，安拉自然会为老百姓安排一切。不过，如果联合国和各大非政府组织停止自己在阿富汗的援助项目，当地人民的生活只会更加困窘，尤其是那些完全依赖援助度日的弱势群体，比如孤儿和寡妇。

1998年，阿富汗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该国北部连续发生三次大地震，同时塔利班对哈扎腊贾特的围困使得阿富汗中部饥荒严重。南方也不太平，坎大哈城外遭遇洪灾，大片的农田和村舍被淹没，城中的百姓则由于联合国救援机构的撤离深受其害。当年8月，美军的导弹袭击迫使驻坎大哈的救援人员弃城而走。1998—1999年之交的严冬对于喀布尔市民尤其寒冷，由于缺乏供暖，他们的家中冻如冰窟。街上的行人个个面有菜色，许多人一天连一餐都无法供应。只有和平才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1998年阿富汗的粮食产量预计为385万吨，比前一年提高了5%，创造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峰。

这个难得的丰收年反映了三个状况：塔利班治下的农村地区渐渐恢复秩序，阿富汗南部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大批难民的回流。不过，仍然有大批阿富汗人流亡异国，其中120万滞留巴基斯坦，另外的140万在伊朗。但仍有400多万人在1992—1997年期间回到故国。

虽然情况有所改善，粮食的缺口仍然很大，塔利班和联合国方面需要进口75万吨小麦予以填补。塔利班并不是糟糕的阿富汗经济状况的元凶，他们只是从战争中接手了这个烂摊子而已。1992年之后，所有的阿富汗军阀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对民间疾苦表示漠然。

阿富汗似乎永无宁日，而各派军阀又罔顾民生。西方国家的援助热情渐渐转凉，陷入了所谓的“援助疲劳”之中。阿尔弗雷多·赛斯特里是联合国驻阿富汗的联络官员，他在这个国家一直工作到1998年。对于这里的情况，他有着如此的评价：“阿富汗人民所受的苦难十分惊人。随着时间的流失，援助资金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拿到手的钱还不到预期的一半。”^{【154】}军阀毫不关心国家的重建事宜。阿富汗这个经济黑洞越来越大，越拓越宽，越来越多的人落入其中。

第 10 章

全球圣战：奥萨马·本·拉登和阿拉伯人在阿富汗

托克哈姆（Torkham）位于开伯尔山口的顶部，这里是一处边境驿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分别位于一道简单的栅栏两边。巴方一侧驻守着精神抖擞的边防军人，灰色的制服、靴子和头巾是他们的标志。1989年，苏军从阿富汗刚刚撤离完毕，笔者也踏上了回国的行程。不过，当时的托克哈姆关口却是栅门紧闭。带着一身的疲惫，我不得不在阿富汗一侧的草地上稍作休息，等待国门再次打开。

突然，我的身后响起一片喧闹。只见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圣战武装呼啸而过。那上面都是些异国面孔，有浅色皮肤的阿拉伯人、蓝眼睛的中亚人，还有几位东亚人模样的黑脸汉子。他们的打扮和一般的阿富汗圣战战士并无二致，只是头巾显得不大合衬。这群人全副武装，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从不离手。大家都在等着开关放人，我干脆和他们攀谈开来。这才发现其中竟然只有一名阿富汗人，其他的30多位对普什图语、达里语和乌尔都语一概不通，全靠他一张嘴进行翻译。

我遇到的这帮人中，有菲律宾来的摩罗人、苏联来的乌兹别克人、邻国的分裂主义分子，阿拉伯人更是不少，分别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多个国家。至于那位阿富汗人，则是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Hizb Islami）的成员。经过一周在训练营的辛苦训练，这群外国人准备到白沙瓦过周末，去看看家信、换身衣服或改善一下伙食。他们来到阿富汗的目的除了要和圣战组织并肩作战，还接受了武

器、爆破和游击战方面的训练。日后他们返全球圣战回家乡之时，圣战也会一并前去。

同一天晚上，贝·布托总理在伊斯兰堡设宴款待新闻界人士。三军情报局负责人哈米德·古尔（Khamid Gul）也是与会宾客之一。这位上校是军队中的头号伊斯兰极端分子，他对于苏联人的撤退感到无比振奋。笔者向古尔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如果古尔广招天下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举动不是玩火，那么到底谁才是巴基斯坦的盟友？二、这些极端分子会不会把恐怖活动带回自己的祖国？古尔的回答如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圣战。历史进入现代以来，这还是全世界穆斯林第一次组成同一个阵营。世界上已经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为什么穆斯林就不能团结在一起呢？”对于这些秉持着国际主义的穆斯林，笔者愿意用“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称呼他们。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成为阿富汗公民，很多也并非阿拉伯裔。

1986年，当时的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威廉·卡塞（William Casey）连出三招，步步都是对付苏军的杀手锏，这些计划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首先，在国会的许可下，美方向阿富汗方面提供了大量FIM-92毒刺导弹，圣战组织因此有了击落苏军飞机的能力。同时，美国军事顾问也参与到圣战之中，为阿富汗人传授游击战的点点滴滴。此前，美方虽然一直力挺圣战组织，却从未向阿富汗盟友提供任何美制武器和人力支援。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达成协议，准备向苏联境内发动游击战攻击，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就是此次行动的目标。两地都是穆斯林聚居地，也是苏军供给的来源地。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希克马蒂亚尔和他的武装身上。这位军阀是三军情报局最为仰仗的圣战武装领导人。1987年2月，小队武装离开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基地，跨过阿姆河进入塔吉克斯坦，并用火箭向当地村落发动攻击。这个新闻让卡塞兴奋不已。情报局长第二次对巴基斯坦进行秘密访问时，甚至亲身进入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一起检阅圣战组织的部队。【155】

卡塞的第三招便是从全世界招募伊斯兰极端分子前来巴基斯坦受训，进而参与抗苏战争。这本是巴方的一项计划，1982年来，三军情报局一直在推行这种政策，随着战争的进行，参与援助圣战组织的各方力量都参与到了支持的行列中。齐亚·哈克想巩固伊斯兰国家的联盟，同时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联盟的首领。同时，齐亚还计划将中亚各国拉进自己的阵营。华

盛顿当局也希望整个穆斯林世界一起对抗苏联，这既是对阿富汗的支持，也完全符合美国利益。沙特阿拉伯则又得到了一次推广瓦哈比主义的机会，同时还可以用战争除掉瓦哈比派中的极端分子，可谓一举两得。

各方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没想到圣战组织也有自己的打算。阿富汗人的怒火已经慢慢从苏联方面蔓延到本国政府和美国身上。为了吸引伊斯兰极端分子，巴基斯坦方面大开方便之门，只要愿意参加阿富汗圣战，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从当地的巴基斯坦使馆拿到签证。巴方的号召在中东引起了热烈回应。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招募了大批兵员，立即投赴阿富汗前线。这些中东志愿军一来到巴基斯坦，旋即受到三军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党的热情迎接。主人为客人安排好了食宿和军事训练课程，鼓励他们加入阿富汗圣战组织，其中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阿富汗伊斯兰党。沙特情报部门为其间的一切费用埋单。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瓦把这宗交易形容为“沙特、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富汗伊斯兰党三方合作的冒险，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则是他们的媒人”。【156】

1982—1992年的10年间，共有来自43个国家的3.5万名极端分子离开自己在中东、北非、东非、中亚或远东的家乡，不远万里来到阿富汗接受战争的洗礼。此外，还有几万名外籍极端分子来到巴阿边境，在齐亚政权资助的宗教学校里学习。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万名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政府、阿富汗战争搭上了关系。

极端分子们的巴阿之旅往往开始于白沙瓦或阿富汗境内的训练营里，在这些地方，他们彼此相识，一起学习、受训，最后一齐上战场。其间，各地的极端分子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互通有无，结成了战斗友谊，这让他们在未来受益匪浅。这里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学课堂。除了这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学术场所能够聚集这么多的极端分子。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eni Brzezinski）曾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是苏联解体的影响更大，还是塔利班的崛起更有意义？是极端穆斯林之间的串联让人震惊，还是中欧的解放和冷战的结束更具影响力？”【157】1993年，几名出自阿富汗训练营里的武装分子策划袭击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这一行径惊醒了美国人。

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写道：“战争让各种伊斯兰极端势力团结到了一起，他们要对一切非穆斯林发起攻击。同时，无数

的武装分子从战争中成长起来，训练营、后勤供应线等也因此建立。战争扩张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人事和组织联系，提供了大批的新式武器，其中包括300~500件毒刺导弹。最重要的是，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获取了自信。他们自信能从一次胜利走向下一次胜利。”^{【158】}圣战分子认为，既然一场圣战能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他们完全可以用另一场圣战将另一个超级大国击倒在地，顺带把本国的政府一并推翻。圣战分子显然认为苏联的败退完全由于自家之力。实际上，苏联的解体有着复杂的内因，阿富汗人的抵抗不过是来自外部的一击而已。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的祸端起于萧墙之内，而极端分子则觉得那是伊斯兰的伟大胜利。伟大的胜利让极端分子欢欣鼓舞，伊斯兰教曾在7、8世纪的200年间横扫全世界，辉煌过去似乎又要重演。极端分子认为，只要一代战士能够不畏牺牲、献出热血和生命，一个新的乌玛世界就会再次降临人间。

来到阿富汗的志愿者成千上万，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学生，名叫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也门富商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儿子，一家大型建筑集团的继承人。穆罕默德·本·拉登和已故的费萨尔国王私交甚密，他的公司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揽下了多处清真寺的维修和扩建工程，并因此大发横财。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一直向图尔基·本·费萨尔王子提出要求，希望这位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委派一名王室成员来阿担任志愿者的领队，以显示沙特王室对阿富汗圣战的关注和支持。此前，来到阿富汗参战的沙特公民大都是学生、出租车司机和贝都因牧民，中亚的群山之间还没有出现过权贵的身影。奥萨马·本·拉登虽然出身平民，但却家资豪富，勉强可算半个王室成员，足以充当沙特志愿者的领导人。出于共同的目的，本·拉登、图尔基王子和古尔三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受世界穆斯林联盟和穆斯林兄弟会操控，这两个组织在白沙瓦设有办公室，由阿卜杜拉·阿扎姆负责。阿扎姆拥有约旦和巴勒斯坦双重国籍，和本·拉登在吉达大学有过一面之缘。本·拉登对这位负责人很是崇拜，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1989年，阿扎姆在白沙瓦附近遭遇炸弹袭击，他和两个儿子一同身亡。在20世纪80年代，阿扎姆和希克马蒂亚尔过从甚密，与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卜杜尔·拉苏尔·赛义夫（Abdul Rasul Sayyef）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当时，赛义夫应沙特方面的邀请来到白沙瓦推广瓦哈比主义。阿扎姆在1984年成立了“马赫塔布组织”

(Makhtab al Khidmat)，专门为那些初来此地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提供服务，并接收来自伊斯兰慈善组织的捐款。沙特方面自然不会亏待阿扎姆，大批资金流入他的服务中心。捐款机构来自沙特各界，从情报机构到红新月会，从世界穆斯林联盟到各大清真寺，以及各位王公贵族的私人钱袋。经过十年的发展，“马赫塔布组织”周边聚集了一大堆极端团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和1998年美国使馆的两起爆炸事件都是他们的作为。

阿富汗是本·拉登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奥萨马·本·拉登大概出生在1957年。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来自也门，妻子和儿女众多。奥萨马·本·拉登在57个兄弟之中位列17。他曾在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尔·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攻读商业管理硕士，不过很快便转修伊斯兰研究。他身材高大，四肢纤瘦，一把胡子又蓬又长。6英尺5英寸的个头在一干同学中很是显眼。据同学们回忆，这位年轻人秉性安静，十分虔诚，看不出他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159】

穆罕默德·本·拉登十分支持阿富汗圣战，为此捐赠了大笔金钱。所以，当他的儿子提出要亲赴前线的时候，一家人反应热烈。1980年，年轻的本·拉登先生来到白沙瓦，和圣战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会面。此后，他频繁地往返于沙特阿拉伯和白沙瓦之间，每次都为圣战组织带来大批援助。1982年左右，奥萨马·本·拉登选择在白沙瓦定居，随之而来还有大批建筑工人和设备，帮助圣战组织筑路修房。

1986年，本·拉登帮助修建了霍斯特隧道工程。该工程靠近巴基斯坦边境，深居群山之间，是圣战组织重要的武器库、训练营地、医疗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为此提供了资金支持。本·拉登的举动在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中大受好评，各位志愿者都把这位瘦削、富有、深具领袖魅力的沙特阿拉伯人当作自己的领袖。

本·拉登事后说：“为了抵抗苏联无神论者的进攻，本人被推举为沙特方面在阿富汗的代表。我在邻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随后，大批好汉来此聚义。他们有的来自沙特国内，有的来自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为他们提供了训练营，由来自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教官对他们进行培训。美国人出枪，沙特方面出钱。后来我发



现，圣战不能局限于阿富汗。我们应该反抗一切敌人，反抗共产势力的同时，不能忘了西方势力的压迫。”【160】

据本·拉登自称，他曾经参与抵抗苏军的一线斗争。不过，这位沙特富翁更多的时候是在大撒金钱，帮助圣战组织修建工事，并在阿富汗人中传播瓦哈比主义。1989年阿扎姆于此身亡之后，本·拉登接手了“马赫塔布”，并将其更名为“基地组织”（Al Qaeda，阿盖达）。基地组织是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及其家眷新的依靠，并将他们凝聚到了一起。在本·拉登的帮助下，几千名阿拉伯人在阿富汗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这些基地遍布在库纳尔、努里斯坦和巴赫达尚几个省份。不过，这些外乡人有着强烈的瓦哈比派思想，阿富汗大众对他们并不欢迎。而且，阿拉伯人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之间的联合，激起了阿富汗什叶派信众和非普什图民族的强烈对立情绪。

不久后，马苏德对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的存在表达了抗议。1997年，塔吉克军阀被塔利班驱逐出了喀布尔城，临走时他说：“在抗苏战争期间，我部和那些阿拉伯人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他们的朋友是阿卜杜尔·拉苏尔·赛义夫和希克马蒂亚尔。1992年，我部攻占喀布尔。这些阿拉伯人还站在希克马蒂亚尔一边进行负隅顽抗。我们必须驱逐这些外来势力。本·拉登这个人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功绩。”【161】

当年，由于圣战组织之间内斗不断，本·拉登也有些心灰意冷。一气之下，沙特富翁回到国内经营自己的家族生意，直到90年代才再次涉足阿富汗。本·拉登为那些援助圣战的阿拉伯老兵建立了专门的福利基金。在他的帮助下，4 000多名老兵得以在麦加和麦地那定居，战死沙场的人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引发了沙特方面的恐慌。本·拉登就此向王室提议组织人民武装，将那些阿富汗战场上退下的老兵派上前线保卫国家。不过，法赫德国王并没有理睬本·拉登的进言，他心仪的保护人是美军。这可是对本·拉登的沉重打击。随着54万多国部队进入海湾地区，本·拉登公开发表了一通谴责王室的言论。同时，他还开始拉拢本国的教士阶层，试图签订一系列反对非穆斯林的宗教协议。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并没有撤离，2万多人的部队仍然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国土上。本·拉登的批评也因此大声了许多。1992年，他和内政部长纳伊夫王子（Prince Naif）发生激烈争吵。本·拉登指责王子是伊斯兰的叛

徒，而王子则到法赫德国王面前告了本·拉登一状。很快，本·拉登上了沙特政府的黑名单，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不过，王室成员中有不少纳伊夫的政敌，他们和本·拉登保持着同盟关系。同本·拉登关系密切的还有沙特情报部门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1992年，本·拉登来到苏丹，这个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极端主义革命，传奇人物哈桑·图拉比（Hassan Turabi）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沙特人正是慕他的大名而来。同时，本·拉登继续着对沙特王室的口诛笔伐。1994年，恼羞成怒的王室干脆剥夺了这名不受欢迎人物的公民身份，这在沙特历史上尚属首例。通过金钱引诱和人脉关系，大批阿富汗战争老兵来到苏丹投靠本·拉登。美军赢得海湾战争让老兵们十分不满。阿拉伯各国统治者对美军的挽留更是让这些人愤愤然。后来，苏丹政府迫于美国 and 沙特方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对本·拉登下了驱逐令。

1996年5月，本·拉登回到了阔别多时的阿富汗。一架专机载着这名沙特富翁来到贾拉拉巴德，与他同行的还有数十名阿拉伯武装分子、保镖和家眷。本·拉登的3位妻子和13个孩子也在此列。此后，本·拉登一行在贾拉拉巴德舒拉的保护下开始了在阿富汗的新生活，1996年的8月，本·拉登发表一项声明，指责美国侵占了自己的祖国，并就此向侵略者发动圣战。声明中指出：“压迫和专制的墙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会垮掉。”当年9月，塔利班武装先后攻占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此时，本·拉登和奥马尔两人之间早已经惺惺相惜。1997年，前者在阿富汗的家搬到了坎大哈。世界的另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针对这位沙特流亡者建立了特别小组，专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美国国务院1996年8月的一纸报告指出，本·拉登已经成为“世界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主要支持者之一”。报告认为，本·拉登资助的恐怖分子训练营遍布全球，索马里、埃及、苏丹、也门和阿富汗都有这位沙特人的恐怖产业存在。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反恐协议》，要求美方冻结一切恐怖组织的财产。本·拉登的财产首当其冲。据统计，这位沙特富翁当时的个人资产在2.5亿~3亿美元。^{【162】}几个月后，埃及情报部门爆料指出，本·拉登手下已经有了一支千人部队。受训者并非战争老兵，而是新一代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本·拉登希望这些新战士能成为阿拉伯各国开展伊斯兰革命的中坚力量。^{【163】}

1997年初，几名中央情报局人员悄悄潜入白沙瓦。特工们此行的目的



是抓捕本·拉登，挟持这位恐怖大亨离开阿富汗。此外，中情局还收买了多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地人作为呼应。不过，行动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美国人的冒险让本·拉登饱受惊吓，沙特流亡者决定就此避居坎大哈。1998年2月23日，基地组织纠集一千恐怖组织在霍斯特一处训练营地召开会议，各方以“国际伊斯兰反犹太反十字军圣战阵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言声称“7年以来，美国一直占据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土地——阿拉伯半岛。美国人掠夺这里的资源、勾结这里的统治者、羞辱这里的人民、威胁邻近这里的一切国家。这里遍布着美军的基地，是悬在邻近地区穆斯林头上的一把利剑”。

会议最终得出了共同奋斗的纲领。“消灭美国及其盟友——无论军队还是平民。这是每个穆斯林的责任，无论时间，无论地点，如有需要须立即执行。”本·拉登已经不满足于推翻沙特王室或驱逐美国人，他的目标是解放整个中东。1998年，美军加大了对伊拉克的空袭力度，本·拉登由此号召全球穆斯林“对抗、打击和消灭”一切美国 and 英国公民。^{【164】}1998年8月，美国驻肯尼亚及坦桑尼亚使馆发生爆炸案，220人死亡，本·拉登这个名字从此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变得家喻户晓。美方指责本·拉登策划了这一系列爆炸案，并在13天之后发动报复行动。70多枚巡航导弹袭击了本·拉登位于霍斯特和贾拉拉巴德附近的训练营地。其中一些营地原本属于塔利班，刚刚移交给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极端组织。本·拉登和哈立德·本·瓦立德（Khalid Bin Walid）控制的阿尔·巴德尔（Al Badr）营地和巴基斯坦伊斯兰解放组织（Harakat ul Anwar）属下的姆阿瓦亚（Muawaya）营地是美军打击的主要目标。营地里的受训者将来的战场在克什米尔地区。在美军的报复性袭击中，共有7名非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籍人士死于非命。其中有3名也门人、2名埃及人、1名沙特阿拉伯人和1名土耳其人。此外，7名巴基斯坦人和20名阿富汗人因此身亡。

1998年11月，美国对本·拉登开展悬赏通缉，奖金高达500万美元。沙特恐怖大亨声称自己受伊斯兰责任的感召，将使用化学武器乃至原子弹攻打美国。这番狂言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恐惧。本·拉登声称：“如果穆斯林不能掌握一种防止异教徒迫害的武器，那将是一种犯罪。打击美国是一种宗教责任。我们希望安拉的保佑。”^{【165】}

非洲使馆的爆炸声响过的几周之内，克林顿政权便展开了对本·拉登的

宣传攻势。在美国人的描绘下，这位沙特富豪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每一次反美行动都扯上了关系。此后，纽约一家法庭对本·拉登进行了缺席审判。根据指控，本·拉登和以下的一系列案件有涉：1993年，18名美军士兵在摩加迪沙被杀；1995年在利雅得，5名美军工作人员因爆炸袭击而身亡；1996年，19名美军士兵在沙特阿拉伯东北部城市达兰（Dhahran）横死。本·拉登还被怀疑和1992年阿登的一系列爆炸有关。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中也有这位沙特恐怖教父的影子。此外，本·拉登还被控于1994年在菲律宾预谋刺杀克林顿总统，并计划在1995年引爆10余架美国民航飞机。【166】不过，许多美国公众并不认为上述这一系列案件当中都有着本·拉登的影子，一些反恐专家尤其对沙特人是否插手其后的一系列恐怖活动表示怀疑。【167】

不过，克林顿当局并没有明察秋毫的闲心。总统正陷在莱温斯基丑闻案中不能自拔，政府亟须一些可以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事情，为一连串恐怖活动找到一个笃定的结论无疑是个好办法。本·拉登由此被华盛顿当局塑造成了恐怖活动的中心，仿佛一件针对美国的惊世大阴谋正在围绕他而进行。而实际上，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圣战组织的支持，才让一代原教旨主义组织陆续崛起，并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他们的头号目标并非美国人，而是本国腐败的统治阶层。早在1992年，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最高领导人多次请求美方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以期根绝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带来的隐患。不过，美国当局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任由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168】

阿尔及利亚当局的焦虑很有现实意义。各国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之中，数阿尔及利亚籍圣战老兵夺权时间最短。1991年，伊斯兰解放阵线（FIS）在阿尔及利亚首轮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该党在农村地区的得票率超过60%。阿尔及利亚军方不得不出面中止选举，并在1992年1月宣布全国军管。随后的两个月内，一场全面内战爆发开来。截至1999年，一共造成70万人死亡。伊斯兰解放阵线内部也发生政变，极端分子夺取了阵线的指挥权，并在1995年将组织更名为武装伊斯兰主义集团（GIA），并将领导权交到了阿拉伯裔阿富汗人手中。这些阿尔及利亚籍圣战老兵信奉瓦哈比主义，他们的目标是将整个北非卷入一片腥风血雨，并促进法国境内伊斯兰极端活动的发展。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后来一系列类似事件的预演。此后，埃及发生了数次爆炸袭击事件，经过追查，几起事件都和曾在



阿富汗参战的埃及籍人员有关。这些人曾和本·拉登在阿富汗长期共事，互相之间十分熟悉。而且，本·拉登一直致力为圣战老兵提供福利，双方一直保持联系。因此，本·拉登有资助某些恐怖活动的嫌疑。但要说这位沙特富商对于各国圣战老兵的活动纲领都熟知无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本·拉登在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中无足轻重，他一不是宗教学者，二不是教师，完全没有发布宗教法令（fatwa）的权力。可是，西方世界都把他那声“带给美国死亡”的宣言当成了有宗教意义的法令。实际上，穆斯林并不以此为意。

不少圣战老兵都在抗苏战争期间和本·拉登打过交道。据他们回忆，这位沙特人知识并不渊博，表达能力也很是一般。因此，他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当务之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而言，本·拉登不是革命导师，也不像切·格瓦拉那样在第三世界有着巨大影响。

圣战老兵眼中的本·拉登是个易受影响的人，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谋士的辅佐。他的身边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和现代世界的了解都远甚于本·拉登。阿伊曼·阿尔·扎瓦希里（Aiman Al Zawahiri）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埃及人和本·拉登相识很早，他所领导的“伊斯兰圣战”（Islamic Jihad）组织已经遭埃及当局取缔。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伊斯兰复兴组织（El Gamaa Islamiyya）也早就被禁止活动，他本人目前正在美国的监狱中服刑，这位盲人教士因为涉嫌参与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而被捕入狱。不过，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本·拉登仰仗的重要谋士。

通过在阿富汗的圣战经历，本·拉登还和苏丹的国家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Al Hezbollah）拉上了关系。活跃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Hamas）也和本·拉登有过交往。本·拉登在坎大哈的生活也被各国人士包围，车臣人、孟加拉人、菲律宾人、肯尼亚人，美国黑人穆斯林也常常和沙特富商交流谈心，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名头上都盖过了本·拉登，是美国通缉的要犯。因此，这些人不能离开阿富汗，只能在本·拉登的金钱和权力庇护下生活。

非洲使馆爆炸案之后，美国方面展开了一场全球行动。很快，80多名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相继在十几个国家落网。这些武装分子从肯尼亚、坦桑尼亚、苏丹和也门一路东逃，来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藏身。^{【169】}1998年12月，印度官方拘捕了数名孟加拉恐怖分子，指控他们预谋利用炸弹袭击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同时，马来西亚警方拘捕

了7名持假护照入境的阿富汗公民，这些人试图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制造爆炸事件。^{【170】}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1998年12月也门发生的16名西方游客被劫持事件有本·拉登的金援作祟。^{【171】}1999年2月，孟加拉国官方称本·拉登向达卡汇款100万美元，以资助本国极端组织孟加拉圣战运动（Harkat-ul Jihad, JH）。该组织的不少成员曾在阿富汗接受训练，他们宣称，要将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塔利班式的宗教政权。^{【172】}

几千英里之外的毛利塔利亚也不太平，数名武装分子在这个西非国家的首都努瓦克肖特（Nouakchott）被拘捕，他们涉嫌制造爆炸事件。^{【173】}与此同时在开罗，埃及官方经由军事法庭向107名伊斯兰圣战组织分子提起诉讼。其间埃及情报官员指出，本·拉登对这一极端组织进行了资助。^{【174】}1999年2月，中央情报局宣称，通过对本·拉登的通讯情况进行卫星侦察，美方及时挫败了7起针对美国海外资产的袭击企图。这7次袭击的目标分布于7个国家——沙特阿拉伯、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干达、乌拉圭和科特迪瓦。看来，阿富汗圣战老兵们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1999年，克林顿政权为反恐事业投入了67亿美元，而联邦调查局的反恐预算也从前一年的1.18亿美元上升到了2.86亿美元。涉及的人员数也达到了2 650人，比1998年增长了一倍。

不过，在一系列恐怖袭击中受害最深的并非美国，而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当初，正是这两个国家对阿拉伯裔阿富汗人鼎力支持。1997年3月，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难民营爆发激烈枪战。经过36个小时的对峙，警方击毙了5名武装分子，其中3人为阿拉伯人，2人为塔吉克裔。这座难民营隶属于瓦哈比极端组织塔福基尔（Tafkir）集团。当时，该集团策划袭击正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元首会议。

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鼓励下，塔利班、本·拉登和许多阿拉伯裔阿富汗人都参与到了巴印两国在克什米尔的纠葛之中，圣战老兵们纷纷加入“解放运动”（Harkat-ul Ansar）为巴方作战。可是，阿拉伯人竟然想借此机会在克什米尔地区推广瓦哈比主义，这让当地武装分子十分恼火。1996年，美国将“伊斯兰解放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一组织被迫更名为“圣战运动”（Harkat-ul-Mujaheddin）。1997年美军对霍斯特附近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发动导弹袭击，导致不少巴基斯坦籍武装分子死亡，这些受害者无一例外地来自“圣战运动”。1999年，“圣战运动”宣布在克什米尔山谷推行



瓦哈比式的着装条例，禁止牛仔裤和夹克衫。同年2月15日，“圣战运动”武装分子枪击了3名当地有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涉嫌转播西方电视节目。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有着自由的传统，原“解放运动”一向也予以尊重。阿拉伯人的倒行逆施反而给了印度方面展开反面宣传战的口实。【175】

华盛顿当局向伊斯兰堡方面施加压力，要求谢里夫政府立即逮捕本·拉登。巴方显得十分为难，毕竟三军情报局和本·拉登关系匪浅，沙特富翁多次资助克什米尔武装分子，还为他们敞开了霍斯特训练营的大门。因此，谢里夫总理于1998年12月的华盛顿之行荆棘丛生。谢里夫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敏感问题，但他的一些下属显得颇为安然自得。这些巴基斯坦官员不忘提醒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巴美双方可都是本·拉登的后台。进入90年代后，两国在支持塔利班的问题上也保持一致。在一次采访中，本·拉登证实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对自己的支持。他说：“巴基斯坦的某些政府部门在安拉的感召下，正视了本国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他们对我们的事业表示同情，甚至给予了合作。不过，另一些部门已经落入了异教徒的控制。希望他们能在安拉指引下迷途知返。”【176】

巴基斯坦某些政府部门对本·拉登的支持反映了巴方对阿政策的又一个矛盾。个中详情，在本书的第14章有所详述。作为巴基斯坦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当局和巴军方以及情报部门关系极深。但是另一方面，塔利班和本·拉登容留了大量克什米尔武装分子，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也符合巴方利益，完全没有予以制止的必要。因此，虽然美方多次催促三军情报局加入追捕本·拉登的战团，巴方仍予以拒绝。不过，巴情报部门仍然帮助美国人缉捕了不少本·拉登的走卒。没有巴基斯坦的鼎力支持，美方断无可能展开一系列的抓捕行动，而有针对性的精确打击也需要巴基斯坦的国土作为基地。而且，美方也不敢揭露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之间的盟友关系，因为他们还指望三军情报局帮助自己缉捕本·拉登。

沙特阿拉伯面对的情况更为糟糕。1998年7月，图尔基王子访问坎大哈，几个星期之后，王子赠送塔利班方面的400多辆小汽车便出现在阿富汗。这批礼物来得过于迅速，车上的迪拜牌照都还没来得及换掉。同时，沙特方面还给了塔利班大量金钱，以便他们能在秋季攻势中顺利攻下阿富汗北部。沙特阿拉伯当局对塔利班的各项资助持续不断，但是，他们并没有催促自己的阿富汗盟友尽快引渡本·拉登。【177】沙特阿拉伯当局的沉默耐

人寻味，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沙特方面并不很想缉捕本·拉登，只希望这位不受欢迎的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异国他乡。倘若他真的落入美国人之手，很快，这位恐怖大亨和王室及部分情报官员之间的关系将会暴露。那样后果不堪设想。只要本·拉登不被美国人逮到，不管他是丧命，还是被塔利班当成座上宾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便是沙特阿拉伯的态度。

1998年非洲使馆爆炸事件之后，美国进一步向沙特方面施加压力。图尔基王子再次来到坎大哈，这一次，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务是劝说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奥马尔对此严辞拒绝。此后塔利班领袖甚至出口伤人，对沙特王室进行了一番不敬，引得图尔基王子大发雷霆。根据本·拉登的描述，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他（图尔基王子）要求奥马尔毛拉出卖我们，要么把我们交还沙特方面，要么把我们赶出阿富汗。显然，出卖奥萨马·本·拉登不是沙特当局的要求，而是美国指使图尔基所为。”^{【178】}沙特方面对于奥马尔的行径十分恼火。作为报复，沙特当局和塔利班政权建交的行动暂时中止，而沙特方面也在表面上停止了对塔利班的援助。不过，沙特阿拉伯当局并没有认清塔利班的真面目。

本·拉登在塔利班运动内部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力。不过，双方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如是。1996年夺取喀布尔之前，塔利班政权和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并没有任何交往，而且，阿拉伯人推崇的泛伊斯兰思想在塔利班分子之中也没有任何市场。塔利班和本·拉登之间的关系，源自巴基斯坦方面的引荐。巴方的目的是从塔利班手中获得霍斯特训练营地以培训克什米尔武装分子。巴基斯坦的劝诱和本·拉登的金钱都让塔利班官员动心不已。而且，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塔利班人士的头脑中也有着模糊的泛伊斯兰思想。因此，塔利班和本·拉登进行了接触，并交出了霍斯特训练营地。

1997年，塔利班将本·拉登等人转移到了坎大哈居住。这一举措部分是为了沙特客人的安全考虑，部分出于对控制这位阿拉伯恐怖大亨的必要。一开始，本·拉登就如同入住宾馆，事事需要花钱。沙特客人出资为奥马尔及其家人修建了一所别墅，对于其他塔利班领导人也是多有钱物孝敬。同时，他还承诺帮助修葺坎大哈机场高速，并承建几座清真寺、学校和水坝。不过，这些民生工程从未真正动工，因为沙特客人的资金链早已被冻结。本·拉登的生活方式引人侧目，他有着宽大的宅邸，成群的家眷、仆役和随从和他居住在一起。阿拉伯人的举止十分傲慢粗鲁，而本·拉登承诺的



民生工程又一个个相继沦为烂尾工程。这一切都让阿富汗本地百姓十分不满。部分人甚至认为，塔利班已经被这些阿拉伯人操控。

1997—1998年间，数百名阿拉伯裔阿富汗人随塔利班部队一起对反塔联盟发起攻击，本·拉登的身价随之进一步上升。这些瓦哈比主义武装分子参与了塔利班对于哈扎拉人的屠杀。此外，隶属于里什科尔（Rishkor）守备部队的几百名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和塔利班部队一起抵抗马苏德武装的进攻。本·拉登的世界观也越来越受到塔利班领导层的认同。阿拉伯客人常常和各位塔利班领导人彻夜长谈，并借此控制了主人们的思想。在他到来之前，这些领导人一味追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对于美国及西方阵营并没有特别的仇视。不过，非洲使馆爆炸事件之后，塔利班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美国、联合国、沙特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各个政府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寇。这些态度显然并非源自塔利班自身，而是本·拉登及其同伙想法的真切反映。美国一再向塔利班政权施压，要求奥马尔驱逐本·拉登。而塔利班也针锋相对，声称本·拉登是自己的客人，把客人赶出家门有悖于阿富汗传统。不过，塔利班很快发现自己对本·拉登的包庇可能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于是，塔利班政权试图和美方展开一次交易——用本·拉登换取美国人的外交承认。1998年冬天之后，本·拉登实际已经成为塔利班手中的一张王牌，可以随时甩出来和美国人讨价还价。

为了和奥马尔联系，美国国务院开通了一条卫星电话专线。通过翻译的帮助，美方和奥马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虽然双方都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会议却未能得出任何结果。^{【179】}1999年初，塔利班开始对美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定不再等待美方的折中方案，转而将拉登当作依靠。

阿拉伯籍圣战人员在阿富汗的经历有如一个循环。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势力微不足道，只是圣战组织中的一抹点缀。谁能想到，这些外来客在90年代反客为主，不但在阿富汗呼风唤雨，还成了中亚各国和西方世界的关注中心。1992—1996年之间，阿富汗一直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避难所。这些客居阿富汗的极端分子威胁着冷战后的世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对这一问题置若罔闻，如今，华盛顿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世界各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齐聚阿富汗，令美国和西方世界难以应对。

第三部分

新一轮的大博弈

The New Great Game

第 11 章

独裁者和石油大亨：塔利班和中亚、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的纠葛

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abad）新的国际机场落成于1996年。候机楼既宽大又豪华，主人原以为络绎不绝的西方航班会给这个富有油气资源的沙漠国家带来如织的人流，结果却是一场空。不出几个月，候机楼被迫关闭了一半设施，以节省运行费用。剩下的那一半也是门可罗雀，一周只有几个航班到访，惨淡的状况直到1999年也没多少改善。

1999年，在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边界上的小城萨拉赫斯（Sarakhs）有一座新火车站刚刚竣工。站内的墙壁和票务台都由大理石雕琢而成，站外酷热难当，红沙在呼啸，黑沙（当地语言称为“卡拉库姆”）也不平静，它们拍打着车站大楼。一条由伊朗建设的铁路将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Meshad）和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连接起来，萨拉赫斯正是铁路进入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第一站。自70年前断绝交通后，这条新铁路重新将中亚国家和南方的穆斯林兄弟联系在一起。不过，由于每周只有两趟货客列车从伊朗前来，新车站大多数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诸国都把连接外部世界的交通作为当务之急。不过，当地的交通问题在此后十多年都未能解决。传说中丝绸之路上骆驼商队穿梭不停的胜景一直未能再现。前面提到那些豪华大气的交通设施，都是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Saparmurad Niyazov）的大手笔，它们体现着总统先生宏大的愿望和未



竟的梦想。土库曼斯坦拥有420万人口，国家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而尼亚佐夫也吝于将钱花在民生问题上。总统先生更喜欢用金钱去实践自己那些个人癖好。1999年12月，他曾经向笔者表示土库曼斯坦会成为“新的科威特”。^{【180】}如今，尼亚佐夫的宏愿随着他那些沙漠伟迹一起变得遥不可及。

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却一直难觅销路。不仅因为地处闭塞，邻国的妒意也是一大原因——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似乎都不怀好意。一直以来，土库曼斯坦等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亚油气管线的建设，以摆脱对于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油气管线一开，自然而来的硬通货可以帮助这些国家重启因苏联解体而崩溃的经济。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治下的70多年间，土库曼斯坦的一切交通，无论公路、铁路还是油气管线，都朝着俄罗斯所在的东方而建。时代不同了，土库曼斯坦人更想找到通往阿拉伯海、印度洋、地中海和中国的道路。

过去几年，每当提到里海沿岸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能源储量的丰富程度，各界人士都极尽夸张之能事。90年代早期美国方面的探测认为，里海地区石油储量在1 000亿~1 500亿桶。这个数字显然太过浮夸，如今的估计已经下降了一半。个别人甚至认为，当地储油量不过500亿桶而已。实际上，当地已被核实的石油储量约在160亿~320亿桶，而美国储油量为220亿桶，北海地区为170亿桶。如此算来，里海地区石油储量约为中东的6.7%~10%。

不过，里海地区也许是最后一块未开采的处女地。它的开放，对于各大石油公司有着极大吸引力。1991—1992年，西方石油公司的兴趣还在西伯利亚西部，此后，1993—1994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哈萨克斯坦。1995—1997年，阿塞拜疆成了西方石油公司的新落脚点。在这之后的1997—1999年两年间，西方人终于来到了土库曼斯坦。1994—1998年，13个国家的24家公司都在里海沿岸地区签订了开采合同。里海沿岸各国之中，哈萨克斯坦拥有最大的石油储量，预计达到850亿桶，不过只有100亿~160亿桶得到证实。

而阿塞拜疆预计中的270亿桶原油之中也只有40亿~110亿桶落到了实处。土库曼斯坦的320亿桶预计储量中有15亿桶得到确认，而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储量始终只停留在预计数字上，据说这个国家拥有10亿桶原油。

美国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为300万亿立方英尺，而里海沿岸地区的储量

约在236万亿~337万亿立方英尺。土库曼斯坦以159万亿立方英尺而成为世界第11大天然气出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坐拥110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哈萨克斯坦储气量为88万亿立方英尺，而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共有3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181】

谋划中的油气管道、潜在的交通路线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困扰着中亚各国的领导人。1996年，里海沿岸地区每天约出产100万桶石油，其中的30万桶用于出口。出口石油大部分来自哈萨克斯坦。不过，只有一半出口到苏联地区之外。里海沿岸地区的产油量只占全世界的4%。1996年，该地区的天然气产量达到3.3万亿立方英尺，其中的0.8万亿立方英尺出口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外的地区，而土库曼斯坦是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在这种情况下，油气管线的建设迫在眉睫。

外来势力对中亚石油的争夺，让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在中东发生过的故事。不过，如今的中亚情势，比起当年的中东更加复杂和诡异。俄、美和新兴大国，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土耳其等邻近国家无不参与其中。中亚诸国自己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别提那些最厉害的角色——石油公司。在中亚舞台上，各国政府、各种专家、各大公司轮番登场，上演了“新一轮的大博弈”——这是笔者一篇文章的题目，写于1997年，用来形容这各种势力之间的争夺还真贴切。【182】

1989年，笔者第一次来到中亚采访。当时，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行经济改革。笔者确信，苏军撤离以后，民族问题将成为阿富汗的下一个导火索。而要了解阿富汗境内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的起源，必须到他们的祖籍国走一趟，这也是笔者那次中亚之行的目的。此后，我多次回访中亚，探寻当地发展的远景。苏联的崩溃让那里本已复杂的民族和政治局势变得更加迷乱和动荡。1991年12月12日，笔者在阿什哈巴德停留，恰巧中亚各国领导人在当地召开会议。他们要讨论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裁军问题和国家独立后的出路。

对于独立，新国家的领导人们并不情愿。相反，失去了苏联体制的安全庇护和经济支持，他们十分忧心新国家的命运。几个月之内，中亚前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便陷入了风雨飘摇。危局之下，石油资源和相关管线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中亚各国领导人开始和西方石油公司展开谈判，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和美国谢夫隆公司（Chevron）之间旷



日持久的会谈。几次中亚行的见闻被笔者汇总成为一本有关当地问题的著作。在那本书中，我曾经下过定论，认为阿富汗的四分五裂会给中亚诸国带来严重影响，而油气管线问题则会成为决定这一地区未来地缘政治形势的要素。【183】

新的“大博弈”出现的时候，旧的“大博弈”并没有过去多久。那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暗战，发生在19世纪末，斗争的双方分别是英属印度为基地的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斗争的目的是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统治权。1898年，即将上任的印度总督寇松爵士（Lord Curzon）曾经写道：“土库曼斯坦、阿富汗、里海沿岸、波斯（Persia，伊朗），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字眼象征着边远和蛮荒，代表了沧桑和衰亡。可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而棋局的目的是征服世界。”【184】

英、俄都致力于扩张势力范围，英国势力从印度进入阿富汗，而沙俄军队征服了中亚地区。阿富汗正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英方担心，一旦阿富汗统治者被莫斯科当局买通，沙俄可以通过土库曼直接进攻英属俾路支斯坦。而沙俄方面也是满怀忧虑，因为英国人可以煽动布哈拉（Bukhara）和浩罕（Kokand）的封建王公和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部落进行叛乱，从而削弱自己的统治。两大帝国博弈的焦点，在于各种各样的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英、俄势力都投入了巨大心血。沙俄的铁路线穿越整个俄占中亚，直抵与阿富汗、波斯和中国等国的边界。而英国经营的铁路横跨英属领地，把印度和阿富汗连成一体。

新一轮的“大博弈”仍然是大国之间的角逐。俄罗斯虽然已经衰弱，但仍将中亚地区视为自家领地的边界，它力图扼住中亚油气管线的走向，从而控制当地石油的流向。美国是“大博弈”中的新角色，中亚油气管线通过俄罗斯显然不是美国所愿，因此美方要介入中亚，竭力阻止。大博弈之中的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目标很一致，他们都力图争取有利于己的油气管道线路图。三国的交通线路都铺设到了中亚的路口，未来的油气管线是往东、往西还是往南？这是伊、土、巴三方最为关注的。中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者。首先，中国新疆和中亚诸国比邻而居，边境上生活着许多跨境民族，中亚的形势关乎新疆的稳定；其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能源安全的要求日趋增加。因此，中国势必追求在当地增加政治影响力。作为地主的中亚诸国，也各有各的打算，为着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

的各行其是。国与国之间暗流涌动，而欧、美、亚各大石油公司已经展开了直接的争夺。

19世纪的阿富汗是英俄博弈的主战场，百年之后，这个动荡依旧的国度仍然是新一轮大博弈的焦点。其中，咄咄逼人的塔利班政权尤为引人注目。未来的油气管线能否穿越中亚，直达南亚，塔利班的态度起着关键作用，而参与博弈的各个国家和各大石油公司也都相时而动，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和塔利班交往的战略。

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如今的塔吉克斯坦全境、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地区的主宰者不是来自喀布尔，就是布哈拉的埃米尔。即便是后者当政，其统治基础也是阿富汗雇佣兵。这片土地上没有边界，各路豪强——从部落首领到江洋大盗和宗教领袖，都习惯到别人的地盘上寻求庇护。这种传统流传至今，不久之前的1997年，塔吉克斯坦还将本国南部的库里亚布（Kuliab）空军基地交给马苏德武装作为庇护，为后者获取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大开方便之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阿富汗和中亚的纽带宣告断裂。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关闭了和诸多伊斯兰教国家接壤的南部边界。当这条边界重新开放之时，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1991年，这正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开始。

如今的阿富汗有三个北方邻居：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只有土库曼斯坦拥有丰饶的能源矿藏。最东边的邻居塔吉克斯坦的人口达到500多万，帕米尔高原横贯全境。塔阿边境绵延640英里，两国之间只隔着一条阿布河。塔吉克人占阿富汗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更多的塔吉克裔分布在中亚各国，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20万塔吉克族。2000~2500年前，一些伊朗语族部落（波斯部落）来到中亚定居。他们便是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而塔吉克人也是唯一没有突厥血缘的中亚民族。而正是蒙古高原上突厥语系民族的入侵，造成了塔吉克人在中亚的边缘化。

在古代，塔吉克斯坦一度是整个中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后来成为突厥部落西去进犯伊朗、俄罗斯和欧洲的必经之道。1868年，沙俄夺取了塔吉克斯坦北部，并将其纳入俄占“土耳其斯坦”（Turkestan）。1884年，争斗得不可开交的英、俄两国划定了中亚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而沙俄趁此机会将塔吉克斯坦南部一并吞入囊中。



1924—1925年，随着斯大林大笔一挥，苏联的5个中亚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就此确定。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都是塔吉克历史文化名城，在斯大林的导演下却成了乌兹别克斯坦领土的一部分。塔—乌关系因此罩上一层阴霾，至今未消。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全无历史上的风采，政治上缺乏影响力，经济也十分落后。斯大林留给塔吉克斯坦的负资产不止于此，他制造的戈尔诺-巴达赫尚（Gorno Badakhshan）自治州也让塔吉克人十分头疼。戈尔诺-巴达赫尚位于帕米尔山区，虽然只分布着塔吉克斯坦3%的人口，却分去了这个国家44%的领土面积。塔吉克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而戈尔诺-巴达赫尚的土著族群则多为什叶派。这些土著之中既有伊斯玛仪派（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系）信徒，也有阿迦·汗（Agha Khan）的追随者。阿富汗境内的巴达赫尚地区也是他们的生活范围。

十月革命之后数月，中亚各地的穆斯林武装纷纷起兵反对新生的苏俄政权。这些布尔什维克口中的“中亚叛匪”（Basmachis）打出了三面旗帜——反共、爱国和护卫伊斯兰教。60年来，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口号也不过如此。出于反苏的需要，英国势力大力支持叛匪对抗苏联红军。1919年，阿富汗统治者在英国唆使下为叛匪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数千名塔吉克叛匪顽抗长达10年，终于在1929年彻底失败，残余势力随后逃往阿富汗北部。

20世纪80年代，相同的战况重演了一次。在美国煽动下，阿富汗圣战组织主动出击，进入苏联境内破坏军事邮政设施。圣战组织的反抗活动，让苏军感觉似是故人来。因此他们也成了苏联人口中的“中亚叛匪”。

作为苏联大家庭的一员，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始终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这个边陲小国完全依赖中央的经济补助度日。苏联解体之后，塔吉克斯坦国内的种种矛盾面临总爆发，塔吉克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芥蒂不少，而塔吉克人内部的部族纠葛也一并升级，最终酿成了一场内战（1992—1997年）。一方是奉行“新社会主义”的政府，一方是诸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结果国家彻底破产，无数难民逃往阿富汗北部。值得一提的是，塔吉克斯坦政府得到了俄罗斯军队的鼎力支持。1993年，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公然宣称，塔阿边界“实际上也是俄罗斯的境界”，因此，塔境内的2.5万余名俄军官兵肩负着守土之责。叶利钦的一番话，可以看作莫斯科重回中亚的宣言。【185】

最终，塔吉克斯坦政府和反对派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不过，内战双方都无力为对立中的塔吉克诸部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总之，塔吉克斯坦内部离心离德，而且“塔吉克斯坦缺乏有远见卓识的本土知识阶层，无法形成有效的民族主义思潮，将人民和土地联系起来”。因此，阿富汗各派军阀的影响力便趁虚而入。^{【186】}

塔吉克斯坦内战双方都和马苏德武装有过合作。许多塔吉克人视马苏德为民族英雄，因为他挺身抗击塔利班。而塔利班则认为这位军阀阴谋分裂国家，意图将阿富汗的巴赫达尚并入塔吉克斯坦，实现“大塔吉克斯坦”的梦。对于这番指控，马苏德一再否认。不过，塔利班的话反而助长了马苏德在塔吉克人心目中的声望。至于塔吉克斯坦眼里的塔利班，那是一群标榜原教旨主义的异类，和中亚地区温和的苏菲派信仰格格不入。而塔利班背后的普什图扩张主义，更是塔吉克人不能容忍的。

再说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该国境内活跃着许多支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其中有不少都在阿富汗军阀的支持下，让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深为忌惮。作为中亚人口最多也最为骁勇的民族，乌兹别克人占据了中亚的中心地带，他们的领土不但是当地的宗教核心，也是地缘政治的心脏。乌兹别克斯坦和所有其他中亚国家都有接壤，国内两大城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都是文明古城，2500年来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衰。而且，这里还是伊斯兰教走出阿拉伯地区后落脚的第一站。据统计，中世纪的布哈拉坐拥360座清真寺、113家经学院校。直到1900年，当地还活跃着100多所经学院校，1万多名学生就读其中。250英里长的费尔干纳（Fergana）河谷是中亚地区最富饶的农业区。这一带宗教氛围浓重，叛匪时常出没，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乌兹别克人自认为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后代。1500年，隶属蒙古帝国的昔班尼部（Shaybani）征服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及阿富汗北部地区。

自踏入中亚地区以来，乌兹别克人一直寻求地区主导权。乌兹别克斯坦拥有2200万人口，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外，还有600万乌兹别克人居住在其他中亚国家，他们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民族。如此一来，卡里莫夫总统的同盟军遍布整个中亚。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的中亚叛匪事件，让200多万乌兹别克人迁居阿富汗北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也生活着2.5万多名乌兹别克人（即乌孜别克族）。

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前，苏联中央政府曾和塔什干方面合作，谋划并煽动阿富汗境内的乌兹别克人在阿北部建立了由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控制的“保护区”，防止圣战组织渗入该地区。此后近10年，这一政策十分奏效。莫斯科当局和塔什干方面共同扶植的拉希德·杜斯塔姆（Rashid Dostum）将军牢牢控制着阿富汗北部的6个省，令圣战组织和此后的塔利班都奈何不得。1994年之后，卡里莫夫多次施展手腕在中亚诸国和俄罗斯之间穿梭牵线，意图组成反塔利班的统一阵线。不过，1998年马扎里沙里夫的陷落让塔利班控制区和乌兹别克斯坦毗邻而立，卡里莫夫的反塔政策随之破产。马苏德本可以成为卡里莫夫的新盟友，不巧的是，这位军阀是塔吉克人。如此一来，乌兹别克斯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渐渐式微。

卡里莫夫不但败走阿富汗，在塔吉克斯坦的经营也以吃瘪告终。乌兹别克人占塔吉克斯坦总人口的24%，1992年，卡里莫夫当局开始向塔吉克斯坦方面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后者镇压宗教极端组织。时至1996年，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始和叛军进行磋商，卡里莫夫趁机煽动塔北部乌兹别克人进行暴动。其目的在于迫使塔内战双方给予境内乌兹别克人更多的自治权力。此外，对于塔吉克斯坦内战双方组成联合政府的努力，卡里莫夫坚决予以阻挠。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登上庙堂，可能在乌引发连锁反应，这可不是卡里莫夫想看到的。他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控制森严，权力高度集中的警察国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内乱，正是这位总统厉行专制的口实。卡里莫夫在国内的主要敌人是宗教极端分子，其中有一些属于瓦哈比主义者（Wahabbis）。他们聚居在费尔干纳河谷一带。20世纪80年代，这些人不是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秘密学习，就是亲身参与了阿富汗的圣战组织训练营，他们自然而然地和塔利班搭上了关系。

中亚五国之中，就数乌兹别克斯坦对原教旨主义最为严厉。卡里莫夫不但严格限制宗教学校的开办，对于蓄须行为也非常反感。这位总统习惯把国家动荡的责任归罪于“瓦哈比教徒”——这个字眼在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名词。

不过，当时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中，有一半都未满18岁。国民经济混乱不堪、通胀失控、失业成群，这些年轻人躁动不安。不过，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就国力而言，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翘楚，但这个国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两极化也是中亚之冠。卡里莫夫对于阿、塔局势的干涉助长了乌国

内伊斯兰极端武装的气焰。

不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资源不但足以自给，还可以在未来出口海外。因此，它在新一轮大博弈中仍是主要角色。西方石油公司刚进入中亚市场的时候，塔什干政权的邻国都得到了大笔的合同和外国投资，让晾在一边的卡里莫夫十分眼红。

但总统先生本来就不打算放松经济管制来换取西方投资者的青睐。随着油气出口量的增加，乌兹别克斯坦开始谋求符合本国利益的油气管线规划方案。利己之余，卡里莫夫政权不忘损人，削弱邻国经济、增加自身影响力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在大博弈中的目标。

阿富汗境内约有50万土库曼人，同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一样，他们的到来也是1920年苏联内战的后果。19世纪早期，阿萨里部（Esari）成为第一个徙入阿富汗的土库曼部落。一个世纪之后，泰克部（Tekke）因被红军击败而步埃萨里部后尘。土库曼斯坦是一个遍布沙漠和山地的国家，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土库曼部落的家园。历史上，土库曼人一直顽强抗击外来侵略者，不过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沦为波斯、突厥和沙俄的附庸。19世纪之前，土库曼人在中亚地区往来游牧，来去自由，任何边界对于他们都没有意义。如今，仍有30万土库曼人生活在伊朗，17万人生活在伊拉克，8万人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有数万土库曼人。泰克部是最大的土库曼部族，1870年，沙俄势力侵入土库曼，随即遭到泰克部的抵抗。1881年，泰克武装在泰佩（Geok Tepe）全歼俄军。次年，6 000余名土库曼骑兵在沙俄的报复行动中丧生。1916年，土库曼人在传奇领袖穆罕默德·库尔班·居奈德·汗（Mohammed Qurban Junaid Khan）的领导下再次投入艰难而漫长的抵抗战争。在此期间，白军和红军先后进入土库曼，正是后者在1927年彻底击溃了居奈德·汗的武装，土库曼民族英雄不得不逃往阿富汗。

苏联时期，土库曼斯坦一贯不被中央政府重视。各加盟共和国之中，土库曼斯坦的失业率最高，婴儿死亡率也最高，而工业化程度位居倒数第二，只比邻近的塔吉克斯坦好一点。^{【187】}

苏联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工业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漠视了土库曼斯坦这块潜在的能源宝库。不过，1989年，土库曼斯坦向其他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出口了3.2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所得资金占了该国当年财政收入的47%。

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的老客户先后独立建国，然后个个陷入经济困境。它们无力承担亏欠土库曼斯坦的油气债。1991年10月，土库曼斯坦外长阿夫德·库利耶夫（Avde Kuliyeu）曾经无奈地告诉笔者：“现在真不知道该把石油卖给谁，也不知道谁付得起钱了。”【188】

土库曼斯坦最大的麻烦是地理位置。南邻伊朗不为美国所容，不可能成为能源通道；东邻阿富汗陷于内战；北方的俄罗斯则是竞争对手。为了西伯利亚天然气的顺利出口，俄罗斯方面对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西方一事一直持阻挠态度。截至1992年，乌克兰、亚美尼亚乃至俄罗斯都先后拒绝支付欠下的用于购买土库曼石油的费用。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完全仰仗前苏联时代修建的管线进行泵送，而这些管线在苏联解体后被俄罗斯接管，莫斯科当局对土库曼天然气的掌控能力可见一斑。欠费逐渐高筑，到1994年达到了10亿美元，尼亚佐夫总统随之中止了对邻国的天然气供应，导致当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产量下降到0.73万亿立方英尺，不足5年前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

孤立伊朗是美国的一贯政策，但可不是土库曼斯坦政府的明智选择。作为近邻，伊朗为土库曼斯坦提供了通往南方和大海的捷径。尼亚佐夫巧妙地瞒过了华盛顿当局，成功从伊朗方面获取了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的援助。1997年，连接土、伊两国，由伊方援建的天然气管线宣告竣工。管线全长119英里，东起土库曼斯坦西部的科佩泽（Korpedzhe）气田，西达伊朗东北部的科尔德-库伊（Kord-Kuy）。通过这条管线，土库曼斯坦出口的天然气可供伊朗东北部地区使用。【189】

科佩泽到科尔德-库伊之间的天然气管线是十几年来中亚国家争取油气出口道路的唯一成果。除了拉拢伊朗，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尼亚佐夫争取的合作伙伴。西方人的介入可以帮助土库曼斯坦摆脱俄罗斯的桎梏。1992年4月，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和伊朗三方曾经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一条经过土耳其前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工程预计将花费25亿美元。管线一直未能开工，而且考虑到美国的态度，土库曼斯坦方面不得不多次对管道线路作出修改，以绕开伊朗领土。几经波折之后，有关土-土油气管线的合约终于在1999年2月敲定。这一次，伊朗元素被完全清除，首先，签约方变成了美国公司；其次，管线将通过里海海底到达阿塞拜疆，最后抵达土耳其，回避了任何进入伊朗的可能。【190】

为拯救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尼亚佐夫一直为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寻找其他出口路线。1994年^{【191】}，通往中国的油气两用管线曾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条东去之路长达5 000英里，造价达200亿美元，一直处于调研阶段未能开工。同年，阿根廷石油企业布里达斯（Bridas）向土方提议，开建一条经阿富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此前，阿根廷公司已经获得了在土库曼斯坦的特许经营权。他们面临着优尼科公司（Unocol）的竞争。美国石油巨头也有着和阿根廷同行一样的规划，而且还拥有华盛顿当局的鼎力支持。两大公司之间的龙争虎斗，将是本书下两个章节的主要内容。

不过，他们最后都败在了塔利班和其他阿富汗军阀脚下。新一轮大博弈的第一战，以阿富汗起到决定作用而告终。

土库曼斯坦拥有漫长的边境线，由于国家贫弱，尼亚佐夫的政府无力组织强大的军队对本国毗邻阿富汗、伊朗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量地带进行巡逻和守卫。而且，土乌关系一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土库曼斯坦政府一直秉承中立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尼亚佐夫当局逃避俄罗斯影响力，避免重回苏联体系牵制的一大理由。奉行中立还使得阿什哈巴德方面安然置身于阿富汗内战之外。尼亚佐夫拒绝加入反塔利班联盟，让塔什干和莫斯科当局都十分恼火。在1992年喀布尔陷落之前，土库曼斯坦一直向控制当地的社会主义政权出售柴油。此后，赫拉特军阀伊斯梅尔·汗（Ismael Khan）也长期得到土方的柴油供应，直到1995年赫拉特被塔利班占领为止。而后，赫拉特的新统治者随即变成了土库曼斯坦柴油在阿富汗的新买家。土库曼斯坦驻赫拉特领事馆和当地塔利班长期维持着友好关系，而在反塔联盟的中心马扎里，土库曼斯坦领事馆和主人的关系也不错。总之，土库曼斯坦对塔利班是拉拢多过抗衡，这在中亚国家里是个特例。

和其他中亚领导人一样，尼亚佐夫总统厉行专制。他镇压反对派、实行媒体审查制度、坚持国营经济。此外，尼亚佐夫还照搬了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他的画像和雕塑在国土上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为了让总统画像能遍布土库曼斯坦的每一个角落，政府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尼亚佐夫和卡里莫夫虽然不共戴天，却有着几乎一致的经历——同为孤儿，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保幼院长大，同样早早地加入了各自国家的共产党。苏联解体前，两人担任着同一种职务，都是所在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同样的教育背景，相似的成长环境，让两位总统对那个逝去的制

度怀有一样的忠诚。但是，他们也都有着同样的政治技巧，能在新一轮的大博弈中翻云覆雨。

中亚及附近地区各国之中，要论从苏联解体中获益最大的一方，非土耳其莫属。几个世纪以来，俄国都是土耳其的最大敌人。从17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土俄之间爆发过数十次战争。土耳其的种种外交作为，比如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及谋求成为欧盟一员，都是该国政府在俄国威胁下做出的抉择。不过，中亚各国的独立，让土耳其有了继承一笔历史遗产的感觉。

泛突厥主义思潮认为，东起中国，西到地中海的广袤地方都应该是土耳其的疆土。沉迷于这个春秋大梦的土耳其学者不乏其人，但安卡拉当局的外交动作甚少引以为据。1991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泛突厥主义不再可梦而不可即，它实实在在地变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要知道，从伊斯坦布尔一路东行穿过高加索地区到达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路分布的许多民族都属于突厥语族，他们可以用民族语言和土耳其人交流无碍。在中亚国家眼中，土耳其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模范——既保留了伊斯兰教传统，又维护了世俗国家的性质。而土耳其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安卡拉当局意图通过加强自身在中亚的影响力，而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因此，为拉拢高加索和中亚各国，土耳其不惜工本，提供了大量援助，具体的项目包括：开通直达各国首都的航线；通过卫星向各国播送土耳其电视节目；向各国学生提供数千个奖学金项目；帮助各国培训外交人员、士兵和银行家。泛突厥国家峰会也在筹备之中。1991—1998年间，土耳其的各类公司在该地区的投资达到15亿美元，是当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要获取中亚影响力，必须安抚俄罗斯，土耳其当局十分清楚这一点。为此，安卡拉当局主动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并扩大了对俄贸易。1990年，土俄双边贸易额不过19亿美元，7年之后，这一数字膨胀到了41亿美元。^{【192】}同年，土耳其的入盟请求遭到欧盟拒绝，愤怒的土耳其人转而加强了同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亚地区的关系。

新一轮的大博弈中，土耳其的位置不可或缺。出于能源需求，也为了加强在中亚的影响力，数届土耳其政府都摆出姿态，争取成为中亚石油出口的主要通道。1997年夏天，在土、美两国的合作策划下，一条“交通走廊”呼之欲出。走廊之中，横贯着一条石油管道，东连阿塞拜疆首都巴

库，西接土耳其境内地中海港口杰伊汉，穿越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石油可以通过这条管线进行运输。管线是美国方面的主意，美方认为，只有哈、土两国的参与才能缓解这条耗费巨大的漫漫长线所承受的财政压力。^{【193】}美国人希望，土库曼斯坦方面能主持修建一条海底管线，横穿里海同巴库-杰伊汉能源走廊进行对接。

同样的要求也被转达给了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两个油田——腾吉斯（Tenghiz）和卡拉察格纳克（Karachagnak）的开采权都在西方公司手中，而乌赞（Uzen）附近的第三大油田则由中国方面负责。^{【194】}美国提出巴库-杰伊汉方案之前，哈萨克斯坦已经规划了从腾吉斯到俄罗斯黑海港口诺沃罗斯聂斯克（Novorossiysk）的石油管线。不过，美国和土耳其的方案为哈方提供了多项选择，以及摆脱俄罗斯控制的途径。

阿塞拜疆国际运行公司（AIOC）全权掌管着该国的石油工程。这家公司由十几家来自不同国家的石油公司组成，阿国石油界的实权人物也参与其中。他们并不看好巴库-杰伊汉管线，原因很多——耗费过大，线路过长，而且途经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受当地动荡局势影响太大。^{【195】}1998年之前，美国方面一度十分热衷的阿富汗管线工程搁浅已成定局，巴库-杰伊汉走廊因此成了华盛顿当局在里海地区的最重要的能源项目。

此后，围绕着巴库-杰伊汉走廊的各种话题一直喧嚣不断，直到1998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所有的争议都戛然而止。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创造了每桶13美元的历史新低。一年之前，每桶原油的价格还是25美元。如此一来，中亚石油的生产和运输费用都显得过于高昂，开采的一系列动作不得不缓行。当时，中亚石油的单桶价格为18美元，仅仅能够保本。^{【196】}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美国方面建设巴库-杰伊汉的战略决心却没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也是阿富汗圣战组织的支持者之一，只不过投入相当有限。随着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甚嚣尘上，安卡拉当局开始大力扶植阿富汗当地的突厥语民族，乌兹别克人是他们重点栽培的对象之一。土耳其政府不但给与杜斯塔姆财政支持，还两次为这位军阀敞开大门，提供庇护。土耳其方面对塔利班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招致传统盟友巴基斯坦的非议。不过，塔利班的威胁倒也促使土耳其和伊朗关系的暂时缓和。

此外，由于土耳其的引荐，以色列也开始介入阿富汗局势。1993年，土以签订奥斯陆协议。此后，两国军事和战略关系逐步密切，不断升级。

以色列的反塔利班立场并非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对于活跃在美国的某些犹太说客来说，塔利班也不是天生就面目可憎。^{【197】}一开始，以色列人认为塔利班可以为己所用，在中亚牵制并打压伊朗的影响力。而且，优尼科公司承建的油气管线可以让伊朗的中亚油气管线梦想落空。为此，摩萨德（Mossad）和塔利班进行了接触，会谈在后者位于美国的联络办公室举行。此后，以色列情报机构还跟多家石油公司沟通了同样的问题。

为了摩萨德和塔利班的会谈，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出力不小。虽然巴基斯坦政府并未承认以色列，两国情报部门却因为阿富汗圣战而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搭上了关系。在土耳其支持下，以色列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建立起了密切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以色列企业在上述三国的投资涉及农业、石油和通讯。

随着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改变，以色列政府也掉转了方向，一切都源自塔利班对本·拉登的庇护和对毒品交易的鼓励。土耳其方面的表态让以色列确信，塔利班是中亚安全的重大威胁，并可能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策源地。随着优尼科项目的流产，以色列彻底明白了其中亚盟友和土耳其的反塔利班态度。摩萨德和反塔联盟开始公开接触。虽然对亲伊朗的马苏德武装怀有猜忌，但为了阻止塔利班占领整个阿富汗，以色列并不吝于提供援助。这也成为了塔利班攻击北方联盟的口实，当然，北方联盟也以同样的借口指责塔利班。

在新一轮大博弈中，伊朗一直扮演着不可预知而又至关重要的角色，1999年油价的下跌更助长了伊朗的能力。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知的石油储量为930亿桶，而石油产量达到360万桶。由于油价走低，导致管线工程停滞，伊朗方面更是主动敞开国土，呼吁中亚各国利用南北走向的管线工程将本国的天然气输送到海湾地区。伊朗方面的提议十分便捷，只需要将国内已有的管线工程和阿塞拜疆联通即可，其造价远低于土耳其方案。时任伊朗石油部助理部长的阿里·马杰迪（Ali Majedi）在奥斯陆表示：“油气管线经过伊朗，是最安全、最廉价和最便捷的选择。我们的方案只需花费30万美元，而如果管线走土耳其一线，则要耗资30亿美元。孰优孰劣，自然清楚。”^{【198】}伊朗的对手不只是土耳其，还有土库曼斯坦。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争夺的焦点在于通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油气管

线。而伊朗明显更有吸引力，因为它的方案绕开了阿富汗。【199】

根据伊朗的计划，伊朗将首先和中亚国家互换原油。1998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就开始将本国的原油经由里海运送到伊朗的奈卡（Neka）港，提炼之后完全用于伊朗本国市场消费。作为交换，伊朗允许石油公司通过伊朗港口和领土将石油输送到海湾地区。由于阿富汗管线建设的停滞，石油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伊朗。虽然美国的态度依然强硬，各公司还是开始和伊朗方面磋商交换的具体问题，就连美国的公司也不能免俗。1998年5月，谢夫隆和美孚两家公司向克林顿当局提交申请，要求得到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换的许可。美国政府对此十分头痛，而这一情况也将影响美国对伊禁运政策的未来走向。【200】

中亚到南亚的油气管线的安全建设，最终必须建立在阿富汗内战结束的基础上。联合国阿富汗问题调停专员拉赫达尔·布拉希米（Brahimi Lakhdar）曾经向读者表示：“中亚国家对阿富汗的认知分为两面，一是恐惧，二是机遇。恐惧来源于对自身局势的担心，担心阿富汗的内乱可能会波及他们。不管阿富汗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亚国家都不想接受来自喀布尔的任何冒险：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

布拉希米补充道：“至于机遇，则缘于中亚各国摆脱对俄罗斯依赖的渴望。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国纷纷南望，企盼南去的油气管道和交通线路。他们期望喀布尔能有一个负责任、亲邻国的政权。中亚各国想打开南方边界，而不是闭关隔绝。”【201】

新一轮大博弈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俄罗斯经济愁苦万状的日子。不过，莫斯科并未因此放弃参与博弈的雄心。俄美两国对油井的争夺，将决定油气管线竞争的未来。对于维护自家的中亚后院，驱逐美国势力，俄罗斯决不含糊。叶利钦在1998年的一番讲话表明了这种态度，他表示：“某些西方国家掀起了争抢里海地区石油的风潮，我们对此决不能坐视。有些人意图将俄罗斯排除在游戏之外，严重妨碍了我国利益。所谓的管道战争，不过是这一图谋的组成部分而已。”【202】

至于美国，中亚地区的稳定是最大的战略目标。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内战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中亚政策。“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对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混乱局势深感忧虑。他们既担心伊朗插手，也担心国内极端主义



塔利班

的升级。”这是美国苏联加盟共和国研究部特别顾问斯特凡·赛斯坦诺维奇（Stephan Sestanovich）在1999年5月的表态。^{【203】}唯有阿富汗结束内战，中亚各国和石油公司才能有建设通往南亚地区油气管线的信心。而要获得这种信心，绝非近日之功。

第 12 章

塔利班传奇(一): 油气管道战争, 1994—1996年

塔利班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敞开怀抱, 是在卡洛斯·布尔格罗尼 (Carlos Bulgheroni) 访问喀布尔的时候。阿根廷企业家的阿富汗之行关乎金钱, 关乎石油政治, 更把喀布尔的新主人带进了新一轮的大博弈。身为布里达斯总裁, 布尔格罗尼的最大心愿是将公司在土库曼斯坦的油田和印、巴两国连成一线, 这需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总裁先生的宏愿若能成真, 不仅阿富汗能重获和平,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许都能一笑泯恩仇。

20世纪初, 英美各大石油公司都把石油工业视为国际政治的延伸。正因为如此, 石油巨头们纷纷追求政治影响力。对于英美同行的这种石油观, 布尔格罗尼表示深以为然。1995—1996年间, 布里达斯总裁抛下南美的生意, 他的专机先是走遍了阿富汗各地, 又在伊斯兰堡、阿什哈巴德、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辗转。布尔格罗尼先生辛苦奔波一场, 为的是争取政治人物对自己管道计划的支持。笔者不知道他的部下是否怀有同样的热忱, 不过, 他们跟着总裁一路走下来肯定是忙坏了。

布尔格罗尼祖籍意大利, 来自一个团结的大家族。这是一位富有魅力、博学多闻的人, 他不但是企业家, 还拥有哲学家的头脑。关于苏联的崩溃、石油工业的未来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等问题, 布尔格罗尼先生都乐于给出自己的见解, 娓娓道来数小时不绝。他的祖父阿莱杭德罗·安赫尔 (Alejandro Angel Bulgheroni) 开创了布尔格罗尼家族的石油生意, 公司成立于1948年, 正是阿根廷发展民族石油工业的时候。一开始, 布里达斯只

是一家负责服务的小公司。到了1978年，它已经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石油和天然气企业。这都要归功于卡洛斯·布尔格罗尼和他的兄弟阿莱杭德罗（Alejandro Bulgheroni），后者是公司的副总裁。不过，参与土库曼斯坦的油田项目，还是布尔格罗尼家族第一次涉足亚洲。

阿根廷人不远万里而来，其中必有不可抗拒的诱惑。苏联解体才不久，布里达斯公司就忙不迭地踏入了这个新世界。他们在西伯利亚西部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不过初次作战未能告捷。“主要是当地的油气管道和税制有太多问题，所以我们就转战土库曼斯坦了。”布尔格罗尼亲口向笔者解释道，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就布里达斯在阿富汗的种种问题接受采访。^{【204】}1991年，布里达斯公司参加了土库曼斯坦油田的竞标，这还是西方企业第一次参与类似活动。为此，布尔格罗尼先生冒了巨大风险，其他公司的负责人都认为他疯了。土库曼斯坦不但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而且没有任何保护外来投资的法律条例。布尔格罗尼分析认为：“其他公司不愿意去土库曼斯坦，因为他们认为当地虽然有天然气，却无处可卖。而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跨国油气管道解决。既然在拉美能做到，那么在土库曼斯坦也不成问题。”布尔格罗尼先生的热情让尼亚佐夫总统很是受用，要知道，其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对他都是不理不睬。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1991年1月，布里达斯得到了土库曼斯坦东部亚什拉尔（Yashlar）地区的油气开采权。这一地区邻近阿富汗，东北部就是苏维埃时代著名的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气田。一年之后的1992年2月，布里达斯公司又获准前往土库曼斯坦西部里海沿岸的克依米尔（Keimir）地区进行开采。作为土库曼斯坦境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外来石油企业，布里达斯公司获得了丰厚的优惠条件，首先，亚什拉尔油田的收益完全对半分账，而在克依米尔，布里达斯更是享受了总收入的75%。布尔格罗尼称：“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开采苏联时代的气田，必然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反对。因此，我们必须开掘新气田，才能不给俄方干涉的口实。”

为了土库曼斯坦的几处油田，布里达斯付出了4亿美元的投资。那个时候，真正的大石油公司都还徘徊在市场之外，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能拿出这么多钱，实在不容易。1994年，布里达斯公司的克依米尔油田的日均产量达到1.68万桶，所产石油开始向外出口。次年7月，布里达斯锲而

不舍的开采活动终于获得了回报，这第一桶金来自炎热干旱的卡拉库姆（Karakum）大沙漠。新气田也位于亚什拉尔，储气量高达27万亿立方英尺，比巴基斯坦一国的总储气量还多出两倍多。“石油可以慢慢采，但天然气必须马上卖。所以，我们得马上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这是何塞·路易斯·苏莱达（Jose Luis Sureda）的意见。^{【205】}苏莱达是布里达斯公司的一名经理，专门负责天然气运输。为了找出合适的管道路线，这个结实而固执的汉子必须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在阿富汗各地进行调研。

布尔格罗尼认为：“亚什拉尔气田的部分天然气将经北部管线运往俄罗斯，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市场，比如中国和南亚。”他又补充道：“修建一条穿越阿富汗的管线意义重大，这样的工程可以带来和平。任务很艰巨，但不是不可能完成。”1994年，塔利班占领坎大哈。与此同时，在布尔格罗尼的劝说下，尼亚佐夫总统决定成立专门工作组，研究经阿富汗抵达巴基斯坦的油气管线的可行性。

4个月后，布尔格罗尼的游说再次取得成效。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决定和土库曼斯坦方面展开合作。1995年4月16日，巴土双方签署备忘录，允许布里达斯公司展开工程前的可行性调查。贝·布托女士的丈夫，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Asif Zardari）对土—阿—巴管线寄望甚高，他告诉笔者：“这条管道是巴基斯坦通往中亚的门户，它为未来开启了无限可能。”扎尔达里认为，塔利班的介入保证了管道的建设。扎尔达里先生办公桌的背后，悬挂着一幅关于土—阿—巴管线的巨型地图。交谈当中，他一直在那上面指指点点。^{【206】}

迄今为止，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一直支持塔利班开放南部边界，建设一条经坎大哈到赫拉特，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线。同时，巴方也和卡塔尔、伊朗展开谈判，希望两国能通过两条单独的管线提供天然气。不过，用地缘战略的术语来说，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有着不可动摇的利益，而布里达斯的土—阿—巴管线最符合这一利益。^{【207】}

布里达斯的方案中管道长达875英里，从亚什拉尔气田开始，途经阿富汗南部，最后到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苏伊（Sui）。苏伊不但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还是巴基斯坦新建管线工程的起点。巴基斯坦的管线工程目标远大，未来可能经木尔坦（Multan）延伸到拥有更大市场空间的印度。在布里达斯的提议下，工程规划了开放管道，方便其他公司和国家

注入天然气。这一规划对于阿富汗军阀尤为诱人。阿富汗北部的若干气田曾一度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天然气，不过后来被迫关停。现在又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布尔格罗尼在阿富汗军阀之间奔走，寻求各方的支持。他说：“我和所有的领导人都进行了会面。我在赫拉特见了伊斯梅尔·汗，在喀布尔拜会了布尔哈努丁·拉巴尼和马苏德，在马扎里与杜斯塔姆进行商谈，当然也在坎大哈接触了塔利班。他们都对我表示欢迎和理解，因为阿富汗人知道重建的重要性，而重建需要外国投资。”

1992年2月之前，布尔格罗尼向贝·布托和尼亚佐夫汇报了情况：“协议已经达成，各派人马都答应签字，并提供地利之便。”^{【208】}同月，布尔格罗尼和拉巴尼领导的阿富汗政府签订了一份30年合约。合约规定，布里达斯公司获得相关天然气管线的建设权和运营权，而其他公司也可以以加入联合企业的形式参与管线营建。布里达斯方面很快就和其他石油公司搭上了线，美国当时第12大石油企业优尼科（Unocol）也在此列。优尼科公司在亚洲耕耘多年，1976年，他们就已经进入巴基斯坦市场。1995年4月，在布里达斯的邀请下，土库曼斯坦官员和优尼科方面在休斯顿进行了初次接触。此后，优尼科公司代表团访问了阿什哈巴德和伊斯兰堡，这时的他们还以布里达斯公司潜在合作伙伴的面目示人。

不过，布里达斯很快便在土库曼斯坦遇到了麻烦。尼亚佐夫的幕僚向总统先生告了阿根廷公司一状，他们认为，布里达斯实际上是在剥削土库曼斯坦。1994年12月，土库曼斯坦方面下令禁止克依米尔石油出口，并向布里达斯公司提出重新谈判的要求。1995年1月之前，布里达斯公司提出妥协，表示愿意将自身收益下调10%，一场风波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布里达斯发现亚什拉尔气田的时候，尼亚佐夫一行拒绝出席阿根廷方面的庆祝仪式。而后，土库曼斯坦政府又表示要重新谈判克依米尔和亚什拉尔两地的开采合同。尼亚佐夫先后剥夺了阿根廷公司开采亚什拉尔和克依米尔两地气田的权利，这已经是布里达斯第二次失去克依米尔地区的开采权了。不过，这一次阿根廷人表示不会妥协，并提醒土库曼斯坦方面尊重合同，保守承诺。

作为一名高度集权的统治者，尼亚佐夫是不大尊重国际法和合同的。而且，他毁约的原因不止于此。关键时刻，优尼科公司恰当地表达了自建

油气管线的兴趣。优尼科的提案内容包括：开采土库曼斯坦已有的道拉塔巴德油田，所得收益悉数归土方所有。在尼亚佐夫看来，优尼科的出现是鼓励美国大公司乃至克林顿当局参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建设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土库曼斯坦总统开始和美国外交官进行磋商。尼亚佐夫需要美国人，而美国人同样离不开尼亚佐夫。美方可不希望将土库曼斯坦推向伊朗一边。尼亚佐夫访问联合国总部的时候，优尼科和布里达斯双方的代表也一并被总统先生召到纽约开会。1995年10月21日，尼亚佐夫和优尼科及其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企业德尔塔公司签订协议，双方将合作负责穿越阿富汗的天然气管线。这一切都发生在布里达斯公司代表众目睽睽之下，可想而知阿根廷人有多惊讶。一位布里达斯公司经理说：“我们都惊呆了，去找尼亚佐夫理论的时候，他只是说：‘你们可以另建一条管线嘛。’”【209】

当天的签约仪式还有一位贵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当时正是优尼科公司的顾问。对于阿富汗管线项目，基辛格将其视为“一次超越了经验的希望的胜利”。当然，布里达斯方面并不打算主动出局。随着阿根廷人的应战，新一轮大博弈的第一场战斗打响了。布里达斯公司管理总监马里奥·洛佩兹·奥拉西雷古尔（Mario Lopez Olaciregul）后来曾说：“我们只想开发资源而已，但却卷进了别人的‘大博弈’，看着大国和大公司互相争斗。”【210】

道拉塔巴德气田的储气量为25万亿立方英尺，而优尼科的管线工程也将从这里开始。管线的下一站是巴基斯坦中部的木尔坦。为了此工程，优尼科公司牵头成立了所谓的中亚天然气联合企业，并持有70%的股份，小伙伴德尔塔公司拥有15%的股份。至于其他股东，包括占据10%的股份的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Gazprom），以及占据5%股份的土库曼斯坦国有天然气公司（Turkmenrosgaz）。优尼科的第二份合同更为雄心勃勃，根据这份合同，优尼科的中亚石油管线工程（CAOPP）长度达到1 050英里，北起土库曼斯坦的查尔朱（Chardzhou），南抵巴基斯坦沿海某个油港，日运输量可达100万桶。至于苏联时代建设的油气管线，比如跨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连接苏尔古（Surgut）—鄂木斯克（Omsk）西伯利亚油田到达奇姆肯特（Chymkent）和布哈拉的那条，完全可以跟优尼科的工程连成一线，从而将中亚的石油直接送达卡拉奇。



优尼科执行副总裁罗伯特·图多尔评价说：“利用已有的管线工程并将其延伸到印度洋沿岸，这一举动有利于俄、哈、乌三国的石油生产企业。通过这条中亚商路，他们可以融入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211】

不过，谢夫隆公司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失败无疑是前车之鉴。优尼科公司吸取了同行的教训，一开始就致力于跟莫斯科当局搞好关系。俄罗斯方面不但得到了南方市场和通往大海的捷径，该国国有天然气公司还获得了管线的部分股权。“俄罗斯方面不是问题，阿富汗才是大问题。我们的方案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这是优尼科公司驻土库曼斯坦经理亨利·德·拉·罗萨对笔者表达的看法。【212】

克林顿当局和优尼科公司在土库曼斯坦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外交政策转变的背景。1991—1995年间，华盛顿方面大力扶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力图把这两个国家打造成经济独立的典范。为此，美国公司没少在当地大力注资。

当时，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苏联遗产不少，不但有核武器，还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资源。因此，该国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成了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总统的拉拢对象。不过，1995年以前，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生涯越来越不被人看好。当时，哈萨克斯坦政府当中腐败横行，总统本人也愈加地独断专行。

1993年之前，哈萨克斯坦方面将境内所有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国家之中，俄罗斯人占据了总人口的40%，他们对本国政府的恶意十分明显。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对俄罗斯方面的安全 and 经济要求是有求必应。4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请求俄罗斯方面开放油气管线，以便谢夫隆公司将腾吉斯油田的石油运送到欧洲。俄罗斯方面对此不理不睬，最后激怒了谢夫隆方面。美国人原先承诺在腾吉斯投资50亿美元，结果，到1995年10月之前只有700万美元到位。【213】

同一时期（1991—1995年），美国中亚政策的主题是漠视。不但内战中的塔吉克斯坦遭遇了华盛顿的冷漠，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两位独裁者也被美国政府视为不可接触的人。更有甚者，助理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的眼中只有俄罗斯，由于这位国务卿主管美国外交，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态度变得十分友好，既不敢直接刺激对方，也不干预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塔尔伯特的如意算盘包括，将俄罗斯纳入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维持稳定的美俄关系，不在俄罗斯的后院煽风点火。

不过，随着俄罗斯经济陷入混乱，塔尔伯特的亲俄政策也陷入了同事的一片声讨中。一个更加多面的、将苏联各国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是犹太-以色列说客和各大石油公司的共同心愿。只有这样，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才能得到开发，而沿岸国家也可借此摆脱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最终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作为进入中亚的先锋，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纷纷渴望能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1995年初，为谋求自身利益，美国几家主要的石油公司在华盛顿成立“在外石油公司集团”（Foreign Oil Companies Group）。^{【214】}不但优尼科公司是其中一员，布什和卡特时代的大批官员也成了集团雇员，他们专门出面为石油公司打点政府和议会关系。集团成立之初，就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能源专家塞拉·赫斯林（Sheila Heslin）进行了会面。当年夏天，集团又和赫斯林女士的上司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塞缪尔·贝尔格（Samuel Berger）交换了意见。此前，贝尔格牵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制订美国在里海地区的政策，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都参与其中。^{【215】}

在里海地区，华盛顿方面和石油公司的战略利益与日俱增。美国政府的对俄态度也渐渐转冷，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成了华盛顿的新宠儿。此前，土库曼斯坦方面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游说经历。事情发生在1993年3月，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在尼亚佐夫的聘请下，和雇主一道造访华盛顿。他们的目的之一是吸引美国石油公司前去投资，其二在于软化美国对管线途经伊朗的强硬反对态度。尼亚佐夫的这次华盛顿之行十分失败，总统先生甚至没能和美国领导人结下一面之缘。

不过，1995年之前，美国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美方意识到，冷冻政策只能把尼亚佐夫政权推向伊朗的怀抱。由于不能出口天然气，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美国方面还认为，修建一条穿过阿富汗境内的天然气管线不但有利可图，还可以孤立伊朗。不过，管线建设必须依靠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当局，同时还要彻底排挤伊朗和俄罗斯的力量。

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帮忙，美国是无法在中亚安插自己的战略钉子的。论领土，论实力，卡里莫夫治下的国家都是中亚之最。乌兹别克斯

坦也是这一地区唯一能与俄罗斯分庭抗礼的国度，不过，当时的乌俄关系还算相敬如宾。北约曾想建立一个中亚营地，卡里莫夫对此表示支持，这惹恼了俄罗斯方面。1997年，一位俄罗斯外交官曾经愤愤不平地向笔者表示：“中亚是我国的后院，决不允许北约插足。美方必须认识到，中亚仍是所谓‘近郊’，是俄罗斯影响力覆盖的地带。”【216】

美国公司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十分感兴趣，如同一夜之间，美乌贸易突然繁荣似锦。1995—1997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8倍。而卡里莫夫也在1996年6月首次出访美国。

谢林·T. 亨特如此评论道：“到1995年底，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把乌兹别克斯坦当成了对抗俄罗斯霸权复活和伊朗影响力的唯一力量。”【217】

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地区形成了两组同盟关系。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为其中一方，而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也在美国盟友的鼓励下在当地进行大量投资。同时，俄罗斯加强了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联系，它们组成了两大同盟中的另一方。通过结盟，美国当局已经决定就里海地区能源和俄罗斯展开一番争夺。美国著名中亚问题学者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认为：“美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俄罗斯拥有霸权。而一旦俄罗斯有能力将西方势力排除在世界最后一处大油气田之外，后果更是严重。因此，美方任何小小行动，都会引发俄方最大的猜疑。”【218】

笔者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已经是1996年夏天的事了。当年9月，随着喀布尔的陷落，我开始对几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此前，西方记者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却没有得出任何答案。首先，美国是否会支持塔利班？支持会以间接还是直接的形式完成？谁会是美方的代理人？优尼科，抑或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其次，当时看来，美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塔利班已经组成了联盟，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俄罗斯、伊朗、中亚各国和反塔利班联盟，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两大阵营互相敌对？某些研究者关心的是，阿富汗圣战时代那种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会卷土重来。而笔者当时则注意到，华盛顿方面和塔利班之间的合作建立在美方对油气管线的渴求上，这必然导致伊朗和俄罗斯的反应。

探究管线背后的故事，如同一头扎进了迷宫。笔者采访的每个人物都

遮遮掩掩，生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采访毫无头绪，作为记者的我毫无办法，换个侦探来干也许更合适些。

实际上，记者很难接触到游戏真正的参与者。在外抛头露面的政客和外交官们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能力，真正的实权派是石油公司以及各国的情报机构，而他们都隐藏得太深了。各大石油公司不但对心仪的管道路线图三缄其口，刚刚会面过的客人是谁他们也都不肯透露。哪怕一点点泄密，似乎都会把合同拱手让给对手。

布里达斯公司的各位主管是严守秘密的典范。他们从不接受采访，连声明都甚少发表。只有一家同样谨小慎微的公共关系公司在伦敦时不时地代布里达斯方面表达意见。相形之下，优尼科公司更为可亲一点，不过，你休想从优尼科主管的回答中套出任何信息。不过，两家公司不同的企业文化，影响了他们和塔利班打交道的方式。

布里达斯公司属于家族经营，而且规模较小。各位主管深受欧洲传统熏陶，对于政治、文化、历史都很感兴趣。他们努力地适应着各地风俗，热衷与合作伙伴搞好关系。总之，布里达斯的主管们对“大博弈”的难度有着充分了解，因此，在和每位军阀打交道之前，他们都已经不辞辛劳地把对手的民族、部族乃至家庭背景搞得一清二楚。

作为一家大公司，优尼科的项目遍布全球。派往阿富汗的优尼科经理之中，大多数人更看重自己的饭碗，而不是当地的政治情况。布里达斯方面愿意深入实地考察路线，他们的活动项目包括在沙漠中花费几个小时和部落居民饮茶叙话。相反，优尼科经理的时间大多在飞机上度过，至于阿富汗的情况，当地那些反复无常的军阀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另外，优尼科对美国政策亦步亦趋，导致他们总是对塔利班指指点点，这也是美国公司的一大劣势。相反，布里达斯公司要乖巧许多。塔利班虽然还没有获得广泛承认，但阿根廷人已经准备和他们草签协议了。

优尼科总是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寻求支援。至于情报工作，他们懒得自己动手，反正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情报部门会随时报备事情进展。笔者的著作事关两家公司的龙争虎斗，对新一轮大博弈的种种特点也多有涉及。因此，布里达斯和优尼科在一开始都把笔者当成了对方的商业间谍。布里达斯方面还我清白之后，优尼科公司仍然不觉得笔者只是个好奇心很强，在阿富汗浸淫很久，评论很尖刻的记者。



笔者在阿富汗游历长达7个多月，进行了100多次采访。由于原来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我不得不查阅了无数相关文献。最后，笔者将工作写进了《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4月刊的封面故事。

1997年7月，塔尔伯特的一次演讲为美国的中亚政策定了调。他说：“最近有种说法很是流行。有些人认为，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再次陷入了‘大博弈’。显然，他们认为，石油驱使各种势力在当地你争我夺。美国应阻止历史再现，至少不能予以鼓励。吉普林（Rudyard Kipling）和弗拉泽尔（McDonald Fraser）的那些冒险故事还是待在书架上吧。什么大博弈，这种基姆（Kim）大战闪电侠（Flashman）的玩意就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杂耍。”

无论如何，大博弈都已经开局。塔尔伯特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话可以被看作是对博弈参与者的警告。塔尔伯特称，华盛顿当局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冲突：“如果发生内部或边界冲突，该地区会变成恐怖主义的发源地，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温床。外来势力会在这片土地上掀起战争。”【219】

书归正传，尼亚佐夫和优尼科签约，让布尔格罗尼恼怒不已。1996年2月，布里达斯总裁选择诉诸法律，他向得克萨斯州休斯顿附近的本德堡县法庭提出诉讼，优尼科和德尔塔成了被告。布里达斯控告优尼科方面“粗暴干涉商务关系”，“优尼科、德尔塔、马尔蒂·米勒（时任优尼科副总裁）及其他人员阴谋构陷本公司”，并索赔150亿美元。据布里达斯方面在法庭上披露，该公司“曾邀请优尼科方面联合开发，同时向米勒透露本公司油气管线的运行和建设计划”。一句话，布里达斯认为优尼科窃取了自己的计划。【220】

不久后，布尔格罗尼似乎决定妥协了。他向笔者表示：“优尼科是我们请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共处。当初，我们带他们去土库曼斯坦考察，希望他们能参与开发。可是，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方案很荒谬，无论是土库曼斯坦还是阿富汗他们都没有兴趣。”布尔格罗尼还表示，关于土库曼斯坦关闭布里达斯在亚什拉尔和克依米尔两地气田一事，布里达斯将会把相关的三个案子提交国际商务法庭寻求仲裁。

优尼科坚持认为，自己的提案以道拉塔巴德气田为起点，而布里达斯公司的工程围绕着亚什拉尔气田而建，两者并不冲突。【221】优尼科总裁约翰·艾姆勒（John Imle）曾经致函布尔格罗尼。据优尼科总裁称，土库曼

斯坦方面曾告诉他，该国政府和布里达斯之间并无合同，因此优尼科完全可以自行其是。这封信后来作为呈堂证供被公之于众。

艾姆勒在信中辩白道：“我方确保中亚天然气工程有着完全的独立性，和布里达斯方面并无任何冲突之处。我们从中亚已有的气田购买天然气，通过天然气管线将其用于出口。而布里达斯方面则计划从他们所有的亚什拉尔气田出口天然气……我方的中亚天然气工程并没有侵犯布里达斯方面运输和出售天然气的权利。”【222】

很快，美国政府出面为优尼科撑腰。1996年4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汤姆·西蒙斯（Tom Simmons）拜会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席间，美国大使要求女总理将布里达斯的合同转手交给优尼科去做。“布托尊重合同，她支持布里达斯。于是西蒙斯指责总理女士在敲诈。这可把她气坏了。”这段回忆来自布托的一位助手，他当时正好在场。而布托内阁一位成员还说出了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布托要求大使作出书面道歉，她如愿以偿了。”【223】

美国主管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宾·拉斐尔于1996年4月和8月两次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于本国公司，她也表示支持。1996年4月21日，拉斐尔女士在伊斯兰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现了这种态度：“一家美国公司正有意建设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天然气管线。管线对于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两方都大有裨益。它不但能带来就业机会，还能为巴基斯坦提供阿富汗的天然气。”当年8月，拉斐尔国务卿访问了中亚和俄罗斯，向各国领导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美国政府对优尼科的公开支持，让伊朗和俄罗斯大感怀疑。德黑兰和莫斯科方面有理由认为，美国正在向塔利班提供支持。1996年12月，伊朗的一位资深外交官平静而笃定地告诉笔者，沙特阿拉伯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塔利班一笔钱，金额高达200万美元。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伊朗人的话，但美国政府和优尼科公司的一系列错误，惹得批评和质疑的声浪四起。

1996年9月，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其实，驻喀布尔的一位优尼科经理克里斯·塔加特（Chris Taggart）告诉一家通讯社，随着塔利班在首都得势，优尼科的工程将会更加顺利。对于塔加特先生的这番高论，优尼科方面很快便予以否认。美国公司可不想背上支持塔利班的名声，几周之前，优尼科刚刚宣布，一旦阿富汗各派军阀同意组成联合委员会对管线工程进行监

管，美国公司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对他们的“奖励”。总之，优尼科愿意用钱笼络各派军阀。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几小时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将派员前往喀布尔进行谈判。华盛顿当局的反悔同样来得很快。国务院发言人格莱恩·戴维斯（Glyn Davies）称，美国对塔利班施行的伊斯兰教法“绝无反感”。在他看来，塔利班可能有点反现代倾向，但还不至于反西方。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纷纷支持塔利班。汉克·布朗（Hank Brown）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优尼科工程的支持者说：“总算有一派人马可以组建一个政府了，这是好事情。”^{【224】}至于那份冒失的声明，据美国外交官向笔者透露，事前并未提交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进行商议。这位美国外交官提及此事，也显得十分尴尬。

不过，声明的影响已经传播了出去。优尼科的种种行为，加上美国国务院的暧昧态度，让伊朗、俄罗斯、中亚诸国以及反塔联盟相信，美国政府和优尼科公司是塔利班的后台。大多数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居民更是对此深信不疑。美方和优尼科的解释也于事无补。一些巴基斯坦内阁部长亟不可待地把这个错误信息泄露给了本国媒体，这下大家都清楚美国人的态度了。

从中亚到南亚，整个地区都被流言和猜测围绕，一贯中立的各大通讯社也加入了猜测的行列。路透社便报道：“很显然，塔利班执行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一个逊尼派政权的出现会孤立伊朗，而它还可以保障贸易通道和油气管线，并以此打破伊朗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225】}

布里达斯迎来了最为艰难的时刻，阿根廷公司必须加倍小心，才能保证不出局。他们的气田被土库曼斯坦方面关闭，土库曼斯坦不答应卖给他们天然气，而巴基斯坦也不打算买。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优尼科已经获取了塔利班的信任。不过，布里达斯没有关闭位于阿什哈巴德和喀布尔两地的办公室，虽然尼亚佐夫已经准备下逐客令了。当时，土库曼斯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穆拉德·纳兹贾诺夫（Murad Nazdjanov）明确地向笔者宣布了布里达斯的失败：“布里达斯公司已经出局。阿富汗的管线我们已经交给优尼科方面了。至于布里达斯，我国政府将不再与之合作。”^{【226】}

虽然遭到土库曼斯坦方面的拒绝，布里达斯公司仍和塔利班保持着

良好关系。阿根廷公司告诉阿富汗军阀，他们的工程资金完全不用依赖国际金融机构，而后的借贷要在喀布尔政权被世界承认后才能到位。布里达斯的钱主要来自TAP管线公司，这是一家由阿根廷人和沙特阿拉伯Ningarcho公司共同兴建的企业，双方五五分成。布里达斯的沙特伙伴背景十分深厚，和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Prince Turki）关系匪浅。据布里达斯公司介绍，工程款的一半来自沙特阿拉伯，主要用于阿富汗境内的施工。而难度相对较小的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工程段，则由布里达斯方面牵头组织的联合企业出资。一位布里达斯公司经理介绍道：“对于土库曼斯坦政府的矛盾和阿富汗管线这两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区别对待，成立了两家联合企业。其一负责阿富汗境内工程建设，余下工程由另一家全权管理。”【227】

万事俱备，只等开工，布里达斯当时需要的，不过是和阿富汗各派系的几张合同而已。

另一方面，优尼科公司仍然紧随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他们向塔利班表示，只要喀布尔政权被承认，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马上会为管线工程解囊相助。但在那之前，美国人是不会跟塔利班进入谈判阶段的。约翰·艾姆勒解释道：“从一开始，我们就向各方表明，工程建设的关键在于启动资金。为此，阿富汗冲突各方必须达成协议，成立政府，接受借贷机构确认后，工程方可动工。”【228】

优尼科之所以也能稍稍地打动塔利班方面，是因为他们背后的政府。塔利班一直期望获得美国承认，而管线工程就是一个契机。

对于地区大国，布里达斯和优尼科都竭力进行拉拢。两家公司又尤其地重视沙特阿拉伯元素。在和塔利班谈判的过程中，布里达斯公司多次动用图尔基王子的人脉。布尔格罗尼认为：“沙特阿拉伯方面长期资助阿富汗的宗教圣战，他们真心认为我们的工程会给当地带去和平。”优尼科也不甘落于人后，他们也有位亲密的沙特朋友——德尔塔公司总裁巴德尔·阿尔·艾班（Badr Al）。艾班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和王储阿卜杜拉·阿卜杜尔·阿齐兹（Abdullah Abdul Aziz）尤为亲近。艾班先生的兄长马萨德（Mosaed）还是法赫德国王身边的亲信。这样看来，布里达斯和优尼科之间的争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沙特阿拉伯的宫廷斗争。

因为美国政府的原因，巴基斯坦方面对优尼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贝·

布托政府在1996年下台后，新当选的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和他的石油部长阿里·汗（Chaudry Nisar Ali Khan）都是优尼科管线的支持者，至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更是不在话下。巴基斯坦希望美国向塔利班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并多次催促优尼科尽快开工，以巩固塔利班的统治基础。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方面研究认为，塔利班统一阿富汗有助于优尼科开展工程，而美国政府也会跟进承认阿富汗新政权。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优尼科公司，都对这种分析深信不疑。

巴基斯坦方面不但要求美国承认塔利班政权，也需要满足自身的天然气需求。该国37%的能源消费都依赖于天然气，作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气田，俾路支省的苏伊气田已近枯竭。根据确认，巴基斯坦拥有22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而该国年平均消费量约为0.7万亿立方英尺，而且以每年0.7万亿立方英尺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之前，巴基斯坦将面临每年0.8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缺口。伊斯兰堡当局本可以向伊朗或者卡塔尔寻求帮助，但囿于资金短缺，这一构想一直未能实现。同时，巴基斯坦还亟须更廉价的石油供应。1996年，巴基斯坦进口了价值2亿美元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20%。1990年，该国国内石油产量为每日7万桶，7年后，这一数值下跌到每日5.8万桶。优尼科工程所提供的石油不但可以让巴基斯坦一解近渴，还将让这个南亚国家成为中亚石油在亚洲最大的出口市场。

尼亚佐夫总统同样渴求优尼科早日开工。他多次催促巴基斯坦向塔利班方面施加压力，以迫使阿富汗军阀接受优尼科的提案。同时，土库曼斯坦政府对美国的拉拢开始获取回报。1997年1月，尼亚佐夫政府和美国美孚公司、英国纪念碑公司签订合约，英美巨头将联合在土库曼斯坦西部开采石油。由于优尼科方面在土库曼斯坦还没有直接投资，这笔交易还是尼亚佐夫第一次和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达成合约。

1996年11月，布里达斯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已与塔利班和杜斯塔姆就油气管线达成书面协议，而拉巴尼总统也已经点头承认。这一声明让优尼科公司和巴基斯坦方面都震惊不已。1996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纳吉穆丁·谢赫（Najmuddin Sheikh）前往坎大哈，在和奥马尔的会谈中，巴基斯坦客人多次催促塔利班领导接受优尼科的条件。对此，奥马尔并没有给出确定答复。这是典型的阿富汗式智慧，塔利班不置可否，优尼科和布里达斯还得为合同继续奋斗。每年一亿美元的租金并不足以满足塔利班的

要求，石油工程带来的道路、饮水、电话线路和电力供应也是阿富汗新政府的兴趣所在。

不少塔利班领导人都私下地表示了对布里达斯公司的支持。优尼科方面总向塔利班传达美国的意志，比如要注意人权问题以及尽快与反塔联盟展开谈判等。布里达斯公司可没有这么烦人，除了合同，阿根廷人对客户别无所求。优尼科公司的压力不光来自华盛顿政权，美国国内的妇女权益组织也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巨大影响。妇女组织认为，美国政府和优尼科公司应立即停止同塔利班之间的谈判和贸易往来。联合国的态度也十分重要。联合国人权事务秘书长明石康（Yasushi Akashi）曾向笔者表示：“外界十分关心阿富汗天然气管线的归属。大家都担心，地区势力和公司会为了私欲而一味讨好塔利班。”【229】

两家公司都认为，自己的工程会让和平降临阿富汗。不过，西方各大银行可不想把钱投在一个正在发生内战的国家。罗伯特·埃贝尔（Robert Ebel）评论道：“参与这场游戏的每个人都清楚，和平会带来天然气管线，但天然气管线无法带来和平。”新一轮的大博弈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30】

第 13 章

塔利班传奇(二): 油气管道战争, 1997—1999年

为了迎接塔利班代表团, 布里达斯公司 (Bridas) 进行了一番精心准备。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部里的女秘书们一个个都收到了着装禁令, 用长裙和长袖衬衫代替迷人的迷你裙, 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1997年2月, 到访的塔利班客人享受了国王一般的礼遇。主人带着他们四处游览, 参观公司位于阿根廷各地的天然气和管道设施。访客们的足迹甚至延伸到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冰天雪地里, 为的就是领略布里达斯的雄厚实力。

与此同时, 另一支塔利班代表团正在华盛顿领略另一番文化冲击。代表们和优尼科公司 (Unocal) 洽谈生意之余, 还会晤了多位美国政府官员。此外, 赴华盛顿代表团的另一大任务是进行政治游说, 以争取美国政府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

回国途中, 两支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稍作停留。他们在麦加进行朝觐, 并拜会了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图尔基王子 (Prince Turki)。至于布里达斯和优尼科谁会赢得最后的订单, 塔利班方面宣称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 阿富汗的新领导者们很快便纯熟地运用起了“大博弈”的规则, 将竞标者玩弄在股掌之中。【231】

布里达斯和优尼科都在竭力拉拢和取悦塔利班政权。1997年1月, 国际商会的一纸临时法庭命令让布里达斯在克伊米尔 (Keimir) 油田的石油出口生意重获生机。虽然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 (Niyazov) 对此置若罔闻, 布里达斯方面还是受到了鼓舞。当年3月, 布里达斯公司驻喀布尔办事



处正式成立，布尔格罗尼亲自到场祝贺，并与塔利班高层进行了接触。

此时，布里达斯和塔利班开始就签订合同进行具体磋商。磋商持续数周，过程极其艰苦。布里达斯公司派出了3名经理，围绕着长达150页的文件展开讨价还价。他们的谈判对手是12位毛拉。这些塔利班的代表几乎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知识，其中仅有的一位工科毕业生也从未学以致用。塔利班不但缺少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专家，对英语的掌握也不够精熟。为了迁就他们，布里达斯公司专门准备了达里语的合同文本。布里达斯的一位高级经理曾向笔者透露：“合同的内容经过字斟句酌，得到了塔利班方面的完全认可。我们还把同一份合同呈送给阿富汗各支反对派力量，同样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可以说，这份合同代表着全体阿富汗人的共同意愿。”^{【232】}

另一方面，优尼科公司还在等待着。他们坚持要等到喀布尔政权被美国承认的那一天，才正式开始谈合同的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优尼科方面出资90万美元资助了奥马哈大学的阿富汗研究中心。在这个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中心里，资深的阿富汗问题专家托马斯·高蒂耶（Thomas Gouttiere）担任领导职务，还有一家人道主义培训机构负责救助阿富汗人。同时，中心还在坎大哈开办了一家学校。学校主管杰拉尔德·博尔德曼（Gerald Boardman）对塔利班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位美国国际发展机构驻白沙瓦的代表就负责为阿富汗的圣战组织提供跨境支持。博尔德曼的学校招收了400多名阿富汗人，其中包括教师、电工和木匠，以及为优尼科将来的管线工程培养的管道工。

优尼科给塔利班的馈赠不止于此，他们还献出了一台传真机和一部发电机。后来随着整个故事的破裂，这两件小礼物引发了一桩丑闻。反塔联盟、伊朗当局和俄罗斯政府就此抓住优尼科的把柄，指控这家石油公司为塔利班提供金钱支援。对此优尼科方面矢口否认。笔者曾经就金援问题向该公司求证，得到了对方的独家答复。1999年3月，优尼科总裁约翰·艾姆勒（John Imle）告诉笔者：“据我们估计，公司为了争取中亚（Cent）天然气项目耗费了1500万~2000万美元。其中包括救助地震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职业培训项目和一些新设备，包括一台传真机和一部发电机。”^{【233】}

德尔塔石油扮演的角色加重了外界的猜疑。这家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注册，在塔利班内颇有些人脉。在优尼科的授意下，他们一开始便加入到向阿富汗各大派系献殷勤的行列当中。不过，德尔塔公司在阿富

汗的全权代表并非沙特籍人士，而是一位叫做查尔斯·桑托斯（Charles Santos）的美国公民。桑托斯和阿富汗结缘甚早，自1988年开始，他数次参与联合国对阿富汗战争的调停和斡旋。不过，桑托斯的工作并没有换来好评，连续两任联合国调停事务专员都指责他和美国政府关系过密，而且一直操劳于个人事务。1995年，联合国调停事务专员马哈茂德·梅斯蒂里（Mehmood Mestiri）任命桑托斯为自己的政治顾问，随着塔利班兵临喀布尔，两人的合作以灾难收场。阿富汗的所有政治派系都不欢迎桑托斯，塔利班对他尤其厌恶。除了几次无谓的阿富汗之行，德尔塔毫无收获，优尼科公司也是后悔不迭。眼看沙特伙伴（德尔塔公司）打不开局面，优尼科方面决定亲自出马，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受命前往阿富汗。

作为曾经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和驻索马里特派使节，奥克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圣战组织的支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美国人远离阿富汗，这层关系已经淡漠，奥克利没有因此占到丝毫的便宜。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他都被许多人视为骄狂无知之徒，巴基斯坦人送给这位前大使的外号是“总督”。带着优尼科方面的期望，奥克利前往莫斯科和伊斯兰堡寻求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专家团，受雇者除了前面提到的高蒂耶和博尔德曼，还有美籍阿富汗裔扎尔马伊·哈利扎德（Zalmay Khalizad），此人曾就职于兰德公司（RAND），还为中亚形势专家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工作过。

雇佣专家学者参与事务，或者请前政府官员发挥余热，这样的案例在美国企业界并不鲜见。实际上，美国石油巨头个个深谙“大博弈”之道。出于游说政府和国会的目的，他们的帐下宾客之中不乏来自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大人物。不过，优尼科公司并不算大的手笔还是引发了广泛猜疑，人们纷纷表示不解，认为其中必然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代表了8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间谍网络的复兴。

除了在阿富汗各个派别之间辗转，优尼科公司还面临着尼亚佐夫总统的压力。土库曼斯坦国家元首似乎一向不问时事，对阿富汗持续不停的战争也好像一无所知，因此，他一再催促优尼科尽快开工。尼亚佐夫不认为阿富汗内战对他的天然气项目有任何妨碍作用，每当部下战战兢兢地试图指出其中要害，都被总统先生厉声喝退。尼亚佐夫曾怒气冲冲地告诉我：“我们需要天然气管道，我们最大的工程对阿富汗的稳定和和平有帮

助。”^{【234】}阿富汗前线的坏消息持续不断，不过土库曼斯坦的官员乐于欺瞒他们的上司。尼亚佐夫总统也就更加闭目塞听了。

虽然麻烦重重，优尼科和土库曼斯坦方面最终还是定下合约。协议是在1997年5月巴基斯坦阿什哈巴德的一次例行年会上达成的。根据规定，优尼科必须在1997年12月之前将所用资金筹措完毕，并在次年初启动石油项目。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向美、土两国通报：塔利班已经逼近北方联盟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很快便会占领该地。不过，塔利班只在那里支持了两星期，伤亡过百，不得不败退而走。而阿富汗各地的反对也愈加激烈。美国方面因为过分依赖三军情报局而再一次陷入难堪境地。

中亚天然气项目组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恰逢马扎里沙里夫城破之时，优尼科副总裁马尔蒂·米勒（Marty Miller）为此很是忧心，害怕项目会在1997年12月的期限之前夭折。1997年6月5日，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大吐苦水：“开工时间无法确定，一切要看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我们必须找到能与之合作的政府机关。工程可能年内启动，也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三年之内，甚至也可能就此搁浅。”为此，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被迫和优尼科另立新约，把工程开工的底线延后了整整一年。然而，即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不敢轻言在那个时候工程就可以破土动工。华盛顿方面也是疑窦丛生，指望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完成阿富汗的统一大任，看来是不可能了。于是，美国政府开始为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运输寻找其他道路。土库曼斯坦经伊朗至土耳其的天然气管线戏剧性地起死回生，1997年7月，美方一方面宣布不反对土—土天然气管线的建设，另一方面坚称不放弃对伊朗的制裁。不过，随着欧亚各大石油公司争相涌入伊朗市场，美国的石油企业看到了伊朗解禁的一线曙光，纷纷向克林顿当局施加压力。^{【235】}

伊朗若成为里海石油和天然气的中转站，阿富汗一侧的管道项目就变得可有可无。华盛顿当局的决定让优尼科措手不及，同时也给巴基斯坦政府提了个醒。伊斯兰堡方面认识到了美国人的反复无常。而形势对塔利班越来越不利，武装统一阿富汗的机会正在流失。更糟糕的是，伊朗联合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BHP）石油公司发表声明，宣布投资27亿美元建设1 600英里长的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管道西至伊朗南部，东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日运输量达到20亿立方米。对于优尼科的方案而言，其直接威胁在于地理环

境。相比之下，伊朗的管道沿途没有任何内战纷扰，一路太平。

1997年10月16日，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总理对阿什哈巴德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巴基斯坦总理会见了尼亚佐夫，双方着重探讨了优尼科管道问题。结果，巴土双方和优尼科签署了一份试探性价格协议。协议规定，塔利班可向过境的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征收每千立方英尺15%的过境税。【236】

谢里夫和尼亚佐夫都忽视了战争的存在，他们的决定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被晾在一边的塔利班方面大为恼怒，他们马上开出了比15%高得多的卖路价。

1997年10月，优尼科公司发布了关于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全新计划。新计划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来自日本、韩国和巴基斯坦的石油公司也参与其中。【237】

不过，优尼科和俄罗斯方面的会谈破裂了。虽然持有中亚天然气项目10%的股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却拒绝承认新计划。因为俄罗斯政府指责美国支持塔利班，并试图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238】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列姆·维亚西列夫（Rem Vyakhirev）宣称，俄方绝不允许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通过俄罗斯管道之外的途径进行出口。维亚西列夫态度十分强硬：“如此大的一片市场，哪怕只是放弃一点点，都是对俄罗斯的犯罪。”【239】

美国官方并不掩饰对俄罗斯的抑制企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能源专家塞拉·赫斯林（Sheila Heslin）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美国的政策旨在促进里海地区资源的开发……我们的目的就是加强这些富油国度的自主性，打破俄罗斯在该地区石油运输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我们要通过能源来源的多样性，保证西方的能源安全。”【240】

为了争夺市场，布里达斯有备而来。这一次该公司的合作伙伴连美国政府也难以拒绝。1997年9月，布里达斯将60%的股份出售给了美国石油巨擘阿莫科公司（Amoco）。新股东的分量之大，完全可以说动尼亚佐夫，土库曼斯坦总统也许会考虑解冻布里达斯在土库曼斯坦的财产。布里达斯还邀请了以阿赫迈德·詹（Ahmed Jan）毛拉为首的塔利班代表团于9月再度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阿赫迈德·詹原为地毯商人，当时是塔利班政权的

工业部长。对于塔利班人士的第二次阿根廷之行，巴基斯坦官方在白沙瓦进行了半路阻截。直到塔利班方面答应同时派人前往优尼科公司做客，巴方才予以放行。

前往优尼科公司的塔利班代表团由独眼毛拉穆罕默德·高斯（Mohammed Ghaus）带队，他们在1997年11月到达休斯顿。逗留期间，他们下榻之处都是五星级酒店，优尼科还安排客人游览动物园和超级市场，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卫星发射中心。宾主双方在马尔蒂·米勒家中欢宴，客人对米勒先生漂亮的游泳池和豪华的宅邸称羡不已。塔利班代表团的行程中包括了美国国务院，期间他们不免又谈及美国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问题。【241】

经过一个平安无事的冬天，阿富汗迎来了1998年的新春，这个国家也进入了新一年的武装冲突。而对于布里达斯和优尼科来说，天然气项目的春天仍然很遥远。当年3月，马尔蒂·米勒在阿什哈巴德宣布整个工程陷入无限期的停摆，因为战争的进行导致资金无法到位。尼亚佐夫为此大发雷霆。为了稳住不耐烦的土库曼斯坦总统，优尼科方面再次提出将计划时间延后，以超出1998年12月的期限。与此同时，美国石油公司后院起火。1998年6月的优尼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一些股东对公司的阿富汗项目表示反对，因为塔利班政权虐待当地妇女。同时，美国的妇女权益组织展开公众活动，呼吁公众抵制塔利班和优尼科的合作。

1998年，女权组织对优尼科公司的指责日渐升级。同年8月，一群环保主义者向加利福尼亚检察官提出诉讼，状告优尼科“反人类”和“破坏环境”的罪行。这桩官司显然源自石油公司和塔利班之间的关系，优尼科对此表示“荒谬”。优尼科方面本想和女权主义者对簿公堂，但后来明智地放弃了。这些美国女人并不好惹，即便是克林顿当局也不敢非议妇女解放运动的正当性。约翰·艾姆勒就此评价道：“对于美国妇女解放组织对于本公司阿富汗项目的非难，我们不能接受……阿富汗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而我们只是他们的客人。这样的事情超出了任何公司的能力范畴。即便我们放弃阿富汗的天然气管道和人道主义救援项目，也不能解决问题。”【242】

1998年8月，美军轰炸本·拉登营地，优尼科被迫撤出驻巴基斯坦和坎大哈的员工。随后的12月，美国公司无奈地退出了它曾经倾力争取的森

特天然气项目。油价下跌导致的全球性石油行业大衰退更让优尼科大伤元气。优尼科放弃了土耳其的一处管道项目，关闭了驻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办事处。由于油价不断创造新低，公司1999年的财政支出将被削减40%。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优尼科公司唯一的胜利来自老对手布里达斯公司。1998年10月5日，得克萨斯州地方法庭驳回了布里达斯要求优尼科赔偿150亿美元的诉讼案，因为土库曼和阿富汗关于法案的判决在得克萨斯没有法律效力。

美国对本·拉登的追捕，基本宣告这场“大博弈”游戏暂时告一段落。塔利班坚持的两项原则——本·拉登和持续的武装斗争——和美国政策正好相左。政府的强硬态度下，所有美国公司都无福消受阿富汗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于这一点，优尼科公司本该早有预料，但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担保让他们自以为胜券在握。作为游戏中的幸存者，布里达斯公司保持低调，力图熬过接下来艰难的几个月。巴基斯坦方面更是一直为工程的延续做着不懈的努力。1999年4月，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利班在伊斯兰堡会面，企图重启整个管道项目。与会三方声称，要为布里达斯公司找一家新对手。不过，没有资金愿意涉足塔利班和阿富汗，连巴基斯坦都成了外资的禁区。

保罗·斯塔罗宾（Paul Starobin）将美国的中亚政策形容为“一系列的混乱”，而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直斥华盛顿当局的作为“无知、混乱、幼稚和危险”。在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看来，这一地区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243】}

虽然油价持续走低，而石油公司也并不配合，美国政府却仍然热衷于巴库-杰伊汉（Baku-Ceyhan）管道的建设。显然，华盛顿当局并没有意识到战略眼光和和平环境对能源工程的积极意义。

1989年苏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势力也随之撤离，只留下了花费数亿武装起来的各支伊斯兰圣战组织。1992年喀布尔的沦陷，让美国人的撤离变成了逃跑。为了解决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内战，美国政府寄望于它的两个地区盟友——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出手相救。对于普通阿富汗人而言，美国的撤离如同战友的背叛。而华盛顿当局对于国际调停的漠然，对军阀的纵容，更让阿富汗人感觉到了双重的背叛。另一些阿富汗居民认为美国纵容巴基斯坦插手阿富汗事务，实在不可容忍。美国的战略缺失，

让该地区的各国势力可以在阿富汗展开争夺，就连新兴的独联体国家也扶植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阀，从而大大加强了内战的力度，也延长了战争的时间。美国军方向圣战组织提供武器的管道畅通无碍，而对阿富汗人民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通道却一直求路无门。而后者本是阿富汗各方达成停火，进行重建的希望所在。

冷战结束之时，短视的华盛顿当局并没有系统的中亚政策，这使他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屡屡受挫。美国人不懂得防微杜渐的长期战略，面对接踵而来的危机，只知道见招拆招、疲于应付。其塔利班政策就是一个印证这种多变性的范例：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华盛顿当局对塔利班的态度时常发生逆转，完全看不出任何战略目的。

1994—1996年间，美国政府假借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区盟友之手，对于塔利班的各种政治图谋一应支持。理由很简单，华盛顿认为塔利班仇视伊朗、反对什叶派而又亲近西方。至于这个组织的另一面——推行原教旨主义、迫害女性、一再破坏中亚和平，短视的美国当局统统视而不见。之后的两年（1995—1997年），出于对优尼科项目的支持，美国的放任变本加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方面虽然看重中亚能源，却没有相应的战略计划。华盛顿官员天真地认为，他们的天然气管线可以超越一片战乱安然存在。

到了1997年下半年，华盛顿对塔利班的态度骤然转变，一切来自美国国内的女权主义抗议浪潮。要知道，克林顿总统十分重视国内政局，对制定外交政策和盟友的要求则有些不管不顾。他能发现阿富汗问题，还有赖于这帮美国女人的提醒。女性选民的鼎力支持是克林顿夫妇赢取1996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总统先生贤伉俪还在女选民的庇护下逃过了莱温斯基事件的讨伐。总之，这些女自由派分子他得罪不起。而且，克林顿总统的另一个大票仓——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的好莱坞明星们也加入了声讨塔利班的战端。演艺明星不仅为克林顿的政治生涯慷慨解囊，还直接决定着副总统戈尔先生的2000年总统梦。利害交关之下，华盛顿当局自然不能继续纵容塔利班。

而塔利班也给了美国人强硬的借口。1998—1999年，塔利班当局表示了对拉登的支持，还和刚刚上台的伊朗温和派政府达成妥协。同时，优尼科的中亚计划正式流产。“抓捕本·拉登”是1999年美国的头号目标，不

过，他们却放过了眼皮底下的阿富汗。这个国家极端的宗教氛围，足以炮制出无数的小本·拉登。不过，美国政府总算在这段时间里表示了对联合国调停阿富汗事务的支持。

美国的政策失误，来源于美国当局对形势的误判。1994年，塔利班势力初露锋芒。笔者第一时间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通报消息，当时，各位外交官很是兴奋。当美国人造访坎大哈的时候，塔利班分子向他们拍胸脯保证，罂粟种植和毒品交易会得到管束，同时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伊朗的仇恨。塔利班方面还告诉美国人，阿富汗境内的一切外来势力都应撤离，圣战组织里的阿拉伯裔人员也在此列。至于阿富汗的统治权，塔利班表示非其所愿。这番说辞打动了不少美国来客。在这些外交官看来，塔利班和来自家乡“圣经地带”（Bible Belt）的基督再临派教众（born-again Christians）一样，为了行善积德而默默地苦行。总之，根据美国外交界的判断，塔利班的目的和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完全相同。按一位美国外交人士的说法，塔利班可以帮助他们“消灭毒品、消灭敌人”。但是，塔利班在当时只是一支新生力量，力量薄弱，根本没有清晰的自身定位，更无暇考虑登上庙堂之后的问题。美国人对他们寄予希望，实在是幼稚可笑。

1995年，塔利班攻下赫拉特，美国方面不发一语。极端分子接下来又把女学生纷纷赶出学校，华盛顿也没有作出任何抨击。相反，美国 and 巴基斯坦情报部门都把赫拉特的陷落当成好事一桩，既有利于优尼科的订单，也是钳制伊朗的好机会。以塔利班制约伊朗的策略显然不智，一时之间，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对抗因此升级，而逊尼派和什叶派也进入了对立状态，隔离政策更加加剧普什图人和外族之间的一贯冲突。巴内特·鲁宾（Barnett Rubin）抨击了美国的作为：“隔离政策可能加重了伊朗的制裁，但也让美国人在阿富汗自废武功。”【244】

对于中央情报局，伊朗方面从来都是疑心重重。因此，伊方一面向反塔联盟提供支持，一面竭力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塔利班沆瀣一气。一位伊朗外交官认为：“美方迫使我国和俄罗斯以及反塔联盟团结起来，对付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塔利班势力之间的联盟。”【245】

一些美国外交人士也对本国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不作为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当局完全跟着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亦步亦趋。笔者曾有幸接触过一份1996年美国国务院的机密记录。专家们认为，

如果任由塔利班坐大，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地区大国会扶植反对势力予以对抗，中亚地区永无宁日。专家还警告，美国对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支持，会影响华盛顿政府和印、俄两国改善关系的大局。

美国政府摇摆不定的阿富汗政策，大概就是出自这样的背景。1996年是选举年，政治家们忙于竞选，无暇顾及阿富汗事务的政策连贯性。实际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对阿富汗全无兴趣。罗宾·拉斐尔（Robin Raphel）是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作为当时华盛顿政府阿富汗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她私下表示自己曾屡次呼吁将阿富汗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屡次遭遇同事的冷漠回应。而拉斐尔女士的上司，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瓦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更是创造了一项纪录——任期内从未提及阿富汗。拉斐尔认为，美国政府应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阿富汗实行武器禁运。不过，白宫并不当一回事。直到1996年，拉斐尔女士终于让阿富汗问题出现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之中，这在6年来还是头一遭。同年6月，在拉斐尔的支持下，参议员汉克·布朗（Hank Brown）牵头组织了一场为期3天的参议员听证会。阿富汗各派力量都派出代表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议员们座谈交流。优尼科公司当仁不让，承担了会议的费用。^{【246】}

随着时间推移，拉斐尔愈加感觉阿富汗形势不妙。1996年5月，她在参议院坦承：“阿富汗已经沦为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的通道。严重威胁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安全，甚至影响俄罗斯和欧洲的局势。”拉斐尔还说，阿富汗正在通过境内的极端分子训练营出口恐怖主义。^{【247】}

拉斐尔的努力最终换来一些成效，但对于阿富汗的问题只是杯水车薪。美国外交继续忽视这一地区，因为华盛顿当局并不想在中亚牵扯过多精力。1996年9月，塔利班攻陷喀布尔。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巴基斯坦同行无不为之振奋。阿富汗似乎统一在望，而优尼科公司的项目也有了着落。为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塔利班迫害妇女的行为沉默以对，华盛顿方面还得忍受持续升级的武装冲突。当年11月，拉斐尔宣布了对塔利班的支持。副国务卿认为，各国政府应主动接触塔利班，而不是与之为敌。她说：“塔利班已经占据了阿富汗三分之二的国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阿富汗人，拥有持续执政的能力。他们的成功源头来自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其中的普什图族。阿富汗人都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他们认为，和平稳定是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即使忍受一系列的社会限制也在所不惜。”拉斐尔还警告：“孤立塔利

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尤其是阿富汗人民的利益。”【248】

华盛顿当局政策的左右摇摆，让不少评论人士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口头上谴责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实际上却没有清晰的战略行动。此外，华盛顿当局本该坚决反对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干涉行径。塔利班攻占喀布尔攫取阿富汗政权，离不开这两个美国盟友的多方面援助。”【249】

美国政府和优尼科公司太过迷信巴基斯坦方面的研究报告，满以为塔利班会顺利统一阿富汗全境。美国高层中的某些糊涂人士甚至开始幻想未来的美塔关系，那应该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样合作无间。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言论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沙特阿拉伯就是阿富汗的未来模板。沙特阿拉伯拥有的一切：从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和石油管线，到埃米尔和伊斯兰教法（又称沙里亚法），阿富汗都会有。沙特阿拉伯没有的东西，比如议会，阿富汗也不会有。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有和没有都不是问题。”【250】

反塔联盟、俄罗斯和伊朗对于优尼科扮演的角色疑惑重重。美国石油公司看上去不单单是为了投资兴业，而是肩负着华盛顿政府和中情局的战略意图。优尼科和当局的关系甚至招致了美国分析人士的猜疑。理查德·麦肯齐（Richard Mackenzie）便一口咬定这家公司被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收编了。【251】

面对类似的怀疑，在海外拥有投资的美国石油公司都会选择沉默，优尼科方面自然也是不置可否。不过，该公司发表声明，和中央情报局撇清关系。约翰·艾姆勒向笔者谈及此事时表示：“本公司是中亚天然气工程诸多竞标方中唯一的美国公司，美国政府对此当然是要支持的。不过，优尼科在政治事务上一贯奉行中立原则，这也是美国政府清楚并谅解的。”【252】

优尼科虽然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但在阿富汗各大派系都没有太深的人脉资源。最后一无所获，也属情理之中。

优尼科败走中亚，还有深层次的政策原因。美国政府向来缺乏经营当地能源的眼光，直到1997年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的讲话才唤醒了华盛顿的战略意识。此前，美国各大石油公司苦于缺乏政府引导，面对着伊朗和俄罗斯这两块禁地发愁不已。而当美国政府兴冲冲地提出“交通走廊计划”（非官方正式名称）的时候，一众石油公司也是满心不

情愿。首先，这个计划绕开伊朗和俄罗斯的捷径而选择土耳其为 midpoint，路途遥远，费用不菲。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对中亚和平进程的漠视，使得中亚和里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包括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车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库尔德人聚居区）战乱频繁。加上伊朗和俄罗斯的敌视态度，要开展管道建设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于俄、伊两国而言，混乱的中亚局势大有裨益，所以他们才大力武装反塔联盟，以期维持该地区的不稳定。是抑制俄罗斯和伊朗重要，还是开放一条出口管道方便中亚国家靠石油脱贫更为紧迫？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还在犹疑。

类似的选择题也摆在当年的美国政府和优尼科公司的面前。一方面，他们有一条老路可循——支持塔利班，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的援助会帮助这个组织顺利完成阿富汗的统一事业；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选择一条全新的途径解决阿富汗问题，那需要亲身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斡旋阿富汗内战中的各派，最终形成联合政府。也许，后者才是和平稳定的长久之道，华盛顿当局似乎更应该选择后者。不过，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对塔利班深信不疑，要他们管束沙特和巴基斯坦盟友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中央情报局确实没有向塔利班提供军需物资，优尼科也不是塔利班的军火中转站，但是，美国政府间接地帮助了塔利班政权，作为美国盟友，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塔利班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都得到了美方首肯。1998年，一位美国政府负责阿富汗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曾坦承：“美国政府过去纵容了塔利班，因为我们和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及沙特阿拉伯两国政府关系匪浅。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绥靖。至于巴、沙两国政府，我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对协议的关注。”^{【253】}实际上，华盛顿方面也许连所谓的暧昧政策都没有，他们无所作为。一个暧昧政策，至少包括计划、金钱援助和决议的过程。不过，美国政府高层对阿富汗事件毫无准备。

1997年末，华盛顿当局对塔利班态度的转变跟巴基斯坦也密切相关。当时，巴基斯坦正经历着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情况持续恶化。美国官方担心，毒品、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趁机葬送这个脆弱的南亚盟友。险境在前，美国人不得不向巴方表示提醒。不过，让美方恼怒的是，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拒绝向塔利班施压以促使阿富汗军阀改变其政治和性别政策。

1997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伊斯兰堡。她的一番公开讲话，代表了美国政策的改变。在巴基斯坦外交办公室外的阶梯上，奥尔布赖特公开指责塔利班的性别政策“可鄙”。此后的会谈中，美国国务卿警告，巴基斯坦正在中亚陷入孤立，这也会削弱美国的力量。不过，谢里夫当局并未接受劝告。巴方渴望中亚能源，同样渴望和平，不过是塔利班胜利带来的和平。当然，塔利班胜利、中亚通道、巴伊修好、本·拉登恐怖主义灰飞烟灭……这些好事不可能同时发生。巴基斯坦方面的政策完全是自欺欺人、自相矛盾，最后只能自认倒霉。这一点也是巴基斯坦当局至今不肯承认的。

美国政策的转变也引发了华盛顿政坛的反应。1997年初，沃伦·克里斯托弗被迫卸下国务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奥尔布赖特。新国务卿的童年不堪回首，那段遥远的中欧岁月让奥尔布赖特女士十分注重人权问题。美国当局重新组建了一支外交官队伍，其中有的留守华盛顿，有的前往伊斯兰堡，不过他们的共同任务都是阿富汗问题。同时，新一任负责南亚事务的副国务卿也走马上任。相比他的前任拉斐尔，曾是记者的卡尔·因德福尔特（Karl Inderfurth）和上司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奥尔布赖特先是公开抨击了塔利班，然后私下批评了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政策。此后的1998年4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比尔·理查德森出访伊斯兰堡和喀布尔。不过，巴基斯坦仍没有向塔利班施加任何有效的压力，他们只是建议阿富汗人向理查德森作出书面保证。理查德森等于空跑了一趟，他走后不到几小时，奥马尔就急不可待地撕毁了协议。理查德森的阿富汗之行的唯一意义，是让伊朗人确信了美塔之间的勾结。德黑兰方面误认为美国将塔利班作为未来阿富汗和平谈判中的一方。因阿富汗问题而稍稍缓和的美伊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自1996年拉斐尔发起的动议开始，美国势力介入阿富汗乱局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美方从来不想真正地承担责任。美方既不愿意加入战团，也不想为和平进程付出任何努力。对此，巴基斯坦方面十分清楚，所以每当美方施加压力，巴方从来都置若罔闻。理查德森访问阿富汗前夕，巴基斯坦外长古哈尔·阿尤布（Gowhar Ayub）正在东京访问，他借机大力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人想（在喀布尔）扶植傀儡政权。他们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只是周旋于一个个鸡尾酒会之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美方



根本没有向阿富汗提供任何支持。”【254】

1998年9月，本·拉登恐怖势力袭击了美国在非洲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恐怖主义的一大后果是让美巴关系骤然紧张起来。1996年，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将本·拉登引荐给塔利班，并一直与这位恐怖分子保持联系。如今，巴方又拒绝帮助美国缉拿本·拉登。这让美巴关系出现了大波折。美国当局的措辞日趋严厉。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伯特在1999年1月表示：“巴基斯坦政局和阿富汗动乱之间出现明显的互相影响，这十分危险。塔利班的出现，应该让邻近国家提高警惕，防范军事极端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威胁。如果‘塔利班化’在地区内蔓延开来，受害最大的国家将会是巴基斯坦。”【255】

不过，美方并不打算批评沙特阿拉伯方面对塔利班的公开支持。不过，美国人私下要求沙特方面运用影响力，以迫使塔利班交出本·拉登。不过，美国国会议员们挤进了一条必然失败的政策通道。1999年4月，丹娜·罗拉巴赫（Dana Rohrabach）议员承认：“我们的政府是否助长了塔利班的气焰，并帮助这个凶残的组织夺取政权？对此我不敢肯定。美国 and 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起到主导作用，反而被盟友们处处牵着鼻子走。”【256】

同时，巴基斯坦方面也陷入了困扰。美方对本·拉登的肆意妖魔化，反而让这位沙特籍人士成了无数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这种情况在巴基斯坦尤为多见。美国的政策目标过于单一，他们只顾追捕本·拉登，全然不见阿富汗的恐怖活动还有和平进程等更重要的问题。华盛顿方面只有本·拉登政策，而没有阿富汗政策。从鼎力支持塔利班，到完全无视塔利班的存在，美国当局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美国政府之所以疏远塔利班，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国内的女权运动。在杰伊芭·绍里希·沙姆利（Zieba Shorish Shamley）等阿富汗妇女活动家的努力下，妇女组织“女权主义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掀起了一场签名活动，声援阿富汗妇女的同时，也迫使克林顿当局对塔利班采取强硬态度。活动中，300多个妇女组织、贸易协会和人权运动机构都签下大名表示声援。著名喜剧演员杰伊·雷诺（Jay Leno）之妻玛维斯·雷诺更是慷慨解囊，出资10万美元表示心意。雷诺女士的善举也使得这个活动声名大噪。1998年4月，玛维斯·雷诺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于阿富汗妇女的处境，美国负有一定的责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一直向圣战组织

提供武器，帮助他们对付苏联人。”【257】

在雷诺女士的帮助下，“女权主义多数派”成功组织了一场主题派对，表示对阿富汗妇女的支持。这个派对正赶上了1999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候，显得星光熠熠。《华盛顿邮报》就此评论道：“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是好莱坞名流的新话题，其他话题都逊色了，现在流行阿富汗。”【258】美国文化很看重明星，而雷诺女士正是明星，明星的话自然有着深远的明星效应。志在从政的希拉里·克林顿正需要在美国妇女界大捞印象分。为此，她也加入了挾伐塔利班的战局。1999年，克林顿女士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向阿富汗人开火：“仅仅因为罩衫没有遮住全身或者走路发出声音，妇女就会遭到所谓宗教警察的毒打。这种毒打不但摧残妇女的身体，更是对她们心灵的践踏。”【259】美国政策绕了一个大圈，从盲目听信塔利班到了逢塔利班必反。

操纵者还是受害者：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角色

1998年6月的最后几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和财政部完全忙成了一团。小官员们拎着文件包在两大部门之间不停奔走，此外，他们还得去总理秘书处走一趟。总之，无数的文件等着不同的部长签字批准。几天过去后的6月30日，旧的财政年度就将画上句号。每个部门都想方设法地花光本年度资金，以便来年从财政部那里获得更多预算。几周之前（具体时间是5月28日），巴基斯坦刚刚完成数次核试验，以作为对印度核试验的回应。西方世界各打五十大板，对印巴两国都进行了惩罚性禁运。这造成了巴基斯坦的外汇危机，令这个南亚国家自1996年以来深陷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

不过，财政部虽然缺钱，但仍有大方的时候。6月28日这一天，他们便慷慨地批准了一纸3亿卢比（相当于600万美元）的薪金方案。^{【260】}这笔钱是送给塔利班政权的礼物，接下来的6个月内，巴基斯坦外交部按月向阿富汗的统治者发放5 000万卢比工资。为了掩人耳目，外交部把3亿卢比支出隐藏在了自身的预算方案之中，实在无法蒙混过关，还可以求助其他部门进行掩盖。最后，这笔钱成功地从1998—1999财政年度的预算记录中消失了。要知道，国际援助组织一直要求巴基斯坦削减政府开支，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这下他们可找不到任何可供置喙的地方了。

有人预计，1997—1998财政年度里，巴基斯坦方面向塔利班提供的援助资金达到了3 000万美元。具体的项目包括：60万吨的小麦、柴油、石油和煤油（部分由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军需、炸弹、各种苏制武器（如



坦克和重炮)所需的维护费和配件、塔利班空中力量和机场运行所需的修葺费、道路建设费、坎大哈的电力供应设施以及塔利班人员的所需工资。塔利班从乌克兰等东欧国家采购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巴基斯坦对此也是一路开绿灯。本来用于支付工资的那笔金钱,也直接被投入了战备所用。有一段时间,驻喀布尔的塔利班官员完全没有薪金可拿。当然,巴基斯坦官方一直否认本国支持塔利班。

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是历史惯性使然。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援助的数十亿美元就是经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转手,最终才到达阿富汗圣战组织名下。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鼓励和技术支持,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借助这笔援助资金,迅速发展壮大。由此增加的数百人手之中,只有一部分前往阿富汗前线展开工作,另外一些人从事对印度的情报工作,更有甚者专事监视负责国内政治、经济、媒体以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巴基斯坦同行提供了最先进的各种技术装备,其中包括能监听国内任何一出电话通话的仪器。美国人的帮助,让齐亚总统的军政权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1989年之前,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是巴基斯坦政坛和外交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即便后来文官政府上台、议会重组,情报部门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尤其是在那些关系着国家利益的政策领域里,又特别是在对印和对阿富汗政策方面,情报部门起着巨大的作用。

整个80年代,巴基斯坦的对阿政策都操纵在情报机构手中,而情报官员们也一直致力于维持这种一手遮天的形势。不过,冷战的结束,巴基斯坦经济遭遇危机,让情报部门失去了金援,而那笔秘密费用也因此被砍掉了。更重要的是,本已不富余的情报资金还要为另一个战场分忧——1989年,印控克什米尔一侧的反印烽火有燎原之势,巴方对此肯定要大撒金帛用于收买人心。

1993—1996年,是贝·布托的第二届总理任期。期间,已经退休的内政部长纳斯鲁拉·巴布尔启发了巴基斯坦新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态度。巴布尔和贝·布托都对情报部门充满疑心,不仅因为情报部门资源和能力有限,更因为在贝·布托的第一任任期中,情报官员多次与这位女总理发生摩擦,并最终导致她在1990年下野。更重要的是,情报部门一开始并不看好塔利班,他们更属意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而且,情报部门也没有更多的钱赞助阿富汗的学生运动了。

巴布尔对塔利班的支持走了一条“平民化”路线，他在内政部里建立了专门的阿富汗贸易发展小组。表面上看，小组的任务是为巴基斯坦开拓前往中亚市场的贸易道路。但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其实是给塔利班提供后勤支持。这一次，巴基斯坦的援助不再偷偷摸摸，而是直接出自政府部门的预算。

在巴布尔的命令下，巴基斯坦电信公司为塔利班搭建了电话网络，这一网络直接和巴国内的电话系统相连。只要加拨前缀081（这是奎达的区号），巴基斯坦国内的任何地方不用通过国际长途就能和坎大哈进行联系。边界集团（Frontier）是一家半军工企业，直接受巴布尔控制。该集团在阿富汗境内修建了无线通话网络，方便塔利班指挥官进行通话。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Pakistan International Airlines, PIA）和国内航空局派出人员前往坎大哈，帮助修葺当地机场之外，他们也对塔利班缴获的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机进行了一番维修。在巴基斯坦国家电台的技术支持下，阿富汗国家电台也呈现出了新面貌，而且还有了一个新名称——沙里亚电台。

1995年塔利班攻克赫拉特之后，巴基斯坦方面的援助也大幅度上升。1996年1月，阿富汗贸易发展小组的负责人途经奎达前往土库曼斯坦访问。陪同人员阵容强大，国内航空管理局、巴基斯坦电信、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巴基斯坦铁路公司、巴基斯坦电台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在内的一众负责人都在其列。为了支持塔利班，巴基斯坦政府各部门不惜动用本该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资金。【261】

虽然受援甚多，但塔利班政权仍然保持着很强的自主性。对于巴方的遥控意图，他们一概予以回绝。历史上阿富汗民族从未成为过外来势力的玩偶，连英、苏等强权也未能让他们屈服。80年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资金让巴基斯坦成了阿富汗圣战的指导者，而巴方也一直沉溺在这段历史当中。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个古老的历史教训。而且，20年来，大批普什图难民逃到巴基斯坦边境一侧聚居，他们和塔利班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关系密切。实际上，塔利班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里诞生，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宗教学校里接受教育，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圣战组织训练营学会了战斗技巧。而不少塔利班家属都已经更换身份，成了巴基斯坦国民。

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国家机关到各



大政党，从伊斯兰主义团体到宗教学校，从贩毒集团到商业和运输集团，到处都是塔利班的影子。当时，巴基斯坦的政府权力完全碎片化，这使得任何巴基斯坦利益集团（包括情报部门）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控制塔利班。这和80年代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圣战组织完全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伊斯兰党（Jamaat-e-Islami）的控制之下，其他政治势力无从插手。相反，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广结善缘，和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大多数巴基斯坦人。

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人脉之广，甚至可以挑动巴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内斗，从而进一步加深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布局。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对情报部门的不满，转而寻求政府部门或者走私黑帮的支持；有时候，他们又会背弃巴基斯坦联邦政府，转而投靠俾路支斯坦省和西北边境省地方政府。随着塔利班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主仆关系似乎发生了逆转。巴基斯坦从操纵者变成了塔利班的受害者。20世纪50—60年代，阿富汗曾经宣布，俾路支斯坦省和西北边境省都是阿富汗领土。为此，巴阿两方发生过多多次边境冲突。阿富汗方面一直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地应该独立建国，或者干脆划归阿富汗。1955年和1962年，两国外交关系两次面临中断的危机，祸根都是阿富汗方面的“大普什图斯坦”主张。阿方的意见得到了巴国内左翼普什图人的支持。因此，齐亚军政府力图通过阿富汗圣战在当地建立亲巴政府，从而彻底断绝阿方觊觎巴基斯坦领土的念想。

军方参谋人士也对齐亚的构想深以为然。他们认为，此举会拓宽巴基斯坦和主要敌国印度之间的“战略纵深”。巴基斯坦领土狭长、缺乏战略缓冲地带，无法长期抵抗印度的进攻。进入90年代以后，巴基斯坦方面的构想又有了新内容，一个友好的阿富汗可以作为克什米尔武装分子的训练地。

1992—1993年，在印度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人几乎快将老盟友巴基斯坦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其时，武装游击队以巴控克什米尔为基地，对印控地区进行骚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巴方在1993年将大批武装分子移送到阿富汗东部，让他们在那里安家。为此，巴基斯坦向贾拉拉巴德舒拉提供了一大笔钱，后来，克什米尔在阿富汗的保护者变成了塔利班。同阿富汗的情况一样，巴基斯坦方面并不直接出面支持克什米尔圣战组织，而是由伊斯兰主义团体代行负责对武装分子的经济支持和军事训

练。1996年，本·拉登受邀加入塔利班，这位恐怖大亨也是克什米尔武装分子的金主。他们在霍斯特一起度过了许多日子。

很快，克什米尔问题便成了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的最大动力。巴基斯坦当局有求于塔利班，对塔利班的要求他们是有求必应。塔利班对此一清二楚，因此，除了接收克什米尔人，巴基斯坦的其他要求他们一概回绝，而巴方是绝对不敢说不的。1998年，奥马尔曾经表态：“我们支持克什米尔圣战。确有一些阿富汗人在克什米尔抵抗印度侵略者，不过他们的行动跟塔利班无关。”【262】

很多人认为，“战略纵深”缺乏实际意义。保证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应该是国内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识字率的提高、睦邻友好等等。所谓的战略纵深，不过是几座阿富汗的山丘而已，完全不足以安邦定国。巴基斯坦学者阿克巴·艾哈迈德（Akbar Ahmad）评论说：“自齐亚政权以来，巴基斯坦的对阿政策一直在追求战略纵深。从军事专业角度来说，战略纵深仅指那种可供残兵败卒栖身的易守难攻之地，除此之外，基本就是个伪概念。”他还补充道：“这种政策让巴基斯坦作茧自缚，错误的预判、无稽的观念、失败的政策、僵化的表态和宗派斗争把这个国家重重围困。塔利班得势不但不能解决这一困境，反而让困境变本加厉。”【263】

巴基斯坦军方认为，塔利班方面会老老实实在杜兰德线（Durand Line）的另一端。可是，没有一届阿富汗政府承认过这条大英帝国留下的巴阿边界线。军方还认为，塔利班会约束西北边境省猖獗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也会投奔阿富汗而去，那样一来，国内就万事大吉了。不过，事实的发展正好跟巴方的一厢情愿相反。首先，塔利班拒不承认杜兰德线，并多次强调西北边境省是阿富汗领土。其次，塔利班大力支持普什图民族主义，而且还为民族主义加上了宗教外衣，巴方一侧的普什图居民纷纷为之所动。最糟糕的是，塔利班为巴基斯坦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提供庇护所，后者屠杀巴国内的逊尼派，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巴现政府，最终建立一个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奥利维耶·罗瓦（Olivier Roy）早在1997年5月便作出了预言：“巴基斯坦只是赢了一时，苦果还在后面。塔利班的势力只会让巴阿边界彻底消弭，而普什图人将会成为这片边境土地的主人。极端主义思潮会蔓延开来，毒品交易也会随之泛滥成灾。普什图人会获得自治地位，巴基斯坦领



土上会遍布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小部落。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是阿富汗逐步吞并巴基斯坦的缓慢过程。”^{【264】}一句话，阿富汗的逆流将会促进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阿富汗哪里是巴基斯坦的战略纵深，相反，巴基斯坦领土才是阿富汗军阀的编外领地。

巴基斯坦的悲剧不仅由于自身的战略短视，情报部门也要负很大责任。在80年代，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之所以能成功操纵阿富汗圣战组织，一是因为军政府的铁腕统治，二是由于源源不断的海外资金。有了这些条件，情报部门可以毫无顾忌地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当时，齐亚军政权及其情报部门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难以望其项背。不过，时代不同了，巴基斯坦国内不止一家利益集团在和塔利班打交道，它们各有各的盘算，而情报部门只是其中之一。

三军情报局的阿富汗政策十分僵化，既不采取严肃的评估，也不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而且，他们对于风云莫测的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也是一无所知，缺乏应对。这样僵化的政策最终害了情报部门，塔利班根本不听巴方差遣。三军情报局派驻阿富汗的官员都是普什图人，他们之中不乏死硬派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些巴基斯坦情报官员先是和希克马蒂亚尔勾结一气，后来又跟塔利班形影不离。他们的目标渐渐明晰——在阿富汗把普什图人的权势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发扬光大，而阿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温和的伊斯兰教信众则会遭遇一场浩劫。

一位退休的情报官员的话可作佐证：“这些官员比塔利班还塔利班。”可以想见，他们对反塔联盟和当地管线情况的调查报告会是什么样——无非是些歪曲事实，空话假话而已。这些人满脑子都是极端思想，事实根本不入他们的眼。不过，三军情报局的权力太大了，任何人都无法清除他们带来的坏影响。

塔利班刚刚崛起的时候，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并不看好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过，随着希克马蒂亚尔攻打喀布尔失利，加上本身缺乏资金，三军情报局的影响力很快退潮。贝·布托政府趁机出面，表现出了对塔利班的支持。^{【265】}1995年，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内部掀起了一次大讨论，话题当然是塔利班。那些驻阿富汗的普什图裔官员认为，巴方应加大支援塔利班的力度；另一些官员更为深谋远虑，他们坚持只给塔利班最小限度的支持，以免刺激中亚各国和伊朗。1995年夏天来临之前，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开始向俄罗斯、

伊朗和印度寻求资助。这些国家可都是巴基斯坦的竞争对手。【266】如此一来，普什图裔官员最终占据了论战的上风，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开始全面倒向塔利班。

塔利班象征着宗教极端分子，代表了毒品大亨，这是所有和他们打交道的巴基斯坦利益集团都要遭遇的麻烦。如今，这些麻烦也摆到了情报部门面前。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利益集团的你争我夺，严重干扰了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在这场争斗中，巴方外交部完全没有话语权，只能眼睁睁看着周边环境的恶化。俄罗斯、伊朗、中亚各国，一个个邻国都在指责伊斯兰堡当局破坏地区稳定。为解开外交僵局，情报官员不得不多次前往莫斯科、德黑兰、塔什干和阿什哈巴德进行解释，可惜次次都无功而返。随着国际舆论声浪迭起，新当选的谢里夫政府与情报部门反倒加强了和塔利班共进退的决心。

1997年5月，塔利班武装逼近喀布尔。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很是高兴。巴方认为，随着塔利班确立在阿富汗的统治权，自己可以成为新阿富汗政权和一众邻国之间的友好桥梁。到时候，一切敌意都会烟消云散。很快，巴基斯坦便承认了塔利班政权。不过，随着塔利班从马扎里匆匆败退，巴方的举动自然也就成了笑柄。【267】

计谋失算后，巴基斯坦方面开始怨天尤人，连联合国也成了指责的对象。巴方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阿富汗问题的处理偏颇。1998年1月，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艾哈迈德·卡迈勒（Ahmed Kamal）表达了这种态度，他说：“联合国在阿富汗毫无作为，而且在调停过程中有偏袒某一方的举动，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后来，在伊斯兰堡的一次会议上，卡迈勒向一众同行宣布，目前的形势不是巴基斯坦因为阿富汗问题被世界孤立，而是世界对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不了解。所以，全世界必须了解并接受巴基斯坦在塔利班问题上的立场。【268】

巴基斯坦政府不惧国际舆论为塔利班撑腰，却没有勇气面对国内的艰难困境。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巴阿两国之间猖獗的走私活动。中亚诸国、伊朗和波斯湾沿岸国家都大受影响。不过，受害最甚的还是巴基斯坦，蜂拥而入的外国消费品几乎挤垮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当时，所谓“阿富汗中转贸易”（AIT），或者说阿富汗的走私活动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塔利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还有来自巴基斯坦的大量参与者——包



括走私分子、交通运营企业、毒枭、官僚、政治家、警方和军官，多方关系编织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走私已经成了阿富汗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邻国因此深受其害。

巴阿边境是走私活动的生命线，其中，又以俾路支斯坦省查曼（Chaman）和阿富汗斯平布尔达克（Spin Baldak）两地之间的边贸关口最为重要。如果天气晴好，一天就有300多辆卡车通过关口。长长的车流等待通关，车流上下的司机、巴基斯坦海关官员和塔利班分子也不着急，他们悠闲地喝着茶。大家似乎都是朋友，一派祥和之下，司机们会讲一些有关他们货物的故事，内容足以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官老爷们汗毛倒竖。那些奔驰轿车和贝德福卡车大都是偷来的，车牌自然也是伪造的。司机们运送的货物中没有一件附有合法票据。走私路上一共要通过6处国境线，至于驾驶执照、通行证明和护照也都是假的。走私的东西应有尽有，包括日本产的电子产品、英国产的内裤和伯爵红茶、中国产的丝绸、美国产的电脑部件、阿富汗出产的海洛因、巴基斯坦的小麦和糖、东欧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伊朗的石油，如此种种，一应俱全。对于这些东西，关税和消费税自然不起约束作用。

这里是狂野西部，外加无法无天的自由贸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有三：阿富汗内战、毒品贸易和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诸国国家机构的腐败堕落。不过，这一地区确实太缺乏消费品了。巴阿两国的黑帮组织因此找到了商机，他们有的组织运输，有的贩卖毒品，通通行动了起来。巴基斯坦中央税务局的一位官员曾向笔者透露，早在1995年，“一些运输贩子就贿赂塔利班，为自己的走私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这种非法活动正在侵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的政府机关。今年，巴基斯坦的财政收入下跌了30%，全都是‘阿富汗转口贸易’的错”。【269】

对于这片中亚土地来说，对外贸易一向意义重大。中世纪时，联结中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从这里穿过。当年的骆驼商旅走过的地方，如今都是卡车车队的痕迹，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地的游牧部族始终忠实地扮演着运输队员的角色。丝绸之路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历史，其意义不下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它不但带来了东方的奢侈品，更是思想、宗教、新式武器和科学发现的传播大道。

一个驼队由5 000~6 000头骆驼组成，据法国历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

代尔（Fernand Braudel）介绍：“驼队负荷的货物总量跟一艘大型帆船相仿。队伍组织有序，有首领，有决策层，也有严格的纪律，还有义务的实习岗位。对于强盗的袭击，也有常规的预警措施加以应对。”^{【270】}2 000多年来，这种情况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今天的走私集团也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只不过骆驼变成了大卡车。

1950年是“阿富汗转口贸易”开启的元年。正是在这一年，巴基斯坦向深居内陆的阿富汗敞开了大门。根据协议，阿富汗可以借用卡拉奇港进口产品，税负全免。大宗货品被装上卡车，启程前往阿富汗。第一轮大贩卖将在喀布尔进行，剩下的商品则会运回巴基斯坦国内销售。对于巴基斯坦人来说，这种贸易就是廉价免税商品的代名词，即便规模很有限。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转口贸易经历了一次大升级，连苏军控制区也处于贸易的覆盖范围之下。1992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喀布尔陷落、中亚各国的独立，以及阿富汗难民的返乡潮。随之而来的是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奇货可居，于是，走私帮派分子又赢来了一轮发财良机。

但是，阿富汗内战并没有结束，割据军阀裂土分疆，对来往商家雁过拔毛。短短的一段路程，收拦路费的关卡就有十几个之多。这自然影响到了走私分子的财路。白沙瓦附近的走私分子还算幸运，他们主要是从巴基斯坦经阿富汗北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避开了喀布尔附近的战火。奎达的走私黑帮则正好要穿过坎大哈军阀的领地，一路下来要忍受对手数十次的搜刮。苦不堪言的黑帮分子非常想另辟蹊径，找到一条通往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安全通道。在这一点上，贝·布托政府深有同感。

奎达走私帮派是最早向塔利班运动提供经济支持的组织，因此，两者关系甚为融洽。一开始，走私集团的金援按月支付，不过随着塔利班向西部的扩展，他们所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1995年4月1日在奎达，有人告诉笔者，查曼那边的走私贩子捐给了塔利班方面600万卢比（13万美元），第二天又另付出了1 200万卢比。当时，塔利班准备第一次攻打赫拉特，这笔钱也就成了战争资金。除了“捐赠”之外，奔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走私贩子还得向塔利班付买路钱，而那才是阿富汗军阀最新的财源。

得到军阀的保护许可后，走私贩子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们的车队从奎达启程，平安穿过阿富汗后，既可以南去伊朗，也可以西走土库曼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走私的触角甚至伸到了俄罗斯境内。很快，奎达黑帮



便急不可待地请求塔利班赶快拿下赫拉特，彻底打通前往土库曼斯坦的道路。^{【271】}但是，当时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却不支持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看来，他们对阿富汗的影响力还比不上一群走私贩子。

1996年，走私贩子再次着急地催促塔利班继续北进攻占喀布尔。此前，塔利班向走私车队征收的税目为3万~5万卢比一车，而如果喀布尔落入塔利班控制，这一费用可以降低到6 000卢比（折合150美元）。奎达黑帮的走私生意，一些塔利班领导人也有份入股，他们的不少亲属甚至亲身参与其中，这都是走私分子拉拢塔利班的手段使然。另外，贩卖毒品的黑帮还得另付“天课”（zakat），总之，所谓的转口贸易对于塔利班意义极其重大。

而巴基斯坦则是走私生意的最大受害者。中央财政收入委员会估计，仅1992—1993财年一年，巴方就损失了35亿卢比（合8 000万美元）。接下来的1992—1993财年，这一损失上升到了110亿卢比。1994—1995财年，巴基斯坦的损失达到200亿卢比。1997—1998财年，损失达到300亿卢比。损失年年增长，因为塔利班的势力年年扩大。^{【272】}塔利班的转口贸易给巴基斯坦的另一件礼物是盘根错节的腐败网。每一个政府部门——从海关、情报部门、中央财政委员会，到边境稽查和部落地带的官员，但凡牵涉其中，没有不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如果有人想捞到阿富汗边境海关的肥差，先得向有关官员提供贿赂才行。贿赂，对于这些海关官员不过是必要的投资而已，成本很快就可以从走私活动中找回来。

腐败网络十分广大，内阁成员和俾路支斯坦、西北边境两省的不少官僚都涉嫌其中。在高官们的纵容许可下，俾路支斯坦省和西北边境省的道路许可条例对于走私小麦和糖的卡车大开绿灯，它们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过这两个省份前往阿富汗。1995年和1996年，巴基斯坦军队高官两次向笔者透露，俾、西两省官员甚至为了签订道路许可条例展开了激烈竞争，腐败因此而生，政府职能因此而瘫痪，情报部门的指令因此失效，塔利班倒是因此“控制”了巴基斯坦政客们的所作所为。

走私的范围越扩越大，阿富汗的大地因为黑帮的猖獗变得赤裸裸、光秃秃。在乡村地区，数百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随即销往巴基斯坦。铁厂大多被毁，坦克、汽车、电线杆和电话线都逃不掉被拆的命运，这些物资都在拉合尔的铁磨坊里变成了垃圾。卡拉奇和其他巴基斯坦城市的汽车

失窃率大大上升，也是走私黑帮在捣鬼。他们雇用人员专门偷车运到阿富汗，然后再返销给巴、阿两国的客户。1992—1998年，卡拉奇一共丢了6.5万辆汽车，其中大多被卖到了阿富汗，少数重归故国的汽车也都换了牌照和主人。【273】

走私贩子还从迪拜、迦沙等地进口电子产品，并将海洛因藏在水果和季节性木材里运往上述的波斯湾沿岸港口。塔利班操纵的阿富汗国家航空公司（Ariana Airlines）则负责提供作案工具。航班从坎大哈、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直飞目的地，直接把塔利班带入了喷气时代，丝绸之路上的走私也走起了现代化的捷径。

巴基斯坦的地下经济原已十分猖獗，走私贸易的出现让这一情况变本加厉。根据相关调查，1973年，巴国内地下经济的规模为150亿卢比，1996年，这一数据滚雪球般地增加到了11 150亿卢比。同时，地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上升到了51%。【274】

同时，巴基斯坦的逃税潮也是水涨船高，被逃税额从15亿卢比上升到了1 520亿卢比，每年增长约880亿卢比，甚至连关税方面也不能幸免。1993年，走私贸易为地下经济贡献了1 000亿卢比，到了1998年，这一数值暴涨到3 000亿卢比。当时，巴基斯坦的出口总额不过100亿美元，走私所得收入竟然达到了这个数字的30%，跟1998—1999财年的预期财政收入（3 000亿卢比）完全相当。而每年流通在阿巴两国间的毒品贸易，也已经有了500亿卢比的规模。

西北边境省的走私市场（当地语言称作“巴拉”）里，进口消费品货物充足、琳琅满目。巴基斯坦本国制造商却因此破产连连。因为走私的缘故，免税的日本产电视和洗碗机跟巴基斯坦国产货叫到了一个价，显然，后者不会有任何优势。白沙瓦市郊的哈亚塔巴德（Hayatabad）走私市场里大牌云集，从英国的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和马瑟科尔百货，到日本的索尼公司（Sony）都看上了这里免税的环境，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门店。西北边境省贸易部长马哈塔布·艾哈迈德·汗曾对此很有看法，1998年12月，他说：“走私行为已经破坏了我省的经济活动，人民完全丧失了诚实致富的品德，走私仿佛才是天经地义。”【275】

大面积腐败和经济系统的紊乱，同样在伊朗遍地开花。走私集团将大宗燃料和其他物品非法偷运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伊朗蒙受了极大的财



产损失。国民工业因此濒临破产，官员腐败丑闻不断爆发。有伊朗官员曾经私下告诉笔者，伊朗国营企业和革命卫队都因为走私石油而获利颇丰。伊朗石油在阿富汗销售，可以获得高过本国市场2~3倍的利润。阿富汗军阀的战争机器无时无刻不需要石油，而俾路支斯坦省的油田经营者很快满足了军阀们的需求。通过走私集团，他们从伊朗大量获得廉价燃料，然后转手卖给阿富汗各派武装。当然，巴基斯坦公司和海关也在这场交易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巴基斯坦方面不是没有打击过走私贸易，但每次打击都三心二意。有几次，巴方立法禁止了电子设备的进口，不过更多的时候，由于塔利班拒绝遵守法律，以及帮派分子不断施压，巴基斯坦政府只好选择退缩。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愿意揭露出本国经济千疮百孔的真相，也没有人愿意制服塔利班，连巴基斯坦情报部门都不情愿断绝对塔利班的支持。看上去，巴基斯坦政府宁肯背弃国内外投资者，宁可牺牲本国的经济发展，也要维护塔利班的利益。实际上，他们干脆把巴基斯坦的财政收入直接送给塔利班，支持阿富汗军阀的同时，也让牵涉其中的个别人大发横财。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专门绑架巴基斯坦政策，全力逢迎塔利班。

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让巴基斯坦后院起火。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催生了所谓的“海洛因和冲锋枪文化”，巴基斯坦深受其害，经济和政治基础为之动荡不已。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经评论道：“10年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巴基斯坦的社会风貌。其影响之大，让任何政府都难以有效施政。”^{【276】}巴基斯坦社会更加地四分五裂，枪支泛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麻醉品遍布街头。”

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基斯坦走进了历史最低谷。几乎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卷入腐败、沆瀣一气；经济完全破产，外交政策饱受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孤立；伊斯兰武装分子建立的地下法制蚕食着国家法律。1996—1999年间，新一代的反什叶派极端分子在塔利班的庇护下大肆杀害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遇害人数达几百人。不但巴基斯坦国内被教派冲突困扰，和伊朗的外交关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277】}

约有8万名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和塔利班并肩战斗，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并不下于自己的阿富汗战友。这些人甚至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自己的祖

国重复塔利班在阿富汗走过的道路。【278】

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省都有大片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在这里，不少部落居民都把塔利班视为楷模。早在1995年，毛拉纳·苏菲·穆罕默德（Maulana Sufi Mohammed）就曾在巴焦尔特区（Bajaur Agency）发起叛乱，他所领导的“伊斯兰教法运动”（Tanzim Nifaz Shariat-i-Mohammedi）意图建立宗教政权。无数的塔利班分子都举兵相应，其中既有阿富汗人，也有巴基斯坦人，这次暴动最终被军方镇压。教法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逃到了阿富汗。1998年12月，奥拉克兹特区（Orakzai）再次兴起了所谓的“塔利班运动”（Tehrik-i-Tuleba），这一次，极端分子在2 000多人众目睽睽之下处死了一名杀人犯。在普什图人聚居区里，极端分子实行着塔利班式的正义，而巴基斯坦本地法律则完全被抛在一边。为了效法阿富汗发生的一切，聚居区内完全禁绝电视、音乐和录像带的存在。【279】

奎达也冒出了一批亲塔利班的普什图人势力，他们焚毁电影院、关闭录像带租赁店、拆除卫星信号接收天线，并将妇女通通赶回了家。

1998年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后，巴基斯坦方面急不可待地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捷报。巴方认为，这下全世界会自然而然地承认这个控制了阿富汗80%国土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军方和政府都认为，塔利班的大捷，也是巴基斯坦的胜利。而此前的种种亲塔利班的政策方针，自然也是正确无误、不容改变。巴基斯坦当局还认为，伊朗势力将从阿富汗消失，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也只能任生米煮成熟饭，老老实实地和塔利班政权打交道。当然，这少不了要靠伊斯兰堡当局从中撮合说情。至于西方世界，更是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塔利班和他们的宗教思想。

尽管公众对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已经有了警惕，但国家领导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越来越多的局外人眼中，巴基斯坦是一个行将失败的国家，也许它已经失败了，跟阿富汗、苏丹或者索马里的命运一样悲惨。一个失败国家也许还不至于覆亡，但肯定已经走在了覆亡的路上。在一个失败的国家里，领导层濒临崩溃，政策一次次破产，而没有人思考个中原因。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层一味顽固坚持自以为是的阿富汗政策。齐亚将军一直做着莫卧儿皇帝般的美梦，他幻想着在反叛的‘印度斯坦’、‘异教徒’（因为什叶派）的伊朗和‘基督教’的俄罗斯之间，‘重建逊



塔利班

尼派穆斯林的空间’。【280】齐亚始终相信，阿富汗圣战组织的思想会在中亚遍地开花，一个巴基斯坦领导下的伊斯兰国家集团会雄踞亚洲的中南部。可是，军政府总统始终没有思考一下，他的政策会给自己的国家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第 15 章

逊尼派对什叶派：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争夺

1999年的德黑兰之春，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着新气象。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的20年之中，希贾卜（Hijab）一直伴随着德黑兰街头的每位女性，人人都裹在这种黑袍里。今年的情况有点不同，希贾卜搭配仿制豹皮或者皮草看来是最新的流行风潮。在一片雨衣和黑罩衫下，可以时不时地发现超短裙、紧身牛仔裤、黑丝吊带袜和高跟鞋的蛛丝马迹。大家的打扮不再是千篇一律，追求时尚似乎成了每位女性的权利。自1997年5月，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Sayed Mohammed Khatami）总统上任以来，伊朗社会发生了不少变化，女士们的着装只是其中之一。选举中哈塔米获得了70%的支持率，远胜他那些保守派对手。年轻人是哈塔米最坚强的支持者，25%的失业率和高通胀让他们苦不堪言。伊朗年轻人都希望新总统能刺激经济复苏，带来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

哈塔米不但肩负着国内人民的期望，他的当选也给伊朗和外国关系带来了转机。哈塔米政权对西方采取开放政策，并多次向美国示好。伊朗新总统宣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十分必要。对于阿拉伯世界，伊朗同样张开了友好的怀抱。而阿富汗就是美、伊、阿拉伯世界三方关系正常化的基石。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比尔·理查德森于1998年4月出访喀布尔，其间他表示，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政府将伊朗视为可对话的伙伴。同时，伊朗也向另一个老对手沙特阿拉伯伸去了橄榄枝。

1998年5月，伊朗新任外交部长卡迈勒·哈拉兹（Kamal Kharrazi）表

示：“伊沙关系正常化有利于双方，我们可以携手解决阿富汗冲突。”哈拉兹先生长期担任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待人有礼、英文流利。他柔和的外交风格，正印证了伊朗政权对外态度的软化。^{【281】}

实际上，伊朗的新领导人对塔利班并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他们深知，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不但有利于伊朗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还能帮助自己摆脱孤立的境地，如此一来，伊朗必须务实行事。哈塔米总统不愿和塔利班发生任何摩擦。谁能想到，仅仅6个月前，由于塔利班在马扎里杀害了9名伊方外交人员，伊朗方面在伊阿边境陈兵25万，随时准备干涉阿富汗局势。随着和塔利班关系的缓和，接下来，伊朗需要同沙特阿拉伯修好。

历史上，代表什叶派的波斯人和代表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冲突不断，双方互有胜负，都曾经占领和奴役过对方。阿富汗正是两者争夺的要地。1501年，在萨法维（Safavid）王朝君主沙阿·伊斯梅尔（Shah Ismail）的领导下，伊朗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什叶派国家。中亚和阿富汗曾经先后成为波斯和阿拉伯两大势力的领地，相比之下，波斯人的统治更为长久，留下的文化和语言痕迹也更多。

20世纪80年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了长达8年的战争（1981—1988年），双方共有150万人伤亡。出于同族情谊，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鼎力支持，这加深了他们同波斯人之间的裂痕。两伊战争爆发之时，隔壁的阿富汗也是战云密布。冷战中，美国一直竭力孤立伊朗政权，彻底隔绝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阿富汗问题上立场一致。两国都强烈反对苏联的侵略行径，都给了圣战组织大力支持，都支持国际社会对苏联及阿富汗傀儡政权实施制裁。不过，伊、沙两国扶植的圣战组织属于不同派系。而且，伊朗一直和阿富汗傀儡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的援助和美国以及巴基斯坦完全一致，狂热的逊尼派穆斯林从美国及其盟友那里得到大批军火，而什叶派圣战组织则一无所获。那些信奉瓦哈比主义的圣战组织，尤其得到沙特方面的重视。

沙特方面资助的每一分钱都经过了美国的清点，而受助对象也都经过了美方的考验。整个80年代，沙特阿拉伯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的官方援助高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伊斯兰慈善组织、基金会、沙特王室的私人捐助、清真寺募集资金等多种渠道非官方援助。^{【282】}同时，沙特阿拉伯还

直接为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提供经费。1989年，阿富汗各派领袖汇集一起，商讨在伊斯兰堡建立流亡政府的相关事宜。^{【283】}会议期间，沙特阿拉伯人四处出击，为贿赂各路人马大撒金钱，金额高达2 600万美元。在沙特方面的银弹攻势下，阿富汗军阀将一名瓦哈比主义者选为临时政府总理。

1990年3月，沙特方面再次掏出银票，为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注资1亿美元。当时，希克马蒂亚尔和沙阿纳瓦兹·塔纳伊将军（Shahnawaz Tanai）正预谋在喀布尔发动政变，推翻总统纳吉布拉。^{【284】}1992年之后，沙特阿拉伯人继续扮演喀布尔政府的金主。大批能源和物资经巴基斯坦流入阿富汗，这成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情报部门的财源。

由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那些以伊朗为根据地的阿富汗圣战组织自然无法得到军事援助。而滞留伊朗的200多万阿富汗难民更是孤苦无助。相比起来，逃到巴基斯坦的300多万难民无疑要幸运一些，他们至少还在国际人道主义救助的庇护之下。两伊战争带来的创伤，让伊朗政府无力为圣战组织掏更多的钱。在整个80年代，美国成功地将伊朗排除在阿富汗问题以外。美国的敌对态度，让伊朗方面更加怀恨在心。伊方耐心地等待冷战结束，美军一撤离，他们就将毫不犹豫地介入了阿富汗事务。

伊朗方面的援助，最初只针对什叶派圣战组织，其中大多都是哈扎拉人（Hazaras）。当时，伊朗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对世界各地的什叶派武装分子都给予大力援助，从黎巴嫩到巴基斯坦，到处都活跃着伊朗援助的影子。1982年之前，在伊朗方面的训练下，一支由年轻一代哈扎拉人为主力的极端武装初具规模。此前的1979年，为了抵抗苏联势力，哈扎腊贾特崛起过一股武装势力，并在后来夺取了当地统治权。很快，他们就遭到了伊朗支持下的新生力量的挑战。不久以后，德黑兰当局出面确认了8个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组织。不过，伊朗方面口惠而实不至，从来没有给自己的阿富汗部属提供足够的武器。结果，伊朗的支持不但没能给哈扎拉人任何好处，反而让这个民族在阿富汗内战中屡屡受挫、濒临边缘化。苏联入侵期间，哈扎拉人更多地陷于内斗，真正抗击苏军的时间反而很少。部族主义的流行无疑是伊朗方面短视而又囿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的后果，哈扎拉人更乐意向德黑兰方面争宠，而不是搞好内部团结。

1988年还没到，不过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伊朗方面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援助壮大哈扎拉势力的脚步刻不容缓。在



伊朗的撮合下，8支各自为政的哈扎拉武装组成了统一的伊斯兰团结党。伊朗方面努力将这个党派的成员塞入即将成立的阿富汗临时政府，而那本已是白沙瓦一带圣战组织的天下。尽管哈扎拉人人口稀少，但伊朗的胃口却并不小，他们认为，哈扎拉人应占去未来政府一半的席位。遭到拒绝后，伊朗方面才稍微松口，把原先的席次划去了一半。

同时，沙特阿拉伯方面也没有停下脚步。大批阿拉伯人进入阿富汗境内，并开始大肆传播瓦哈比主义和反什叶派思想。沙特方面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和伊朗之间的斗争。对于沙伊之间的角力，巴基斯坦方面始终保持中立。沙、伊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盟友，巴方多次向两国强调团结的意义，毕竟在当时，苏联扶植的喀布尔伪政权才是共同的敌人。苏军败退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矛盾彻底激化，而后者在当时和喀布尔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暧昧。

伊朗方面认为，喀布尔伪政权是唯一可以抵御逊尼派普什图人的力量。1992年，喀布尔被圣战组织攻陷，为求应对，伊朗不得不重新武装伊斯兰党。伊斯兰党的势力不止限于哈扎腊贾特，喀布尔西部的战略要地也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在同一时间，沙特阿拉伯方面正在吞咽失败的苦果。沙特政府资助的两派新瓦哈比主义武装——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和阿卜杜尔·拉苏尔·赛义夫发生内讧。前者对新成立的圣战组织政府表示反对，甚至加入哈扎拉武装一方对喀布尔进行炮击。而萨亚夫和希克马蒂亚尔的意见正好相反，他坚决拥护新政府的权威。自1990年伊拉克武装侵略科威特以来，沙特方面的外交政策再次遭遇重大挫折。20余年来，沙特政府对伊斯兰世界内的新瓦哈比主义力量从来都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为的是掌握各国伊斯兰运动的方向，并大力传播瓦哈比主义。

不过，利雅得方面的付出虽然巨大，收回的成本却少得可怜。比如，1990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号召那些受其资助的新瓦哈比主义力量团结一心，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一道打击萨达姆·侯赛因。让沙特方面始料未及的是，各派力量大多选择支持萨达姆，悉心栽培的希克马蒂亚尔等各派阿富汗瓦哈比主义武装也在此列。多年付出的大量金钱，一夕之间便付诸东流。沙特方面的教训在于外交政策，他们的种种外交行动竟然完全忽略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在沙特阿拉伯国内，精英阶层较为西化，奉温和的保守原教旨主义为正统；而下层沙特人民则多奉行反西方的极端原教旨主义。

沙特政府在海外所宣扬的是后一套宗旨。没想到，这种极端思潮不但没能宣扬国威，反而让沙特政府内外交困。更为讽刺的是，一直被忽视的阿富汗温和派最终却和沙特阿拉伯王国保持了一致的立场。【285】

1992—1995年，阿富汗内战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敌意也随之增加。沙特和巴基斯坦方面一直努力将阿富汗各派别团结到一起，不过，伊朗及其支持的哈扎拉人不在团结之列。沙、巴方面竭力将伊朗势力排除在一切协议之外。1992年，沙、巴两国牵头商谈白沙瓦协议（Peshawar Accord），各派武装就未来喀布尔政府的权力分配展开会谈。这一协议最终流产，一年后，伊斯兰堡和贾拉拉巴德的两次协议都力图终止阿富汗内战，伊朗及其扶植的哈扎拉势力被排除在协议之外。80年代，伊朗深受美国的封锁之痛，进入90年代后又连遭沙、巴的杯葛。一系列的碰壁让德黑兰方面更是恼怒。

不过，重压之下，伊朗方面也学会了务实行事。渐渐地，伊朗的支持不仅限于什叶派武装，所有说波斯语、抵抗普什图进攻的武装集团都成了德黑兰政府的援助目标。伊朗人和塔吉克人同文同种、渊源深厚，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对喀布尔地区哈扎拉势力的打击，却深深地刺痛了伊朗方面。不过，德黑兰政府确信，如果不弹压普什图人的势力，后者所代表的逊尼派势力便会占领整个阿富汗。1993年，伊朗第一次向据守喀布尔的拉巴尼总统提供军事援助，杜斯塔姆也在受援之列。伊朗此举在于凝聚人心，呼吁各民族势力团结到拉巴尼的领导下。

伊朗的新举措和巴基斯坦的利益正好相悖，两国关系随之紧张。当时，伊斯兰堡当局正竭尽全力地支持普什图人进军喀布尔。和沙特盟友一样，巴基斯坦方面也不愿哈扎拉人获得任何权力。80年代，巴方一直在沙、伊两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今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巴基斯坦当局公然倒向沙特阿拉伯一边。

苏联的解体和中亚的开放，让伊朗看到了打破孤立局面的良机。1991年11月，时任伊朗外长阿里·阿克巴·维拉伊蒂（Ali Akbar Velayti）前往中亚展开开路之旅。此行让伊朗收获了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铁路合同。不过，美国并没有任何打破禁令的意思。1992年，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宣称，华盛顿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扼杀伊朗在中亚的影响力。【286】



一开始，中亚的新社会主义领导人们并不信任伊朗，担心德黑兰的到来会散播宗教极端主义。不过，伊朗方面表现得很是克制，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向前迈了一大步。1989年，时任苏联外长艾德瓦·谢瓦尔德纳泽来到德黑兰，这是苏伊关系的破冰之旅。行程之中，谢瓦尔德纳泽和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举行了会面。最终，伊朗精神领袖在去世前肯定了苏伊关系的紧密性，这也为未来的伊俄关系定下了基调。1989—1993年之间，苏方（后来的俄方）向伊朗提供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武器。至于本地区的其他非伊斯兰教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亚美尼亚，伊朗与它们的关系也日趋密切。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激战正酣，虽然伊朗人口的20%都是阿塞拜疆族，德黑兰方面还是表示不会支持阿塞拜疆。而且，伊方还帮助联合国和俄罗斯政府，为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结束作出了贡献。^{【287】}最重要的是，伊朗和中亚国家对阿富汗普什图人的原教旨主义同样怀着一份警惕，对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的支持也有着同样的反感。于是，伊朗、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塔利班还未成军的时候，一个支持阿富汗境内非普什图部落的联盟就已经初现端倪。

相比伊朗的外交努力，沙特阿拉伯完全没有亲近俄罗斯的意思，更缺乏跑遍中亚各国寻求支持的魄力。沙特方面竟然磨蹭了长达四年之久才和中亚五国悉数建交。不过，沙特阿拉伯的中亚政策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飞快地为中亚人民送去了成百万本古兰经，并邀请大批当地穆斯林前往沙特国内游学。学习的内容当然是瓦哈比主义思想。沙特方面的所作所为迅速招致了中亚各国领导人的反感。没过几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异口同声地表示，瓦哈比主义已经成为中亚各国共同面对的最重大威胁。^{【288】}

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在阿富汗摇摇欲坠。情急之下，沙特方面把塔利班看成了可倚重的实力派。沙特阿拉伯和塔利班的初次接触是以豪奢的狩猎活动拉开序幕。在巴基斯坦方面的组织下，1994—1995年之交，以马乌拉纳·法兹鲁尔·拉赫曼（Maulana Fazlur Rehman）为首的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各国王公贵族浩浩荡荡地奔向坎大哈“打猎”，阿拉伯王公们坐着宽大的私人飞机驾临坎大哈，他们的吉普车队庞大而又豪华，其中的不少座驾，事后都留给了塔利班主人作为礼物。此后，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来到坎大哈进行正式访问。1996年7月，图尔基王子访问伊斯

兰堡和坎大哈之后，沙特方面一出钱、二出汽车、三出燃料，为塔利班攻克喀布尔创造了不少条件。两家沙特公司——德尔塔和宁加尔乔公司（Ningarcho）都陷入阿富汗管线工程不能自拔，它们的处境，迫使利雅得当局不得不支持塔利班。

不过，沙特国内的瓦哈比教士势力才是决定利雅得方面亲塔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沙特王室一向倚重教士阶层作为自己的政策参谋。资深教士大会是该国重要的资政机构，而教士们在另外四个国家部门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289】}教士们一贯主张沙特阿拉伯应该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积极输出瓦哈比主义，沙特王室言听计从。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法赫德国王曾经召集350名教士共商大计，最终下旨同意驻沙美军北上参战。^{【290】}沙特情报部门也和教士来往甚密，沙特阿拉伯政府扶持的伊斯兰慈善组织也不例外。在教士们的建议下，这些慈善组织延续了80年代支持圣战组织的政策，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救援资金，只不过这一次，接受者变成了塔利班。至于沙特国内众多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更是教士们的王国。每逢周五的布道中，必然包含着大量力挺塔利班的内容。这样的渲染之下，沙特国内的公众舆论也渐渐地倒向了塔利班。^{【291】}

沙特分析学者纳瓦夫·奥拜德（Nawaf Obaid）认为，为利雅得方面支持塔利班推波助澜的教士主要是以下两位：谢赫·阿卜杜尔·阿齐兹·本·巴兹（Sheikh Abdul Aziz Bin Baz）和谢赫·穆罕默德·本·朱拜尔（Sheikh Mohammed Bin Juber），前者担任着大穆夫提（Grand Mufti）和资深教士大会主席两大要职，后者则是法律部长和教士大会的重要成员。^{【292】}沙特方面鼎力支持，而塔利班政权方面也投桃报李，多次向沙特王室表示敬意。塔利班全盘照搬了沙特阿拉伯那一套瓦哈比主义制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宗教警察。1997年4月，塔利班领导人拉巴尼（Rabbani）毛拉在利雅得拜会了法赫德国王。阿富汗客人对主人的赞美溢于言表，他说：“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穆斯林的中心，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沙特方面的帮助。塔利班建设沙里亚国家的一系列善政，让法赫德国王深感喜悦和欣慰。”^{【293】}这次会面过去5个月后，塔利班方面收到了利雅得寄来的大礼包。穆罕默德·斯塔纳克扎伊（Mohammed Stanakzai）毛拉高兴地介绍道：“法赫德国王真是个大善人。沙特方面对我们真是有求必应、倾其所有。”^{【294】}

沙特阿拉伯的亲塔政策给利雅得自己也带来了麻烦，盛情之下，沙特



当局把美国政府的催促抛在一旁，他们并不愿意向塔利班施压，迫使阿富汗人驱逐本·拉登。但是，坎大哈的一场外交小事故让沙特方面对塔利班的支助大为削减。不过，事件的起因是奥马尔冒犯了图尔基，沙特方面的反目完全出自个人恩怨，而不是外交政策的转变。利雅得并不认为输出瓦哈比主义有什么错。

沙特方面的亲塔态度，让伊朗方面确信其后有美国势力在撑腰，一切都不过是80年代以来美国方面围困伊朗、支持反伊势力政策的延续而已。德黑兰方面认为，美国的新策略是确保中亚石油管线绕开伊朗领土。塔利班攻陷喀布尔后，伊朗媒体把德黑兰当局的意见再次重复了一遍。《伊斯兰导报》（*Jomhuri Islami*）认为：“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是在华盛顿当局授意下，利雅得当局资助下和伊斯兰堡当局后勤支持下的一次行动。”【295】

不过，伊朗对阿政策的破产更多是由于内因。当时，伊朗政府内部因为各自意见不同，已经一分为二。一派立场强硬，坚持伊朗应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什叶派武装；另一派较为温和也较为理性，他们认为支持反塔联盟，避免同塔利班直接冲突才是当前大计。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利益集团轮番出马，力图将伊斯兰堡的对阿政策引上有利于自身的轨道。同样的争夺也在伊朗上演，军方、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神职人员及其手下的各种基金会等多种势力展开了一番大战。神职人员尤其神通广大，他们掌握着多个国民经济部门，财大气粗，是伊朗外交冒险的坚实后盾。面对这些实力派，负责阿富汗问题的代理外交部长阿拉丁·博鲁杰尔迪（Alaeddin Boroujerdi）必须小心行事，多方讨好，保持平衡。

博鲁杰尔迪负责阿富汗事务已有十年有余，这名聪颖的外交官历经拉夫桑贾尼（Akbar Ali Rafsanjani）和哈塔米两届政府，直到塔利班在马扎里杀害伊朗外交人员的事件爆出，才不得不引咎辞职。在阿富汗问题上，博鲁杰尔迪既可以是鸽派，也可以是鹰派，这取决于他的交谈对象。此外，博鲁杰尔迪的任务还包括谨慎处理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冲突，并确定沙特阿拉伯不会甩手而去。与之相反的是，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萨乌德·阿尔·费萨尔（Saud Al Faisal）对于阿富汗问题完全不闻不问，一切听从王弟图尔基和情报部门安排。【296】

阿富汗政府的崩溃增加了伊朗方面的不安全感。伊方首先担心毒品和武器问题；其次，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矛盾也会随之而来。由于阿富汗经济

困境，上百万难民也会逃进伊朗，必然导致伊朗民众的反感。当时，伊朗国内约有300万瘾君子，跟巴基斯坦等量齐观。但是，伊朗人口只有6 000万，不到巴基斯坦人口的一半。而且，由于大宗燃料、食物和其他物资从伊朗被偷运到阿富汗，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暂的经济问题。伊朗的财政收入刚刚因为油价下跌而缩水不少，正是经济重建的关键时刻，如此一来，等于屋漏偏逢连夜雨。

更令伊朗方面如坐针毡的是，自1996年起，塔利班就开始秘密支持伊朗反政府武装。伊朗逊尼派武装阵线（Ahl-e-Sunnah Wal Jammāt）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秘密基地位于坎大哈，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呼罗珊省和锡斯坦省。该组织的发言人多是伊朗境内的土库曼、俾路支和阿富汗少数民族，他们宣称，自己的目的是推翻德黑兰什叶派当局，建立一个塔利班式的逊尼派政权。不得不说，这个目标有点过于远大，伊朗人口的90%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不过，他们的主张在伊朗国内的反政府组织中还是颇受欢迎的。伊朗逊尼派武装阵线从塔利班那里得到军火和一切支持，而据伊朗方面了解，巴基斯坦当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6年马扎里陷落后，伊朗方面也加大了对反塔联盟的资助。不过，伊朗领土和马苏德等反塔联盟控制区并不完全接壤，一切物资都必须用飞机或铁路进行运输。如此一来，伊方不得不事先征求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同意。1998年，伊朗情报部门用飞机将武器运送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库里亚卜机场，当地正是马苏德武装的基地。而塔吉克裔军阀也成了德黑兰的常客。这种运输方式也会遭遇危险。199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方面截获一趟据称是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列车，并从上面搜出700吨武器和军需装备，它们原计划将被运往塔吉克斯坦境内。【297】

伊朗支持反塔联盟，塔利班自然不高兴。1997年6月，塔利班封闭了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并指责西邻破坏阿富汗的和平稳定。【298】当年9月，塔利班攻打马扎里沙里夫遭遇失败，一份报告指出了其中的伊朗因素：“伊朗飞机粗暴违反国际法及相关条例，蓄意侵犯我国领空，并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机场投放物资。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公敌，伊朗要为一系列的干涉行径负责。我方完全可以在境内资助伊朗反对派，回击伊朗当局。”【299】

1998年，塔利班在马扎里杀害了数名伊朗外交人员。这一行径差点引

发一场双边战争。实际上，德黑兰当局中不乏支持战争的声音，强硬派分子更是希望借此机会削弱哈塔米的权威。一贯温和沉默的外长哈拉兹也不得不放出狠话：“塔利班势力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他们无视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力，所以反抗才会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的和平才会遥遥无期。我警告塔利班及其背后的势力，伊朗不会容忍边境地区发生动乱和阴谋。我方和巴基斯坦方面曾经签署协议，阿富汗问题不应当以战争的方式进行解决。如今战争已经爆发，我方拒不接受。”这番宣言来自哈拉兹1998年8月14日的讲话。^{【300】}

巴基斯坦的背信弃义，让伊朗方面恼怒不已。1996年，拉巴尼总统在伊朗方面的建议下，准备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普什图人等势力都在联合之列。正在这时，塔利班军队闯入并控制了喀布尔。伊朗方面得知，巴基斯坦一直在破坏拉巴尼的民族团结努力。1997年6月，谢里夫总理访问德黑兰，巴、伊两国领导人共同呼吁阿富汗各方停火。哈塔米和谢里夫都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但是，伊方料到巴基斯坦并无遵守承诺的诚意。《伊斯兰导报》就评论道：“巴基斯坦违背了伊朗人民的意愿，不值得信任。我们决不能放纵巴方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301】}

1998年夏，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劝说下，伊朗派员参加了联合外交和平代表团。巴、伊两国的中层外交官首次共同出访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与反塔利班势力进行会谈。7月4日，塔利班攻打马扎里沙里夫，杀害了正在当地逗留的伊朗外交官。伊朗方面认为，巴基斯坦一面以签订和平倡议为名，诱骗伊朗外交官前往马扎里沙里夫；一面又让本国情报机构唆使塔利班进攻该城。而且，伊方还称，巴基斯坦方面曾经保证伊朗外交人员在马扎里沙里夫的安全。惨案爆发后，伊朗方面十分愤怒，同时谴责塔利班势力和巴基斯坦政府。伊朗官方认为，杜斯特·穆罕默德（Mullah Dost Mohammed）应对惨案负直接责任。正是这位毛拉率军占领了当地伊朗领事馆，并把伊朗外交人员关押在一处建筑之中。随后，杜斯特·穆罕默德打电话请示坎大哈方面，并最终执行了枪决命令。^{【302】}

塔利班方面也进行了辩驳。他们认为，这些伊朗人不是所谓的外交官而是情报人员，专门负责为反塔联盟提供武器，这场外交风波也让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303】}伊朗方面的愤怒不止于此，塔利班的行动还威胁到了转暖中的美伊关系。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6月说：“伊朗在这一地区的重要角色，让美伊关系成为国务卿关心的重要问题。”^{【304】}

奥尔布赖特的一席话，让伊朗当局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的重视。哈拉兹外长曾告诉笔者，美伊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绝对有着代表意义。美国当局已经认识到地区的现实，以及伊朗对本地和平稳定的促进作用”。他还说：“我们一直向他们（美国当局）强调，伊朗是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305】}美伊两国的靠近，来自于华盛顿方面对塔利班看法的改变。塔利班政权的种种行径：包括他们的毒品和妇女政策、对恐怖分子的纵容、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标榜，美伊双方都表示了一致反对。讽刺的是，美国一直在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缠斗，唯一的区别在于过去的对手是什叶派，而如今变成了逊尼派。

沙特方面也渐渐地难以容忍塔利班势力，转而追求和伊朗改善关系。塔利班对本·拉登的庇护，对极端主义的支持，让沙特阿拉伯的稳定深受威胁。沙伊关系的正常化历程一路舒畅，1998年伊朗入侵阿富汗的宣言也没能阻碍两国重修旧好。1999年5月，哈塔米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他也是近30年来首次访问该国的伊朗领导人。

塔利班大力支持沙特国内的异议分子，这对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威胁巨大。过去，沙特方面对塔利班式的原教旨主义鼎力支持，至于国家组织形式、政治协商和权力分配等具体问题，他们从没有思考过。不过，形势逼迫之下，沙特当局不能如此糊涂下去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更多系于私人关系，而不是依靠国家机构出面。这样一来，沙特当局的外交政策很少以本国利益为主导，而是处处以弘扬瓦哈比主义为目标。

为推动国内改革，伊朗政府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局势。支持反塔联盟、打击东来的毒品、打击武器走私和分裂主义思潮、加速改善同美国的关系，都是哈塔米政权为防微杜渐作出的努力。

塔利班极端主义同样让伊沙关系重现暖意，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同上述两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伊朗重回国际外交舞台，巴基斯坦是其中最大的失败者。不过，为结束西方世界的禁运政策，伊朗必须展现出负责任的一面，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态度。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便是德黑兰当局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第 16 章

总结：阿富汗的未来

面对阿富汗内战，西方世界选择性地失明了，他们更关心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在1995年的一番感叹。^{【306】}世界对于阿富汗的处境不管不顾，任由这个国家在内战、民族隔阂、宗派冲突中备受煎熬、濒临破产。既然国已不国，人民的生活当然无法保证。一代代的阿富汗儿童过着漂萍一般的生活，没有认同、没有生存的意义，生活中除了打打杀杀别无他物。至于成年人，也不免变得暴戾、狂躁、沉湎战争、拜服强权。联合国调停官员拉赫达尔·布拉希米曾经叹道：“我们身在一个失败的国家中。这个国家宛如感染过的伤口，让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清洗才好。”^{【307】}

全体阿富汗人都陷入了流离失所的状态，离开家园的滋味，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尝到了。喀布尔的惨状，完全可以跟二战中德国的德累斯顿相提并论。这片土地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驿站，亚洲的十字路口，如今只剩下了一片瓦砾。基础建设完全崩溃，社会组织也难以依存，连最贫困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据国际红十字会在1998年的统计，阿富汗有9.8万个家庭失去了男主人，而残疾人为主的家庭达到了6.3万个。此外，仅1998年一年，阿富汗就有4.5万人留下战争创伤。至于因饥饿、缺乏救治的疾病、虐待、屠杀等带来的死亡人数，更是无法统计。整个国家唯一兴旺的工业项目便是生产假肢、拐杖和轮椅的工厂。^{【308】}

阿富汗的分裂是多方面的——不同民族之间、不同部族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受教育者和文盲之间、持枪者和手无寸铁的人之间，都有着不

可逾越的鸿沟。这个国家的经济成了一个大黑洞，通过非法贸易、毒品贩卖、武器走私等活动，将邻国也一步步拖向经济崩溃的深渊。一位来自瑞典的救助义工安德斯·方格（Anders Fange）说：“阿富汗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权，做一点起码的规划，为这个国家的发展着想。这个过程起码要花费10~15年时间。而其个人认为，这还是乐观估计。”【309】

此前的几个世纪，阿富汗曾经有过有力的政权组织，但在今天，这种组织已经支离破碎。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无法完成国家统一和重建的历史任务。国家认同更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血缘和部族关系为寄托的认同感。阿富汗人再也不以阿富汗人自居，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普什图人或塔吉克人，他们更愿意用坎大哈人、潘吉什里人、赫拉特人、喀布尔人或约兹亚尼人（Jowzjanis）来表现自己的归属。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甚至深入到了一村一镇，到处都是裂土为国的痕迹。由于战争和迁徙，普什图人部落共同财产和牧场都已经消逝，因此，部落结构本身也难以幸免。至于那些非普什图裔的阿富汗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只能从自己所依附的军阀，甚至出身的山谷里寻找自己的根。

在部落长老的调停下，阿富汗的冲突一度有平息的趋势。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长老们死的死，逃的逃。苏联入侵已经将阿富汗旧的统治精英完全埋葬，而新的统治者从未诞生，没人能代表阿富汗参加和平谈判，没人能为阿富汗的利益作出决断，甚至没人能够委曲求全。为数众多的政治领袖，都只能代表全国人口中的某一部分，没人能获得全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势之下，战火延绵不绝。阿富汗是否会彻底分裂？而阿富汗的分裂会不会在这一地区造成连锁反应，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阿富汗内战难以平息，主要原因应该归咎于外来势力的介入。正是这些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直接导致阿富汗不断在战争和暴力之中盘旋。这一恶行的始作俑者是苏联，不过，侵略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曾是一名苏军少校，也参加过侵阿战争，他是这样评价阿富汗战争的影响的：“对于我们来说，阿富汗的影子一直挥之不去。它已经深入我们的魂魄、心灵、习惯。一切的一切都被这段经历浸染。那是一次政治冒险，只是为了所谓的输出革命，结果为苏联的覆灭埋下了伏笔。”【310】阿富汗的圣战组织不但为埋葬苏联撒下了一捧土，甚至间接引发了东欧的剧变。

不过，西方世界并没有认识到阿富汗在终结冷战方面的功绩。苏军的败退，预示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即将走到尽头，一场体制内的自愈式改革以失败告终。苏联的前车之鉴给今天的干涉者提了个醒，那些干涉阿富汗的外来势力将会遭受四分五裂的命运。当然，这不是因为阿富汗自身的力量，而是干涉者本身社会的脆弱性会因干涉而动摇。

冷战一结束，美国势力便早早地撤出了阿富汗。此后的几年内，华盛顿政府便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外交官被杀、大使馆被毁、纽约发生爆炸袭击、阿富汗出产的廉价海洛因行销美国街头等。这一切，都出自阿富汗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的新兴避难所。冷战中的阿富汗曾经为美国利益而战，如今却因为老朋友的冷漠而独吞苦果。20世纪80年代，美方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倒下为止”，全然不顾苏联的战争威胁。但是，苏联势力败退后，美国方面却对一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民族的和平愿望视而不见。美国的退出，让一些地区势力有机可乘，他们趁机向阿富汗渗透并制造事端，而美方则对这些势力惟命是从。无论在石油管线上，还是在妇女问题和恐怖主义上，美国政府都没有吸取教训。优尼科工程的最终流产，本应该让美国领导人的脑子清醒一点。不幸的是，美国外交官仍然执迷不悟地追求所谓的石油出口通道，他们为巴库-杰伊汉管线在中亚各地穿梭不停。直到最后，这条管线也陷入了无限期的停滞之中。很快，原定于2000年开工的管线延期到了2003年。本书完稿的时候，更是已经推迟到了2005年。^{【311】}

优尼科工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在这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车臣、格鲁吉亚、库尔德人聚居区包围下的地区，如果美国和其他国际势力不努力解开冲突的结，任何油气管线都将会是空中楼阁。对待这样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地区内的各路势力需要一致努力，才可能把它浇灭。在那以后，油气管线才能水到渠成。作为两股重要的力量，伊朗和俄罗斯绝不应该被排除在地区发展之外。刻意的隔绝，只能导致两国对管线工程的抵触和阻挠，而且，民族间的冲突和国家间的对立也是管线建设的大敌。民族主义永远是现代社会的有力号角。解决民族矛盾、加强各国团结，需要各方付出长期的外交努力。黑金政策虽然能够掩军阀之口于一时，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此外，持续不断的内战、不稳定的局势、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浸淫已

久的环境、严重的毒品和军火问题，这些统统都是石油公司开展管线建设的阻碍。在英俄对峙的大博弈时代，双方虽然都作出剑拔弩张的姿态，却始终没有越红线一步。当时，英国和沙俄勘定边界、签订条约，把阿富汗作为双方的缓冲国。新一轮的大博弈之中，各方势力应该共同努力，维护稳定，杜绝增加地区冲突和敌意的行为。美国是唯一有力量制止邻国干涉阿富汗内政的大国，但是，华盛顿当局并没有为此付出全力。

至于巴基斯坦，冷战的结束也让一度热络的巴美合作走到尽头，而这个南亚国家也从此陷入经济危机。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放弃在阿富汗扶植新政府、拓展本国影响力的努力。印巴关系一向紧张，而印度的人口是巴基斯坦的7倍。自1947年分治以来，独立的巴基斯坦就把安全作为立国第一要务，各种内政外交都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不过，从5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的命运从来只掌握在军方、官僚和情报部门等政治精英阶层手里，公民社会从来没有成长机会。巴基斯坦的威胁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解释权在精英手中，而民选政府、议会、公民组织甚至民意都无从置喙。

从建国之初到1988年，巴基斯坦已经有四届民选政府被解散。这段时间之中，还有十届政府前后上台，内政的稳定性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312】}面对如此深刻的认同危机、政权合法性问题、经济失序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们不顾一切地一脚踏进了帝国主义扩张活动。这也是二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所进行的最愚蠢的冒险。如今，巴方同时面临着两个战场，一是克什米尔，二是阿富汗。随之而来的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毒品、军火和社会组织的瘫痪，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侵袭深入腠理。不过，巴方当局对此毫无对策。国内的种种乱象，让一场塔利班式的伊斯兰革命走到了爆发边缘。一旦革命成真，中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将遭受极大挑战。

要想在喀布尔建立稳定的中央政权，巴基斯坦方面必须付出全方面的努力。重建资金、食物、燃料和对外关系，这些事情都需要巴方帮助。可是，巴基斯坦的决策者们对此毫无察觉。试想，如果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提供重建需要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材料，那将是一次两国双赢的机会。阿富汗难民能够重回家园，减轻巴方的财政负担，巴基斯坦也可以重建一些已经崩溃的国家机构，并确定边界的安全。

当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陷入错误的时候，伊朗的影响力并没有借机扩

大。伊方只能以其微弱的影响力，抵御着塔利班统一全国的脚步。不过，阿富汗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伊朗的两张牌——什叶派和波斯语。伊方的外交策略，让阿富汗的各个民族互相对立。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是伊朗最为支持的两大民族。它们之间的分道扬镳，充分显示了伊方“分而治之”战略对反塔联盟的破坏性。

伊朗政策的反复，反映了伊朗国内政治高层权力争夺，这种争夺日渐白热化，尤其是近两年。而且，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互信完全破裂，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也因此大大延后，阿富汗人民的痛苦也更加持久。伊巴双方不但没有就解决阿富汗问题达成共识，甚至还挑起了代理人战争。这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战事，阿富汗当然不能幸免，宗派主义阴云密布着整个地区。随着塔利班的诞生，阿富汗发生了宗派主义和民族隔绝所引起的大清洗。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灾难还是首次。

虽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新手，但中亚诸国很快便掌握了个中要领，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消除威胁和障碍。在他们看来，一个由普什图人统治的阿富汗便是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障碍。塔利班所宣扬的伊斯兰极端思想，更是让中亚诸国的统治者又恨又怕。为了给阿富汗境内的本族人争取政治权力，中亚各国各显神通，纷纷力挺自己的阿富汗同胞抵抗塔利班。中亚各国的作为，让巴基斯坦横跨阿富汗，联通中、南亚的管线梦遭遇了极大难度。因为一旦塔利班真正掌权，中亚各国只好自认倒霉。他们肯定不会放心自己的能源经过塔利班的地盘，巴基斯坦的计划因此面临被架空的困境。

沙特阿拉伯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很有启示性。从始到终，沙特方面完全不顾自身的国家利益，一门心思只为了讨好国内瓦哈比利益集团。而沙特势力从阿富汗撤离，只是因为奥马尔犯上作乱，侮辱王室成员。瓦哈比主义的出口转内销，反而削弱了沙特王室的统治基础。本·拉登对沙特家族腐化无能的多次指责，让沙特人民言犹在耳。除非阿富汗战争停止，境内恐怖主义基地得到清除，否则本·拉登的恐怖事业不愁没有后来人。

沙特阿拉伯支持塔利班的行为，让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十分失望，因为塔利班所崇尚的那一套完全曲解了他们的信仰。不过，西方民众越来越把两者混为一谈。批评的声浪不仅指向塔利班，而且直扑整个伊斯兰教。部分西方人认为，伊斯兰信仰缺乏宽容，而且反现代化。塔利班等原教旨主义分子只接受伊斯兰神学，而伊斯兰文化的其他部分——哲学、科学、艺



术、美学和神秘主义思想则被通通抛弃。伊斯兰所蕴含的丰富多元性，以及古兰经的真谛——建立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自然也都被抛到脑后。

早期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光辉之处，在于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兼容和交汇。如今的伊斯兰世界中，许多国家都处在失败边缘。伊斯兰的古老传统被独夫民贼和狭隘的原教旨主义取代，从而带来了这些恶果。整个伊斯兰教发展史陷入了被征服、复活和失败的循环。“也许，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命运。最初，它的文明之光泽被四方，邻近的原始部落都归化入教。后来，宗教沦为这些野蛮人的猎物，一切秩序都被重建。最后，原始部落披上了伊斯兰文明的外衣。”布罗代尔如此写道。^{【313】}

按照这个循环，塔利班会改弦易辙，适应一个拥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部落社会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结构水火不容，塔利班困在这两难之中，进退不得。由于权力分配不均，普什图人内部已经斗得不可开交，何况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非普什图裔民族。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阿富汗学者阿什拉夫·加尼是这样看待本国的多民族关系的：“表面上看，普什图人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建立国家政府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精英阶层都应当参与其中。尤其是那些非普什图裔人，他们在政府和军方都会扮演重要角色。”^{【314】}不过，塔利班并不懂得阿富汗的历史，因此，他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且，塔利班方面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建设方面的规划，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中央政权、国家机构、建设方案和反映民意的咨政机关（如支尔格大会和伊斯兰教舒拉大会）全部缺位，如此一来，大多数阿富汗人当然不可能接受塔利班政权，而世界各国也不会予以承认。阿富汗的建国大业，必须建立在一个被广泛接受，能终结内战的政权组织方案上。不过，奥马尔为首的坎大哈派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小集体，拒绝任何外人分享权力。塔利班内部出现了裂痕，将来出现一次针对坎大哈派和奥马尔本人的兵变并非没有可能。

所有阿富汗军阀都无视民间疾苦，其中尤以塔利班为甚。在塔利班分子的心目中，伊斯兰信仰会带来一切，所以任何关系民生的建设都无足轻重。人道主义援助虽然让阿富汗人民能够姑且苟活，却也使得军阀更加无视人民的处境，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了战争。因此，援助愈是增加，

阿富汗的战火愈是炙热。联合国和各大非政府组织对此十分头痛。这种现象并不是阿富汗的特殊国情，苏丹、索马里……所有的失败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依靠国际救援，对于他们似乎是饮鸩止渴。

驻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几乎全盘失败，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外——无论战争多么严峻，有组织的走私和贩毒活动始终坚挺、长盛不绝。为了促进走私效率，塔利班甚至干了一些实事：他们修葺道路、建设油井，甚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起了一个电话网络，毕竟时间就是金钱，贩毒生意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便利，都献给了走私和贩毒集团。至于医院、学校、自来水这些关系民生但无关走私的事情，自然没人去做。

塔利班势力绝无统一阿富汗的可能，要想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更是痴人说梦。也许塔利班军队将会攻克反塔联盟的北部老巢，不过，那无助于阿富汗的稳定。相反，非普什图裔阿富汗人的抵抗力量会逃往伊朗和中亚，并继续他们的游击斗争。即便在普什图人聚居区，塔利班虽然拥有稳固的统治基础，却也不会迎来安定和平。“喀布尔以南的阿富汗人大都认为，塔利班虽然已经大失民心，不过仍然是当地人的安全保障。塔利班的统治，至少比以前的统治势力要好。以前真是一片混乱。”【315】

塔利班不会彻底消亡。未来的阿富汗很可能迎来塔利班和反塔利班势力间的对峙局面。主要战场包括喀布尔、坎大哈，尤其是赫拉特。

塔利班的北进计划困难重重，而反塔联盟更是无力南下确立统治。马苏德曾经试图和普什图人中的反塔利班势力团结作战，不过，他始终无法找到足够多的盟友，也无法找到统一阿富汗的民族合法性。反塔联盟的生存机会，只能寄望普什图人的内部纷争。虽然内战肯定会进一步延长，但塔利班的气焰也会遭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双方会选择谈判。塔利班只会破坏，不懂建设，反塔联盟也好不到哪里去。各派组织各行其是，缺乏统一制衡的力量，而各派组织间的争权夺利，更让阿富汗人民无法为他们投信任票。塔利班很糟，但反对他们的势力也不见得有多好。

阿富汗彻底分裂并非不可能，普什图人居多的南方被塔利班占据，而反塔联盟则盘踞着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脉便是两国的国界，而喀布尔则将是双方争夺的要地。种族屠杀、宗派冲突、民族清洗，这些惨剧在阿富汗各地并不少见，国家分裂的那一天看起来十分可期。万幸的是，阿富汗各派势力之中没有一个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或者萨达姆·



侯赛因之类的人物，军阀裂土称王的事情，暂时还不会发生。对于外国干涉者来说，阿富汗的分裂并不符合自身利益。这个国家一旦分裂，潘多拉的魔盒会随之打开，民族冲突、毒品、武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冲破阿富汗边界，给它的一众邻国带来灾难。没人愿意看到这个结果，这也是未来和平的一点微弱的契机。

为了阿富汗的和平，联合国方面不可谓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始终没有任何成效。只要外来势力还在为军阀出钱出力，阿富汗内战绝无可能停止。因此，为了制止阿富汗的内战，需要先从阿富汗以外的各种势力做起。所有邻国应协调一致，共同停止向阿富汗输出任何武器。而联合国必须起到监督作用，保证各方势力说到做到。各个邻国还必须收敛控制阿富汗的欲望，他们的代理人也得停止武力统一的步伐。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作用尤其重要，巴方要停止在普什图人聚居区煽动战争的行为，而伊朗也不得在阿富汗中西部为什叶派武装提供战争支持。

总之，每个邻国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邻居的诉求，也应该给予尊重。在目前这个阶段，完全摒除外来势力并不现实，只能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外来势力之间需要互相理解，不能危害对手的安全利益。不过，要让他们达成共识，过程将会十分艰苦。因为这不仅仅是外交问题，各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也会横插一脚。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警惕，反对一切意图肢解阿富汗和干涉阿富汗政治权力分配的行为。

鉴于阿富汗目前的局势，不能再奢望各方势力组成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奥马尔和马苏德之间矛盾重重，毫无商量和协议的余地，更别提他们抛弃前嫌、共主喀布尔的可能性了。为求和平，只有先达成停火协议，建立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实施喀布尔的非武装化。至于那些由地方武装盘踞的地区，可以暂时维持现状。不过，各派势力一定要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武装，而喀布尔的警务力量则由各方协商之下，共同出兵组建。

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外国后台，他们的援助资金也来自四面八方。这笔钱可以由各方自行保管，但国家基础建设的整体规划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进行。这样不但可以修复阿富汗的满目疮痍，还能够增进各派力量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另外，各派武装必须在统治区域内建立民选的议政机构，作为未来喀布尔大支尔格或者舒拉大会的基础。

要达成这一切殊为不易，而且，目前的状况是没有一方军阀愿意坐下来谈判。如果国际援助者、世界银行和大型的私人慈善机构共同出面为阿富汗的重建作担保，也许会引起各方谈判的兴趣。但是，没有和平的保证，这一切也都是空谈而已。

国际势力的银弹攻势不仅仅是贿赂军阀，也是对阿富汗人民的鼓舞。外国人的钱鼓舞人民向各派军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为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付出足够的努力。要知道，如果没有国际方面的斡旋和支持，和平不会轻易地降临到阿富汗土地上。

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对于地区局势善莫大焉。巴基斯坦可以从阿富汗的重建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阿富汗内战带来的种种弊端——军火走私、毒品、恐怖主义、教派冲突和地下经济也可以从巴国土地上连根拔除。而且，巴方外交会摆脱孤立的局面，巴基斯坦同中亚国家的交通联系将得到重建，帮助对方找到通往大海的捷径。伊朗也将得到重回国际社会的机会。回归后的伊朗将作为中亚、南亚、中东三地之间的通衢大道而发挥重要作用。土耳其方面可以从阿富汗的稳定中受益良多，一条连接阿富汗突厥语民族的大道会摆到这个国家面前。阿富汗获得和平也符合中国的利益。阿富汗的和平会让俄罗斯政府改变观念，莫斯科会认识到，俄方和中亚、南亚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经济基础而不是霸权企图上。困扰俄罗斯人多时的战争幽灵也将随之烟消云散。油气管线将会穿越阿富汗，为这个国家带来重建所需要的一切。而美国也会制定出更为现实的中亚政策，维护和平环境、谋求能源利益、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对阿富汗内战视而不见，只会收获最糟糕的后果。巴基斯坦将面临一场塔利班式的伊斯兰革命，从此不但国无宁日，地区安全也将受到冲击。至于伊朗，仍将是世界的孤儿，而且东部边境将动荡不止。中亚国家不但不能得到出口能源矿产的捷径，还同样面临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俄罗斯也面临社会动荡、经济低迷的危险。总之，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第 17 章

卷土重来：2000—2009年间的塔利班

2001年9月11日，19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飞机冲进了纽约帝国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一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一度认为，一切政治威胁都已经覆灭，过小日子的时候到来了。如今，西方人的美梦被恐怖主义的爆炸惊醒，他们很快发现，伊斯兰极端分子不单单是在滥杀无辜，还直接往西方世界的核心上插了一刀。而对于万里之外的中亚和南亚人民来说，西方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将是一次历史机遇，塔利班的统治很可能就此终结。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阿富汗忍受了20多年的战争，如今也该到头了。很快，一场旨在推翻塔利班，重建阿富汗的战争全面爆发了。

“9·11”事件爆发之前的18个月内，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被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折腾得近乎崩溃。这本是一次对世界的警示，本·拉登已经把阿富汗当做自己的庇护所，他手下的2 500多名恐怖分子蠢蠢欲动。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南亚、中亚、中东、远东、非洲甚至欧洲。他们涌入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学习战斗、制造炸药和投毒的种种技巧。

2001年1月，国际社会试图加强对塔利班的制裁，不过仍不足以断绝阿富汗军阀和基地组织间的联盟关系。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33号决议，对塔利班进行制裁，禁止向其出口武器，并冻结了塔利班的一切海外资产。这禁令让塔利班恼怒不已，因为他们的最大对头——联合阵线（现已更名为北方联盟，NA）完全不受任何限制。不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并没有理会联合国的要求，继续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巴基斯坦



情报部门的顽固，迫使联合国在7月再次出台新禁令，向伊斯兰堡方面进一步施压，试图彻底断绝塔利班的武器来源。

一轮禁令下来，塔利班政权和巴基斯坦政府更显得孤立，不过禁令本身并没有起到多大效力。为了反击，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总统领导的军政府专门组织了反美和反联合国大游行，各个伊斯兰宗教组织大肆鼓噪。至于对塔利班的支持，自然一切照旧，而基地组织也参与其中。

国际压力也使得塔利班统治阶层内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温和派人物向来反感阿拉伯人插手阿富汗事务，这一次，他们坚决地站到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对立面。而且，塔利班温和派还希望同联合国进行协商。不过，4月16日，温和派领袖穆罕默德·拉巴尼罹患癌症在卡拉奇一所医院内去世，这位塔利班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也是运动内反阿拉伯势力的代表。随着他的离去，基地组织放开了手脚。在他们的挑唆下，奥马尔下达了一系列罔顾阿富汗文化和传统的命令。几周之内，外国医院统统关门，而境内的印度教徒被迫佩戴黄肩章作为身份标识。塔利班还禁止人民使用互联网，将8名人道主义救援义工告上法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粮坊为几百万阿富汗饥民提供口粮，现在也不得不停止工作。

基地组织为塔利班注入了新鲜血液——2 500名阿拉伯志愿兵，而塔利班也磨刀霍霍，准备向马苏德武装盘踞的地盘发起攻击。很快，塔利班便攻占了阿富汗中部的哈扎腊贾特。为了对当地的哈扎拉人表示惩戒，奥马尔决定炸毁巴米扬山谷中的两尊大佛像。这两尊大佛都有1 800年的历史了，但是，哈扎拉人的主要信仰其实是伊斯兰教什叶派。4月10日，佛像被炮火摧毁，引发了国际上的谴责声浪。哈扎拉人的逃难潮，导致阿富汗国内难民增至百万，进一步加重了饥荒和破坏。许多人不得不靠吃草、老鼠和动物饲料苟延活命。为了获取食物，卖儿鬻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对那些有心的阿富汗问题观察家来说，“9·11”事件早有先兆。灾难发生的前夜，阿富汗已经乱象连连，基地组织盘踞于此，无能政权统治于此，饥荒、内战、难民潮、毒品不但为祸于此，而且肆虐于外。

基地组织为“9·11”恐怖袭击作了精心准备。两天前，马苏德被刺身亡。在基地组织的策划下，两名摩洛哥籍年轻人伪装成记者，他们从比利时一路出发，最后用隐藏在电视摄像机里的炸弹谋杀了联合阵线领导人。为了这次刺杀行动，基地组织用了几个星期来准备策划，塔利班本可以趁

此机会将联合阵线一举击溃，并在“9·11”灾难发生的时候控制阿富汗全境。马苏德的死，是本·拉登送给奥马尔的礼物。作为回赠，塔利班继续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并抵抗美国人可能的报复行动。

“9·11”发生不过几周，布什总统便向恐怖主义宣战，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很多国家都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9月15日，布什向穆沙拉夫发出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警告巴基斯坦总统“要么合作，要么闹翻”。很快，军政府的立场摇身一变，抛弃昔日盟友塔利班，转而支持美国进攻阿富汗。穆沙拉夫认为，如果巴方拒绝美方要求，便会遭到轰炸。不但本国核设施不保，美军甚至可能入驻印度。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势力对总统的态度大为不满，不过穆沙拉夫弃塔利班投靠美国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

至于奥马尔，他拒绝下野，也拒绝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成员引渡美国。塔利班和美军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地到来。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多次苦劝奥马尔丢卒保帅，但都未能见效。不过，奥马尔非常清楚，塔利班领导层内部对本·拉登的看法并不统一，他本人力保基地组织的行为甚至可能为自己招来兵变之祸。巴基斯坦境内的亲塔利班势力向阿富汗方面通报称，美军不会出动地面部队，只会利用空中轰炸，塔利班完全可以抵抗。这个情报让奥马尔安心不少。

当时，美国方面确实处于犹疑之中。毕竟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华盛顿当局还不敢贸然闯入阿富汗泥潭。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大胆建言，让美军特种部队及中央情报局人员同阿富汗北部的联合阵线武装组成联合武装力量，后者负责为美国空军找到轰炸目标，并同时策应美军的地面攻势。驻中亚、巴基斯坦和波斯湾地区的美军都进入了战备状态，美国航母也驶近巴基斯坦一带。

10月7日，所谓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正式拉开帷幕，美军对分布在阿富汗各地的塔利班基地和军事设施展开一番狂轰滥炸。当时，约有5万名塔利班士兵正在喀布尔城外与联合阵线武装激战，他们也成了轰炸的目标之一。轰炸持续了整整4周，随后，联合阵线的地面进攻也开始取得成效，11月9日，马扎里沙里夫被拉希德·杜斯塔姆和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领导的乌兹别克-塔吉克联军攻克。此后的3天内，阿富汗中西部的大片领土落入联合阵线手中，塔利班军队仓皇逃窜之中又遭

遇美军轰炸，死伤无数。同时，中央情报局拿出金钱攻势，一些普什图武装在利诱之下也背叛了塔利班。【316】

先是失去了阿富汗北部，旋即又从喀布尔败退，塔利班无奈之下只得龟缩回坎大哈老巢。不过，阿东北部普什图人聚居的飞地昆都士省虽然陷入重重包围，却仍处在亲塔武装控制之下。被困在昆都士省的人员之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官员。战争进展得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撤离。在穆沙拉夫的请求之中，美国方面允许巴方前往昆都士撤出本方人员。11月中旬，巴基斯坦空军来到昆都士，不但救出了本方情报人员，一些塔利班武装分子甚至基地组织成员也随行撤出。这次行动一共花费了3个晚上。而剩下的塔利班武装大多选择向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投降，不少降兵被处死，另有不少人死于狱中。

12月5日，奥马尔打开坎大哈城门，宣布投降。不过，塔利班领袖本人却骑上一辆摩托车成功地逃出重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地的塔利班人员大多都安全地栖身在农村地带，也有的人前往邻近的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避风头。至于本·拉登等一干基地组织成员则选择往东逃窜，他们在托拉博拉山脉躲藏过一段时间，后来甚至翻越国境，进入巴基斯坦的几个自治地区寻求庇护。对于这次胜利大逃亡，美国方面没有一点办法。因为华盛顿当局坚持不出动地面部队，只依仗联合阵线武装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堵截。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本次战役的最大的失策。

几个月后，笔者在喀布尔和几位军官进行了交流。他们告诉我，塔利班一共损失了8 000~12 000名人员，占其兵力总数的20%。而受伤的塔利班人员约为死亡人数的两倍多，此外，还有7 000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不过，虽然塔利班因此大伤元气，却并没有彻底一败涂地。他们的领导层保存完好，完全可以逃到巴基斯坦以图再战。

战争进展之迅速，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不过，随之而来的政府问题还是让人头痛。在联合国特派大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和助理弗朗塞斯克·旺德雷尔（Francesc Vendrell）的斡旋下，阿富汗各派武装在德国波恩（Bonn）举行了会谈，讨论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问题。虽然出席派别很多，联合战线仍然在各派之中占了绝对优势。当然，不少普什图武装都无缘参加此次会议。至于塔利班，更是不可能接受邀请。

11月27日，波恩会议正式开幕。经过几天几夜、夜以继日的争执和辩

论之后，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阿富汗新一任临时大总统。卡尔扎伊来自坎大哈附近一个普什图部落，要论部族关系，他还是前国王查希尔·沙阿的一族同胞。新总统是文官出身、秉性温和，没有太多军阀习气。90年代早期，卡尔扎伊在奎达一带经商为生，当时他还是一名塔利班运动的支持者。不过，1999年的一起事件让他的态度起了180度的变化，在那一年，塔利班谋杀了卡尔扎伊先生的父亲。“9·11”事件之后，卡尔扎伊甚至冒险进入阿富汗境内，鼓动自己的普什图同胞反对塔利班统治，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位普什图裔武装领导人。卡尔扎伊在阿富汗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美方慷慨地提供了武器、食物，并为卡尔扎伊配备了专门的军事顾问。【317】

12月6日，谈判各方达成了波恩协议。协议呼吁建立一个“多方接受、主张男女平等、民族团结和代表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意愿的政府”。各派还约定在次年6月进行紧急的支尔格大会，届时大家将讨论过渡政府的相关事宜，同时也会把未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之前，正式的支尔格大会将讨论并起草新宪法。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将会被授予“国父”的荣誉称号。不过，波恩协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停火协议。因为，战争的另一方并没有加入讨论，所以，停战和非武器化能否实现还是个问号。不久后，布拉希米和旺德雷尔就开始后悔了。他们当初没有邀请塔利班共赴波恩也就罢了，事后也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不过，波恩会议虽然过于仓促，但却十分必须。得益于会议成果，战争终于有了停止的迹象，喀布尔的权力真空也将得到补救，临时政府即将成立，而阿富汗各方也团结一心、缓解了外国吞并的危机。

不过，布什政府并没有重建阿富汗的打算，甚至不准备增派部队保护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阿富汗告捷不到几周，美国空军便投入到对伊拉克战争的准备活动中去了。美军特种部队也停止了对基地组织的搜查，纷纷从所谓的重要目标撤走了。布什政权为了保卫美国的能源安全，不惜牺牲阿富汗，转而把金钱和军力投向伊拉克。为了维持阿富汗的局面，美方加强了同联合阵线的合作。要知道，联合阵线也是内战的积极参与者，阿富汗人民对他们同样恨之入骨。

不过，仍有一些驻喀布尔的美国官员反对本国政府扶植代理人的行为。他们认为，联合阵线是中央情报局的忠实盟友，可以维护喀布尔附



近的和平，并帮忙追缉基地组织成员。不过，这些军阀贪婪成性、腐败残忍，他们不但欺压人民，甚至卷入毒品走私等非法买卖之中。2002年5月，民主党议员（现任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曾经发出警告：“塔利班垮台之后，美国却扶植了一群军阀……现在看来，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在走。”^{【318】}不过，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美国和军阀的合作是一笔好生意。

2002年6月，支尔格大会如期举行。卡尔扎伊再次当选临时政府总统。不过，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成果。临时政府几乎什么都缺，无法正常施政。由于美军部队不足，城市安全无法保证，更别提广大的乡村地区了。美国方面后知后觉，很久以后才发现一支阿富汗军警力量的必要性。新政府的财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阿富汗的各方面都需要钱——基础建设、创造就业、工农业投资、帮助塔利班人员回乡安置，资金缺口达数十亿美元。显然，美国方面并没有满足阿富汗的需求。

北约中的欧洲国家一直认为，阿富汗新政府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在不行，也得有一支多国维和部队对其进行保护，至少喀布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在盟友的压力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勉强同意了。很快，一支名为国际安全保卫力量（ISAF）的维和部队迅速成军，20多个国家都派出了兵员参加，总人数达5 000人，专门负责保护喀布尔的治安。至于其他城市，维和部队很少涉足，除非布拉希米和旺德雷尔亲自下达命令，否则他们不会离开喀布尔半步。布拉希米和旺德雷尔找到了新工作，他们现在是欧盟驻喀布尔的总代表，同时也代表着卡尔扎伊总统的旨意。至于成百上千的阿富汗武装分子，联合国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不过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態度造成的。

再说塔利班的情况。他们的领导阶层毫发无损，而且在巴基斯坦拥有大批支持者。江东父老十分欢迎塔利班的归来。不少塔利班分子同家人在俾路支斯坦的难民营里团聚，一些人则回到了原来的宗教学校。至于塔利班的头头脑脑们，三军情报局、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省的大小官员都对他们礼遇有加。

2002年的巴基斯坦大选完全被军方垄断，贝·布托和谢里夫所领导的两大党派被迫靠边站。军方破坏大选的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大家都很

同情两位前总理的遭遇。但是，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两地的选举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军方的操纵下，伊斯兰教士同盟（Jamiat-e-Ulema-e-Islam, JUI）在两省大获全胜。1994年，正是同一个伊斯兰党派发起了塔利班运动。教士同盟的成员都是强硬派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塔利班如今落难潜逃，教士同盟仍然义无反顾地表示支持。

一些阿富汗籍塔利班分子趁战乱逃回了农村老家，很快，他们也来到了巴基斯坦，不仅是来找工作，也是为了寻求资金支持。还有一些塔利班军官选择向美军投降，作为战俘，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这批降将被押解到美国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住进了专为恐怖分子特设的监狱。对于普什图武装和塔利班，美方从不准备与之谈判。当然，普什图武装分子一开始也不信任美国。后来，随着美军的轰炸目标日益增多，不少平民百姓也因此丧生，普什图人的仇美情绪自然更为高涨。在美军眼里，所有的普什图人都是塔利班的天然同盟。这个观点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聚居于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的大批普什图人成了被妖魔化的目标，这种歧视直接导致了塔利班活动的死灰复燃。

奥马尔一直在赫尔曼德省藏身，直到2002年冬天，塔利班领袖离开栖身地，来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奎达。很快，塔利班舒拉便得到了新生。奥马尔任命了4位新指挥官，专门负责南部四省（乌鲁兹甘、赫尔曼德、坎大哈和查布尔省）的抵抗活动。这4名指挥官分别是前国防部长毛拉·奥拜杜拉·阿罕德、前军队司令毛拉·阿赫塔尔·穆罕默德·尤斯曼尼、因摧毁巴米扬大佛而闻名的独腿司令毛拉·达杜拉，以及前内政部长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为了打仗，4人在卡拉奇和奎达四处筹钱。他们并不缺少同情者和支持者，那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学校尤其踊跃。波斯湾沿岸诸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有不少人出钱又出力。塔利班分子很快便筹集到了足够的战争资金，他们准备着重返阿富汗与美国人开战。

巴基斯坦北部的7个部落自治区被统称为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这一地区以及阿富汗东部是塔利班死灰复燃的重灾区。当地一些武装分子是塔利班的长期盟友，塔利班的重建他们自然责无旁贷。其中，塔利班前部落事务部长贾拉鲁丁·哈卡尼所率领的武装尤其活跃。哈卡尼之子斯拉祖丁则拥兵占据了北瓦济里斯坦的米兰沙阿，他对父亲的事业也是鼎力支持。这父子两人和基地组织以及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此外，普什图裔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刚结束在伊朗的流亡生涯，也一头扎进了塔利班的复兴运动中。而赛义福尔·拉赫曼·曼苏尔则带领自己的部队在加德兹省附近的山区和美军激战。当时，正值美军发起名为“巨蟒行动”的春季攻势。战争持续了两周，此后塔利班悄悄潜回了巴基斯坦。

2002年初，巴基斯坦军方停止了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部署兵力的行动。此前，由于克什米尔武装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导致印巴冲突再次升级。随后的一整年内，印巴关系牵制了巴军方的大部分精力，基地组织趁虚而入，开始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一带活动。基地组织和当地的普什图部落结成了同盟，不少阿拉伯武装分子通过联姻加入了当地部落，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也在训练、金援和武力支援下渐渐复苏。

同时，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和塔利班藕断丝连，前者仍然偷偷地向后者提供支援。美国对联合阵线武装的支持让巴基斯坦甚为不满，因为联合阵线的后台是印度、伊朗和俄罗斯，它们都是巴基斯坦的战略对手（而且，卡尔扎伊政府的大部分位子都被联合阵线的人占据了）。令巴方更为气愤的是，印度势力大肆进入阿富汗。巴方认为，如果印度成功渗透阿富汗，巴基斯坦将面临东西腹背受敌的局面。面对咄咄逼人的印度，巴基斯坦军方希望借助美国人的力量，以便彻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不过，布什政府对此并无兴趣，美方的心思已经放到了伊拉克身上。至于印巴关系，华盛顿当局只希望双方相安无事就好。

美方的战略意图很快便被穆沙拉夫军政府识破。巴方据此判断，美军将很快撤出阿富汗，即便美军留守，也不会对这个国家投入全力了。而阿富汗将再次成为巴基斯坦的专有财产，就像1989年美苏两强相继撤离之后的情况一样。穆沙拉夫认为，塔利班不必铲除，完全可以为己所用。巴、美之间的信任缺失，给了塔利班死里逃生的好机会。

不过，三军情报局对基地组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巴基斯坦先后拘捕了数名在巴国内藏身的塔利班分子，其中包括“9·11”事件的策划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以及基地组织重要成员阿布·祖拜迪。为了报复，基地组织甚至谋划刺杀穆沙拉夫，而刺客都是巴基斯坦本地的极端主义分子。2003年12月，穆沙拉夫先后躲过两次自杀性爆炸事件。不过，巴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局——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

班三方已经勾结到了一起。

2002年末—2003年初，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分子终于装备完毕，随后，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游击战。坎大哈、扎布尔和赫尔曼德三省是主战场，而这一地区正好毗邻巴基斯坦。2003年1月，80余名塔利班分子在巴尔达克和美军部队碰了个照面，这次遭遇让后者大为惊讶。4月27日，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萨尔瓦多籍工程人员在遭绑架数日后被处死，事发乌鲁兹甘省，凶手正是塔利班分子。人质事件让阿富汗人和国际社会再次感到了塔利班的威胁。

此后的数星期之内，十几名国际援助人员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中既有阿富汗人，也有外籍人士。塔利班并不怜惜平民百姓的生命。此时的布什政权正陷在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中，对于阿富汗发生的几次小型袭击，华盛顿方面实在是无暇顾及。不过，在接下来的夏天里，美军却出人意料地发起了一次大型攻势。让美军十分惊讶的是，塔利班分子并没有一触即溃，他们足足周旋了9天，直到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方才偃旗息鼓。当年秋天之前，塔利班武装几乎占据了扎布尔和赫尔曼德两省的大部分，并打通了前往巴基斯坦的补给线。

当时的情况十分关键。在阿富汗南部，塔利班还没有聚集起足够的人气，自然谈不上任何政治影响力可言。如果美国方面能多增派一支部队，也许就能将立足未稳的塔利班一网打尽。不过，美国人的心思并不在阿富汗，他们的目标只有本·拉登。至于扫荡农村地区、重建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以及应对塔利班威胁等事务，统统被美方抛到了脑后。军事方面没有反应，政治上也没有任何作为。联合国应对此负很大责任，在他们的帮助下，普什图人结束了政治上的孤立，获取了更大的政治权力。不过，获取普什图人民心的最好方法应该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清明政治，最重要的是让美国出钱，偏偏美国人并没有提供大规模金援的行动。联合国组织了两次支尔格大会：2002年6月，卡尔扎伊被选为临时总统；2003年冬天，新宪法讨论通过。正是这两次会议，联合国帮助普什图人的政治势力重返阿富汗政坛中心。

塔利班的归来，自然也会重新激活阿富汗南部的鸦片生产活动。2000年，塔利班政府曾经立法禁止鸦片种植。这并不是为了禁毒，而是生产过量严重影响了海洛因的市场价。“9·11”事件发生后，鸦片生意大受影



响，只有部分农民还继续种植罂粟。相反，大多数罂粟种植户都希望能干点别的，不过，他们没有替代作物。而且天公不作美，当时的阿富汗正在经历严重旱灾。苦等的美国援助迟迟不来，2001年底，很多农民不得不重操旧业，种植罂粟。很快，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占领阿富汗南部。这一次，加诸农户身上的税款更加沉重。不过，罂粟种植户也因此得到了保护，可以对抗阿富汗新政府的禁毒令。

2004年是阿富汗的复苏之年。当年的鸦片产量达到了4 200吨，比起前一年的水平——3 600吨大为提高，增加了64%。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当年的报告，鸦片种植遍布阿富汗的34个省份，涉及人口为230万（相当于阿富汗农业人口的14%）。阿富汗失业形势严峻、贫困人口众多，而外国农业投资始终没有到位。窘迫之下，农民们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罂粟种植，而塔利班则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

在多国部队的推举之下，英国方面担负起了扫除毒品的工作。不过，面对日益猖獗的毒品形势，国际社会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良策。到底是斩草除根，直接将罂粟扼杀在田地里，还是放长线钓大鱼，在运输过程中将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各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阿富汗缉毒形势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西方各国都不想出动本国部队参与扫毒，其中又以美国为甚。但是在当时的阿富汗，外国军队是唯一能震慑毒品贸易的力量。在毒品贸易的滋润下，塔利班迅速复苏。虽然布什政权对此视而不见，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联合国、西方外交官、国际救援组织在内，都已经对毒品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之间的共荣关系心知肚明。

2008年以前，美国及驻阿各国军方都没有任何的禁毒计划可言。与此同时，塔利班分子从毒品贸易中获利甚丰，他们的财源不仅来自农民的税款，还包括鸦片提炼、越境贩毒所带来的收入。通过毒品贸易，塔利班甚至和土耳其、欧洲和中亚的黑帮搭上了关系。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年的年度报告，2006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6 100吨，并在次年增长到8 200吨。毒品贸易居然占到了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估计为67亿美元）的一半。

毒品带来的金钱用处很广，这笔收入促进了塔利班的复兴，也有贿赂新政府、警察和法律部门的功能。不少资深政客和地方实力派也在毒品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此，卡尔扎伊总统并不准备予以打击。毒品贸易

还打乱了正常的国家建设，因为毒品工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薪酬，而且十分稳定，这都是正常行业所不能比的。由于毒品的麻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瘾君子，绝望的情绪弥漫在阿富汗人民周围。

2004年10月，阿富汗第一次总统选举顺利举行。卡尔扎伊获得了55.4%的支持率，而其主要对手，联合阵线总统候选人尤尼斯·恰努尼（Younis Qanuni）的支持率只有16.3%。卡尔扎伊因此顺利当选。选民热情非常高，选举人口中的73%参与了投票，这反映了人民对于政府系统有效管理的渴求。大家都希望卡尔扎伊手中有权之后能做到这一点，到头来，他却还是辜负了人民的期望。2005年的议会选举只有53%的人参加，看来公众对于民主进程和经济发展都不大满意。虽然无力阻止选举，塔利班一直威胁选民退出投票。不过他们的威胁并没有太大效果，而他们的势力也远远没有复原。

2004年底之前，美国和北约情报官员得出结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有一整套培训阿富汗塔利班的训练设施。培训基地位于俾路支斯坦某处，可以为恐怖分子在波斯湾沿岸各国和巴基斯坦筹措资金、买卖军火，而迪拜是他们重要的武器来源。奥马尔等塔利班高级官员都隐居在奎达附近的农村地区，他们的行动如此自由，塔利班的政府机构俨然就是奎达的舒拉。美国和阿富汗新政府的士兵很早便向长官报告，巴基斯坦军方可能在阿巴边境附近为塔利班提供庇护所。这样一来，塔利班武装既可以西去阿富汗，也可以向南撤入巴基斯坦境内。

美军派驻南部省份的兵力长年不足，形势十分严峻，但华盛顿方面却一直按兵不动、拒绝增援。此外，美方并不知道穆沙拉夫的两面游戏，事情败露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2005年，姗姗来迟的北约部队终于进驻阿富汗南部，不过，美方却无法在阿国南方以及奎达等地给予友军太多的情报支援。究其原因，一位美国军方人士曾经向笔者抱怨，长期以来，美国都没有对阿富汗南部进行持续的卫星监视。因此，塔利班可以逃过一切人的眼睛，大摇大摆地从俾路支斯坦北上进入阿富汗。

2005年，塔利班展开了一次夏季攻势。这场战役显示了塔利班方面的新武器、新策略和新本领。基地组织人员从伊拉克战场上带来了崭新的军事理念，帮助塔利班人员改善了自己的伏击战术，以及让他们掌握了简易爆炸装置（IED）和地雷的使用方法。而且，塔利班方面还学会了如何有



效地利用自杀性爆炸在城市地区制造事端和阻止敌方前进。卡尔扎伊不止一次地向布什提出警告，塔利班如今又成为了地区的最大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了基地组织。很明显，这是因为塔利班已经威胁阿富汗新政权的统治。不过，白宫对阿富汗总统的呼吁并不以为然，美方既看不到塔利班的威胁，对重建阿富汗也不感兴趣。他们的工作重点，仍然只限于追捕基地组织成员，而这一行动用去了美方的全部兵员。

不过，卡尔扎伊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阿富汗新总统决定和塔利班及其盟友展开谈判。2005年，他试图派遣一支和平解代表团前往敌营进行接触。卡尔扎伊的特使意在劝说塔利班领导人放弃对抗回归国内，新政府不但保证赦免这批归乡人，甚至可以给予他们一些政治权利。这一提议遭到了内阁和议会中联合阵线势力的反对，布什政府则认为卡尔扎伊是在玩弄绥靖政策，也表示了不支持的态度。

与此同时，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完全陷入泥潭。相形之下，阿富汗的形势也十分微妙，塔利班大有彻底翻身之势。华盛顿方面终于下定决心扩编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保卫力量。这支维和部队的防区原来只包括喀布尔地区，现在即将扩张到阿富汗全境。多余的兵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让布什政府和北约组织之间争论不休。此前，美方曾在部分地区组织了所谓的地区重建队（PRT），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成功的。于是，美国方面希望北约各成员国组织各自的地区重建队，分别负责阿富汗的34个省级行政区。每个重建队由100名士兵组成，辅以培训人员和建设工人，后两种人主要负责培训各省的警察和官员，并为各项建设提供支持。不少欧洲国家虽然支持北约出兵阿富汗，但却并非自觉自愿。他们只是为了避免往伊拉克投入兵力，而又不激怒华盛顿当局。

喀布尔的国际安全保卫力量由北约组织全权管理，第一支地区重建队来自德国，2004年，他们整装前往阿富汗北部。根据北约组织的规划，阿富汗各地地区重建队的派遣工作将分为四步进行，始于2004年，并将在2006年大功告成。英国、荷兰和加拿大三国部队的防区将直接面对塔利班的北上攻势。实际上，许多国家甚至禁止本国军事人员参与战斗活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指挥系统。北约组织和国际安全保卫力量负责阿富汗的维持和平行动，其中也有美军参与。而联合军事行动则由美方指挥，专门负责追踪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为了阻止多国部队在阿富汗的扩张，2006年夏天，塔利班发起大规模攻势，意图一举拿下坎大哈。5月中旬，塔利班纠集数千人马，向4个省份发起新一轮攻势。当时，英军正在赫尔曼德省附近活动。2001年，英国武装部队是第一支进入该省的外国军队。很快，他们便陷入了塔利班的猛烈攻势之中。对抗英军的塔利班武装装备齐整、自信非凡，旗下编有数个营级战斗单位。每个营约有400人，还配备有数百辆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和摩托车，拥有一定的机动作战能力。

重新占领阿富汗南部部分地区后，塔利班忙着任命官员、成立法庭，一套完全平行于现政府的国家机构被建立了起来。而这一切都为了稳定和收买当地人心。塔利班的行动虽然鲁莽，但却十分成功，攻势很快从南部蔓延到东部。而且，塔利班开始清洗和新政权有关的一切人员——官员、公务员、教师和警察。新政府的警察部队腐败无能，早已声名狼藉。自杀性爆炸事件导致的死亡越来越多，很多人在塔利班的预谋中被谋杀，更多的是无辜受害。2006年，根据联合国的年终报告，塔利班一共焚毁了187所学校，85名教师遇害。此外，还有超过600名警察被塔利班杀害。

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是塔利班的常用武器。2004年，塔利班方面一共发起了6次自杀性袭击，并不算多。2006年，这一数字陡然上升到141起，造成1166人伤亡。在塔利班的战术中，自杀性袭击担负着扰乱敌军防守的任务，其后，大规模的步兵攻击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驻阿美军的地面部队和直升机武装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变得人手不足，不得已的情况下，美方只得采用狂轰滥炸的策略。轰炸给塔利班带来了重大伤亡，但是因此死亡的平民也是不计其数，这激起了阿富汗人的愤怒。而且，塔利班分子大玩肉盾战术，把普通百姓当作自己的防空工具。北约其他部队和美军面临着同样的麻烦——地面部队紧缺，而且欧洲各军都不想付出太多士兵的生命。因此，美国的盟友们也大量使用空中战术。2006年上半年，驻阿美军共出动战机2100架次，同一时期，美军驻伊拉克部队只出动了88架次。

2006年9月，塔利班武装已经渗透进入了坎大哈地区，他们的基地就位于附近的潘杰瓦伊地区（Panjwai）。一小股西方部队在巡逻中发现了塔利班的行踪，并看到他们的基地设施完备，数千名武装分子驻扎在此活动。当时，塔利班正在向坎大哈发起进攻，塔利班策划攻打坎大哈已久，早在巴基斯坦就做好了充分准备。阿富汗军阀为此囤积了大量武器、军需和后

勤物资，这次事件也让西方世界对巴基斯坦的看法急转直下。无论是美方还是北约司令部都开始公开指责巴基斯坦袒护塔利班。

塔利班方面敏锐地发现了北约各国之间的嫌隙。他们还清楚，许多国家的驻阿部队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一共有37个国家参与了阿富汗维和行动，不过战斗人员仍然不够。2006年，北约部队总人数达到4.5万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战斗人员编制。

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曾是北约司令官，后来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对当年多国部队的阿富汗行动有自己的看法。“北约希望多国部队参与地面战斗，这种设想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琼斯说，“如果北约的军事进攻失败，多国部队将陷入巨大危险。实际上，北约那种老旧、僵化的体制会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19】}2007年4月，卡尔·艾肯贝里（Karl Eikenberry）上将向美国国会直言，如果不对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巢穴采取行动，美军及其北约盟友断无可能在阿富汗取得成功。艾肯贝里还是第一位向国会陈情的军方人士。^{【320】}

2007年，北约各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对战争走向的争论上。至于那些实际问题，比如增加兵力和直升机、解除部队不参加战斗的限制以及制止巴基斯坦政策则被抛到了脑后。阿富汗国民军（ANA）在这一年正式成军。这支部队约有兵力13.4万人，武装警察8万人，从装备到组织，都凝结着美国当局的心血。不过，美方的主要精力仍在伊拉克方面。

塔利班加大了简易爆炸装置（IED）的使用量。喀布尔爆发了数次自杀性爆炸袭击，死伤惨重。这都是贾拉鲁丁·哈卡尼及其团伙的杰作。2007年9月，31名政府军成员在军队大巴上遇袭，无一生还。几个月后，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闯入了喀布尔市内安保森严的赛蕾娜酒店，造成6人死亡。在农村地区，警察部队成了塔利班的主要猎杀对象。2007年一年内便有900余名警务人员遇袭身亡。

在基地组织的指导下，塔利班也玩起了宣传战。他们灌制了上千份DVD和磁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的大小集市都有销售，只需花上几便士就可以买到。而且，塔利班的声音和观点还出现在了互联网、电台和电子邮件中，他们甚至还有专门的发言人（通常设于奎达）负责应付各国驻巴基斯坦记者。塔利班最心爱的宣传工具是一家调频电台，驴驮马载之下，电台多次躲过了战火，把塔利班的声音广为传播。不过，20世纪90年

代的塔利班对媒体没有任何好感，他们查禁包括电视在内的一切媒体，对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高。不过时过境迁，塔利班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官方刊物“阿尔-萨哈布”（Al Sahab）。仅在2007年，这个新闻刊物就刊印了89次，其中包括发送本·拉登和扎瓦希里的演讲录音带。

塔利班的手段日益多样，而北约方面也开始走好运，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北约国家的情报合作也有了些许进展。于是，北约部队第一次成功地刺杀了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受害者阿赫塔尔·尤斯曼尼曾是军事指挥官，现任职于塔利班奎达地方舒拉。2006年12月，尤斯曼尼在英军对赫尔曼德省的空袭行动中身亡。2007年4月，奥拜杜拉·阿罕德（Obaidullah Akund）在奎达被捕。在英美双方的压力之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终于对这位塔利班高官动手了。不过，阿罕德很快便重获自由。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数名政府军士兵，作为交换，阿罕德被释放了。至于毛拉·达杜拉，这位阿富汗南部最悍勇的军事领袖在2003年打响了塔利班复苏的第一枪。当时，达杜拉杀死了一名国际红十字会官员，作为再次起义的象征。2007年5月，这位塔利班将领在加姆瑟尔（Garmser）的一次火并中遭到英军的跟踪追击，最后一命呜呼。达杜拉死后，他的位子被他的兄弟接替。不过，新指挥官也很快在巴基斯坦落入法网。

塔利班连折几员大将，虽然损失惨重，却也给了新人上位的机会。毛拉·阿卜杜尔·加尼·巴拉达尔（Mullah Abdul Ghani Baladar）便抓住了这次机会。早在塔利班创建之初，巴拉达尔就是奥马尔的亲密战友。现在，这位毛拉负责塔利班在奎达军事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一切将领的任免都归他裁决，一切军务大事也要由他定夺。此外，巴拉达尔还要向战地指挥官发放粮饷。^{【321】}由于奥马尔久久不现身，巴拉达尔实际上成为了塔利班的最高人物。

由于北约成员内部矛盾重重，而美国当局无暇关注阿富汗，塔利班似乎找到了战略良机。他们试图将西方人拉入持久战，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每当卡尔扎伊政权施政乏力，或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塔利班的表现机会就到了。阿富汗新政府的每一次失分，都会将民众往相反方向——塔利班的方面推。

塔利班在阿富汗复兴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巴基斯坦。虽然西方向伊斯兰堡当局施加了很大压力，而后者也开始对本国的塔利班分支进行清剿。不

过，巴基斯坦军方仍然拒绝驱逐奎达的塔利班势力，对于希克马蒂亚尔和哈卡尼也是一味容忍。这两位武装派别首领安然地盘踞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享受着巴方“战略盟友”的待遇。

2008年夏天，塔利班势力已经逼近喀布尔。7年前，他们刚刚从这座城市败退而走。塔利班的嚣张气焰迫使美军不得不加入战团，参与保卫喀布尔附近省份的战役。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塔利班并不想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战果。不过，美军的参战让天平大为倾斜，喀布尔邻近地区的安全状况大为改观。2009年，塔利班进一步深入阿富汗北部和西部诸省。昆都士省成了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塔利班在此地和德国维和部队展开大战。而在赫拉特，意大利和西班牙部队也面临着塔利班的冲击。由于欧洲各国政府禁止该国维和部队轻易参战，塔利班趁机攫取了不少土地。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伊拉克议题吸引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却一反常态，他承诺自己如果当选，会将阿富汗议题列为自己的注意焦点。奥巴马批评布什，认为这位前总统完全忽视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所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不过，美国总统选举却并未给阿富汗问题带来转机，反而延误了战略转向的时机。2009年1月，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与此同时，阿富汗方面对军队、金钱和新政策的需求达到了高峰。他们急需这些资源保证本国2009年8月的总统选举安全举行。不过，布什政府并没有满足阿富汗人的需求，所有的事情都被抛给了奥巴马和他的内阁们。

美国政府的无所作为让塔利班有机可乘，他们连续在城市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爆炸事件，并用游击队攻击农村地区。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也愈加频繁。2008年4月，塔利班甚至策划谋杀卡尔扎伊，阿富汗总统将在喀布尔的阅兵式上露面。6月13日，坎大哈监狱遭遇袭击，1100名囚犯趁机越狱。400名在押的塔利班分子也混在其中逃之夭夭。7月，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被炸。同日，库纳尔省发生激战，7名美军士兵被杀，15人受伤。这也是美军自开战以来遭遇的最大伤亡。

西方部队在阿富汗的境遇第一次落到了伊拉克之下，而阿富汗部分地区也陷入饥荒，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2008年有26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死于非命，此后，各大救援机构都选择龟缩在喀布尔。他们的却步不前给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奥巴马甫一上任，便立即和他的内阁官员们短暂回顾了过往的阿富汗政策，并与各个政府部门交换了意见。奥巴马当局尤其注意军方的建议，很快，美国新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在2009年4月27日出台了。奥巴马承诺，将把主要精力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相关地区。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被任命为阿—巴问题特使，而大卫·彼特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则因为在伊拉克卓著的反游击战经历升任阿富汗联军司令部的新主管。奥巴马当局还改变了战争策略，把重建恢复提到了军事打击一样的高度。

2009年春，美军在阿富汗南部投入了2.1万人的兵力，其中有4 000名军事教官，专门负责培训阿富汗军警系统。北约方面承诺继续投入兵力，至少9 000人会投入阿富汗总统选举的安保工作。美国、北约、欧盟和联合国多方合力下，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总统选举上。其他事务不可避免地遭到冷落。美方官员在私下都对此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总统选举分散了奥巴马实行阿富汗新政的精力。而奥巴马也失去了证实自己政策正确性的机会。

奥巴马的另一大麻烦来自于美方和卡尔扎伊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年春天，卡尔扎伊一度认为美国新领导人将会抛弃自己，并操纵阿富汗选举另立新人。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卡尔扎伊的助理和兄弟们向他灌输了很多所谓的英美阴谋，让阿富汗总统更加疑神疑鬼，从此不再信任西方人。这些情况都是卡尔扎伊总统手下的官员告诉笔者的。^{【322】}

塔利班一直威胁要袭击选举，同时，他们趁着冬天调遣了大批人员物资进入阿富汗南部，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对峙。当时，军事专家安东尼·科尔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正担任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Stanley Mc Crystal）的顾问，他披露，在这个选举前夜，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全国364个大区中的164个。而在2003年，这个数值仅仅是30而已。而且，2008年10月—2009年4月间，塔利班的袭击行为上升了60%。当年7月有44名美军士兵死于战火，8月则有47名美军死于非命。两个月内的损失创造了美军纪录，同一时期英军的损失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塔利班的大规模自杀性爆炸也是愈演愈烈，他们往往先派遣十几名自杀式袭击者同时攻击同一目标，而后士兵再跟进突袭。在美国人看来，这些疯狂举动反映了塔利班的困窘境地，不过这些事件对于当地军警机关和



维和部队确实有一定威慑力。随着选举临近，全国的安保环境越发地令人担忧。

阿富汗总统选举共有41名政治家参加，卡尔扎伊总统当然也在其中。虽然他的支持度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和阿富汗军阀们的勾结往来也让百姓伤透了心，卡尔扎伊先生仍然是总统宝座最有力的竞争者。塔吉克裔的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则是最有力的挑战者之一。他曾经是马苏德的亲密助手。普什图裔的前财政部长阿什拉夫·加尼则是总统角逐的另一位重要角色。

塔利班也瞄上了这几位总统候选人，候选人的选举班底也是袭击目标。此外，由于地区选举和总统选举同日举行，所以地区议会也是塔利班的打击对象。同时，塔利班还在阿富汗北方和西部开辟了新战场。之前，这两个地方还很少有塔利班武装涉足。其中的昆都士省成了最激烈的战场：选举日当天，57颗火箭弹降落在该省省会，守卫当地的德国维和部队则始终躲在战壕里不应战。对此，美军方面并没有粉饰太平。8月23日，美军参议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穆伦（Mike Mullen）上将在CNN节目《国家政府》上坦承：“事态很严重，而且在持续恶化……塔利班已经进一步复苏，他们的策略也有很大进步。”

其他城市也遭到了塔利班的大举攻击，坎大哈和喀布尔也未能幸免。塔利班军队利用坚固的工事、猛烈的进攻向守军持续施压，而简易爆炸装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选举前一个月，美、英、阿政府军三方曾经纠集数千名士兵，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发起过一轮主动进攻。此次行动目的有三：一是维持自身的领土；二是切断塔利班前往巴基斯坦的补给线；三是拯救塔利班统治区的村民，让他们能享受自己的选举权利。赫尔曼德和坎大哈两省的投票率据估计为1%~5%，8月20日晚，卡尔扎伊最终胜出。

巴巴及（Babaji）是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小镇。英国方面声称，在该小镇的一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4名士兵。选举期间，该镇8万居民只有150人参与了投票。为了保证选举安全，英军在当地驻扎了6周，付出了37死、150伤的代价。坎大哈省潘杰瓦伊区的赞加巴德村的情况更为严峻，当地没有一票得到了准确统计。不过，仍有2 000张支持卡尔扎伊的选票被送往喀布尔以供计算，显然，总统先生的支持者们为了舞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赞

加巴德最后也落入塔利班之手。

塔利班多次威胁要破坏选举，在他们的淫威之下，许多普通百姓都不敢出门投票。最终的投票率只有2004年第一次总统选举时水平的一半，当年的投票率达到了73%。选举日当天，为了进行干扰，塔利班方面一共发起了400次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也是阿富汗历史上的黑暗一日。

不过，美国、北约、欧盟和联合国的态度十分冷漠。选举结束时，四大国际势力竟然发表声明，向阿富汗“成功的选举”表示祝贺。他们认为，既然塔利班未能完全得逞，此次选举不可谓不成功。不过，国际势力的祝贺，在阿富汗普通百姓听来更像是自欺欺人。阿富汗人民对选举的有效性更感兴趣。选举委员会一共收到了2 500封投诉信，其中的570封中反映的情况十分严重，足以推翻整个选举。

舞弊行为本不应该发生。选举期间，阿富汗国内遍布着数百位外国观察员——他们大多派驻在各国使馆和联合国机构里。另外，欧盟方面也派出了专门代表团，其他监察组织也在阿富汗行驶着自己的职权，保证选举公正进行。不少阿富汗当地人和有关人士提醒各国使馆，他们认为操纵选举的行为可能早在几周之前就已经发生。不过，外国观察员慑于农村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纷纷拒绝下乡查票。最终，西方社会对选举舞弊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4年的选举由联合国一手操办。5年之后联合国方面未能再续前缘，绝对是一桩战略失误。这一次，由阿富汗人组成的独立选举委员会（IEC）全权负责总统选举。这个所谓的独立委员会的会员多是卡尔扎伊任命，其“独立性”可想而知。

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几个星期，阿富汗的形势一直蒙在阴影之中。很显然，如果卡尔扎伊顺利当选，反对派和许多民众肯定不会认账。相反，如果卡尔扎伊不能保证得到51%以上的选票，那他将对一场加时赛。10月，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将进行最后决战。复杂的情势让整个国家都陷入停滞，前后长达两个月。其间，平民百姓个个人心惶惶，民族冲突也随之加剧。在第一轮计票中，卡尔扎伊获得了55.6%的选票，而阿卜杜拉只有27.8%。不过，选举投诉委员会（ECC）宣布他们在2 500多家投票站里发现了舞弊情况，并要求对其中的100万张选票进行重新统计。直到本书付梓之时，重新计票仍未结束。显然，卡尔扎伊赢了，不过他的形象因此大为

受损。总统先生必须在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心中重建自己的威信。不过，一番折腾下来，塔利班倒是因此大为受益。

选举过程中，卡尔扎伊承诺将和塔利班进行谈判，虽然对方一直拒绝总统先生的和谈建议。卡尔扎伊和国际社会都对和谈抱着很大希望。在美国的鼓励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再次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做双方的中间人。很快，卡尔扎伊的代表和一众塔利班前军官在利雅得碰头了。交谈之中，卡尔扎伊一方试图软化那些国际社会眼中的塔利班中间派。这些人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追求，加入塔利班纯属其他原因。其中有因为愤怒和绝望投靠塔利班的人，也有死硬的反美分子，还有一些被塔利班威逼利诱裹挟的人。他们便是国际社会认为的“温和派”。

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还是一支单纯的农民武装，发展成为国际恐怖组织已经是日后的事情了。不过，农民武装的组织特点被一直保留了下来，至今仍然鲜明可见。虽然塔利班上层都是强硬的圣战分子，他们绝无向美国和新政府妥协的可能。奥马尔等人更是对基地组织“全球圣战”的理念膜拜不已。但是，卡尔扎伊和西方人慢慢地认识到塔利班上下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利益集团组成，其中不乏可以争取的力量，但只要塔利班觉得胜利在望，他们是绝无可能接受任何和平协议的。至于阿富汗新政府和新宪法，更不可能得到塔利班的肯定。选举期间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塔利班的政治哲学反而对巴基斯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阿富汗塔利班相比，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分支的宗教色彩更强、更加残忍，和基地组织的关系也更深。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在巴阿边境起家的，长年以来，巴基斯坦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都十分混乱，显然是各路伊斯兰武装分子繁衍生息的温床。巴基斯坦政府里，文官和军方之间的争权夺利已经延续了近50年，如何平息这种内斗，目前还没有任何办法。1979年伊朗上演的那一幕，也许永远不会在巴基斯坦重演。不过，境内塔利班和其他极端分子引发的恐怖和忧虑始终阴魂不散，而巴方政府并没有向他们下逐客令的决心。更令人担心的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所引发的社会对立。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无力开办任何社会服务，教育、卫生、保障性住房都无从谈起。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可能成为塔利班入主巴基斯坦的契机。

2001年那场战争中，美军未能彻底铲除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势

力。逃亡到巴基斯坦境内的残余分子可以在俾路支斯坦省以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安然度日。塔利班领导人多选择俾路支斯坦避难，而普通士卒则纷纷涌向巴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其中有阿拉伯人、中亚人、俄罗斯穆斯林、车臣人、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东亚的分裂分子。甚至有人从欧美地区赶来进行圣战，他们也在部落地区接受训练。

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七部分组成——开伯尔、库拉姆、奥拉克兹、莫哈曼德、巴焦尔和南、北瓦济里斯坦。当地约有450万人，多为普什图裔。此外，西北边境省还有2800万普什图人，阿巴边境上也定居着1500万普什图人。许多恐怖分子在部落自治地区接受训练，而全球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从马德里到伦敦，再到巴厘岛和其他地区，其策划活动都是在此进行的。部落自治地区山势险峻、地形崎岖、道路艰难，人民的排外心理十分强烈，而且受教育程度十分低下，医疗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无，简直就是基地组织天然的人才库。1901年，英国殖民者策划建立了这个部落自治区。当时这里还是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一块无主之地。英国殖民当局通过西北边境省总督和各种代理人对部落地区进行间接统治。这种统治结构还没有过时，巴基斯坦政府把英国人的遗产沿用至今。部落自治地区内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而巴基斯坦的法律和宪法在这里也不具有任何效力。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会遭到部落长老和巴基斯坦军方的双重反对。前者依然留恋自己的特权，而后者则把部落地区作为武装分子的训练场，方便他们将来更好地投入阿富汗和克什米尔战场。

在布什统治时期，只要巴基斯坦政府严守美国底线，帮助美方缉拿基地组织头目，美方是不会就部落地区问题向巴方发难的。华盛顿的目标过于单一，这正合巴基斯坦军方的心意。在巴方看来，阿富汗塔利班是一支能向喀布尔方面施压的力量，可以保证印度不插手阿富汗事务，还能让穆沙拉夫政权持续得到西方的金援。可谓一石三鸟，值得庇护。当然，基地组织就不在巴方利益范围之内了，所以巴基斯坦军方也乐于追击这帮恐怖分子。巴方和塔利班都笃信，美国和北约不会在阿富汗待太长时间。有朝一日，亲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普什图政权会再次掌握阿富汗政权。

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期间，许多普什图人从巴基斯坦部族地区直接奔赴阿境为塔利班而战。美军入侵的时候，巴基斯坦籍普什图人仍然是塔利班的忠诚战士。同时，他们也为基地组织效劳。现在，基地组织和

塔利班都落难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些巴籍普什图人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他们提供安全的住所、食物、交通和其他后勤物资，而客人的回报也十分丰厚。平日里同极端分子朝夕相处，部落自治地区的普什图居民不但在经济上获益良多，思想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趋向极端。随着金钱的增加和思想的极端化，他们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从前，部落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驴，不过现在很多当地人完全以车代步，还可以雇用几百名保镖，组成自己的私人武装。本·拉登和奥马尔消失后，培训新人、搜刮资金等事务落到了他们的普什图手下身上。在阿富汗战场上，这些人采用了最新的游击战术同美军对抗。如今，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已经离不开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朋友们了，他们不但是合格的战士，还是培训战士的教官。

2001—2004年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一直试图切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本国的人脉。不过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军方和情报部门口径一致，都矢口否认本国境内有恐怖分子的行踪。当然，卡尔扎伊政府和一些西方外交官并不相信这些话，因此遭到了巴方的强烈谴责。

不过，2003年12月连续爆发了两次针对穆沙拉夫总统的刺杀事件，而两次事件都发生在南瓦济里斯坦。严峻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军方再也不能采取鸵鸟姿态了。不过，军方的反应仍然不情不愿。他们派往南瓦济里斯坦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的“前线部队”（FC）装备极差，士兵都是普通的普什图部落民。在巴基斯坦军官的带领下，这群部落民既无空军和炮兵掩护，也没有良好的情报系统。他们很快和2 000多名武装分子发生遭遇战，对方有备而来，巴军损失惨重，200多名士兵死亡。侥幸活命的也被武装分子俘获，而后遭到处决。当然，更多的人选择开小差，早早便逃离了战场。

巴基斯坦军队一触即溃，而瓦济里斯坦武装分子则一战成名。这支武装分子的首领是内克·穆罕默德（Nek Mohammed），当年不过只有27岁。2004年4月24日，巴基斯坦军方被迫屈膝求和，同武装分子达成了和平协定。巴方不但向内克·穆罕默德和其他塔利班领袖表示道歉，而且赔偿了对方的战争损失、释放了在押的塔利班囚犯，甚至邀请这些外籍武装分子到巴基斯坦政府任职（当然，对方拒绝了）。巴方向部落地区发起的进攻遭到惨败，伤亡惨重，被迫签订和平协议，不得不为武装分子将土地双手奉

上，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武装分子在部落自治地区滥施暴政，让巴基斯坦政府再次蒙羞。300多名反对外来干涉的部落长老都被处死，同时，几千个当地家庭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不但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办法保护本国公民，当地的士绅阶层也不能保佑地方平安。

塔利班在部落自治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和政府体系，电视、音乐和互联网都被禁绝，女学生纷纷被赶出校门，宗教学校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地人相信，巴基斯坦军方在玩双面游戏，一方面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打击入境武装分子，另一方面却又对美军和武装分子在阿富汗的争斗乐见其成。同时，穆沙拉夫几次向布什进言，坚称和平谈判是应付塔利班的最佳途径。因此，美方一直没有制订相关的军事政策。

截至2007年，巴基斯坦军警方面一共付出了1 500多人死亡的代价。其间，塔利班发起了一波波的攻势，既在战场上攻城略地，也深入敌后大搞恐怖活动。伊斯兰堡、拉合尔和白沙瓦等地深受其害。2007年12月，24个来自旁遮普省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部族武装在部落自治区集会，很快，他们组成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伊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当选塔利班巴基斯坦分支领袖。马哈苏德当年35岁，来自南瓦济里斯坦，是当地武装组织的传奇人物。他长期和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保持着紧密联系，也是贾拉鲁丁·哈卡尼的好战友。20世纪90年代，马哈苏德就已经是塔利班的一名战士。2001年，基地组织头目也在他的庇护下得以逃脱。此后，马哈苏德又在巴基斯坦卷入了十几桩自杀性爆炸事件，甚至被控谋杀贝·布托总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颠覆巴现政权，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

如此一来，部落联盟地区不但是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还成了巴基斯坦政府的大心病。阿、巴两国的塔利班组织互相扶持，西北边境省的塔利班化日趋严重，巴基斯坦各地的极端分子纷纷逃进部落地区寻求庇护。同样在此栖身的还有基地组织，他们一刻不停地在培训恐怖分子，其宣传工具把塔利班的一举一动传播到世界各地。英、美等各国领导人都在敦促穆沙拉夫立即采取行动，不过巴方仍然三心二意。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圣战活动风起云涌，一次次单独事件汇聚起了一股极端活动的浪潮。2007年春，一群倾向极端的毛拉占领了伊斯兰



堡市中心的红色清真寺，宣称要实现首都的伊斯兰化。虽然极端分子不过几十人，穆沙拉夫当局却仍然拒绝予以剿灭。当年7月，巴军被迫向红色清真寺发起进攻，和盘踞其中的数千名武装分子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3天，造成数百人死亡。武装分子残部选择逃往部落自治地区。他们发誓报仇，并很快成了马哈苏德的忠实死士。旁遮普省的极端分子原来只专注于抵抗印度，现在他们也加入了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

2008年夏天，塔利班取得了极大进展。他们的势力渗入了西北边境省，在科哈特、汉古和斯瓦特河谷等地向警方发起了攻击。在美军压力下，巴基斯坦不得不派遣部队前去镇压。8月6日，在付出了几位指挥官的生命代价后，巴军终于向巴焦尔发起了一轮有效的攻势。巴基斯坦承诺将在6个星期内彻底清剿当地的武装分子。为了躲避军方的轰炸，25万多人逃进了巴焦尔城寻求庇护。极端分子很快便发起了报复的反攻，他们在巴基斯坦四处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英国、德国、西班牙、丹麦和荷兰等国也响起了袭击警报，恐怖分子很可能从部落自治地区走向世界各地。一年之后，巴军在巴焦尔的军事行动并无太大进展，只控制当地的半壁疆土。

塔利班的另一大据点是斯瓦特（Swat）。此地深居大山之中，位于伊斯兰堡北部，据巴基斯坦首都正好120英里，不但战略意义重大，而且各项基建十分齐全，电力、道路和城镇设施完备。斯瓦特山谷附近遍布大片平原，一直延伸到旁遮普省境内。也就是说，恐怖分子如果在斯瓦特安寨扎营，可以享受直达巴基斯坦最大省份的地利。毛拉纳·法兹鲁拉（Maulana Fazlullah）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点，2004年，这位巡游毛拉在斯瓦特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法兹鲁拉原来是一位经营滑雪缆车的商人，现在，他的电台专门播送伊斯兰经典文本，同时向巴基斯坦政府发布威胁。很快，法兹鲁拉便引起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注意，接着便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人力和武器支援。

2007年，巴基斯坦军队进攻斯瓦特地区。在此之前，法兹鲁拉已经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他旗下的电台也发展到了好几家。因此，巴军遭到了法兹鲁拉武装的重创，不得不落荒而逃。至于斯瓦特地区，仍然是法兹鲁拉的天下。2008年，巴基斯坦军方卷土重来，这次巴方一共投入了1.2万兵力，塔利班方面派出了3000多人迎战。很快，巴军再次败退而走。频繁战争造成大批人员流离失所，塔利班驱散了大批学生，这一次连男

学生也未能幸免，平民伤亡不计其数。军队败退后，塔利班的严厉宗教法律再次覆盖了整个斯瓦特地区，死刑、鞭刑、摧毁民居、禁止妇女外出活动、杀害反抗人士，种种恐怖行径纷纷冒头。

巴基斯坦境内恐怖活动的猖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国的一场政治危机。2007年，穆沙拉夫、反对党、法律系统和公民社会之间矛盾重重。由于贝·布托遇刺，巴基斯坦的公民社会走到了尽头。贝·布托刚刚结束流亡生涯回国，便在12月27日的一次集会中遇刺身亡（一名恐怖分子向布托开枪，另一名焚毁了她的座驾）。当时，距选举日不过数十天而已。因此，穆沙拉夫不得不宣布选举延期。此次选举最终在2008年2月举行，贝·布托所属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获得胜利。布托女士死后，扎尔达里先生继续着妻子的事业。穆沙拉夫、新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2008年，穆沙拉夫结束了10年的总统生涯，这次危机才稍稍缓和。不过，军方仍然掌握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尤其是在对阿对印政策方面更是一言九鼎。

2009年2月，西北边境省政府以及巴基斯坦军方和塔利班在斯瓦特达成了和平协议。巴方允许塔利班在该省设立宗教法庭，作为回应，塔利班也必须放下武器，显然，这一点很快遭到塔利班方面的拒绝。巴基斯坦的有识之士对政府的态度十分不满，他们认为，举行和议不但代表对塔利班的妥协，并且为破坏国家法律开了一个糟糕的先例。不过，4月14日，和谈协议在议会全票通过，扎尔达里总统宣布协议生效。几天之内，斯瓦特的政府部门、警察机构、教育系统就被塔利班分子占据。而且，塔利班的势力还在向其他地区渗透，他们并没有放弃颠覆伊斯兰堡政府的努力。

超过250万难民逃出斯瓦特、布奈尔（Buner）和迪尔（Dir）等地。巴基斯坦举国哗然，民众群情激愤，政府也是面上无光。美国方面也十分着急，直接指责巴基斯坦不负责任。国际压力、公众舆论和文官政府三方施压之下，巴基斯坦军方增加了攻打斯瓦特地区的兵力。6月，塔利班终于退出这一地区。不过，包括法兹鲁拉在内的20多名塔利班领导人全员安全撤退。很快，抽身而退的塔利班分子向斯瓦特地区发起了反攻。

10月，巴基斯坦军方准备向南瓦济里斯坦的几个塔利班重镇发起攻击。为了报复，塔利班在10天之内进行了一系列恐怖袭击，目标直指巴基斯坦各大城市。一群恐怖分子甚至混进拉瓦尔品第的军方总部，绑架了49名安全人士。22小时之后，人质得到了解救。10月15日，武装分子再次向



拉合尔的警察和情报部门发起袭击。当月，约有300人死于恐怖袭击。此时，美国新政府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策还不明朗，阿富汗总统选举能否举行也尚存疑虑。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张依旧。

同时，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在2001年遭遇打击后，已经发展出多个分支组织。很快，中亚和巴基斯坦都出现了本国的塔利班组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塔利班的印度分支也会鸣锣开张。这一切事件的背景，是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阿富汗的战争。各国塔利班的目标十分一致，都力图在本国复制一个塔利班式的宗教政权。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迅速出现了大批武装极端组织。此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些极端分子并不被当地政府看作主要威胁，直到2001年为止。美国在准备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一直鼓动俄罗斯和中亚5国为其提供空军和后勤基地。对于美国的这一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4国当局全都有心相应。不过，没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首肯，中亚4国也是无力实施。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土库曼斯坦政府表现得特立独行。阿什哈巴德当局在外交上表示中立，并拒绝为美方提供基地。中亚各国领导人希望和美国结盟，一来为了稳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二来也希望从美国得到收入，改善财政状况。而且，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不断壮大，各国领导人都对塔利班的存在感到如芒在背。

中亚5国之中，美国最为积极拉拢的对象是乌兹别克斯坦。美方需要利用乌境内的空军基地将中央情报局的特种部队运往阿富汗。作为回应，俄罗斯试图阻止美国在中亚的活动。很快，俄罗斯召集中亚各国及阿富汗北方联盟举行了最高会议。俄方在会议上向北方联盟保证，将会为对方提供全力资助，以便打败塔利班。莫斯科当局的价码甚至超过了美国。不过，中亚各国对此并不满意。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率先中止了和俄罗斯的谈判，同时他还密电美方，声称愿意向美军提供空军基地。普京很快就意识到俄方无法阻止中亚各国和美军之间的合作。

9月22日，美俄两国总统互通电话，双方达成协议，美国空军被允许在中亚各国空军基地内建立基地。此时，距战争爆发仅有11天。俄罗斯方面坚持，美军必须在基地组织消灭后立即撤退。大批中央情报局部队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尔西-汉阿巴德（Karshi-Khanabad，K2）空军基地，

为进攻阿富汗作最后的准备。2000年10月中旬，卡尔西-汉阿巴德基地内已经积聚了大批美军部队。不久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样为美国和北约的战斗机打开了基地大门。

“9·11”事件发生之前，中亚地区就已经遭遇了零星数次的恐怖袭击。袭击的幕后黑手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他们的恐怖活动让当局惊骇不已。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有两位——朱马·纳曼干尼（Juma Namangani）和托希尔·尤尔德舍夫，前者负责军事指挥，后者则是组织的精神领袖。早在90年代早期，他们就在费尔干纳河谷的纳曼干一带和乌兹别克斯坦警方进行武装对抗。后来，两人带领部队逃往塔吉克斯坦，并在该国内战中和当地伊斯兰极端分子并肩战斗。从1992—1997年，内战持续了整整5个春秋。此后，乌伊运领导层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山区安顿下来。他们据此为根据地，时不时地冲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进行骚扰。

2000年冬天，乌伊运武装退入阿富汗境内。虽然他们已经被美国人视为恐怖组织，但还是受到了本·拉登和奥马尔的热烈欢迎。此时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稍稍调整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追求，他们不单单想要建设一个宗教化的乌兹别克斯坦，而是追求整个中亚的伊斯兰化，甚至临近的东亚大国的民族自治区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范围。纳曼干尼向奥马尔表示忠心，他的部队全盘照搬了塔利班式的伊斯兰信仰。乌伊运还在靠近塔吉克斯坦边境的昆都士省建立了自己的训练营。训练营中的一切都按照基地组织的标准进行和搭设，来自中亚和车臣的年轻人将在这里学习恐怖袭击的各种技巧。乌伊运很快成长为基地组织在中亚地区的亲密盟友，双方不但拥有相似的意识形态，还在毒品走私等问题上合作无间。乌伊运和基地组织串联的毒品网络始于阿富汗，取道中亚地区到达俄罗斯和欧洲。

乌伊运勾结塔利班的消息让卡里莫夫十分震惊。得知两大恐怖组织的活动中心就在阿乌边境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感到惴惴不安。“9·11”事件发生之前，奥马尔刚刚将纳曼干尼任命为军事长官，职权覆盖整个阿富汗北部。同时，纳曼干尼还将负责马扎里沙里夫的防御工作。不过，新官上任的纳曼干尼很快便遭遇横祸，美军对马扎里沙里夫城的轰炸攻势要了乌伊运领导人的命。纳曼干尼死后不久，2001年11月，马扎里沙里夫被美军和北方联盟攻克。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因此一哄而散，无数武装分子

命丧黄泉。不过，尤尔德舍夫却侥幸逃脱，这位精神领袖率领残部逃往巴基斯坦，在部落自治地区进行避难。亡命巴基斯坦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之中，不少人都娶了普什图女子为妻，并在当地安家落户。基地组织里的阿拉伯人始终不忘故土，他们一心想利用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同情和帮助，最终杀回中东去。相形之下，基地组织的乌兹别克同行并不愿意返回家乡，因为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卡里莫夫的霹雳手段。久而久之，流亡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在部落地区靠出卖武力为生。基地组织、新塔利班组织的领导人和当地的普什图武装头目都曾经是他们的雇主。乌兹别克雇佣兵以残忍、无情和强硬著称，他们的臭名盖过了其他任何极端组织。

虽然面临着美国 and 欧洲的直接压力，中亚各国却并没有认识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十几年来，中亚各国的领导人中倒是换了不少新面孔，不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却一直止步不前。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中，政治反对派指责总统艾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涉嫌舞弊。自1991年独立以来，阿卡耶夫一直稳坐总统宝座，执政十余年后，他的官声已经差到了极点。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严重的暴力示威，人群数次冲击总统府。阿卡耶夫被迫下野，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继任总统。巴基耶夫原是阿卡耶夫的政治盟友，也是一位实权人物。很快，新总统也被丑闻缠上了身，他被指腐败、专制和滥用裙带关系。巴基耶夫上台后，吉尔吉斯斯坦迅速倒向莫斯科。由于美军的空军基地距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Bishkek）只有咫尺之遥，为此，吉方向美方提出了很高的价码。

土库曼斯坦发生的故事大同小异。2006年12月，性格古怪的专制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尼亚佐夫掌权长达21年，土库曼斯坦在他的统治下一直贫困不堪。虽然该国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却也只能是暴殄天物。新总统古尔班古利·别尔德穆罕迈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medov）采取了审慎和缓慢的改革政策，向西方世界敞开了大门。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它有着中亚最多的人口，也孕育了乌伊运这样的极端组织。目前，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次长期危机：政府厉行专制，毫无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意思。人民则对国家前途满怀疑虑。如果卡里莫夫马上死掉，乌兹别克斯坦会怎么样？有些人认为卡里莫夫一

死，万事立即大吉。有的人认为那将是无穷无尽的宗派斗争和权力倾轧的开始，国家将会永无宁日，只有卡里莫夫才能震慑蠢蠢欲动的各派人马。一人在位，鸡犬升天，卡里莫夫的家人和亲信从各种商业活动中获利不少。与此同时，贫困人口越来越多，法制的缺失让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地下活动十分猖獗。

乌兹别克斯坦乱象丛生，伊斯兰极端运动纷纷揭竿而起。其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拥有最长的历史，不过，“伊布扎特”（Hizb ut-Tahrir, HT）的规模是最大的。伊布扎特的目标非常宏伟，他们试图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由哈里发（Caliph）领导的伊斯兰大国。伊布扎特并不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土产组织，它来自中东，并在欧洲的穆斯林青年学生中广受欢迎。不过，圣党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缺乏影响，只在中亚地区被当地人发扬光大。虽然圣党崇尚非暴力，卡里莫夫还是将其视为威胁，并予以残酷镇压。数千名年轻人被指为圣党分子而身陷囹圄，其中大多数都是蒙冤入狱。在卡里莫夫的蛊惑下，美国方面也将伊布扎特列入了恐怖组织名单。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出现了内部纷争，一个叫“伊斯兰圣战联盟”的组织在2002—2003年之间突然崛起。该组织原是乌伊运的一部分，另立门户之后，主要吸收突厥语族的武装分子为成员，其中，中亚人占据大多数。

2004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多个城市发生自杀性恐怖袭击，塔什干也未能例外。伊斯兰圣战联盟被控与这一系列事件有关。4天之内，恐怖袭击造成47人死亡。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本国边界，逮捕了400名嫌疑人，并将境内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援助人员尽数驱逐。当年7月，塔什干的自杀性袭击不减反增，被捕的人数自然也一路上升。整个国家阴云密布，费尔干纳地区的气氛尤其紧张。2005年5月13日，该地区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军警枪击被捕的当地商人。至少有850人被杀，不过，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坚称只有187人身亡。数千人因此进了监狱，更多的人选择逃亡。压力之下，美国和北约组织对卡里莫夫的行为表示谴责。不过，俄罗斯和另一个安理会大国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的行动。为了报复美方，卡里莫夫在当年7月向卡尔西-汉阿巴德基地内的美军下了逐客令。^{【323】}

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镇压活动让流亡在外的乌伊运等极端分子受益不少。镇压之下，无数乌兹别克年轻人选择逃往巴基斯坦部落自治地区，加

入乌伊运的怀抱。他们之中的数百人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受恐怖主义训练。武装分子在乌—阿—巴三国之间往来穿梭、难以禁绝。2001年时，约有数百名乌伊运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部落自治区避难。事到如今，他们的武装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其中的几百名亡命徒每个月都要潜回中亚进行破坏。同时，托希尔·尤尔德舍夫在乌伊运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乌兹别克斯坦的逃难潮同样惠及乌伊运之外的武装团伙。2007年9月，德国警方逮捕了3名德籍穆斯林。这3人刚刚在巴基斯坦部落自治区的伊斯兰圣战联盟训练营里学习过恐怖主义课程，毕业之后，他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返回家乡炸毁位于拉姆斯泰因（Ramstein）的美军基地。纳吉密丁·贾罗洛夫（Najmiddin Jalolov）又名阿布·叶海亚·穆罕默德·法提赫（Abu Yahya Mohammed Fatih），他领导的伊斯兰圣战联盟在土耳其广招人马。因此，潜藏在巴基斯坦的中亚塔利班组织不但是中亚地区的威胁，也将是土耳其和欧洲的噩梦。

如今，卡里莫夫已经充分领教了塔利班和乌伊运带来的威胁。2009年2月，他再次允许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援阿军用物资过境乌兹别克斯坦。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年12月之前，卡里莫夫重新开放了位于纳沃伊（Navoi）的货物基地。不少人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勾结美国势力，为了避嫌，卡里莫夫特地将纳沃伊基地的运营权交给了韩国政府。卡里莫夫合纵连横的行动并没有达到威慑乌伊运的目的。当年6月，费尔干纳等地爆发了一系列针对警察机构的爆炸案。恼怒之下，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关闭了本国毗邻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乌方认为，武装分子自阿富汗而来，穿过上述两国来到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恐怖活动。不过，事实证明，武装分子似乎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建立了秘密基地，并时刻准备着进一步的行动。

中亚地区的各支伊斯兰极端分子都把塔利班当作榜样。极端主义武装一面向人民灌输原教旨主义思想，推行被扭曲的伊斯兰教法；一面通过暴力活动破坏各地的政府组织。暴力活动的猖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政权的无能造成的，国际社会的漠视也负有很大责任。塔利班不但庇护基地组织，还在全球建立所谓圣战组织，诱骗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为了消除塔利班的生存基础，各国政府和西方势力不但要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还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贫困、经济衰败、教育资源短缺、失业问题严重。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都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社

会 and 经济发展，以回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带给地区安全的威胁。

如果读者对本章所披露的各种资料感兴趣，笔者特地推荐自己的另一部作品作为参考。那就是2009年由纽约企鹅图书公司出版的《坠入深渊：美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三地的灾难》一书。本章所有资料都引自该书。

附录一

1996年喀布尔陷落后 塔利班的女性和文化法令展示

原文为达里语，后被译为各国文字，作为法令发放给驻阿各地的西方机构。原文中拼写和语法错误甚多，翻译稿对此进行了修改。



宗教警察（Amr Bil Maruf and Nai Az Munkar）发布法令

1996年11月于喀布尔

各位女性同胞无故不得离开居所。如果需要外出，你们不得像伊斯兰教法实行以前某些女性那样穿着入时、梳妆打扮，并且不避讳男性的众目睽睽招摇过市。

伊斯兰教的主旨是拯救，妇女的各项尊严都得到了保证。对于妇女的行为，伊斯兰教实行了富价值的指导。妇女不能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施行非礼的机会。女性应当承担起家庭表率的重任，其夫婿、兄弟和父亲则负责为家庭生活提供各项必需品（食物、衣物等）。

女性如果因为教育、社交或社会服务方面的原因需要离开住所，其着装应该符合伊斯兰沙里亚教法规定。对于那些外出着装过于媚俗、巧于装扮、过于贴身、有炫耀姿色之嫌的女性，伊斯兰教法将诅咒她们。她们死

后得不到进入天堂的权利。

对于女性的各种行为，每个家庭里的长者都有着监督的责任。我们要求所有家庭的长者严格管控自己的家庭，避免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否则，不但违规妇女会遭到严厉惩罚，其家人也会被波及。惩罚的权力掌握在宗教警察（Munkrat）手中。

宗教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努力不懈，直到所有糟粕乱象完全肃清为止。

二

1996年11月，塔利班政权卫生部以“信徒的领袖”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为名发布的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国立医院和私营诊所经营法则。

1. 女性患者应到女性医务人员处就诊。如需要男性医务人员协助治疗，女性患者必须由亲属陪同。
2. 就诊期间，女性患者和男性医务人员必须穿戴整齐，着希贾卜（hijab）。
3. 就诊期间，男性医务人员不得注视或碰触女性患者患处之外的身体部位。
4. 女性患者所用之候诊室需要严密保护，内景不得外露。
5. 女性患者就诊期间的管理职务须由女性医务人员担任。
6. 夜诊期间，男性医务人员非请不得进入女性患者就医的诊室。
7. 男女医务人员之间不得同坐，不许聊天。如果需要进行交流，双方需要穿戴整齐，着希贾卜。
8. 女性医务人员的衣着应以朴素、简洁为基调，不得穿着媚俗，不得化妆。
9. 女性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不得进入男性患者就医的诊室。
10. 全体医务人员应按时前往清真寺进行祈祷。
11. 宗教警察有权随时对各大医疗机构进行监察，其余人等不得进行阻拦。违反者将受到伊斯兰教法的严厉惩罚。



1996年12月，喀布尔宗教警察总部发布命令

1. 禁止叛乱和女性不按规定穿戴希贾卜的行为。从即日起，司机不得搭载穿戴伊朗式希贾卜的女性。如果违反，肇事司机将被收监处理。宗教警察将找出肇事妇女的住所，并对其配偶进行处罚。司机不得搭载没有亲属陪伴、衣着媚感的女性。

2. 禁止播放音乐。我们将用公众信息资源进行广播。商店、饭店和汽车等场所禁止播放磁带和音乐。5日之内，我们将对相关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某一商店被发现藏有音乐磁带，店主将被收监处理，店面将被强制停业。如果有5人进行担保，店面将重新开放，而店主也将在日后获释。如果某一汽车被发现藏有音乐磁带，交通工具将被没收，车主将被收监处理。如果有5人进行担保，交通工具和车主将陆续获释。

3. 禁止剃须行为。一个半月之后，如果监察人员还发现有剃须行为，肇事者将被收监羁押，直到胡须长到合符规定的长度为止。

4. 禁止养鸽和玩赏禽鸟的行为。10天之内，相关行为必须停止。10日之后，如果监察人员还发现相关行为，涉案的鸽类和其他禽鸟将被人道毁灭。

5. 禁止放风筝取乐。城中所有风筝店将被关停。

6. 禁止偶像崇拜。交通工具、商店、旅舍、房间和其他场所悬挂及出示的画像和相片都必须被销毁。监察人员须负责撕毁以上地点出现的一切相片。

7. 禁止赌博。监察人员将同安全部门开展联合行动，扫荡一切聚赌窝点，涉案人员将被收监处理，刑期一个月。

8. 禁止吸毒。吸毒者将被收监处理，贩毒者及其店铺将被查处。相关店铺将被关停，涉案人员将被收押并接受制裁。

9. 禁止蓄留英美式发型。留长发的人将遭到逮捕，然后宗教警察部门将对违规发型进行处理，一律剪短。所需费用由犯人支付。

10. 禁止盈利性借贷（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古兰经说“安拉允许借贷但禁止利息”，这是伊斯兰教常识）、禁止更改小票和炒汇行为。换汇者须知，以上三种金钱交易必须立即禁止，如果违反，肇事者将被长期收监。



11. 禁止年轻女士到城中的喷泉边洗衣服。监察人员将以伊斯兰道德规则的方式将犯妇送回家中，并对其配偶进行严厉惩罚。

12. 禁止在婚礼上的乐舞行为。如若违反，家长将遭到逮捕并被惩罚。

13. 禁止音乐性的鼓乐演奏。相关案例将进行公示，并交由宗教长老进行裁定。

14. 禁止裁缝为女客量体度身。如果裁缝店中发现女性或时尚类杂志，店主将被收监处理。

15. 禁止巫术占卜。相关书籍应被立即焚毁，涉案神棍将被收押，直到改过为止。

16. 必须按时完成祈祷，确保集市中聚集祈祷正常进行。所有县市之内的祈祷行为都应该按时完成。祈祷时间，城市交通应立即停止，所有人员应前往清真寺完成祈祷。如果年轻人在祈祷时间逛商店，一旦被发现将遭收监羁押。

附录二

塔利班的政权结构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是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有着“信徒的领袖”（Amir ul Momineen）的尊号。设于坎大哈的最高舒拉（Supreme Shura）是塔利班运动的最高决策机构，属于临时性质，由10名成员组成。最高舒拉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临时内阁，因设在喀布尔而又名为喀布尔舒拉；另一个则是军事舒拉。两个委员会直接向最高舒拉负责。

1994—1997年期间最高舒拉中的塔利班创始人

| | |
|------------------|--------------------|
|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 | “信徒的领袖”，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 |
| 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阿罕德 | 最高舒拉主席/塔利班第二号人物 |
| 毛拉·穆罕默德·高斯·阿罕德 | 外交事务代理部长（至1997年6月） |
| 毛拉·穆罕默德·哈桑·阿罕德 | 军事参谋长 |
| 毛拉·穆罕默德·法兹尔·阿罕德 | 军团司令 |
| 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 | 海关总长 |
| 毛拉·赛义德·希亚苏丁·阿迦 | 信息部代理部长 |
| 毛拉·海茹拉·海尔瓦 | 内政部代理部长 |
| 莫拉维·阿卜杜尔·萨塔尔·萨纳尼 | 阿富汗代理最高法官 |
| 莫拉维·阿赫萨努拉·阿赫桑 | 国家银行行长 |
| 毛拉·阿卜杜尔·贾利勒 | 外交事务代理部长（1997年6月后） |



塔利班的政权结构

| | |
|------------|---------------|
| 塔利班军事指挥体系: | 军事舒拉 |
| 最高指挥官: |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 |
| 军事参谋长: | 毛拉·穆罕默德·哈桑 |
| 陆军参谋长: | 毛拉·拉赫马图拉·阿罕德 |
| 军团司令: | 毛拉·穆罕默德·法兹尔 |
| 陆军师指挥官: | 毛拉·朱玛·汗 |
| 陆军师指挥官: | 毛拉·穆罕默德·尤纳斯 |
| 陆军师指挥官: | 毛拉·穆罕默德·古尔 |
| 陆军师指挥官: | 毛拉·穆罕默德·阿齐兹·汗 |
| 第4装甲部队指挥官: | 毛拉·穆罕默德·查希尔 |

2000年喀布尔舒拉各部部长

| | |
|-------------------|----------|
| 毛拉·瓦基尔·艾哈迈德·穆塔瓦基尔 | 外交部部长 |
| 毛拉·穆罕默德·阿巴斯·阿罕德 | 公共卫生部部长 |
| 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 | 内政部部长 |
| 毛拉·奥拜杜拉·阿罕德 | 建设部部长 |
| 毛拉·塔希尔·安瓦里 | 财政部部长 |
| 毛拉·科德拉图拉 | 信息和文化部部长 |
| 毛拉·阿卜杜尔·拉提夫·曼苏尔 | 农业部部长 |
| 毛拉·穆罕默德·以撒 | 水利和能源部部长 |
| 毛拉·艾哈迈杜拉·穆提 | 交通部部长 |
| 毛拉·努尔丁·图拉比 | 法务部部长 |
| 毛拉·哈姆杜拉·努曼尼 | 高等教育部部长 |
| 毛拉·艾哈迈德·詹 | 工矿业部部长 |
| 毛拉·贾拉鲁丁·哈卡尼 | 前线事务部部长 |
| 毛拉纳·阿卜杜尔·拉扎克 | 商务部部长 |
| 卡里·丁·穆罕默德 | 规划部部长 |

塔利班运动成员的来源

D（杜）=杜兰尼部普什图人；G（吉）=吉尔扎伊部普什图人；N（普）=普什图，但不是来自以上两个部落；T（塔）=塔吉克人；U（乌）=乌兹别克人；O（他）=其他民族；FM（创）=塔利班创始人；Muj（圣）=前圣战组织成员

前圣战组织名称

Hizbe（K）=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Hizbe（H）=伊斯兰党（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Jam=伊斯兰促进会（拉巴尼）；Nifa=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盖拉尼）；Har=伊斯兰革命运动（莫拉维·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德）

| 名称 | 职务 | 来源/年龄 | 部落/职位 | 特征 |
|-------------|---------------|------------------------|---|------------------------|
|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 |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 | 生于坎大哈梅万德，为塔利班创始人之一，37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曾在坎大哈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独眼，政府首脑 |
| 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 | 喀布尔舒拉主席 | 生于坎大哈，塔利班创始人之一，38岁 | 普什图人，出身喀喀尔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
| 穆罕默德·哈桑 | 1997年后任外交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曾在奎达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奥马尔的亲戚 |
| 毛拉·穆罕默德·高斯 | 前外交部长，1997年卸任 | 生于坎大哈胡沙卜，为塔利班创始人之一，50岁 | 普什图人，出身杜兰尼努尔扎伊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独眼，另一只眼睛视力高度受损，奥马尔的密友 |

| 名称 | 职务 | 来源/年龄 | 部落/职位 | 特征 |
|------------------|----------------|----------------------|---|---|
| 毛拉·阿卜杜尔·拉扎克 | 海关负责人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杜兰尼波帕尔扎伊部人。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
| 毛拉·赛义德·希亚苏丁 | 教育部部长 | 生于法里亚布省 | 普什图人，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奎达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奥马尔的亲戚 |
| 毛拉·海茹拉·海尔瓦 | 内政部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杜兰尼波帕尔扎伊部出身，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哈卡尼亚接受教育 |
| 阿赫萨努拉·阿赫桑 | 国家银行行长 | 生于坎大哈潘杰瓦伊 | 普什图人，杜兰尼部出身 | 曾任霍斯特省省长，1997年死于马扎里沙里夫 |
| 莫拉维·阿卜杜尔·萨塔尔·萨纳尼 | 坎大哈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 生于坎大哈，80岁 | 普什图人，杜兰尼伊斯哈克扎伊部人 | 曾在坎大哈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 |
| 穆罕默德·阿巴斯 | 卫生部长，同时负责联络联合国 | 生于乌鲁兹甘省，塔利班创始人之一，40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曾在扎布尔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后前往哈卡尼亚就学，曾在坎大哈从事贸易生意，后来成为总检察长，同时也是巴格兰军的司令 |

| 名称 | 职务 | 来源/年龄 | 部落/职位 | 特征 |
|-------------|----------|------------------|---|---|
| 奥拜杜拉 | 国防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奎达伊斯兰学校就学，曾在马扎里沙里夫被俘，负责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联络工作 |
| 达杜拉 | 建设部部长 | | | |
| 穆罕马杜拉·阿罕德 | 财政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杜兰尼阿尔科扎伊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奎达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 |
| 埃米尔·汗·穆塔基 | 信息文化部部长 | 生于罗加加尔省，塔利班创始人之一 | 普什图人，出身科奇游牧部落，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哈卡尼亚就学，奥马尔的老朋友，马扎里沙里夫一役后任巴格兰军指挥官 |
| 阿杜尔·拉提夫·曼苏尔 | 农业部部长 | 生于帕克提亚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部 | 曾在哈卡尼亚就学 |
| 穆罕默德·以撒 | 水利和能源部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
| 阿拉·达德·阿罕德 | 交通部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在西北边境省有一家伊斯兰学校 |
| 努鲁丁·图拉比 | 法务部部长 | 生于乌鲁兹甘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 | 独眼 |

续表

| 名称 | 职务 | 来源/年龄 | 部落/职位 | 特征 |
|-----------|---------|-------------|---|---|
| 哈米杜拉·内曼尼 | 高等教育部部长 | 生于扎布尔省 | 普什图人，出身杜兰尼部达夫塔尼部 | 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
| 艾哈迈德·詹 | 工矿业部部长 | 生于帕克提亚省，40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部扎德兰部 | 曾在哈卡尼亚求学，后在沙特阿拉伯做地毯生意，是塔利班派驻白沙瓦的商务代表，负责和各大石油公司的联络工作 |
| 贾拉鲁丁·哈卡尼 | 前线事务部部长 | 生于帕克提亚省，55岁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扎德兰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党尤尼斯·哈里斯派 | 1974年参与反达乌德政权的叛乱，失败后流亡帕克提亚省。曾在帕克提亚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后在哈卡尼亚求学6年。圣战组织主要指挥官之一，1991年曾率军攻陷霍斯特，1995年加入塔利班 |
| 萨德克·阿罕德 | 商务部部长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出身吉尔扎伊霍塔克部，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未接受教育，1997年参与攻陷马扎里沙里夫的战斗 |
| 卡里·丁·穆罕默德 | 规划部部长 | 生于巴达赫尚省 | 塔吉克人，前圣战组织成员，隶属于伊斯兰促进会 | 塔利班政权中权势最大的塔吉克人 |

| 名称 | 职务 | 来源/年龄 | 部落/职位 | 特征 |
|----------------|--------|------------------------|--|---|
| 莫拉维·卡拉穆丁 | 宗教警察首脑 | 生于罗加爾省巴里基-巴拉克, 38岁 | 普什图人, 出身吉尔扎伊莫哈曼德部, 前圣战组织成员, 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罗加爾和哈卡尼亚伊斯兰学校就学。后在拉巴尼政府中任职, 为纳比·穆罕默迪的秘书, 在扎布尔省加入塔利班 |
| 莫拉维·贾利鲁拉·莫拉维扎伊 | 总检察长 | 生于赫拉特, 68岁 | 普什图人, 哈瓦贾部出身 | 曾在位于印度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校就学, 1988年出任圣战组织政府顾问, 曾任拉巴尼政权的教育厅长 |
| 穆罕默德·哈桑 | 坎大哈省省长 | 生于乌鲁兹甘省, 塔利班创始人之一, 45岁 | 普什图人, 出身杜兰尼阿查克扎伊部, 前圣战组织成员, 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曾在奎达伊斯兰学校就学, 曾在乌鲁兹甘省抵抗苏军, 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和一根手指 |
| 瓦基尔·艾哈迈德 | 奥马尔的秘书 | 生于坎大哈 | 普什图人, 出身喀喀尔部, 塔利班创始人之一 | 奥马尔的主要助手, 塔利班发言人 |
| 舍尔·穆罕默德·斯塔纳克扎伊 | 外交部副部长 | 生于罗加爾省 | 普什图人, 出身吉尔扎伊斯塔纳克扎伊部 | 曾是一名警察, 后在印度受训 |
| 阿里夫拉·阿里夫 | 财政部副部长 | 生于帕克提亚省扎姆鲁德 | 普什图人, 出身于吉尔扎伊苏莱曼部, 前圣战组织成员, 隶属于伊斯兰革命运动 | 为6级伊玛目, 曾在哈卡尼亚求学14年, 曾在帕克提亚省为当地圣战服务 |

附录三

塔利班大事编年纪

— 1992 —

8月19日，布拉希米访问坎大哈。塔利班警告来访的各大媒体必须持公正报道立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 1993 —

拉巴尼（Rabbani）总统和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ikmetyar）之间的苦战造成1万余名平民丧生。

— 1994 —

1月，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武装进攻喀布尔，战火将城市变成瓦砾场。

2月，马哈茂德·梅斯蒂里（Mehmoud Mestiri）为首的联合国特别使团前往阿富汗斡旋。巴基斯坦大使馆遭洗劫。

10月，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斯鲁拉·巴布尔（Naseerullah Babar）陪同10位西方国家驻巴大使访问赫拉特并会见了伊斯梅尔·汗（Ismael Khan）。

10月28日，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Benazir Bhutto）在阿什哈巴德会见了伊斯梅尔·汗和杜斯塔姆。

11月4日，一支由30辆卡车组成的巴基斯坦车队在前往中亚的路程中遭遇军阀袭击，事发地点靠近坎大哈，造成20余人死亡。塔利班势力介入冲突。

11月5日，塔利班控制坎大哈局势，并向车队放行。冲突持续4天，造成50余人死亡。

11月25日，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南部省份拉什卡加尔（Lashkargarh）和赫尔曼德（Helmand）。

— 1995 —

1月1日，3 000余名巴基斯坦分支武装分子从白沙瓦（Peshawar）开赴阿富汗。

2月2日，塔利班进入瓦尔达克（Wardak）省，距喀布尔仅25公里。

2月11日，塔利班占领卢格尔（Logar）省，至此，阿富汗的30个省之中已有9个被塔利班占领。拉巴尼总统派出代表团与塔利班进行接触。

2月14日，塔利班夺取恰拉斯亚卜（Charasyab），希克马蒂亚尔逃走，逃亡过程中未进行抵抗。

2月18日，塔利班提出加入临时政府的三大条件：塔利班组成中立武装；只有“品行优良的穆斯林”才有资格加入政府；30个省都必须派出代表。

3月7日，塔利班军队逼近尼姆鲁兹和法拉两省，试图武装拿下赫拉特。由于哈扎拉守军溃退，塔利班趁机进入喀布尔南部。

3月11日，马苏德武装向喀布尔附近的塔利班军队发起进攻。后者被迫退回恰拉斯亚卜。

3月13日，哈扎拉武装首领阿卜杜尔·阿里·马扎里被塔利班俘虏，随后被押上直升机送往坎大哈。不过，直升机随后失事，马扎里也一命呜呼。同日，塔利班占领法拉省。

3月29日，政府军将塔利班驱赶到信丹德南部80英里处。

4月4日，塔利班占领信丹德空军基地的部分区域。该基地位于赫拉特附近。

5月12日，塔利班军队退出法拉省。



塔利班

5月31日，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访问喀布尔和坎大哈。

7月10日，沙特情报部门代理负责人来到阿富汗周游访问，此行是为了开展和平斡旋活动。访阿期间，沙特方面也和塔利班进行了会谈。

9月2日，塔利班重夺法拉省。信丹德附近爆发激战。

9月3日，塔利班占领信丹德。喀布尔附近激战连连，大批军队经空投进入赫拉特，伊斯梅尔·汗的统治岌岌可危。

9月5日，塔利班占领赫拉特。伊斯梅尔·汗未做任何抵抗，直接逃往伊朗。

9月6日，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馆遭遇冲击，随后被暴民焚毁。伊朗方面警告塔利班勿要跨过伊阿边界。

10月10日，塔利班从坎大哈调集400辆坦克装甲车直扑喀布尔，准备向首都发起进攻。

10月11日，塔利班开始全面进攻，同日，恰拉斯亚卜再次落入塔利班控制。

11月11日，塔利班用火箭炮攻击喀布尔，造成36人死亡，52人受伤。这也是塔利班展开火箭攻势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一天之一。

11月26日，塔利班继续对喀布尔进行炮击，死伤数目再创新高。39人死亡，140人受伤。经过苦战，政府军将塔利班武装赶出了喀布尔地区。

— 1996 —

3月3日，拉巴尼总统开始对伊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进行访问。

3月20日，塔利班舒拉在坎大哈召开，1 000名教士和部族长老被邀与会，共商国是。

4月4日，塔利班舒拉闭幕。舒拉呼吁各派共同努力，发动推翻拉巴尼政权的圣战。奥马尔在会议上被推选为“信仰者的领袖”。

4月19日，美国外交界资深人士出访喀布尔和坎大哈，并与阿富汗各派领袖进行了会见。

5月23日，梅斯蒂里托病辞职。

6月26日，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拉巴尼政权的总理。同日，塔利班火箭袭击喀布尔，造成52人死亡。

7月11日，德国外交官诺尔伯特·霍尔出任联合国派驻阿富汗特使。

9月4日，阿富汗妇女在喀布尔抗议塔利班的倒行逆施。

9月10日，塔利班武装进入楠格哈尔省，并占领了当地的两个大区。哈吉·卡迪尔逃往巴基斯坦。贾拉拉巴德附近爆发激战。

9月11日，塔利班占领贾拉拉巴德。

9月25日，塔利班占领萨罗比和阿萨达巴德。

9月26日，塔利班军队从萨罗比出发，并在一夜之间抵达喀布尔。经过城外的一番战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

9月27日，塔利班吊死了纳吉布拉。马苏德逃往北方。奥马尔宣布大赦，拉巴尼为首的6人委员会成为喀布尔的最高行政机构。伊朗、俄罗斯、印度和中亚各国对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一事表示抗议。同日，巴基斯坦代表团启程前往喀布尔。

10月1日，塔利班向盘踞在潘杰希尔的马苏德发去通知，要求塔吉克军阀立即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塔利班军队继续向北推进，马苏德被迫炸毁道路以阻挡对方进攻。塔利班兵临萨朗隧道，和杜斯塔姆武装形成犄角之势。

10月4日，独立国家联合体峰会在阿拉木图召开，与会各国都警告塔利班不得染指中亚。

10月8日，塔利班进攻潘杰希尔并在当地和马苏德的部队发生激战。巴基斯坦展开穿梭外交。

10月10日，杜斯塔姆、马苏德和哈里里在信詹（Khin Jan）进行会晤，三方联合组成了所谓“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马苏德带领50名士兵攻打巴格拉姆，同时对萨朗公路一线发动反攻。

10月12日，马苏德武装占领杰布尔-色拉伊。

10月14日，马苏德武装重夺恰里卡尔。双方在距喀布尔不到10英里的地方展开激战，战斗造成数百人伤亡。

10月18日，塔利班部队撤离巴格拉姆，当地被马苏德武装接管。杜斯塔姆方面出兵增援马苏德。

10月24日，奥马尔宣称：“我们将战斗到死，为保卫喀布尔把血流尽。”马苏德方面希望喀布尔地区非军事化。塔利班和杜斯塔姆方面展开激战，并最终夺取了巴格迪斯省。



10月31日，伊斯梅尔·汗武装从伊朗进入阿富汗境内的迈马纳，并以此为基地在阿富汗西部抵御塔利班。

— 1997 —

1月1日，塔利班重夺巴格拉姆和恰里卡尔。马苏德方面遭遇重创。

1月23日，塔利班重夺古尔-巴哈尔，当地处于萨朗公路的咽喉部。

2月2日，塔利班部队沿霍尔班德谷地行进，哈扎拉武装因此加强了巴米扬省的守卫力量。同日，塔利班代表团出访美国。

3月12日，塔利班政权的赫拉特省省长阿卜杜尔·拉扎克遭遇谋杀。

5月19日，杜斯塔姆的副手马利克叛变旧主，并盘踞法里亚布省，随后宣布投靠塔利班。

5月20日，经过激战，马利克占领巴格迪斯、法里亚布和萨勒普尔三省。同日，乌兹别克军阀还将伊斯梅尔·汗和700名俘虏送交塔利班处。

5月24日，塔利班攻入马扎里沙里夫，随后在此地推行所谓伊斯兰教法，并关闭女子学校。

5月26日，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权。同日，塔利班和马利克武装在马扎里沙里夫进行的会谈破裂，双方发生武装摩擦。

5月28日，经过18个小时的苦战，塔利班被迫撤出马扎里沙里夫。300名塔利班士兵死亡，数千人被俘。同日，马苏德武装在阿富汗南部发起反击。

6月2日，塔利班关闭了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数千名巴基斯坦学生加入塔利班的队伍。同日，反塔势力在马扎里沙里夫组成新联盟。

6月12日，3 000多名塔利班士兵在巴格兰被缴械。马苏德重夺杰布尔-色拉伊。拉巴尼和马利克在马扎里沙里夫举行会晤。各派反塔武装组成了“拯救阿富汗联合伊斯兰和民族阵线”。

7月19日，马苏德武装占领巴格拉姆和恰里卡尔，塔利班士兵纷纷丢弃重武器，四下逃散。

7月21日，马利克前往伊朗寻求支持。

7月28日，联合国命令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对阿富汗情况进行调研，并提交相关报告。同日，喀布尔附近发生激烈战斗。

8月7日，国际红十字会声称，过去3个月的激烈战斗已造成6 800人受

伤。同日，非政府组织“国际关怀”（Care International）也推迟在喀布尔进行妇女援助的计划。

8月12日，各派反塔势力在马扎里沙里夫举行会议，拉巴尼在会议上再次当选总统。

8月15日，布拉希米来到伊斯兰堡，开始自己在邻近国家的一系列访问。

8月19日，布拉希米访问坎大哈。塔利班警告来访的各大媒体必须持公正报道立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9月4日，毛拉·拉巴尼在吉达拜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沙特方面宣布，将会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对塔利班进行帮助。同日，塔利班指责伊朗、俄罗斯和法国3国为马苏德武装提供支持。

9月8日，塔利班武装从昆都士出发进攻马扎里沙里夫，并重新夺回当地机场。杜斯塔姆和马利克之间的争斗让乌兹别克民兵武装一分为二。

9月12日，杜斯塔姆结束在土耳其的流亡生涯回到阿富汗。同日，塔利班武装在卡兹尔-阿巴德村杀害了70名哈扎拉村民。这一天的马扎里沙里夫刚刚结束了连续3天的劫掠。杜斯塔姆的部队开始进行动员，而塔利班武装的攻势遭到挫折。

9月18日，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再次爆发激战。同日，塔利班声称沙特国王法赫德会向自己提供毫无保留的财政和政治支持。

9月23日，塔利班对巴米扬进行狂轰滥炸。马扎里沙里夫城外10英里处爆发激烈战斗。

9月28日，艾玛·伯尼诺在喀布尔被塔利班逮捕，并与其他19位欧盟委员会官员一起遭羁押长达3小时。

9月30日，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塔利班逐出坎大哈。

10月1日，布拉希米完成自己的出访任务。在此期间，他一共访问了13个国家。同日，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激战持续不停。

10月8日，杜斯塔姆武装将塔利班部队驱赶回昆都士省。同日，塔利班政权拒绝了巴基斯坦提出的转口贸易协定。

10月21日，杜斯塔姆武装攻克希比尔干，马利克被迫逃往伊朗。

11月16日，杜斯塔姆武装在希比尔干附近发掘出了30处填埋坑，2 000多名塔利班分子葬身于此，这些尸体都被交还给塔利班方面。同时，双方也开始交换战俘。



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巴基斯坦指责塔利班侵犯人权的行为“可鄙”。

11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签署报告，严辞谴责外部势力对于阿富汗战事的推波助澜。

1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外部势力向阿富汗各派提供武装的行为，并呼吁各派立即停火。

— 1998 —

1月6日，拉巴尼总统出访伊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此行是为了在联合国针对阿富汗问题的地区会议上争取各方支持。塔利班被指在法里亚布省屠杀了600名乌兹别克裔平民。同日，塔利班对于巴米扬的围困造成了当地的食物短缺，情况日益窘迫。

1月7日，科菲·安南向塔利班发出呼吁，要求对方保证巴米扬地区的食物供应。

1月13日，一架隶属于塔利班的飞机在奎达附近坠毁，80人死亡。同日，坎大哈附近爆发因村民反对塔利班强制征兵的冲突事件。

1月27日，阿富汗内战双方同时释放了250名战俘。

2月3日，阿富汗西北部爆发地震，4 000人死亡，1.5万人无家可归。同时，救援物资因为大雪封路无法到达。

2月20日，震区发生第二次地震。

3月8日，当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对阿富汗妇女的状况进行关注。

3月14日，哈扎拉和乌兹别克武装在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发生冲突。

3月22日，布拉希米再临阿富汗，他此行的任务是在塔利班和反塔武装之间进行斡旋。

4月1日，塔利班选定了代表，准备参加同反塔武装之间的谈判。

4月17日，美国方面的代表比尔·理查德森访问喀布尔和马扎里沙里夫。

4月26日，由联合国组织的塔利班和反塔武装之间的会谈在伊斯兰堡召开。

5月4日，谈判破裂。

5月17日，塔利班方面派飞机轰炸塔罗干，31人死亡，100人受伤。喀布尔和阿富汗北部爆发激战。

5月30日，阿富汗东北部再次发生大地震，5 000人遇难。

6月18日，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访问坎大哈。

6月30日，塔利班要求驻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迁出原址，前往综合技术大学驻扎。不过，各大非政府组织都表示拒绝。

7月3日，正在阿尔玛提举行的中亚5国峰会向阿富汗各方发出呼吁，要求各派停止战争。

7月9日，联合国飞机在喀布尔机场遭遇火箭攻击。同日，奥马尔签署法令禁止电视，并要求境内所有基督教徒立即离境。奥马尔还声称，前傀儡政权的官员必须得到惩罚。同日，傀儡政权的国防部长在奎达遭遇暗杀身亡。

7月12日，塔利班占领迈马纳，俘获800名乌兹别克民兵，同时缴获100辆坦克。

7月18日，欧盟宣布将延迟一切投往喀布尔的人道主义援助，理由是当地有着难以容忍的各种限制。

7月29日，所有驻喀布尔的非政府组织被迫撤走。欧盟关闭了驻喀布尔办公室。

7月21日，2名为西方援助机构的阿富汗工作人员在贾拉拉巴德遭到绑架，随后被杀。

7月31日，塔利班领导人来到巴基斯坦，对当地的哈卡尼亚和阿科拉-哈塔克两所宗教学校进行访问。塔利班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新兵源。经过争取，5 000名巴基斯坦宗教学生奔赴前线为塔利班而战。

8月1日，塔利班占领希比尔干。杜斯塔姆率部逃往阿乌边境的哈伊拉坦。

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本·拉登被怀疑与此次爆炸有关联。

8月8日，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11名伊朗外交官和1名伊朗记者被塔利班分子杀害。同日，塔利班还屠杀了上千名哈扎拉人，而数千名哈扎拉人选择逃离这座城市。

8月10日，塔利班占领塔罗干。

8月11日，俄罗斯方面向巴基斯坦当局发出声明，警告巴方不得支持塔利班。中亚各国都提高了自身的警戒状态。

8月12日，塔利班占领了普勒胡姆里和哈伊拉坦。



8月18日，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指责美国和巴基斯坦利用塔利班进行反伊朗图谋。伊朗和塔利班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同日，奥马尔声称自己的组织会为本·拉登提供保护。

8月20日，美军向贾拉拉巴德和霍斯特的两座恐怖分子训练营发射了75枚巡航导弹。这两处训练营都由本·拉登一手创立，袭击造成21人死亡，30人受伤。

8月21日，塔利班方面对美国的袭击行为表示指责，并再次强调了保护本·拉登的态度。一名联合国军事人员在喀布尔被杀。塔利班还驱逐了阿富汗境内及白沙瓦和奎达城中的所有外国人。

8月26日，纽约法院缺席审判本·拉登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9月1日，伊朗方面出动7万名士兵在伊阿边境上进行军事演习。

9月6日，伊朗方面指出，根据国际法每个国家都有保卫本国公民的义务。这一声明让战争危险进一步升级。美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同日，塔利班再次要求获得阿富汗在联合国的席位。

9月10日，塔利班声称，7名在马扎里沙里夫被杀的伊朗人士的尸体已经被发现。

9月13日，塔利班占领巴米扬，奥马尔要求部属大胜之下务必克制自己。

9月20日，马苏德武装向喀布尔发动猛烈的火箭攻击，66人死亡，215人受伤。

9月22日，沙特阿拉伯驱逐了来访的塔利班特使。此举是为了向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的态度表示报复。此前，图尔基王子曾经亲赴坎大哈进行游说。

9月27日，塔利班在阿伊边境上陈兵3万人，以应对伊朗方面可能的军事行动。

10月2日，伊朗的战斗机侵犯赫拉特领空，同时伊方再次举行军事演习，20万人参与其中。

10月14日，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同奥马尔在坎大哈举行会谈。这也是奥马尔首次会见外国外交人员。同时，塔利班同意释放所有伊朗囚犯。

10月21日，美国“女权主义大多数基金会”（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代表129个妇女组织发出倡议，要求增加对于塔利班当局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杰伊·列诺（Jay Leno）之妻玛维斯·列诺个人出资10万美

元，以支持对抗塔利班性别政策的活动。

10月21日，马苏德方面在东北部的攻势取得成效，其武装进入昆都士（Kunduz）省。同日，贾拉拉巴德（Jalalabad）发生政变，塔利班方面拘捕了60余名塔纳伊（Tanai）将军的支持者。

10月25日，塔利班宣布禁用地雷。同日，马苏德在塔吉克斯坦边境上拘捕了伊玛目·萨赫卜（Imam Saheb）。

11月7日，联合国宣布塔利班方面应为早些时候的马扎里沙里夫屠杀负责，此次屠杀共造成4 000人死亡。奥马尔反而指责联合国偏袒反塔利班势力，并指出该事件造成3 500名塔利班人员死亡。同时，他还拒绝了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

11月13日，伊斯兰团结党（Hizb-e-Wahadat）武装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克巴里（Mohammed Akbari）率部投降塔利班。

11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弗雷德里科·马约尔（Frederico Mayor）呼吁世界共同关注阿富汗局势，并共同努力制止当地种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12月1日，塔利班当局在贾拉拉巴德大学外向学生开枪，造成4死6伤。

12月9日，联合国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立场强硬。

12月29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已经崩溃。

— 1999 —

1月10日，塔利班拒绝了其他派别在白沙瓦达成的新一次“和平和民族团结协议”（Peace and National Unity Party），并称问题只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同时，马苏德武装继续进攻阿富汗北部。

1月12日，前圣战组织领导者阿卜杜尔·哈克（Abdul Haq）的家人在白沙瓦被枪决。

1月19日，塔利班对6名劫匪处刑，劫匪的前臂被砍掉，而后挂在喀布尔市内的树上示众。

1月21日，拉赫达尔·布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在联合国安理会述职。其后，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尽快达成停火。

2月2日，伊朗官员和塔利班方面在迪拜进行接触。同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塔利班代表。



塔尔伯特向塔利班递交了引渡本·拉登的书面要求。

2月9日，塔利班拒绝了美国的书面请求，称自己绝不会驱逐本·拉登，但塔利班承诺对本·拉登的行动采取限制。

2月11日，位于罗加尔省的麦登-沙尔（Maiden Shahr）地区发生地震，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2月13日，本·拉登的活动转入地下，塔利班宣称不知道其行踪。同日，马苏德访问德黑兰进行会谈。

2月15日，苏军撤离阿富汗10周年纪念日。

2月21日，联合国调停专员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在结束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在利雅得的会谈之后来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访问。

2月28日，反塔利班联盟宣称，他们将组建领导机构和一个150人的议会。

3月3日，土库曼斯坦外长谢赫穆拉多夫和奥马尔在坎大哈举行了双方首次会谈。

3月4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言批评塔利班的性别政策。

3月11日，联合国在阿什哈巴德组织召开多边谈判。谈判在土库曼斯坦、塔利班以及反塔利班势力间展开，不久后便告破裂。

3月24日，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在坎大哈会见了奥马尔。

3月30日，由于参与各方互相指责，第二轮阿什哈巴德谈判陷入停滞。

4—5月，各派势力为争夺哈扎拉贾地区的巴米扬省展开激战。

4月7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Igor Sergeyev）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和马苏德举行了会谈。同时，俄方宣布将在塔吉克斯坦新建军事基地。

4月10日，奥马尔拒绝和反对派进行会谈。同日，巴米扬附近地区爆发激战。

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批评塔利班政权侵犯人权，塔利班以指责相回应。

4月21日，由于塔利班的撤退，伊斯兰团结党（Hizb-e-Wahadat）占领巴米扬地区。战斗造成数十人死亡，另有数十人被俘。

4月28日，为重新夺回巴米扬，塔利班对该地区实行轰炸，造成30名平民身亡。

4月29日，塔利班当局、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意在重启经

阿富汗境内运输天然气的管道工程，并为工程寻找投资商。同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再次谴责塔利班的性别政策。

5月，赫拉特爆发反塔利班起义，遭到镇压，100名平民被杀，8名平民受到审判后被处决。

5月5日，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塔什干签署联合公报，共同抵御塔利班意图统一阿富汗的企图。

5月9日，塔利班通过东、北两面的攻势重新夺回巴米扬。

5月12日，塔利班代表团和土库曼斯坦达成协议，前者从后者进口天然气和电力。

5月14日，美国首次警告巴基斯坦切勿支持塔利班。同时，美方表示乐见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复辟。

5月20日，激烈的武装冲突再次爆发，马苏德武装向喀布尔发射了12枚火箭，同时，巴格拉姆（Bagram）遭塔利班轰炸。阿富汗北部的战斗持续不断。

5月22日，塔利班对赫拉特发生的起义事件进行清算。8人被公开处决，另有100人同时被杀。塔利班指责伊朗向起义者提供武器。

5月28日，大赦国际指责塔利班在占领巴米扬的过程中有屠杀平民的行为。同日，奥马尔在坎大哈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探讨塔利班运动的未来发展。多位塔利班军官和毛拉列席进行讨论。

6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外长阿齐兹·卡米罗夫和奥马尔进行会谈。塔利班再次声明，只有在自身被承认为代表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基础上，才会参与下一轮“六加二”会谈。

6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将本·拉登列为头号通缉犯，并悬赏500万美元缉拿此人归案。

6月26日，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在罗马主持召开多边协商会议。不过，塔利班拒绝查希尔·沙阿的任何和平努力。同日，面对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威胁，美国在3天之内关闭了该国驻非洲的6所大使馆。

7月6日，美国对塔利班进行贸易和经济制裁，以报复对方拒绝交出本·拉登的表态。同日，塔利班大肆招募兵源，其中数千人来自巴基斯坦，还有数百名阿拉伯裔人员。塔利班此举在于准备对马苏德武装的夏季攻势。

7月15日，阿富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前参议员阿卜杜尔·阿哈德·卡尔扎伊在奎达（Quetta）遇刺身亡。此前，卡尔扎伊刚刚结束与查希尔·沙



阿的会面。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都对此次谋杀表示谴责。

7月16日，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外长在塔什干举行会谈。三方达成协议，共同打击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7月19日，“六加二”集团会议在塔什干开幕，塔利班虽然派员列席，不过并未停止战争准备。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呼吁阿富汗各方达成停火，并要求联合国就阿富汗问题召开会议。

7月19日，马苏德在塔什干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

7月20日，塔什干会议未能得出任何实质性成果。

7月27日，马苏德武装用火箭炮袭击喀布尔机场，联合国方面的航班因此停运。塔利班的攻势日益临近。

7月28日，塔利班开始夏季攻势，战况激烈。

8月1日，塔利班占领巴格拉姆，马苏德武装试图重夺该地区，双方展开激烈争夺。

8月2日，塔利班夺取恰里卡尔，马苏德武装退至潘杰希尔。20万人逃离肖马里河谷，造成新的难民潮。

8月3日，塔利班军队从昆都士出发，一路北行试图夺取伊玛目-沙希卜和舍尔-汗-班达尔，以切断马苏德武装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补给线。战争造成双方3 000多人死亡。

8月5日，马苏德方面发起反攻，夺回喀布尔附近所有失地。塔利班方面有2 000多人战死。

8月8日，马苏德武装夺回阿富汗北部所有失地。

8月10日，华盛顿当局宣布冻结塔利班控制下阿丽亚娜航空公司在美国的一切资产，以惩戒该组织和本·拉登之间的关系。

8月13日，塔利班重夺巴格拉姆。

8月15日，联合国要求塔利班切勿推动难民潮。另一方面，塔利班军队在肖马里谷地中持续向北推进，战事激烈。数千名塔利班分子在喀布尔被俘。

8月17日，北方联盟拒绝了巴基斯坦提出的调停计划。

8月24日，坎大哈郊外奥马尔住所附近发生爆炸事件，事件造成40人死亡，其中包括奥马尔的2位继兄和6名阿拉伯圣战志愿者。

8月25日，奥马尔住所外发生汽车连环爆炸，造成10死40伤，奥马尔的不少副手和亲戚因此丧生。

9月5日，阿富汗内战双方在北部和喀布尔附近展开新一轮攻势，战况激烈。

9月10日，联合国禁毒署宣称，1999年阿富汗鸦片年产量达到4 600吨，较去年增长了一倍。其中97%的鸦片种植位于塔利班控制区内。

9月20日，俄罗斯方面宣称，有不少来自阿富汗的各国伊斯兰圣战分子参与到达吉斯坦和车臣的战争中，其中有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

9月25日，塔利班军队朝着北方联盟首府塔罗干进军，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9月27日，联合国谴责外部势力对阿富汗内战的干预。塔利班重夺伊玛目-沙希卜。

9月29日，北方联盟和塔利班在塔罗干附近展开激战。交火中，北方联盟守军击落塔利班2架苏-22战斗机。

10月4日，三军情报部负责人访问坎大哈，希望塔利班引渡巴基斯坦籍恐怖分子。奥马尔表示配合态度。

10月12日，伊斯兰堡发动军事政变，谢里夫政府被推翻。

10月15日，美国国务院对塔利班实行部分禁运。

— 2000 —

1月16日，塔利班当局承认车臣分裂势力，后者在喀布尔开设大使馆。

1月18日，西班牙外交官弗朗塞斯克·旺德雷尔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

2月6日，一架执行阿富汗国内航线的阿丽亚娜公司班机遭到劫持飞往伦敦，劫机者要求政治避难。

3月27日，前赫拉特省省长伊斯梅尔·汗逃离位于坎大哈的塔利班监狱，顺利到达伊朗。

4月，阿富汗多地发生严重旱灾，塔利班当局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7月1日，塔利班开始夏季攻势。

7月10日，塔利班要求所有驻阿外国援助机构解雇旗下的阿富汗籍女雇员。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

7月28日，塔利班军队在阿富汗北部向马苏德武装发起进攻。

8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从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向中亚多



个地区发起攻击。奥马尔宣布禁止种植罂粟。

— 2001 —

1月8日，塔利班占领亚克朗，随后屠杀了210名当地平民。

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33号决议，宣布对塔利班实行武器等物资禁运。

2月26日，奥马尔下令炸毁巴米扬山谷中的两座大佛。

3月1日，联合国宣布，由于塔利班的反鸦片政策，阿富汗当年的鸦片产量实际上为零。

3月10日，巴米扬大佛被毁。

4月4日，马苏德出访欧洲多国。

4月16日，塔利班二号人物毛拉·穆罕默德·拉巴尼因癌症死于巴基斯坦。

5月22日，塔利班政权要求境内所有印度教徒佩戴黄色肩章，和穆斯林进行区分。

6月1日，塔利班开始夏季攻势。

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63号决议，宣布对塔利班进行制裁。

8月5日，塔利班以传播基督教为名逮捕了6名外国人和16名阿富汗公民，这些人都隶属于驻阿富汗的基督教救助机构。

9月9日，两名阿拉伯恐怖分子冒充记者，在阿富汗北部刺杀了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穆罕默德·法希姆接替马苏德的职位。

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美方就此对塔利班和本·拉登展开军事行动。

10月7日，美军开始对阿富汗进行轰炸。

11月9日，北方联盟占领马扎里沙里夫。

11月12日，北方联盟占领赫拉特。

11月13日，北方联盟占领喀布尔。塔利班政权退至坎大哈。

11月25日，北方联盟占领昆都士，上百名塔利班士兵投降。

11月26日，美军占领坎大哈机场。

11月27日，联合国促成的波恩会议开幕。

11月28日，被羁押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分子在马扎里沙里夫发动暴

动，600多人死于仇杀。

12月2日，各方达成《波恩共识》，同意组织临时政府。

12月7日，奥马尔逃离坎大哈，该地落入美军控制。

12月22日，临时政府在喀布尔宣誓成立，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政府主席。

12月30日，临时政府同意招揽4 500名国际安全保卫力量人员。

12月31日，美军轰炸导致加德兹附近100多名平民死亡。

— 2002 —

1月2日，来自15个国家的国际安全保卫力量抵达喀布尔，英国军队数量最多。

1月5日，塔利班和临时政府的谈判宣告破裂，奥马尔乘摩托车逃到坎大哈北部的巴格兰地区。

1月8日，3名塔利班政权的部长级人物向美军投降。

1月10日，美军将20名塔利班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转移至关塔那摩基地进行关押。

1月21日，东京会议开幕，与会各方承诺为阿富汗重建提供45亿美元资金。

1月29日，卡尔扎伊访问华盛顿并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会晤。

2月8日，卡尔扎伊首次访问巴基斯坦。

2月14日，临时政府航空和旅游部部长阿卜杜尔·拉赫曼在喀布尔机场遇刺身亡。

2月17日，塔吉克和乌兹别克裔军阀在阿富汗北部发生武装冲突。

2月24日，卡尔扎伊访问伊朗。

3月9日，卡尔扎伊倡议成立“真相委员会”。

4月18日，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回国，沙阿称自己此行并非为重夺王位。

5月1日，穆沙拉夫通过全民公决连任成功，未来5年将继续执政。批评者认为，此次全民公决违反宪法且有舞弊嫌疑。

6月11—19日，支尔格大会选举卡尔扎伊为临时总统。新总统随即宣布自己的内阁名单，这一届政府执政期至2004年为止。

7月6日，临时政府副总统哈吉·阿卜杜尔·卡迪尔在喀布尔遭枪击身亡。

9月5日，武装分子预谋在坎大哈对卡尔扎伊进行刺杀，行动未遂。坎



大哈省省长古尔·阿迦·舍尔扎伊在刺杀中受伤。

10月10日，巴基斯坦举行自1999年军事政变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教士联盟在毗邻阿富汗的两个省份获得胜利。同时，奥马尔穿越两国边境来到奎达。

— 2003 —

1月20日，塔利班和美军在坎大哈附近爆发战端。

3月20日，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英军等多国部队予以协助。

3月27日，国际红十字会雇员里卡多·门基亚被塔利班处决，门基亚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先前他连人带车遭到塔利班羁押。

5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卡尔扎伊一起出席媒体招待会，拉姆斯菲尔德称阿富汗局势正在从战争走向稳定。

6月9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投票通过伊斯兰教法。

8月11日，北约部队开始负责喀布尔的安全事务，这也是该组织第一次在欧洲以外执行任务。

12月14日，穆沙拉夫躲过一次暗杀，当时，他的车队经过的一处桥梁发生爆炸。同日，支尔格大会讨论通过新宪法。联合国禁毒署的年度报告称，当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3 600吨。

— 2004 —

3月，乌兹别克斯坦多个城市发生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47人死亡，伊斯兰圣战联盟对袭击表示负责。

3月31日，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确定阿富汗未来3年将获得82亿美元的援助款项。

3月16日，巴基斯坦边境部队介入南瓦济里斯坦冲突，损失惨重。预计的总伤亡数达到200人。

4月24日，巴基斯坦军方和瓦济里斯坦武装分子达成协议。

6月，巴基斯坦军方再次在巴阿边境对基地组织分子进行追击。

6月18日，南瓦济里斯坦武装分子头目内克·穆罕默德遭美军导弹袭击

身亡。

9月16日，卡尔扎伊的直升机在加德兹遭到火箭袭击，不过他再次逃过一劫，当时，卡尔扎伊的直升机正要在当地降落。

11月3日，卡尔扎伊赢得总统选举，他获得了55.4%的支持率，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73%。据联合国禁毒署预计，2004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4 200吨。

— 2005 —

2月，阿富汗遭遇10年来最严峻的冬季寒潮，数百人死亡。

5月，美军涉嫌虐待羁押中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囚犯，大量相关细节被披露出来。

5月13日，费尔干纳地区爆发群众示威，乌兹别克斯坦军方向人群开枪射击，造成近850人死亡，国际舆论普遍对乌方行为表示谴责。

6月1日，数名自杀性爆炸者伪装成警察对坎大哈一处清真寺发动袭击，造成20人死亡。

7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关闭了美军位于卡尔什-哈纳巴德的空军基地。

9月，阿富汗举行全国性议会和总统选举。

12月19日，阿富汗新议会开始运转。

12月，国际安全保卫力量接手阿富汗南部安全保卫工作。根据联合国禁毒署报告，当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约为4 100吨。

— 2006 —

1月，美军对巴阿边境巴方一侧一处村落发起导弹袭击。此次袭击意在消灭基地组织分子，不过却在巴基斯坦境内造成大量伤亡，死亡人数多达18人。

2月2日，伦敦，国际救助组织会议承诺将在未来5年为阿富汗重建事务提供100亿美元资金。

5月29日，喀布尔爆发反美示威，示威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此前，美



军军车碾压并杀害了多名阿富汗人。这也是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美游行事件。

5—6月，塔利班武装和政府军及其西方盟友在阿富汗南部的图拉斯提山脉附近展开争夺，造成大批平民死伤。

7月以后，北约部队接手阿富汗南部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政府军继续向着塔利班的根据地发起进攻。

8月3日，坎大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车冲向北约车队，造成21人死亡。

8月26日，巴基斯坦安全警察部队杀害了俾路支斯坦部族领袖纳瓦卜·阿克巴·布格提（Nawab Abkar Bugti），布格提声望极高，他的死引发了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

10月，北约部队接管阿富汗全境的安全事务，其司令部设在阿富汗东部，由一支美军领导的多国部队负责。

12月21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死于心脏病。

12月23日，塔利班武装前指挥官阿赫塔尔·尤斯曼尼在赫拉特的一次空袭中身亡。

2006年，塔利班一共关停了187所学校，约造成85名教师和600名警务人员死亡。当年，联合国禁毒署所统计的鸦片生产量为6 100吨。

— 2007 —

1月，美国国家情报局宣称数名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巴基斯坦藏身，巴方对此坚决否认。

1—6月，巴基斯坦国内形势持续紧张，政府和极端组织红色清真寺在伊斯兰堡展开对峙。

3月1日，巴三军情报局声称塔利班三号人物奥拜杜拉·阿罕德已经在奎达落网。

3月6日，北约和阿富汗政府军联合展开所谓的“阿喀琉斯行动”，这也是在阿富汗南方最大一次针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双方在赫尔曼德省展开激战。

3月20日，意大利驻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进行了一次秘密交易。意方用5名塔利班分子换来了被对方绑架的本国记者丹尼尔·马斯特罗贾科莫的性

命。不过，意大利记者的阿富汗籍司机和翻译都被斩首。

3—4月，官方声称，南瓦济里斯坦部族和外来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250人死亡。介入冲突的外来武装分子据说与基地组织有联系。

5月12日，塔利班资历最老的军事指挥官毛拉·达杜拉在和美军以及政府军的交战中身亡。阿巴两国爆发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边界冲突。

5月16日，白沙瓦爆发爆炸事件，24人死亡。

7月10日，经过一周的围困之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终于得以冲入红色清真寺。

7月19日，塔利班绑架了23名韩国籍基督教慈善组织工作人员。

7月23日，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去世。

8月27日，联合国报告认为，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历史新高。

8月28日，韩国政府承诺将终止在阿富汗的基督教传教行为。塔利班释放了被绑架的23位韩国人质中的19位。

9月29日，一辆隶属于阿富汗政府军的大巴车遭遇自杀性爆炸袭击，20人死亡。

10月6日，穆沙拉夫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不过，该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军队最高指挥官参加选举的合法性有待商榷，并据此拒绝承认宣布穆沙拉夫当选。

10月7日，塔利班进行了自2001年失去政权以后的第2次大规模死刑，15人被处决。

10月28日，亲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盘踞的北瓦济里斯坦发生大规模冲突。20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11月2日，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了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武装头目莫拉维·阿卜杜尔·马曼。

11月6日，阿富汗议会代表团在北部城市巴格兰遭遇自杀性袭击，41人死亡。

11月19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驳回了要求重新进行总统选举的提案。显然，这一次的法官们都是穆沙拉夫的亲信。

11月29日，穆沙拉夫辞去军职，开始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12月25日，两位欧盟和联合国特使因被控与塔利班勾结被迫离职。

12月，联邦部族自治区各部族举行会议，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式成立。



12月27日，贝·布托在拉瓦尔品第进行选举拉票活动时遇刺身亡。根据联合国禁毒署报告，当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8 200吨。

— 2008 —

1月，南瓦济里斯坦境内的武装冲突造成近90人死亡。

1月15日，喀布尔赛蕾娜酒店发生炸弹爆炸事件，6人死亡。

4月3日，北约各国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席间，各国都认为阿富汗和平进程事在急迫，并称愿意为此付出持久的努力和支持。

6月13日，塔利班策划了一次大型劫狱行动，坎大哈监狱中1 100多名在押犯人逃脱，其中400多名为塔利班分子。

6月16日，英国国防大臣戴斯·布朗称，英方将把该国驻阿部队的规模从230人扩张到8 000人以上，整个计划将在明年春天前完成。

6月19日，卡尔扎伊声称，如果巴基斯坦不能对武装分子采取有力措施，阿政府将派军进入巴境内作战。

7月7日，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50多人死亡。阿富汗官方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指为幕后黑手，巴方予以否认。

8月18日，穆沙拉夫辞去总统职务。

8月19日，塔利班发起的一次军事进攻致使10名法国士兵死亡。

8月22日，多国部队对赫拉特进行的空袭造成至少89名平民身亡。卡尔扎伊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

8月28日，美军和政府军向赫尔曼德省发起联合军事行动，剿灭了100名塔利班分子。

9月9日，布什宣布，美方将增调4 500名士兵前往阿富汗。

9月6日，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当选巴基斯坦总统。

10月16日，德国国会通过决议，该国武装力量的驻阿军事任务将延续至2009年，执行任务的兵力总数将增至1 000人。

11月17日，塔利班拒绝了卡尔扎伊的谈判建议，塔利班声称谈判只能在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情况下进行。

— 2009 —

1月20日，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2月3日，吉尔吉斯斯坦向美方下达限令，要求美军在6个月内撤出玛纳斯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军向阿富汗战场提供军需、调拨军力的重要地点。

2月18日，美军向阿富汗增派了1.7万名士兵。同时，近20个北约成员国也决定向阿富汗增派武装力量和援建人员。

2月22日，巴基斯坦政府同意该国西北部斯瓦特地区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决议。巴政府的这一行动主要是为了平息当地的武装冲突。

3月27日，奥巴马宣布美国将调整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相关政策。美方将向阿富汗派遣4 000名技术人员，帮助阿政府培训军警机关，促进阿富汗社会发展。

4月27日，卡尔扎伊称自己将参加于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同日，由于斯瓦特协定破裂，巴基斯坦政府向本国西北部地区发动新一轮进攻。

5月11日，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接替大卫·麦克基尔南出任驻阿美军司令。

5月23日，美阿军队在赫尔曼德省进行联合行动，抓捕了60名武装分子，并缴获100吨毒品。

7月1日，美军在赫尔曼德省南部向塔利班发起大规模进攻。4 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数万名阿富汗政府军参与了此次行动。

7月30日，塔利班呼吁阿富汗人抵制总统和地方选举。

8月20日，选举如期举行，但舞弊传言随之而来。同样，塔利班的袭击活动络绎不绝。

8月6日，据报道，塔利班巴基斯坦分支领导人巴伊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已在美军轰炸中身亡。

8月15日，北约驻喀布尔司令部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10月5日，塔利班新任领导人哈基姆拉·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主动约见记者，澄清自己已身亡的传言。同时他还宣称要就美军空袭以及巴伊图拉·梅赫苏德的死进行报复。

10月5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驻伊斯兰堡办事处遭爆炸袭击，4人遇难。

10月15日，武装分子连续对驻拉合尔的警察和情报人员发起袭击。



附录四

新时期的“大博弈”

表格一：1996年始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线

| 参与企业（国家） | 路线规划 | 计划细节 |
|--|--------------------|--------------------|
| 1. 安然（Enron）、美孚飞翼波塔斯（Wings Merrill BOTAS）、伽马库里斯（Gama Guris） | 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 | 途经里海海底，造价16亿美元 |
| 2. 优尼科（Unocal）、德尔塔石油（Delta Oil）、土库曼斯坦燃气公司（Turkmenrosgaz） | 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 | 全长937英里，造价25亿美元 |
| 3. 布里达斯（Bridas）、TAP石油 | 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 | 全长750英里，造价25亿美元 |
| 4. 皇家荷兰—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法国天然气公司（Gaz de France）、斯纳姆普罗格蒂公司（Snamprogetti）、图库马斯坦 | 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 | 全长1 875英里，造价20亿美元 |
| 5. 三菱公司（Mitsubishi）、埃克森公司（Exxon）、中国、土库曼斯坦 |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中国—日本 | 全长5 000英里，造价220亿美元 |
| 6. 中国、伊朗、土库曼斯坦 |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波斯湾 | 全长1 500英里，造价25亿美元 |
| 7. 全长120英里的天然气管线，连接伊朗—土库曼斯坦两国，1997年12月开建 | | |

1999年各大管线工程状况一览

- 1. 连接土库曼斯坦-土耳其之间的里海海底管线于1999年签约开建，承建方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和柏克德工程公司（Bechtel Group）。工程造价25亿美元。
 - 2. 中止
 - 3. 中止
 - 4. 延后
 - 5. 延后
 - 6. 延后
- 资料来源：阿赫迈德·拉希德

表格二：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产量一览

| 年份 | 亿米 ³ /年 | 万亿英尺 ³ /年 |
|------|--------------------|----------------------|
| 1989 | 896 | 3.20 |
| 1990 | 557 | 2.20 |
| 1994 | 206 | 0.73 |
| 1995 | 220 | 0.78 |
| 1996 | 260 | 0.91 |
| 1997 | 170 | 0.60 |
| 1998 | 136 | 0.48 |

资料来源：土库曼斯坦政府

表格三：阿富汗境内天然气管线大事一览

| | |
|-------------|--|
| 1992年 1月13日 | 布里达斯公司赢得土库曼斯坦东部亚什拉尔（Yashlar）地区的天然气开采权。天然气收益采取五五分账。 |
| 1993年 2月 | 布里达斯赢得土库曼斯坦西部克依米尔（Keimir）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权。所得收益采取八二分账。 |
| 3月 | 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访美。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受雇随行。除了为土库曼斯坦吸引美国投资，黑格的任务还包括劝说美国方面接受油气管可能途经伊朗的事实。 |
| 1994年 9月 | 布里达斯公司被禁止从克依米尔地区出口石油。 |
| 11月 | 土库曼斯坦方面组成专家工作组，研究天然气管线路线问题。工作组包括黑格和布里达斯公司人员。同一时期，塔利班攻占喀布尔。 |
| 1995年 1月 | 经过与克依米尔地区政府的谈判，布里达斯公司同意将本方收益降至65%，从而重新获得当地石油出口资格。 |
| 3月16日 | 尼亚佐夫总统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签署协议，双方同意布里达斯公司就阿富汗天然气管道工程进行前期可行性调研。 |
| 4月 | 土库曼斯坦和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初步建设180英里长的管线，并会在未来将管线延长至土耳其。 美国方面组成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参与的工作组，研判美国在里海沿岸地区的石油利益问题。并告知土库曼斯坦方面，美国政府对管线经过伊朗的反对态度。美国方面同时指出，未来的管道完全可以向西铺设。 应布里达斯公司邀请，土库曼斯坦官员访问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访问期间，他们首次接见了优尼科方面的代表。 |
| 6月 | 优尼科代表团访问阿什哈巴德和伊斯兰堡，向两国政府提出参加管道计划的要求。布里达斯方面向土库曼斯坦政府提交可行性报告。 |
| 8月 | 布里达斯公司在亚什拉尔地区进行油气勘探，并在坎大哈和塔利班方面进行了首次接触。布里达斯公司代表访问喀布尔、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三地。 |
| 10月21日 | 尼亚佐夫总统在纽约与优尼科/德尔塔公司就阿富汗天然气管线签署协议。 |
| 12月 | 土库曼斯坦政府再次禁止布里达斯公司从克依米尔地区出口石油。 |

-
- 1996年 2月 布里达斯公司和阿富汗政府签署协议，准备开工建设管线工程。同时，布里达斯公司就优尼科/德尔塔干预公司驻土库曼斯坦商业项目向休斯顿法院提出起诉。
- 3月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汤姆·西蒙斯（Tom Simmons）敦促贝·布托总理向优尼科方面提供专门权。贝·布托大为恼火，要求西蒙斯作出书面道歉。
- 4月 布里达斯公司以非法中止合同起诉土库曼斯坦政府。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宾·拉斐尔（Robin Raphel）访问喀布尔和坎大哈。
- 5月 伊朗开通了一条长100英里，连接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铁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4方达成协议，将授予工程的决定权交给土库曼斯坦方面。
- 8月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优尼科/德尔塔以及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天然气公司签署协议就管道建设达成共识。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宾·拉斐尔访问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在此期间，她多次强调优尼科管道工程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 9月 优尼科方面将管道工程明细合同呈交尼亚佐夫总统。优尼科方面宣称，若阿富汗各军事派别同意组成委员会对工程进行监督，公司将向他们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
- 9月27日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美国方面称本国将很快与阿富汗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 10月1日 优尼科一代表发表言论，对塔利班占领喀布尔表示支持，并认为此事有利于优尼科获得管道建设权。不久之后，优尼科方面再次发布声明，称该言论并非公司本意。
- 10月26日 尼亚佐夫总统和优尼科/德尔塔方面达成协议，将阿富汗管道的专门权赋予两家公司。
美国驻巴基斯坦前任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担任了优尼科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
- 11月 布里达斯公司和塔利班及杜斯图姆方面就管道建设签订协议。
- 12月9日 巴基斯坦外务秘书纳吉穆丁·谢赫（Najmuddin Sheikh）前往坎大哈，和塔利班方面就天然气管道问题展开会谈。
- 12月29日 伊朗、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土耳其将通过伊朗向土库曼斯坦购买天然气。
-



-
- 1997年 1月20日 土库曼斯坦与美孚公司及纪念碑公司（Monument）签署石油出口协议。
- 1月 美国商务部国际处的一纸临时协议赋予布里达斯公司从土库曼斯坦出口石油的权利。
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Yasushi Akashi）就管道工程问题对阿富汗各派军阀和各大石油公司进行了抨击。
- 2月 塔利班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争取美国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并与优尼科方面进行会谈。塔利班同时派员前往阿根廷，与布里达斯公司进行接触。回国途中，塔利班代表在沙特阿拉伯作了短暂停留，并在吉达（Jeddah）同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图尔基王子（Turki）进行会晤。
- 3月 优尼科在坎大哈设立办事处，并建立了旨在帮扶阿富汗当地人的职业训练中心。布里达斯公司驻喀布尔办事处同期开张，公司代表卡洛斯·布尔格罗尼（Carlos Bulgheroni）访问喀布尔、坎大哈两地。
- 4月8日 塔利班声称，将把工程交给率先开工建设的公司。优尼科总裁约翰·艾姆勒对塔利班的声明表示疑惑。同时，优尼科的亚洲新总部将在吉隆坡揭幕。
- 5月14日 阿什哈巴德ECO会议上，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优尼科三方达成协议，油气管道工程将于年内开建。
- 5月24日 塔利班进占马扎里沙里夫，不过4天后便败退而出、伤亡惨重。
- 6月4日 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优尼科/德尔塔3方在伊斯兰堡召开首次工作组会议。
- 6月8日 优尼科公司代表马尔蒂·米勒声称，除非阿富汗实现和平，否则管道工程的建设将在未来数年内没有任何结果。
- 6月9日 布里达斯公司代表卡洛斯·布尔格罗尼在喀布尔拜见了塔利班政府首脑，随后他声称：“无论安全形势如何，布里达斯将如期开始管线建设。”同时，布尔格罗尼还承诺将帮助阿富汗建设道路、复兴工业。布里达斯方面和塔利班就工程细节展开谈判。
- 7月22日 为促进土库曼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关方面组成双边贸易协会。优尼科公司被推选为协会首任主席企业。
- 7月23日 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优尼科公司签署新合同，将工程开工日期延长一年，至1998年12月为止。优尼科公司代表马尔蒂·米勒访问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两地，寻求阿富汗当地势力的支持。
- 7月27日 美国政府表示，不反对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油气管道途经伊朗。事后，美国方面称此举在于支持盟友，并无对伊朗开禁之意。
-

-
- 1997年 8月14日 壳牌公司总裁阿兰·帕斯利（Alan Parsley）和尼亚佐夫进行会面。壳牌方面承诺给土—土管线提供支持。
- 8月28日 塔利班宣称，布里达斯公司提供的建设方案优于优尼科方面，因此将很快与布里达斯方面签约。对此，优尼科方面表态不放弃。
- 9月1日 土库曼斯坦就里海沿岸特许权向各大石油公司发出招标邀请。同一天，57岁的尼亚佐夫在慕尼黑接受了心脏手术，一时间，关于土库曼斯坦总统的健康和继任的传言甚嚣尘上。
- 9月5日 布里达斯将该公司在拉丁美洲60%的股权售予阿莫科公司。自此，双方合并组成新公司，并进行联合经营。
- 9月12日 一支由5人组成的塔利班代表团访问阿根廷，就管道问题和布里达斯公司展开谈判。出访途中，代表团在白沙瓦遭巴基斯坦官方扣留达5天。
- 9月15日 巴基斯坦和优尼科方面签署一纸长达30年的天然气价格协议。巴基斯坦方面将以每千立方英尺2.05美元的价格，购买穆尔坦（Multan）的运输权。收益的15%将交给塔利班。对此，塔利班表示拒绝。
- 10月16日 巴基斯坦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在阿什哈巴德会见了尼亚佐夫总统，双方着重讨论了管道工程问题。
- 10月22日 塔利班代表团访问阿什哈巴德。在此期间，塔利班同意和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组成3方委员会，研判优尼科的工程提案。
- 10月25日 中亚天然气公司（Cent Gas）管道有限公司在阿什哈巴德成立。优尼科方面控股46.5%，德尔塔公司控股15%，土库曼斯坦政府控股7%，日本伊藤忠（Itochu）石油公司控股6.5%，印度尼西亚石油公司（Inpex）控股6.5%，韩国现代建设和工程集团（Hyundai）控股5%的股份。此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也将入股签约。马尔蒂·米勒声称，天然气运输费尚未确定，而中亚天然气公司将不会与塔利班签约。塔利班方面则称尚未决定和哪一家公司达成最终协议。
- 10月28日 塔利班代表团赴美访问。代表团在舒格尔兰（Sugarland）参观优尼科公司，其后又拜会了多位美国国务院官员。
- 12月 优尼科公司向内布拉斯加大学捐赠90万美元，以帮助后者在阿富汗开展技术培训项目。
- 12月29日 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开建120英里长的天然气管线，两国间的天然气年运输量达到0.3万亿立方英尺。
-

-
- 1998年 1月6日 设在巴黎的国际仲裁法庭作出对布里达斯公司有利的裁决，土库曼斯坦政府被裁定须停止对布里达斯方面介入克依米尔地区石油出口的阻挠。布里达斯公司随后获赠300万美元。
- 2月3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退出优尼科联盟，该公司所持有10%的股份被重新出售，优尼科公司所持股份因此达到56%。
- 3月3日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BHP）的资深专家组和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进行会面。伊朗—巴基斯坦之间的管线建设加速。
- 3月11日 优尼科代表马尔蒂·米勒在阿什哈巴德宣布，由于阿富汗持续内战，管道工程开工日期不能确定。工程所需的建设和资金难以在年内到位。土库曼斯坦方面坚持工程应立即动工。
- 3月30日 优尼科方面向巴基斯坦提出要求，将工程正式启动截止日期延后至1998年10月，因为原计划日期由于阿富汗内战而无法实施。
- 6月 优尼科年度会议上，一些股东以塔利班侵犯人权为名对公司的阿富汗管道工程表示反对。优尼科方面宣称，1995年来该公司已为阿富汗工程花费1000万~1500万美元，同时还向阿富汗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慈善基金。
- 8月21日 优尼科宣布管道工程停摆。美国政府用导弹袭击阿富汗以搜捕本·拉登，随后，优尼科工程人员撤出伊斯兰堡和坎大哈。
- 9月10日 某环境保护团体要求加利福尼亚地方检察官起诉优尼科公司，罪名是破坏环境和人权，以及和塔利班过从太密。优尼科方面则认为相关指责“荒谬”。
- 10月5日 设在福特·本德（Fort Bend）的得克萨斯地方法庭驳回布里达斯公司诉优尼科方面同时要求后者赔偿150亿美元的请求，并认为优尼科并未对布里达斯方面在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田开发行为进行阻挠。此次驳回完全遵循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法律，而非得克萨斯当地法律。
- 11月23日 优尼科宣布退出设在土库曼斯坦价值29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并从中撤资。该工程连接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两地。
- 12月4日 优尼科退出阿富汗管道工程投资方，理由是油价走低，而且面临本·拉登和美国女权组织的双重压力。优尼科公司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办事处宣布关闭。
- 12月22日 优尼科宣布，由于油价走低，该公司在1999年的财政支出计划将削减40%。
-

| | | |
|-------|--------|--|
| 1999年 | 1月24日 | 土库曼斯坦外交部长谢赫穆拉多夫 (Sheikhmuradov) 访问巴基斯坦, 并称管道工程将按计划推进。 |
| | 2月 | 卡洛斯·布尔格罗尼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和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
| | 3月3日 | 土库曼斯坦外长谢赫穆拉多夫赴坎大哈和阿富汗领导人奥马尔举行了首次会面, 双方就天然气管道问题进行交流。 |
| | 3月 | 英国石油公司 (BP) 占最大股份的阿塞拜疆北阿普什隆运营公司 (NAOC) 因油价低迷而停止营业。作为投资参与者, 优尼科公司和德尔塔公司一并退出该项目。 |
| | 4月29日 | 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利班3方在伊斯兰堡签署协议, 意图重启天然气管道工程。 |
| | 5月12日 | 塔利班代表团和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 前者将向后者购买天然气和电力。 |
| | 7—8月 | 阿富汗各派联合代表团访美, 成员包括塔利班人士及部分反塔利班势力代表。此次出行由内布拉斯加大学牵头, 并和美国政府共同出资主办。 |
| | 7月4日 | 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和塔利班政权的一切商业交易行为。 |
| | 10月9日 | 时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温蒂·张伯伦 (Wendy Chamberlain) 和巴基斯坦石油部长进行会面, 双方讨论了天然气管道问题。同时, 阿根廷陷入经济衰退。 |
| 2002年 | 2月8日 | 哈米德·卡尔扎伊同意重启经阿富汗运输天然气的管道工程。 |
| | 5月30日 | 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关方面在伊斯兰堡进行会谈, 最终达成关于管道工程的谅解备忘录。 |
| | 7月9日 | 伊朗官员侯赛因·阿迪力 (Hussein Adeli) 宣称, 伊朗方面已经组成专门委员会, 研究伊朗产天然气通过管道出口印巴地区和西欧的可行性。 |
| | 12月27日 | 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方就管道事宜达成新协议。 |
| 2003年 | 1月27日 | 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 (Khatami) 访问印度, 讨论印伊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问题, 不过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
| 2004年 | 9月24日 | 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 (Musharraf) 和印度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在纽约进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相关问题。 |
| | 10月29日 | 中国和伊朗举行谈判, 双方就中国国营石油公司收购伊朗亚达瓦兰 (Yadavaran) 油田51%股份的问题展开磋商。该项收购价值700亿到1 000亿美元。 |



| | |
|----------|---|
| 2005年 1月 | 亚洲石油会议在印度召开，各国石油部长齐聚新德里。会议议程包括对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讨论。 |
| 1月7日 | 印度方面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达成一项价值400亿美元的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于未来25年内每年向伊朗购买500万吨液化天然气。 |
| 1月18日 | 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将对经过阿富汗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展开可行性调查。该调查将于2006年开始。 |
| 3月19日 | 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布，美国反对伊朗—印度—巴基斯坦3方天然气管道建设，因为该项工程会助长伊朗的实力。 |
| 6月5—7日 | 印度代表团和巴基斯坦方面就伊—巴—印管道工程的参数细节进行讨论。经过阿富汗的管道工程也在讨论之列，双方同意将后一条管道延长至印度境内。 |
| 6月12日 | 伊朗宣称，考虑将伊—巴—印天然气管道延长至中国。 |

| | |
|-------|---|
| 2006年 | 因阿富汗安全形势，穿越阿富汗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作被迫延迟。 |
| 5月28日 | 经阿塞拜疆巴库到达土耳其杰伊汉（Ceyhan）的管道位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工程开工，使得这一管线绕开伊朗和俄罗斯领土。 |

| | |
|-------------|---------------------------------|
| 2008年 4月24日 | 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达成协议，3方将从土库曼斯坦购买天然气。 |
|-------------|---------------------------------|

附录五

●

专有名词表

Amir-ul Momineen: 一种伊斯兰头衔，意为“信徒的领袖”。

Baitul Mal: 一种伊斯兰慈善基金，由税款支撑。

Bara: 巴拉。巴基斯坦的走私品市场。

Basmachi: “中亚叛匪”。20世纪20年代反抗苏联统治的中亚各国游击武装。

Burkha: 布尔卡。一种从头到脚的女性罩袍。塔利班曾予以大力推广。

Dari: 达里语。波斯语在阿富汗境内的方言。

Fatwa: 法塔瓦。由高级教士“乌里玛”发布的伊斯兰法令。

Jihad: 圣战。穆斯林为了提升品行所作的努力和内心修炼，也指为捍卫和传播伊斯兰思想所进行的神圣战争。

Jirga: 支尔格。讨论协商政治和法律的部族集会，可以是部族长老之间的协商，也可以是全部族参与的大讨论。

Halal: 宰牲。伊斯兰的屠宰仪式，通过割断牲畜喉管致其血流尽而死。

Istakhbarat: 沙特阿拉伯情报机构。

Kafirs: 卡菲勒。意为“非穆斯林”或“异教徒”。

Khan: “可汗”或“汗”。普什图人常用姓名，过去只限于王族使用。

Lashkar: “拉什卡尔”。意为军队，普什图部落的传统武装力量。

Loya Jirga: 支尔格大会。由各部族领袖、教士和其他代表人物参加。大会选举产生新国王，同时也是国家的立法机构。

Madrasa: 伊斯兰学校或宗教学校。以教授宗教内容为主的学校。

Malik: 马利克。普什图部族中的贵族封号，常用于指称部族或氏族领袖。

Mehram: “血亲”。根据严厉的伊斯兰教法，所谓“血亲”是指和某一女子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其职责在于作为该女子外出旅途中的监护人。

Mujaheddin: 意为“圣战”或“参加圣战的战士”。

Mullah: 毛拉。某一地区清真寺负责带领信众进行祈祷的宗教人士，又称“阿訇”。

Munafaqeen: 指代“不虔诚”的穆斯林。

Nan: 馕。一种烤饼，阿富汗各族人民的主食。

Pashtunwali: 普什图部族体制。常常和伊斯兰教法发生冲突。

Pir: 苏菲派领袖荣誉称号。

Qazi: 卡兹。伊斯兰教法下的法官。

Ramadan: 斋月。

Registan: 意为“沙漠地区”。

Serai: 色拉伊。丝绸之路上的驿站。

Shalwar kameez: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行的一种灯笼裤，男女皆宜。

Shura: 舒拉。伊斯兰议会。

Sharia: 沙里亚。意为“伊斯兰教法”。

Sufism: 伊斯兰教的一派，崇尚神秘。

Tor: 高质量的鸦片。

Ulema: “乌里玛”，又作“高级教士”。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士”一词复数形式的拉丁文转写形式，单数形式为“alim”。

Ummah: 乌玛。意指“穆斯林世界”，即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总和。

Zakat: 天课。一种伊斯兰税，用于补贴穷人。以个人收入的2.5%进行征收。

注 释

- 【1】 摘自塞缪尔·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新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由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 【2】 摘自安东尼·维里耶著《荣赫鹏和大博弈》,由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
- 【3】 摘自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由纽约戴尔出版社在1961年出版。
- 【4】 摘自《巴布尔传》一书,原书由拉合尔桑吉米尔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该段摘录引自奈特·比夫里奇所译的英文本。
- 【5】 摘自克里斯丁·诺埃尔所著《十九世纪阿富汗的国家和部落》,由伦敦寇松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 【6】 摘自巴内特·鲁宾所撰《阿富汗:被遗忘的危机》一文,原载于《难民研究》季刊第15期第2号,联合国难民署1996年出版。
- 【7】 美国援助阿富汗的物资数额具体如下:1979年3 000万美元,1983年上升至8 000万美元,1985年2亿5 000万美元,1986年4亿7 000万美元,1987年6亿3 000万美元。美国援助一直持续到1992年圣战组织攻克喀布尔。1986—1989年期间,圣战组织所收到的援助总额每年超过10亿美元。数据摘自巴内特·鲁宾所撰《阿富汗:被遗忘的危机》一文,原载于《难民研究》季刊十五期第二号,联合国难民署1996年出版。
- 【8】 摘自笔者在1995、1996和1997三年间对哈桑的多次采访记录。
- 【9】 摘自南希·哈奇·杜普里所撰《有关阿富汗的历史导读》一书,喀布尔阿富汗旅游组织出版社1970年出版。
- 【10】 摘自笔者在1996和1997两年间对高斯的多次采访记录。



- 【11】 摘自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所撰《塔利班宣称拉巴尼政权破坏联合国和平进程》一文，见于《新闻报》1995年2月2日刊。
- 【12】 通过数年间对多位塔利班领导人的寻访，笔者终于对奥马尔其人有了基本了解。同时，这要感谢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的辛勤工作，他是当时唯一一名采访过奥马尔的记者。
- 【13】 摘自苏珊·哥德伯格所撰《塔利班崛起之地也就是确定性终结之处》一文，见于《卫报》1998年10月13日号。
- 【14】 摘自约翰·伯恩斯和史蒂夫·莱文所撰《阿富汗的暴君如何控制人民》一文，见《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1日号。
- 【15】 摘自《晨曦报》1994年11月4日号。
- 【16】 美、英、西、意、中、韩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都参与了此次阿富汗之行。此外，代表团中还有联合国人员的身影。
- 【17】 摘自笔者1995年4月在奎达和数名巴基斯坦政府高官和走私分子的采访记录。
- 【18】 摘自安东尼·戴维斯所撰《塔利班如何成为武装力量》一文，原刊于威廉·马利所辑《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和塔利班》一书，由伦敦赫斯特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戴维斯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对塔利班占领斯平布尔达克和坎大哈两地军事行动的最详尽记录。
- 【19】 摘自笔者1995年在坎大哈和巴基斯坦情报官员的谈话记录。
- 【20】 摘自《穆斯林报》1994年11月17日号。
- 【21】 摘自《民族报》1995年2月18日号。
- 【22】 摘自《晨曦报》1995年3月18日号。
- 【23】 摘自德斯蒙德·舍瓦尔德所著《战争的僧侣和军事宗教秩序》一书，由伦敦企鹅图书公司在1972年出版。
- 【24】 摘自笔者1995年3月在坎大哈对塔利班士兵的采访记录。
- 【25】 摘自拉德克·西科尔斯基所著《圣徒的尘埃》一书，由伦敦查托和温都斯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
- 【26】 摘自罗伯特·拜伦所著《去奥克夏纳的路上》一书，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在1937年出版。
- 【27】 拜伦对叫拜楼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他如此形容这一眼：“相片和言语都无法形容和表达那葡萄一般蓝幽幽的颜色，它简直就是一朵绽开的蓝色花朵。精密繁复的结构使它幽深而富有光彩。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柱子撑起了六层塔楼。

石柱上镶嵌着各种巴洛克式的库菲克，那上面有黄、有白、有橄榄绿，还有铁锈一般的红。蓝色的尖顶上，藤蔓、花朵和经文交织出迷宫一般的图案，看起来就像茶杯一样精致。”（摘自《去奥克夏纳的路上》，罗伯特·拜伦著）

- 【28】 摘自南希·哈奇·杜普里所著《有关阿富汗的历史导读》一书，由喀布尔阿富汗旅游组织出版社在1970年出版。
- 【29】 摘自笔者1993年9月采访伊斯梅尔·汗的记录。
- 【30】 摘自笔者1995年5月在坎大哈采访瓦基尔·艾哈迈德的记录。
- 【31】 摘自南希·哈奇·杜普里所著《有关阿富汗的历史导读》一书，由喀布尔阿富汗旅游组织出版社在1970年出版。
- 【32】 摘自笔者1996年2月2日在伊斯兰堡对马哈茂德·梅斯蒂里的采访记录。同一段文字见于笔者所撰新闻报道《梅斯蒂里认为马苏德武装即将发起攻势》，载于《民族报》1996年2月4日号。
- 【33】 援引自法新社1996年3月报道《教士协会呼吁对拉巴尼发动圣战》。
- 【34】 摘自笔者1996年3月对瓦基尔·艾哈迈德的采访记录。
- 【35】 摘自笔者1996年2月在伊斯兰堡对一些巴基斯坦外交人员和情报官员的采访记录。
- 【36】 摘自《民族报》援引法新社1996年4月3日报道《塔利班同意举行谈判》。
- 【37】 摘自笔者1995年2月在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外交官的采访记录。同一段文字见于笔者所撰《阿富汗：代理人战争今又现》一文，见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1996年3月出版《今日世界》。
- 【38】 摘自《民族报》援引法新社1996年4月8日报道《美参议员汉克·布朗在喀布尔会晤马苏德》。本书第13章详述了美国在塔利班崛起中扮演的角色。
- 【39】 摘自《民族报》援引法新社1996年4月20日巴格拉姆电《拉斐尔称美在阿富汗利益日增》。
- 【40】 摘自笔者1996年4月18日在伊斯兰堡对罗宾·拉斐尔的采访记录。
- 【41】 摘自《民族报》援引美联社1996年5月11日电《美国希望阿富汗和平稳定》。拉斐尔在位于华盛顿的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公布了美国最新的对阿政策。
- 【42】 摘自笔者1996年8月在喀布尔对拉巴尼的采访记录。
- 【43】 摘自《民族报》援引法新社1996年7月31日报道《塔利班发动火箭袭击，遭霍尔痛斥》。
- 【44】 摘自笔者对数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士的采访记录。同见于巴内特·鲁宾撰文



《阿富汗：被遗忘的危机》，原载《难民研究》季刊第十五期第二号，联合国难民署1996年版。

- 【45】 摘自安东尼·戴维斯所撰《塔利班如何成为武装力量》一文，原载于威廉·马利所辑《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和塔利班》一书，伦敦赫斯特出版社1998年出版。
- 【46】 相关数据和记录来自笔者1996—1997年对联合国人士和马苏德的采访记录。当时有报道指出，纳吉布拉是自愿离开联合国营地的，并一度希望利用普什图人的同胞之谊和塔利班进行谈判。
- 【47】 摘自贝哈罗兹·汗所撰《塔利班指挥官承认下令处死纳吉布拉》一文，原载于《新闻报》1998年2月16日号拉扎克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下令处死了纳吉布拉。他称：“纳吉布拉是杀害成千上万名阿富汗人的凶手，因此，我们要求士兵处死他。”1996年，拉扎克被奥马尔任命为军队指挥官，负责对喀布尔的占领行动。1997年5月，拉扎克在马扎里沙里夫被杜斯塔姆武装俘虏，但在不久后获释。
- 【48】 摘自约翰·伯恩斯所撰《一位阿富汗领导人的自述：加糖的茶和苛刻手段》一文，原载于《纽约时报》1996年11月24日号。
- 【49】 摘自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所撰《无人所知的领袖》一文，原载于《新闻报》1997年3月30日号。
- 【50】 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向笔者透露，巴方向杜斯塔姆提供了1 000万美元，诱使他和塔利班结盟。伊朗也向乌兹别克军阀提供了相同数额的金钱，不过目的正好相反。
- 【51】 摘自史蒂夫·莱文所撰《敌人的敌人》一文，原载于《新闻周刊》1996年10月21日刊。
- 【52】 杜斯塔姆曾征召马利克前往巴格迪斯前线，不过马利克拒绝从命，理由是杜斯塔姆对自己存有杀心。1997年5月19日，巴基斯坦军界的一名资深人物向笔者指出：“这次事件是马利克叛变的起因。”
- 【53】 1997年5月25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古哈尔·阿尤布发表声明，宣布将承认塔利班政权。同时，巴方还声称，由于塔利班同意组成联合政府，阿富汗危机已经得到解决。阿尤布认为：“我们感觉到，阿富汗新政府已经拥有所有条件，可以得到合法政府的地位。目前，他们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并成为了该国所有民族的共同代表。”声明发表几小时后，塔利班被迫撤出马扎里沙里夫。

- 【54】 塔利班拘捕了伊斯梅尔·汗及其随从700多人。当时，伊斯梅尔·汗应马利克之邀前往后者驻地赴宴，不料却落入塔利班的圈套。这可不是阿富汗人的待客之道。关于这次诱捕事件，详见笔者1997年7月14日为《民族报》所作的报道《阿富汗反对派捕获550名巴基斯坦学生》。
- 【55】 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驻喀布尔官员曾在采访中透露，1997年7月，马利克武装在迈马纳羁押了1 000名塔利班分子，在希比尔干羁押了1 000名塔利班分子，另有800人被关押在马扎里沙里夫。同时，还有600~700名塔利班分子处于马苏德武装控制之下，在潘杰希尔过着铁窗生活。另外，纳德利将军的伊斯玛仪派武装和哈扎拉人的伊斯兰团结党手中各有100名塔利班战俘。联合国还指出，马利克武装在马扎里沙里夫扣押了200名巴基斯坦籍武装分子，另有225名巴基斯坦人被羁押在马扎里沙里夫。而马苏德的手中则有100名巴基斯坦战俘，全数关押在潘杰希尔。哈里里武装也关押了近50名巴基斯坦人。
- 【56】 摘自笔者1997年7月12日在喀布尔对哈卡尼的采访记录。
- 【57】 摘自笔者1997年7月15日在喀布尔对阿巴斯的采访记录。
- 【58】 摘自笔者1997年5日在伊斯兰堡同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界人士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高度争议性：阿富汗战事再起，引中亚各国警惕》一文，发表于1997年6月12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
- 【59】 摘自笔者1997年7月12日在喀布尔对哈扎尼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阿富汗军阀面临严重内部分歧》，发表于1997年7月16日出版的《民族报》。
- 【60】 参见格雷琴·彼德斯所撰《阿富汗屠杀引发种族冲突升级的忧虑》一文，美联社1998年2月15日报道。
- 【61】 摘自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所撰《杜斯塔姆发掘出大量埋尸坑》一文，原载于《新闻报》1997年11月16日号。
- 【62】 法新社1997年12月16日电《塔利班屠杀埋尸地点在阿富汗被发掘》。
- 【63】 摘自格雷琴·彼德斯所撰《阿富汗屠杀引发种族冲突升级的忧虑》一文，美联社1998年2月15日报道。
- 【64】 摘自诺尔伯特·霍尔1997年10月18日在伊斯兰堡召开的媒体招待会。
- 【65】 参见各大通讯社报道。同参见笔者所撰《塔利班在医院扣押伯尼诺》一文，原载于《每日电讯报》1997年9月30日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里斯蒂娅·阿曼普尔也在被扣留人员之列。
- 【66】 早在7月，塔利班领导人就此问题向笔者进行过暗示。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士协会



的两巨头毛拉纳·法兹鲁尔·拉赫曼和萨米乌尔·哈克都对塔利班表示支持。两人将联合国驻阿机构称为反伊斯兰的间谍窝子，要求奥马尔对其进行驱逐。

- 【67】 与会的6个邻国为巴基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
- 【68】 法新社1997年11月9日电《联合国方面负责人指责外部势力煽动阿富汗冲突》。
- 【69】 摘自1997年11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原题为《阿富汗状况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 【70】 摘自赛义德·艾斯卡尔·穆萨维所著《阿富汗哈扎拉人研究：从历史、文化、经济和政府视角出发》一书，由伦敦寇松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哈扎拉民族在阿富汗以外少有人知，穆萨维的大作也是近来唯一以哈扎拉人为主角的专业书籍。
- 【71】 笔者在哈扎腊贾特逗留期间，有幸获得拉西博士赠诗数首。诗歌由达里语写成，联合国方面人士代为翻译，对此不胜感激。
- 【72】 摘自笔者1997年4月8日对拉赫达尔·布拉希米的采访记录。
- 【73】 摘自芭芭拉·克罗赛特所撰《阿富汗限制援助人员行动引联合国不满》一文，原载于《纽约时报》1998年7月14日号。
- 【74】 援引自法新社1998年7月16日电，《塔利班无视撤援警告》。
- 【75】 摘自笔者1998年3月对巴基斯坦官员和外交人士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阿富汗各派接受大批武器援助》，原载于《民族报》1998年3月13日号。
- 【76】 摘自迈克尔·温切斯特所撰《阿富汗的民族清洗》一文，原载于《亚洲周刊》1998年11月6日刊。
- 【77】 摘自笔者在巴基斯坦同阿富汗难民的访谈记录。采访由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同时，难民署还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了专门报告。
- 【78】 “宰牲”是伊斯兰教屠宰牲畜获取肉食的仪式，主要通过割断牲畜喉咙，致其血流尽而亡。
- 【79】 摘自1998年11月人权观察报告，原题为《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的屠杀》。
- 【80】 摘自1998年11月人权观察报告，原题为《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的屠杀》。
- 【81】 摘自1998年11月人权观察报告，原题为《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的屠杀》。
- 【82】 摘自笔者1998年8月在阿什哈巴德和伊斯兰堡同伊朗、土库曼和巴基斯坦三国外交人士及巴方情报官员的访谈记录。
- 【83】 信息来自一位曾与坎大哈监狱囚徒有过接触的官员。
- 【84】 路透社1998年8月21日电《塔利班因轰炸指责克林顿讹诈》。

- 【85】 信息来自巴米扬某消息人士。
- 【86】 摘自联合国安理会1998年12月8日报告。
- 【87】 摘自诺拉·伯斯塔尼所撰《和平使者很忙》一文，原载于《华盛顿邮报》1998年1月10日号。
- 【88】 摘自联合国安理会1998年12月9日的相关报告。
- 【89】 9世纪伊斯兰法的四个学派分别是：哈纳斐派、马利基派、苏菲派和汉巴里派。其中，哈纳斐派主要基于惯例进行判罚，是四大派别之中最为简单易行的一派。
- 【90】 宗教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研读古兰经、释义古兰经、伊斯兰法学、伊斯兰法律、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及言论、普及安拉的言论、伊斯兰哲学、阿拉伯语和数学。
- 【91】 摘自拉尔夫·马格纽斯和艾登·纳比所著《阿富汗，毛拉、马克思和圣战》一书，由印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两位作者看待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发展史的视点十分独特，笔者深表欣赏。
- 【92】 摘自伊本·巴图塔所著《1325—1254，亚非游记》一书，由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和凯根·保罗出版社在1983出版。同见笔者所撰《苏菲派的复兴》一文，原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2年12月17日刊。
- 【93】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著《阿富汗，从圣战到内战》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
- 【94】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著《伊斯兰政治制度的败局》一书，由伦敦I.B.塔乌里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
- 【95】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著《伊斯兰政治制度的败局》一书，由伦敦I.B.塔乌里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
- 【96】 摘自塞缪尔·P.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新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由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 【97】 摘自芭芭拉·麦特卡尔夫所著《1860—1900年间伊斯兰教在英属印度的复兴》一书，由伊斯兰堡皇家书籍公司在1982年出版。
- 【98】 摘自芭芭拉·麦特卡尔夫所著《1860—1900年间伊斯兰教在英属印度的复兴》一书，由伊斯兰堡皇家书籍公司在1982年出版。
- 【99】 摘自阿斯塔·奥尔森所著《阿富汗的伊斯兰和政治》一书，由伦敦寇松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此书是关于伊斯兰和阿富汗之间历史关系的最佳著作。



- 【100】 摘自赛义德·沙夫卡特所著《贝托父女执政时期的巴基斯坦军方和文人政府的关系》一书，由美国西部观点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 【101】 摘自1992年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向谢里夫内阁呈递的报告。
- 【102】 伊斯兰教士会议在巴基斯坦国会和俾路支斯坦省议会中一直处于少数派。1988年，教士协会在俾路支斯坦省省议会中仅仅赢得10席。两年后，他们也只夺取了6把交椅。1993年更是只有3位教士会议成员进入省议会。1997年，虽然塔利班分子鼎力助选，教士协会也只有7人出现在省议会里。国会的情况也不乐观。1988年赢得两个席位，其后的1990、1993和1997年都只有两席。
- 【103】 包括内政部长海尔瓦、卫生部长阿巴斯、信息部长穆塔基、工业部长艾哈迈德·詹、前线事务部长哈卡尼、宗教警察总管卡拉穆丁、农业部长曼苏尔和财政部助理部长阿里夫，详细名单参见附录。
- 【104】 摘自笔者1999年2月对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的采访记录。
- 【105】 摘自《先驱》杂志1997年12月刊所载《比诺里宗教学校》一文。
- 【106】 由于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将其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名单，该组织因而更名为“圣战组织”（Harkut ulMujaheddin）。
- 【107】 摘自拉德克·西科尔斯基所著《圣人的尘埃》一书，由伦敦查托和温都斯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该书对军官们的聚会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记录。
- 【108】 参见拉尔夫·马格纽斯和艾登·纳比合著的《阿富汗，毛拉、马克思和圣战组织》一书，印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两位作者向笔者提供了关于各派圣战组织领导者的详尽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 【109】 阿富汗的行政区划大致如下：全国被分为31个省（wilayat），由省长（wali）负责管辖；每个省下辖数个县（uluswali）和村（alaqdari）；喀布尔市下属数个区（kart），以及最小的行政单位街道（nahia）。
- 【110】 每次到喀布尔采访，笔者都要向各位部长请教他们对于塔利班政权未来的看法。部长们的看法非常一致，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想过。
- 【111】 摘自《阿尔-马贾拉报》（Al Majallah，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阿拉伯语报纸）1996年10月23日号对笔者的访谈记录。
- 【112】 摘自编辑人员1997年3月在坎大哈同笔者的谈话记录。
- 【113】 摘自《民族报》1998年1月10日所载文章《四人在反塔利班暴动中死亡》。
- 【114】 摘自笔者1998年2月在伊斯兰堡对某些国际救援人员的采访记录。这些人员都曾在坎大哈工作，并和农村地区的各位长老有接触。

- 【115】 摘自笔者同坎大哈监狱中囚犯的访谈记录。
- 【116】 援引自法新社1998年10月23日电《塔利班逮捕数十名政变策划者》。
- 【117】 摘自巴内特·鲁宾所著《阿富汗的分裂、国家组成和国际系统的崩溃》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
- 【118】 摘自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著《文明史纲》一书，伦敦企鹅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
- 【119】 摘自笔者1997年6月对马乌尔扎达的访谈记录。
- 【120】 摘自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作的国家发展观察报告。
- 【121】 摘自1996年10月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委员会声明。
- 【122】 摘自1998年12月11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作声明。
- 【123】 摘自巴内特·鲁宾所著《阿富汗的分裂：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建设和崩溃》一书。
- 【124】 摘自大赦国际1999年所作的名为《战火中：战争和儿童的人权》的报告。
- 【125】 摘自安德斯·方格所撰《困难和机遇：阿富汗援助所面临的挑战》一文。这篇文章是1999年2月24日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专题报告。
- 【126】 摘自西米·瓦里1997年10月30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党团所作名为《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的报告。瓦里是救援组织“妇女难民发展会”的负责人。
- 【127】 摘自笔者1997年6月对马乌尔扎达的访谈记录。
- 【128】 1995年11月1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官方公告。次年3月8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发布名为《救救孩子》的公告。
- 【129】 摘自1998年6月采访记录。
- 【130】 摘自南希·哈奇·杜普里撰文《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妇女》，收录于威廉·马利所辑《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和塔利班》一书，伦敦C.赫斯特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塔利班性别政策的来龙去脉，堪称同类作品中的翘楚。
- 【131】 摘自卡尔拉·保尔所撰《迷城》一文，载于《新闻周刊》1998年7月13日刊。这篇文章内容凄美、感情真挚，打动了美国的女权主义团体。
- 【132】 摘自1996年10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所发表的声明。
- 【133】 参见法新社1998年2月28日电《塔利班治下一鸡奸犯逃过一死》。
- 【134】 摘自约翰·伯恩斯所撰《甜茶和苛政，且看一位阿富汗军阀的自白》一文，载于《纽约时报》1996年11月24日号。
- 【135】 参见美联社1996年12月18日电《塔利班禁止音乐》。
- 【136】 参见路透社1996年10月4日电《伊朗领导人指责塔利班玷污伊斯兰》。



- 【137】 笔者在伊斯兰堡的采访工作得到了联合国毒品控制计划署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鸦片增长过程的相关资料。笔者对此表示感谢。
- 【138】 摘自笔者1997年5月在坎大哈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毒染异教徒》一文。原文刊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5月刊。
- 【139】 摘自笔者1997年5月在坎大哈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毒染异教徒》一文。原文刊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5月刊。
- 【140】 摘自劳伦斯·利夫舒尔茨所撰《巴基斯坦：海洛因帝国》一文。该段文字也被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和阿兰·布洛克合著的《缉毒战争，美国毒品政策败因探究》一书引用，由美国西部观点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
- 【141】 摘自巴内特·鲁宾所著《阿富汗的分裂、国家组成和国际系统的崩溃》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
- 【142】 摘自劳伦斯·利夫舒尔茨所撰《巴基斯坦：海洛因帝国》一文。该段文字也被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和阿兰·布洛克合著的《缉毒战争，美国毒品政策败因探究》一书引用，由西部观点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
- 【143】 摘自笔者撰文《危险联系》，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8年4月16日刊。
- 【144】 摘自笔者1998年3月对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署和美国禁毒署官员的采访记录。
- 【145】 摘自笔者1998年3月在德黑兰对伊朗官员的采访记录。参见笔者所撰《危险联系》一文。
- 【146】 摘自1999年3月在巴黎召开的毒品地缘政治观察会议得出的报告《土库曼斯坦毒品问题报告》。
- 【147】 摘自笔者199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对阿卡耶夫总统的采访记录。
- 【148】 摘自笔者1998年5月在伊斯兰堡对大使先生的采访记录。
- 【149】 摘自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署1998年10月25日的报告。
- 【150】 摘自笔者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对阿拉基的采访记录。
- 【151】 摘自笔者1997年5月在喀布尔对阿里夫的采访记录。
- 【152】 摘自笔者1997年5月在喀布尔对詹的采访记录。
- 【153】 数据来自联合国阿富汗扫雷办公室。数年以来，联合国和各大非政府组织都坚持认为阿富汗境内的地雷总数超过1 000万。1997年，有关人士都改口认为过去的的数据过于浮夸。按当时的扫雷水平，1 000万枚地雷需要花上5 000年才能清除完毕。目前，相关人员正在对阿富汗的地雷情况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一切资金由世界银行负责。据估计，阿富汗境内仍有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密布着地

雷。1992—1999年期间的扫雷行动只照顾到了其中19%的地区（大多位于主要城市）。

【154】 摘自笔者1997年6月在伊斯兰堡对赛斯特里的采访记录。

【155】 摘自笔者对齐亚政权时期内阁阁员的采访记录。

【156】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著《阿富汗，从圣战到内战》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

【157】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著《阿富汗，从圣战到内战》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

【158】 摘自塞缪尔·P.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新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由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159】 摘自笔者在1992、1993和1999年在沙特阿拉伯和伦敦同本·拉登亲友的采访记录。

【160】 参见法新社1998年8月27日电《拉登曾于1995年策划全球性伊斯兰革命》。

【161】 摘自哈尼姆·叶海亚撰文《马苏德专访》，载于*Al-Ahram* 1997年8月19日号。

【162】 摘自卡罗尔·贾科莫撰文《美国将沙特商人列为极端主义资助者》，载于《华盛顿邮报》1996年8月14日号。

【163】 援引自法新社1997年2月18日电《埃及方面怀疑本·拉登培训新一代伊斯兰极端分子》。

【164】 摘自迪利普·希罗所撰《伊斯兰武装分子，一直受美支持，如今反戈一击》一文，载于纽约《民族报》1999年2月15日号。

【165】 摘自《时代》周刊1999年11月所载文章《专访本·拉登》。

【166】 摘自《时代》周刊1998年12月21日所载文章《抓捕奥萨马》。

【167】 摘自《新闻周刊》1999年3月1日所载文章《制造恐怖的符号》。在文章中，多名美国消息人士提供证言认为本·拉登并非和所有的恐怖活动有联系。

【168】 摘自笔者1992—1993年间在伊斯兰堡对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外交官和政界人士的采访记录。

【169】 摘自《环球情报最新讯息》1999年1月27日所载文章《孟加拉国运动彰显新式泛伊斯兰认同》。

【170】 摘自《环球情报最新讯息》1999年1月13日所载文章《疑似本·拉登党徒过境马来西亚》。

【171】 摘自蒂姆·雷德所撰《也门人质事件是对伊拉克轰炸的报复》，原载《每日电讯报》1999年1月3日号。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也门恐怖分子拥有包括笔记本



电脑在内的通讯设备，并直接与本·拉登有联系。

【172】援引自法新社1999年2月19日电《本·拉登或将袭击孟加拉国》。

【173】参见法新社1999年3月5日报道《毛利塔尼亚抓获疑似本·拉登支持者》。

【174】参见法新社1999年2月15日报道《本·拉登支持埃及圣战组织》。

【175】参见法新社1999年2月21日报道《克什米尔武装分子指出本·拉登下达命令》。
巴基斯坦外交官对于在克什米尔活动的瓦哈比主义分子愈加关注。参见笔者1999年3月在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外交官的采访记录。

【176】摘自《时代》周刊1999年11月所载文章《专访本·拉登》。

【177】摘自笔者1998年12月一次年3月期间在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政界资深人士的采访记录。参见蒂姆·麦基克所撰《荣耀的客人》，载于《时代》周刊1999年8月31日刊。

【178】摘自《时代》周刊1999年11月所载文章《专访本·拉登》。

【179】摘自笔者1999年1月在伊斯兰堡对美国外交界资深人士的采访记录。

【180】摘自笔者1991年12月在阿什哈巴德对尼亚佐夫的采访记录。

【181】摘自美国能源部1997年10月发布的调研文章《里海沿岸地区》。

【182】摘自笔者所撰《新的大博弈——争夺中亚石油》一文，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4月10日刊。

【183】摘自笔者所著《中亚的复兴，伊斯兰还是民族主义》一书，由伦敦泽德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

【184】摘自安东尼·维里耶所著《荣赫鹏和大博弈》一书，由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

【185】摘自巴内特·鲁宾所撰《俄罗斯和外围国家的崩溃——论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起因和结果》一文。原文收录于巴内特·鲁宾和杰克·辛德尔合著的《后苏联时代的政治秩序、冲突和国家建设》一书中，由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186】摘自巴内特·鲁宾所撰《俄罗斯和外围国家的崩溃——论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起因和结果》一文。原文收录于巴内特·鲁宾和杰克·辛德尔合著的《后苏联时代的政治秩序、冲突和国家建设》一书中，由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187】1989年，土库曼斯坦的失业率达到18.8%。当年该国的婴儿死亡率为5.4%，在某些边远的沙漠地区，这一数字更是高达11%，相当于西欧的10倍。童工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医疗系统的疏失，土库曼斯坦62%的人都忍受着肝病的折磨。其中，四分之一的医院缺乏自来水，或者电力供应十分欠缺。有关情况参见笔者

所著的《中亚的复兴，伊斯兰还是民族主义？》一书。

- 【188】 摘自笔者1991年12月在阿什哈巴德对库利耶夫进行的访谈记录。
- 【189】 在前三年（1998—2000年），该管线所运输天然气的58%将作为管线建设费支付给伊朗方面，折合现金约1.9亿美元。科佩泽气田所出口的天然气在1998年底达到每年20亿立方米，而在2000年预计将提高到每年80亿立方米。
- 【190】 PSG国际投资集团是企业联合体的领头雁，这是一家由美国柏克德集团和联合电气资本结构金融集团共同组建的公司。
- 【191】 当时，日本三菱公司和美国埃克森公司已经准备开始可行性研究。
- 【192】 摘自詹姆斯·珀蒂费尔所著《土耳其迷宫——凯末尔和新伊斯兰主义》，由企鵝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 【193】 摘自石油金融公司1998年5月在华盛顿所作的名为《巴库-杰伊汉管线》的报告。
- 【194】 腾吉斯-谢夫隆石油工程是苏联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投资。谢夫隆、美孚和阿尔科公司都参与其中。美国公司通过和俄罗斯卢科伊斯公司合资组成的卢克-阿尔科公司获取了72%的股权。1993年9月，各方正式签署《腾吉斯-谢夫隆工程产量分成合同》。
- 【195】 在阿塞拜疆国际运行公司中，美方占有40%的股权，由阿美拉大-赫斯、埃克森、潘佐尔石油和优尼科四家公司分享。其余参股者还有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伊藤忠、德尔塔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和土耳其石油公司。
- 【196】 在沙特阿拉伯，每桶石油的开采成本仅为1.5美元。而在里海地区，成本飙升到了每桶5美元，而且每桶里海石油还需另加5美元作为运费。
- 【197】 圣约之子会和美国犹太裔国会议员联合会等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都对伊朗持强烈反对态度。
- 【198】 摘自笔者1998年4月26日在德黑兰的采访记录。
- 【199】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都有承接工程的意向。1998年，必和必拓向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有关方面提交了可行性报告。根据必和必拓的规划，天然气管线将以临近波斯湾的伊朗南帕尔斯气田为出发点。
- 【200】 目前，中亚地区两家主要的西方石油项目都由美国公司操控。谢夫隆和美孚公司占据了哈萨克斯坦西部腾吉斯油田70%的股权，而扎根里海的阿塞拜疆国际运作公司40%的股权操控于美国人手中，由阿莫科、优尼科、潘佐尔和埃克森四家分享。到2010年之前，两大油田的日平均产油量可达到140万桶。此外，德



克萨克公司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察格纳克油田20%的股份，美孚公司则在土库曼斯坦的石油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石油项目也亟须外运管线。

- 【201】 摘自笔者1998年4月8日在拉合尔对拉赫达尔·布拉希米的采访记录。
- 【202】 摘自斯蒂芬·金泽尔所撰《各路人马为里海石油展开争夺》，载于《纽约时报》1999年1月24日号。
- 【203】 摘自弗兰克·松戈斯所撰文章《官方提出美国政策大纲》，自由欧洲电台和RL新闻社1999年3月18日联合报道。
- 【204】 1997年6月的几周内，笔者在伊斯兰堡与布尔格罗尼曾经有过交谈。1999年1月30日，笔者和布里达斯总裁在瑞士达沃斯再次相遇，并进行了第二次访谈。两次采访之中，我们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可能是布尔格罗尼先生唯一一次向一位记者畅谈自己的阿富汗管线计划。笔者和他之间的所有谈话记录都来自这两次采访。
- 【205】 摘自笔者1997年2月27日在伊斯兰堡对苏雷达的采访记录。
- 【206】 摘自笔者1995年5月1日在伊斯兰堡对扎尔达里的采访记录。
- 【207】 卡塔尔方面提出，可以通过修建一条海底管线，将波斯湾和俾路支斯坦联系起来。而澳大利亚方面的提案则要通过伊朗南部和俾路支斯坦相连。
- 【208】 摘自笔者1996年6月在伊斯兰堡同一些巴基斯坦外交人员的访谈记录。
- 【209】 摘自笔者1997年2月27日在伊斯兰堡同布里达斯公司负责人员的访谈记录。
- 【210】 基辛格的这一席谈话是布里达斯公司人员告诉笔者的。当时是1997年2月，笔者正在对奥拉西雷古尔进行采访。
- 【211】 摘自笔者1997年2月27日在伊斯兰堡对图多尔的采访记录。
- 【212】 摘自笔者1996年1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对德·拉·罗萨的采访记录。
- 【213】 1996年4月，谢夫隆公司将工程24%的股份转让给俄罗斯方面，从而赢得了莫斯科当局的支持。这项工程将把腾吉斯油田出产的石油输送到黑海港口诺沃罗斯克。此后，美孚公司收购了谢夫隆租赁的腾吉斯项目25%的股份。
- 【214】 受雇于石油公司的美国前政府高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前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阿米蒂奇、前参谋长约翰·苏努努、前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霍华德·贝克，以及两位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亨利·基辛格。
- 【215】 工作组中有多名美国官员，分别来自国务院、能源部、商务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 【216】 摘自笔者1997年1月在阿什哈巴德同外交官的访谈记录。

- 【217】 摘自谢林·T.亨特所著《独立以来中亚情况》一书，由普莱格尔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 【218】 摘自笔者1997年5月27日在阿什哈巴德对奥尔科特的采访记录。
- 【219】 摘自斯特罗贝·塔尔伯特1997年7月21日在华盛顿所作演讲《深化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作为：未来路线图》。
- 【220】 摘自美国得克萨斯州本德堡地方法庭第94144号案。布里达斯公司诉优尼科公司、马尔蒂·米勒和德尔塔石油公司。
- 【221】 1995年10月11日约翰·艾姆勒写给卡洛斯·布尔格罗尼的信被布里达斯方面呈送法庭。信中强调“优尼科向有关政府部门求证了在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之间建设天然气管线的可能性。有关政府表示他们尚未跟任何方面就工程建设达成协议。因此，优尼科有权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就相关天然气项目展开谈判”。
- 【222】 摘自笔者1999年1月31日在瑞士达沃斯对约翰·艾姆勒的访谈记录。笔者向艾姆勒先生提出了30个问题。其中的一些他作了口头回答，另外一些则用书面形式给出了答案。
- 【223】 1997年1—2月间，笔者在不同场合对贝·布托的助手和内阁成员进行了采访。同时，笔者也向总理本人进行求证。布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要求笔者不得引用她的话。
- 【224】 摘自迈克尔·杜布斯撰文《喀布尔的陷落或将终结乱局》，原载《华盛顿邮报》1996年9月29日号。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南亚分会会长，汉克·布朗向所有阿富汗军阀发出邀约，请他们在1996年6月25—27日到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圆桌会议。据巴基斯坦驻美外交人士向笔者透露，一些阿富汗军阀到美国的机票钱是由优尼科方面垫付。当时，布朗对于阿富汗问题的热衷在美国政坛并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他支持优尼科管线项目的缘故。
- 【225】 参见路透社1996年10月1日报道《美国向塔利班派遣代表团》。
- 【226】 摘自笔者1997年1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对纳兹贾诺夫的采访记录。
- 【227】 摘自笔者1997年6月在伊斯兰堡同布里达斯公司人员的采访记录。阿根廷公司和多家美国公司进行联系，企图拉拢美孚、阿莫科和海岸石油等美国主要石油企业，以抵消优尼科和美国政府勾结形成的影响力。同时，布里达斯还邀请英、法、马来西亚多家企业参与其开发计划。一家俄罗斯公司也是被拉拢的对象，阿根廷人此举是为了防止俄方插手自己的计划。
- 【228】 摘自笔者199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对约翰·艾姆勒的采访记录。
- 【229】 摘自笔者1997年1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对明石康的采访记录。



- 【230】 摘自罗伯特·埃贝尔1997年4月撰文《在邻近国家寻找能源：获益者和一无所获者共同面对未来》，由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提供。
- 【231】 两家公司都在塔利班内部拥有支持者。穆罕默德·萨德克曾经应布里达斯之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位毛拉于1997年2月27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哪家公司获得最后的胜利还不确定。不过，我们更倾向于布里达斯。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他们的中立。”
- 【232】 摘自笔者1997年6月在伊斯兰堡对布里达斯公司人员的采访记录。
- 【233】 摘自笔者1999年1月31日在瑞士达沃斯对约翰·艾姆勒的采访记录。
- 【234】 摘自笔者1997年1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对尼亚佐夫的采访记录。当时，土库曼斯坦方面承办了由联合国发起的“援助阿富汗国际论坛”，目的是为了加强本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 【235】 有三家来自欧洲的石油公司参与到了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的管线工程当中，它们分别是意大利的斯纳姆普罗吉蒂公司、法国天然气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
- 【236】 根据合约规定，作为天然气供应方的土库曼斯坦每输出一千立方英尺天然气，便将获得1美元。而作为运营方的优尼科公司的收益则是65~85美分/立方英尺，而塔利班得到了报价则是15美分/立方英尺。如果合约成功签订，塔利班每年的收益可达1.05亿美元，但他们拒绝了。
- 【237】 1997年10月25日，新的中亚天然气联合体宣告成立。其中，优尼科公司占46.5%的股份，德尔塔公司占15%的股份，土库曼斯坦政府占7%、印度尼西亚石油公司（日本）占6.5%、日本伊藤忠商社占6.5%、韩国现代工程和建设集团占5%、巴基斯坦新月集团占3.5%、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占10%的股份。
- 【238】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撤股后，中亚天然气联合体的股权被迫重组。其中，优尼科公司占54.11%、德尔塔石油占15%、土库曼斯坦政府占7%、印度尼西亚石油公司（日本）占7.22%、日本泛亚细亚天然气有限公司占7.22%、韩国现代工程和建设集团占5.56%、巴基斯坦新月集团占3.89%。
- 【239】 摘自《晨曦报》援引路透社1997年8月9日报道。
- 【240】 摘自希拉·赫斯林1997年9月17日在关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参议员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言。
- 【241】 摘自卡洛琳·李斯所撰文章《石油大亨将塔利班告上得州法庭》，原载《星期日电讯报》1997年12月号。
- 【242】 摘自笔者1999年3月12日在瑞士达沃斯对约翰·艾姆勒的采访记录。

- 【243】 摘自保罗·斯塔罗宾所撰文章《新的大博弈》，原载《国家期刊》1999年3月12日刊。这一概念曾被罗伯特·卡普兰引用，见于《地球的尽头，一次在混乱前沿的旅程》一书，年代图书1997年出版。
- 【244】 摘自巴内特·鲁宾撰文《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原载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1997年1月出版的《穆斯林政治报告》。
- 【245】 摘自笔者1997年1月在伊斯兰堡对伊朗外交官的访谈记录。
- 【246】 表面上，巴基斯坦政府对于武器禁运表示支持。但伊斯兰堡方面私下警告美方，禁运将拖慢塔利班的统一事业，继而影响优尼科的生意进展。美国虽然也支持实施禁运，克林顿任内却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措施加以推进。巴基斯坦外交官员向笔者透露，优尼科公司曾出资赞助塔利班分子出席汉克·布朗召开的美参议院听证会。
- 【247】 摘自罗宾·拉斐尔1996年5月11日在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南亚事务部上所作的证言。
- 【248】 摘自罗宾·拉斐尔1996年11月18日在一次讨论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国闭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文字稿由笔者提供。
- 【249】 摘自巴内特·鲁宾撰文《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原载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1997年1月出版的《穆斯林政治报告》。
- 【250】 摘自笔者1997年1月20日在伊斯兰堡对美国外交界人士的采访记录。美国石油公司控制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业，并组成了联合体进行运营。这一联合体后来被沙特政府收归国有，形成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 【251】 “虽然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并没有新行动，但情报分析人员仍在这里为优尼科工作。优尼科和德尔塔公司将抗苏战争时期在阿富汗工作过的美国情报人员几乎一网打尽，全部聘为顾问。”摘自理查德·麦肯齐撰文《美国和塔利班》，收录于威廉·马利所辑《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和塔利班》一书，由伦敦C.赫斯特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 【252】 摘自笔者199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对约翰·艾姆勒的采访记录。
- 【253】 摘自笔者1998年1月27日在伊斯兰堡对美国官员的采访记录。
- 【254】 援引自法新社1998年3月11日电《美方欲在阿富汗扶植傀儡政权》。
- 【255】 摘自斯特罗贝·塔尔伯特1999年1月23日在加州斯坦福大学所作演讲。该演讲文字稿由美国信息服务中心出版。
- 【256】 摘自丹娜·罗拉巴赫1999年4月14日在华盛顿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南亚事务处



所作的报告。报告题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

- 【257】 摘自玛维斯·雷诺1998年3月2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作关于阿富汗性别隔离政策的报告。
- 【258】 摘自莎朗·瓦克斯曼所撰《被披露的理由——好莱坞众女星对阿富汗妇女的苦难感同身受》一文，原载于《华盛顿邮报》1999年3月30日号。
- 【259】 援引自美联社1999年4月28日电《克林顿夫人抨击阿富汗当局》。
- 【260】 摘自笔者1998年6月对内阁部长和相关官员的采访记录。本章绝大多数资料都出自军政官员之口，是笔者在1995—1999年收集所得。参见笔者撰文《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收录于威廉·马利所辑《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和塔利班》一书，由伦敦C.赫斯特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 【261】 摘自马利亚纳·巴布尔所撰《为阿富汗的经济成果而战》，原载《新闻报》1996年1月15日版。
- 【262】 摘自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所撰《“我们无意输出圣战”》，原载《新闻报》1998年8月19日号。
- 【263】 摘自阿克巴·艾哈迈德所撰《战略纵深的背后》一文，载于《晨曦报》1998年8月23日号。
- 【264】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所撰《中东报告》，由温特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 【265】 本章所用的多数资料都来自笔者数十年如一日对军方人士、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外交官和相关政府官员的采访。
- 【266】 不仅跟塔利班打交道的三军情报局人员全部是普什图人，军队总司令阿卜杜尔·瓦希德将军和军事情报局主管阿里·库里·汗中也将也都是普什图人。
- 【267】 摘自笔者所撰《巴基斯坦当局的阿富汗政策违背地区情况致其在亚洲陷入孤立》一文，载于《远东经济评论》1998年3月5日刊。
- 【268】 摘自笔者所撰《巴基斯坦在和平进程上拖联合国后腿》一文，载于《民族报》1998年1月23日号。
- 【269】 摘自笔者1995年4月在奎达对巴基斯坦官员的谈话记录。参见笔者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1995年5月11日刊上的署名文章《无事宣布》。
- 【270】 摘自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著《文明史纲》，由伦敦企鹅图书公司在1993年出版。
- 【271】 当时占据赫拉特的军阀是伊斯梅尔·汗，他的关税税额高得令人咋舌。每辆过境卡车必须付出5 000到10 000卢比不等的代价。
- 【272】 摘自笔者1996—1998连续三年对CBR官员的访谈记录。1993年，美元和巴基斯

坦卢比之间的汇率是1:40。6年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1:50。

- 【273】 警察机构、海关和各大政府部门中都有走私黑帮的内线。笔者的外甥就曾在拉合尔丢过车,那是1997年的事。当时,他被所在辖区的警察局告知,自己的车已经去了阿富汗。不过,如果肯付出一笔“维修费”,车还是可以拿回来的,否则就得易主了。
- 【274】 摘自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学会1998年12月所辑《非正式经济研究》。
- 【275】 摘自《商业纪录报》1998年12月15日刊登文章《西北边境省主要官员称阿富汗转口贸易摧毁当地工业》。
- 【276】 摘自罗伯特·蔡斯、保罗·肯尼迪和艾米莉·希尔合著的《关键国家,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新政策规划》一书,由W. 诺顿出版公司在1999年出版。
- 【277】 “羌城军”(Lashkar-e-Jhangvi)和“巴基斯坦先知之友”都是伊斯兰教士协会的分支派别。两派都要求将什叶派势力彻底清除出巴基斯坦,并各自派出上千名志愿者前往阿富汗为塔利班助战。而塔利班政权也为两个派别的领导者提供政治庇护。
- 【278】 摘自笔者所撰《阿富汗冲突威胁巴基斯坦稳定》一文,刊于《民族报》1998年1月21日号。
- 【279】 摘自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伊撰文《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行动》,刊于《新闻报》1998年12月18日号。同参见法新社1998年12月14日电《巴基斯坦——死刑犯以塔利班方式被处决》。
- 【280】 摘自奥利维耶·罗瓦撰文《塔利班政权的国内和地区影响》。该文刊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学报1999年4月24日号。
- 【281】 摘自笔者1998年4月30日在德黑兰对哈拉兹的采访记录。同时参见其所撰《伊朗试图加强同宿敌的关系》一文,原载《民族报》1998年5月5日号。
- 【282】 1984—1986年期间,沙特方面一共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5.2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1989年,阿富汗抵抗力量一共获取了7.2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其中61%来自沙特阿拉伯,而美国则承担了其余部分。1993年,沙特援阿资金达到1.93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美国至少向阿富汗提供了30亿~33亿美元,而沙特方面提供的资金超过了美国。参见塞缪尔·P.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新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由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 【283】 摘自笔者1989年同一些巴基斯坦情报官员的访谈记录。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巴内特·鲁宾所著的《阿富汗的分裂》一书也对笔者的记录进行了摘抄。



- 【284】 摘自笔者1990年同巴基斯坦内阁成员的访谈记录。同时参见巴内特·鲁宾所著的《阿富汗的分裂》一书。
- 【285】 沙特方面呼吁圣战组织派遣军事代表团帮助本国抵御伊拉克的进攻。这一行动一是为了彰显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二是为了打破外部关于沙特依赖西方势力的宣传。对于此项建议，阿富汗各派大多表示拒绝，只有盖拉尼领导的阿富汗民族伊斯兰阵线积极响应。盖拉尼的党派秉性温和，向来不受沙特方面重视。
- 【286】 摘自谢林·T·亨特1999年2月所撰《伊朗同中亚关系的伊斯兰因素》一文。这篇文章未能发表，不过，笔者仍从亨特女士那里获益不少。
- 【287】 摘自笔者所著《中亚复兴，伊斯兰还是民族主义》一书，由伦敦泽德图书公司在1994年出版。该书详尽记述了中亚五国在独立初期同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 【288】 当时，中亚各国政府都严厉压制国内民主派力量。因此，当地的反对派都披上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外衣。中亚各国政权习惯将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统称为“瓦哈比派”，虽然其中很多并非受沙特支持的瓦哈比分子。关于1991—1994年间瓦哈比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历程，请参见笔者的《中亚复兴，伊斯兰还是民族主义》一书。
- 【289】 包括高等法官委员会、科学研究院、宗教事务指导处和促进道德反陋俗委员会。最后一种机构被塔利班沿袭。
- 【290】 最有威望的教士谢赫·阿卜杜尔·阿齐兹·本·巴兹亲自签发宗教法令，具体内容如下：“从保守的角度出发，美国人和异教徒并无区别，因为他们并非穆斯林。不过，我们应该支持美国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到此的目的是保卫伊斯兰。”关于这一事件的相关内容，参见纳瓦夫·奥拜德所著《针对沙特阿拉伯决策过程的美国情报研究》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 【291】 据沙特消息人士向笔者透露，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之后，沙特国内的清真寺仍从每周五礼拜信众所捐献款项中提取资金以资助塔利班。早在南斯拉夫内战时期，沙特宗教界就用同样手法资助波黑穆斯林武装。
- 【292】 摘自纳瓦夫·奥拜德所撰《针对沙特阿拉伯决策过程的美国情报研究》一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 【293】 摘自法新社1997年4月21日电《塔利班向沙特索要支持》。
- 【294】 摘自法新社1997年9月17日电《塔利班为争夺阿富汗北方城市展开激战》。
- 【295】 这段话在笔者的另一篇文章《阿富汗——通往灾难之路》中被引用。该文章原

载于《先驱》杂志1996年11月刊。

- 【296】 1986年，笔者在吉达采访了沙乌德王子。3年之后又在伊斯兰堡和图尔基王子进行了访谈。两位王子都精明过人，能言善辩，不过他们也都对阿富汗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同自己的美国盟友一样，沙特情报机关也依赖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为自己提供有关阿富汗的情报。
- 【297】 摘自法新社1998年10月12日电《装载武器的车队遭截获》。
- 【298】 摘自法新社1997年6月24日电《塔利班关闭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
- 【299】 摘自法新社1997年9月22日电《塔利班扬言报复伊朗》。
- 【300】 摘自法新社1998年8月14日电《伊朗称塔利班为地区威胁》。
- 【301】 摘自法新社1997年6月15日电《伊朗就阿富汗政策向谢里夫施压》。
- 【302】 伊朗当局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一位伊朗外交官的证言。在马扎里沙里夫大屠杀中，这位外交官装死逃过了一劫。他带着伤回到了德黑兰，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讽刺的是，杜斯特·穆罕默德回到坎大哈后却进了监狱，因为他的老婆向奥马尔告了一状。她认为自己的老公从巴米扬带回了两个哈扎拉情妇，然后把自己赶出了家门。
- 【303】 摘自笔者1998年9月在伊斯兰堡以及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会议对伊朗外交界资深人士的采访记录。
- 【304】 摘自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8年6月17日在纽约对亚洲学会发表的演讲记录。
- 【305】 摘自笔者1998年4月30日在德黑兰对哈拉兹的采访记录。
- 【306】 摘自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所著《战士的荣誉、民族战争和现代意识》一书，由纽约年代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
- 【307】 摘自笔者1998年5月14日对布拉希米的采访记录。
- 【308】 摘自《新闻报》援引法新社1998年10月13日电《阿富汗伤亡人数居高不下》。
- 【309】 摘自安德斯·方格撰文《困难和机遇：阿富汗援助所面临的挑战》。这篇文章是1999年2月24日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专题报告。
- 【310】 摘自哈罗德·埃勒斯托恩所著《克里姆林宫的叛将——亚历山大·列别德：权力和幻想》一书，由伦敦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在1998年出版。
- 【311】 援引自法新社1999年5月20日电《石油运输管线不能满足生产》。
- 【312】 1988年5月，穆罕默德·汗为首的民选政府遭解散。此后，1990年8月的贝·布托政府、1993年4月的谢里夫政府和1996年11月的贝·布托政府先后遭遇同样的命运。
- 【313】 摘自费迪南·布罗代尔所著《文明史纲》一书，由伦敦企鹅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

- 【314】 摘自笔者1999年3月6日对消息人士的采访记录。
- 【315】 摘自安德斯·方格所撰《困难和机遇：阿富汗援助所面临的挑战》一文。这篇文章是1999年2月24日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专题报告。
- 【316】 摘自加里·C. 施罗恩所著《首次披露：内部人士记录下的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介入》，由纽约巴兰钦图书公司在2005年出版。
- 【317】 摘自加里·C. 施罗恩所著《首次披露：内部人士记录下的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介入》，由纽约巴兰钦图书公司在2005年出版。
- 【318】 摘自《洛杉矶时报》2002年5月17日号所载文章《拜登同意支援1.3亿美元以保证阿富汗安全形势》。
- 【319】 摘自詹姆斯·琼斯和哈尔兰·乌莱曼所撰《阿富汗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一文。该文章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在《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10日号上。
- 【320】 卡尔·艾肯贝里上校的这番证言发表于2007年2月13日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其文件稿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提供给笔者的。
- 【321】 摘自罗恩·莫罗撰文《美国的新梦魇》，载于《新闻周刊》2009年7月26日刊。
- 【322】 摘自安东尼·科尔德斯曼撰文《让我们认真面对》，载于《泰晤士报》2009年8月10日号。
- 【323】 摘自N·C. 艾泽恩曼撰文《乌兹别克斯坦家庭陷入梦魇》，刊于《华盛顿邮报》2005年5月18日。同见《人权观察》2005年6月出版17辑第5号所刊登的文章《弹如雨下：记2005年5月13日安集延屠杀》。

全世界都在

新华社驻巴基斯坦首席记者
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首席摄影师

联袂推荐

《塔利班》的读者有新闻记者，也有外交官，甚至连进驻阿富汗的美军山地师的军人也人手一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塔利班》一书的价值和影响。

——荣守俊，新华社高级编辑，2003—2005年驻巴基斯坦新华社伊斯兰堡分社首席记者

《塔利班》透过一个个新闻纪实，对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解读了神秘塔利班政权的兴衰。

——赵鹏，新华社河南分社摄影部主任，2004—2007年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

拉希德对这场纠纷中的各色人等了如指掌，他们就如同19世纪大博弈年代里的人物一样狡诈多变。

——鲁珀特·埃迪斯《星期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杰作，花费了21年的研究和写作……布莱尔给予了很高评价。德国外长费舍尔也在公开场合提到了它。

——卡梅伦·费舍尔《先驱报》

全球畅销15年 译为28种语言

ISBN 978-7-229-08704-3



9 787229 087043 >

定价：58.00元